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曾志回忆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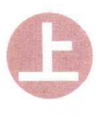
上

⊙曾　志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曾志回忆实录



⊙曾 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曾志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2
ISBN 7-218-02997-3

Ⅰ.①一…②曾…
Ⅱ.曾…
Ⅲ.曾志－生平事迹
Ⅳ.K827.7

著　　者	曾　志
责任编辑	何祖敏　倪腊松
特约编辑	杨筱怀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　　张	19.5
插　　页	10页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1999年12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2997－3/K·668
定　　价	36.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1932年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曾志。



1961年毛泽东与曾志、陶铸夫妇在广州珠岛合影。



60年代曾志在毛泽东的书房。

60年代初曾志在白云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



1960年冬，陶铸、曾志、陶斯亮与朱德、康克清在一起。



1959年曾志、陶铸与叶剑英、陈郁、区梦觉、林李明、邹家华、叶楚媚在一起。

1965年朱德、董必武、徐向前、聂荣臻、贺龙、陶铸、林李明、刘兴元、何连芝、薛明、张瑞华、黄杰、曾志在广州。





1997年曾志、陶斯亮与王鹤寿及夫人王颖在一起。



1995年江泽民与曾志等老同志在一起。



1997年胡锦涛与曾志、陶斯亮在北戴河。



1998年6月24日，曾志与曾庆红、由喜贵在北京医院。



1992年曾志与王任重在一起。



1958年曾志、陶铸与越南胡志明主席合影。



1995年曾志与胡耀邦夫人李昭在一起。



1954年陶铸、曾志、陶斯亮在广州家中。



1959年陶铸、曾志、陶斯亮在庐山。



曾志与陶斯亮一家。

曾志与陶铸在湖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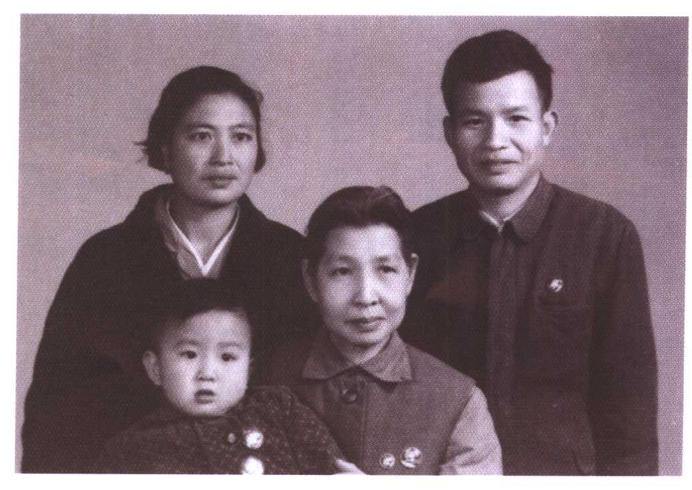
1947年曾志在东北。



60年代初曾志与外宾在一起。



1989年11月30日曾志与陶斯亮在八宝山一室门口。陶铸逝世20周年。



1969年11月曾志出中南海赴翁源前与曾春华全家在一起。



1990年4月，曾志二上井冈山看望石来发一家。



1998年4月4日曾志87岁生日。陶斯亮等兄妹三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母亲合影。



1998年3月16日，湖南暴动70周年、夏明震墓落成，陶斯亮代重病的母亲凭吊夏明震烈士。



1998年7月，井冈山，陶斯亮与大哥石来发夫妇、二哥曾春华夫妇抛洒母亲骨灰时在石来发家门口合影。



1992年9月曾志在家门前种花。



这是曾志外孙小亮为姥姥拍的最后一张相片。虽然病魔缠身，却依然笑容灿烂。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代序）

柯　岩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是辉煌的，抑或是黯淡的，你都将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有的长期交往，有的擦肩而过；有的令你赞叹，有的令你惶惑；有的令你鄙夷，有的令你无可奈何。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或此事让你钦佩，或彼举令你心折的人；但是，能让你刻骨铭心、终生仰慕、每一念及则令你肃然起敬如涤心肺者，滚滚红尘中，也就屈指可数了。

于我，曾志同志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其实，我和曾志同志相识很晚，交往不密，是她人格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终生教育着我。当着人，我像别人一样地叫她曾大姐；背着人，或只当着她家人的时候，我叫她曾妈妈。她曾多次反对说：就叫大姐吧！她的女儿亮亮（陶斯亮）也老憨笑说：我叫你小柯阿姨，你叫她曾妈妈，这不错了辈了吗？于是全体大笑。笑归笑，可不知怎么，多少年，还是这么叫下来了。

记得初见曾志同志是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广州会议刚开过不久，正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时候，许多文友聚会在北戴河。郭小川同志一天忽然对我和敬之说：陶铸同志也在北戴河，咱们看他去呀！我忙问：曾志同志也在吗？郭小川

说：你认识她？我说：哪儿呀，我只是想见她。郭小川点着头笑说：可陶铸同志会客，她一般是不出来的。我说：你说我们就是想见她嘛！陶铸同志谁还没见过呀！郭小川说：你为什么非见她不可呢？我说：她是传奇式的女红军嘛！郭小川磨不过我，用手挠着头说：嚯，还知道得不少呢！试试看吧……也不知郭小川是怎么试的，反正是联系成了。不但联系成了，而且说陶铸同志请我们吃晚饭。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不住地问：曾志同志出来吗？啊？曾志同志出来吗？

到了陶铸同志处，一看，只有陶铸和亮亮。我非常失望，又不甘心，就不断地和郭小川嘀咕，郭小川只好去走亮亮的后门。亮亮那会儿好像刚上军医大，一个大学生，又爱好文学，对我们十分热情，不一会儿，就把曾志同志请出来了。

怎么说呢？从那时到现在，长长的三十七年过去了，又是这样翻天覆地的三十七年！多少痛苦，多少快乐！多少眼泪，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可写到这儿，三十七年前的那个黄昏，仍那样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好像刚刚发生在昨天、在今天一样。

当时，亮亮喜笑颜开地出来说：妈妈来了。她是那样满不在乎地一说，可我竟一下愣住了。因为虽早有准备，知道曾志同志很漂亮，也听说过陶铸同志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总以为那是她年轻时候，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正是残酷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她又是出名的勇将，是陶铸同志把她想像成"母大虫"的强烈反差的缘故。却原来，她真是这样的美！我一直在美女如云的文艺界工作，眼睛早就历练得很"毒"，自是和当年的陶铸不一样；而她，也青春早逝，已年过半百，记得那天，她身着一件极其普通的月白色衬衫，浅灰色长裤，可气度却那样不凡。坐在北戴河陈年旧绿的纱窗下，和我们轻言细语地话着家常，是那样纤柔秀丽，又那样优雅脱俗，直能令你目不转睛。既很难想像出她当年赤脚持枪奔走在福建的崇山

峻岭叱咤风云的勃勃英姿，也很难看出现在是一个身居高位的广州这样一个繁华大市日理万机的工业书记。

那会儿我年轻，就那样很不礼貌地盯着她看，只间或瞟一眼风风火火的陶铸同志，席间说了些什么，竟完全不记得。回去后，可就抓住小川不放了，让他反反复复地叙述有关曾志的一切，他所说的，我至今记忆清晰。他说她是如何地英勇顽强，从年轻时就一直活跃在红军中，可谓身经百战；说她是如何地机智慧敏，在地下工作时怎样多次死里逃生，真是命如悬丝；说她是怎样自尊自强，因为陶铸同志一直身居领导岗位，整个战争年代，她几乎都和他分开各自工作；说她是怎样地情深义重，宁肯受处分也要把危险告诉被错误怀疑的同志；说她个人生活十分曲折不幸，但对革命却无限忠诚，无论是重病在身，还是被错误处分，都不计个人得失地默默为党工作，为革命丢失了几个亲生的儿子……他说得十分动情，我听得如醉如痴。之后，我又向多少革命前辈询问过有关她的情况啊！之后，我又曾和曾志同志有过多少接触啊！但是直到今天，直到此刻，直到我在含着眼泪一页页读着她这本回忆录时，我才知道：她哪里是什么丢失了儿子?！她是为了革命，亲手把他们都送了人，其中一个，甚至是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心甘情愿地卖了一百块大洋……

我不禁掩卷痛哭了。我们这些后来者常常自认为很革命，可是，对于革命前辈，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对于他们的艰辛困苦，他们的怀抱胸襟，我们更是体会不深！曾志同志很谦虚，她说她写这本书，只因为她是一个历史见证人。可是当我们读到那位伤残而不能重返前线的老红军背着小亮亮，历时一年，千山万水、顶风冒雪、忍饥挨饿甚至乞讨……终于把她送还父母的怀抱；当我们读到“文化大革命”旋风陡起，一向极其自尊的曾志对挨斗回来的陶铸说“……我……以后……再不和你争论了”；当我们读到陶铸那首《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

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把它深深地缝进衣角；直到陶铸病体支离被押解出京，明知是死别，却滴泪不掉，只含笑握手。陶铸头也不回，曾志目随万里……这是多么深重的同志情，多少崇高的革命义，何等澄澈的壮士情怀，何等刚烈的铮铮铁骨！看着他们，想着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先行者，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地安享由于他们的奉献而得来的一切吗？还能高高在上地挑剔指责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吗？是的，他们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可是，即使由于时代的进步，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有了多少进步，但在我们的后人看来，我们不也会有我们的局限性吗？是的，他们是革命者。可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是父亲和母亲。不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也处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们肯像他们一样，只是为了后来人，而心甘情愿地、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吗？

我奉劝人们读读这本书，我还想请求哪位高明的编导把它编成戏，拍成电影，因为它不但能让后来人了解那段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还会扩大我们的人生视野，让我们知道世界上确曾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无私无畏，完全忘我，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可以披肝沥胆、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决不是像某些人所描绘的“头脑简单”的“傻瓜”，而恰恰是一些大智大勇的人，一些像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极其鲜明个性的人，不同处只在于：即使我们真心实意地终身努力，恐怕也很难企及这些人。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在面对曾志同志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她和屠格涅夫《门槛》里那个少女叠印起来，无论她在对我说什么，我的耳际也都会叠响着文中那著名的充满诗意和哲理的问答：

深暗的浓雾里吹着雪风，从建筑深处透出来一股冷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

“呵，你想跨进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的。”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

“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

后来我也上了年纪，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每当和曾妈妈面对时，我眼前呈现的画面和耳中响起的声音就要比那更为鲜明和浓烈。因为我懂得了：其实跨进这个门槛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在跨进这个门槛之后。多少人在跨进了这个门槛之后又退了出去；又有多少人在门槛里改变了初衷……

而曾志同志，我们的曾大姐，曾妈妈!却不但跨进了门槛，而且矢志不移。无论是慷慨悲歌，还是衣单被薄；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生离死别，她都面不改色。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手握权杖，无论生降荣辱，还是黄金如雨，她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

艰苦朴素，严格自律，从容淡定。从一个纤纤少女直到白发苍苍，她永远是那么的正！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她，她正为了家人买了几样时令菜在批评他们，亮亮先还不服，见我进门，高兴地跳起来说："小柯阿姨来了，小柯阿姨来了！"可曾妈妈根本不容她转移话题，说："小柯阿姨来了，你也跑不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百里大堤往往毁于蚁穴……"她举了好几个腐化变质的实例，直说得满座肃然。又一次，她一个当空中小姐的亲戚随手带回了飞机上用剩下的咖啡和小毛巾，她居然为此专门给民航写了信，让他们注意对年轻人的教育……在她入党七十周年之际，许多敬慕她的老同志自发地为她举办了一个纪念会，她却在会上反复地讲述自己革命几十年中的教训和错误；她临终时，叫亮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亮亮找出八十几个没用完的薪金袋，一共只有几万元。可她还反复叮嘱亮亮说："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因为它们能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是我的辛苦钱，上缴给中组部老干局……留给外地来京……看病的……困难的老同志……用……"

她过世后，亮亮在一只旧牛皮纸信袋上，看见妈妈写有这样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打开信封，遗嘱写道：

> 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

亮亮为了完成妈妈的遗愿，让妈妈死后真正成为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就真正让她这样走了。曾妈妈从从容容地、坦坦荡

荡地走了，像清风明月一样静静地走了。于是，她也就像清风一样永远吹佛着我们，像明月一样永远照耀着我们，岁岁年年，直到永远……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像屠格涅夫一样说她是“一个圣人”吗?不，我不能。我只能说：她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人生的路上都能像她一样既追求崇高，又甘于平凡；只执著于自己的信仰，而淡泊于功名利禄。这样，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就能像她一样说出“我的一切所得都是干净的，是清白的，清清白白的”了。

写在前面

我叫曾志，今年（一九九八年）八十七岁。我算不上是领导、名人，也不是奇人，更不是伟人，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也许有人问，那你为什么要写回忆录，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呢？这是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我参加党、参加革命七十多年，这期间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了，我并不贪生怕死，然而我却幸存下来，死亡之神多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什么“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斗争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信三座大山一定能推翻，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同一定能成功。正是靠着这些信念，我才得以从各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境中顽强地走了过来，从无数险恶的逆境中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我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的环境下工作过，从事过武装游击斗争、地下斗争、统战工作、抗日工作等

等。我有过成功与胜利,然而也有过挫折和失误。我曾多次受过处分,而其中也有过冤枉和委屈……

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一直抱着积极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和斗争。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当前,我们的祖国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引下,正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宏伟大业,并昂首阔步迈向新的世纪。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莫忘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我有责任和义务,抓紧时间把我从呱呱坠地开始的这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述下来,付梓刊行,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

因此,如果广大读者能够从我的这些平凡的往事中得到一点教益、启示和借鉴的话,我也就没有遗憾了。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于北京医院

目 录(上册)

第二章 初涉洪流

第三章 经历失败

第四章　井冈上下

第五章　白区涉险

第六章 驰骋闽东

第七章　千里寻党

第八章　武汉重逢

第一章　少儿时代

祖父是个赳赳武夫，却干起悬壶济世的营生，一日三餐离不开酒；父亲毕业于法政学院，却是个书呆子，在赚钱的官位上干着赔钱的事；一天到晚骂丈夫是“昏君”的母亲，生了我们姐弟四人

我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我的祖父叫曾秦章，听说清朝时在永新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虽是赳赳武夫，却偏爱读书，尤其精于医道。不知何年何故，祖父解甲归田，举家回到宜章老家王家冲。

祖父自此悬壶行医不再舞刀弄棒。凭着精湛的医术和豪侠仗义、古道热肠，祖父很快成为当地驰名的中医。他不仅在家号脉诊病，还自己上山采摘草药、搓药丸、制药膏。经常有人抬着轿子到我家请他去看病，祖父有求必应，遇到穷苦人家看病，就免费施诊送药，因此深得乡人的敬重。

祖父是一个酒仙，每日三餐少不了酒。为此，家中专门腾出场所酿酒，母亲过门后还学会了酿酒，以使家中常年储备有六七坛陈酒供祖父享用。他还有一个怪癖，喜欢用打来的野味下酒，可新鲜那会儿却不吃，硬是把肉搁在柜子里，待发臭后再吃。真让全家人不可思议。

在我六岁那年，祖父突然带着我们全家人离开了王家冲，进城去了。在宜章县城，祖父只花二三百元，就从一位急着用钱的



六十年代曾志在广州。

破落财主那里，买下了一座有好几进且有店面的砖瓦大院。在那里，祖父继续行医，但不到一年，祖父就病死了。不知祖父何时结下的一伙冤家，到家里大闹灵堂，祖母一气之下，一周后也愤然去世。

在往县城搬家时，祖父就把家给分了。他把曾祖父传下的在窑头的老房子留给其余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我的大伯父二十一岁便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女儿；我的二伯父二十五六岁那年，撇下妻子和三男一女，也跟着走了。

我的父亲叫曾祯，毕业于长沙法政学院，思想比较开明，算是当时的新派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他曾在长沙花钱买了个厘金局长的位子。常人看来这是个赚钱的职位，可他不仅没赚到钱，还让人家给坑了，赔了积蓄和田产。

无奈，父亲只好回到宜章经商。成千上百种买卖，他偏选了个最没有销路的酱菜生意。小县城里家家户户都做腌菜、酱菜，他却到郴州运回酱萝卜、酱姜、豆腐乳之类的，其结果自然是空守柜台，门可罗雀。后来只好再回长沙做事，仍是不得要领，“赔了夫人又折兵”，将祖上遗下的田产差不多折腾个精光。

我的母亲对此很有意见，一天到晚骂他是“昏君”，迂腐无能，办事不力，考虑问题不切实际，并且老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不是。

父亲长年在外读书、做事，与母亲本无感情，加上受新思潮的影响，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姨娘。她是一个满族人的养女，算不上很漂亮，和父亲结婚时才十五岁，但他们关系融洽，情投意合。然而好景不长，在官场和商场屡遭挫折，郁郁不得志，使父亲像他两个兄弟一样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六岁。尽管父亲终生一事无成，但他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厚道与清白，而这些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家一共四个姐弟，我是长女，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的大弟昭仁，提前两个月来到了这个世上。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很差。当生下弟弟八个月后，母亲又怀上了妹妹，没有了奶水，只好找奶妈。奇怪的是，找了奶妈，弟弟就是不肯吃人家的奶。后来在乡下找到了一个奶妈，但人家提出要送到她家里养。这家的孩子已一岁半了，加上农村生活很苦，奶妈每天吃的是瓜菜，所以奶水质差量少。等到弟弟两岁接回时，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快要死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救活过来。

后来大弟上了模范小学，又念了十年的私塾。抗日战争时中山大学撤退到坪石，他进校读了一段时间书。一九三七年我们在湖北应城县汤池创办合作人员培训班，他也来参加了。一九四六年，他就在郴州中学教书。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到武汉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军工厂下属的职工学校当数学教员。一九五三年他随工厂迁往大连，直到退休。

我的妹妹昭德，生下后，母亲为了照顾弟弟，便把她送给别人奶养，四岁时才接回来。回来后显得傻乎乎的，还特别能吃。有一回母亲生她的气，给她装了一大碗饭。她真的把饭全吃了，结果不消化，又吐又泻。她害怕母亲，母亲对她也没有感情。她一直在家里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直到十五六岁才送她去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部队的连长，部队开拔去了四川，她就离开了家。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收容人员被送到军需厂做鞋，后又到广东的南方大学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冶金系统工作。由于她的政审不合格，被调到花县的一条渡轮上记账收费。后来公安部门将她解职送回宜章。

我的小弟昭礼，比我小十三四岁。他还算比较幸运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在大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所就读的广州的一所大学被迫停课，他便回到家乡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队伍被编入地方部队，他进入了武汉军政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南海舰队司令部


小弟曾昭礼。

的一个俱乐部当主任，是个中尉，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后来在审查历史时，以他在广东的学校读书时是三青团骨干为由，将他下放到贵州，在贵阳市手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工厂当副厂长。后来他得了肺气肿和心脏病，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其实，昭礼这个三青团员是在广东上学时，按校方的规定集体加入的，他也不是什么骨干，只是一个小组长罢了，但当时却没有弄清楚。小弟本来很有前途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我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但幸运的是，我的祖父和父母亲，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开明正直而不守旧。加上我诞生和成长的那个年代，正处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转换的风云激荡之中，而这些对于我童年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后来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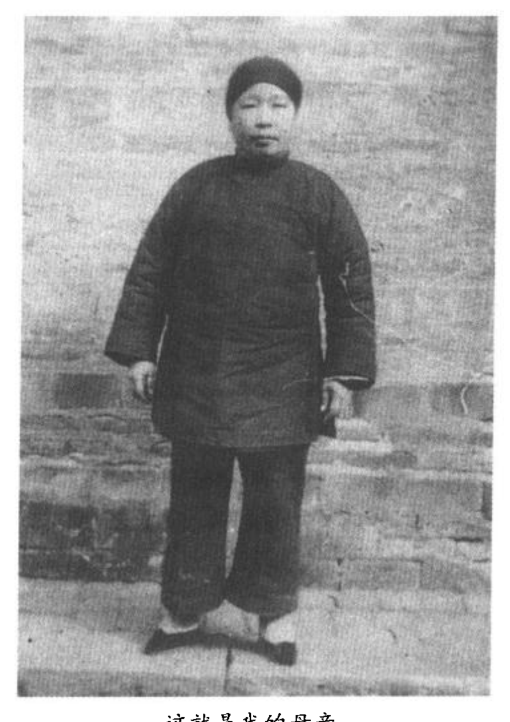
母亲是个缠着小脚的农村妇女，吃尽了名义夫妻之苦，却省吃俭用，送子女读书；她不仅支持我参加革命，还冒杀头的危险帮共产党收藏书籍

我想特别写一下我的母亲，因为她生前多次嘱咐过，要我把她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供在神龛上以作纪念，并传之于子孙后代。

我的母亲叫吴富田，出生在一个盐商之家。

母亲的娘家在本县离坪石镇不到五里的一个叫接官亭的村子。宜章靠近广东而远离长沙，中间被骑田岭相隔，使水路不能

直通长沙，但可通广东的乐昌、韶关。当时湖南完全靠广东的海盐，从广东用船将盐运抵长沙，至宜章后要改用骡马驮过一段光滑的石板山路，到郴州后再装船上路。年复一年，骡马的脚印深深地嵌在这段被人称之为骡马路的石板上。宜章县城有条骡马大街，就是当年专门为骡马落脚的地方。外祖父主要是做盐的生意，也兼做其他的杂货生意，终年来往于湖广之间。



这就是我的母亲。

外祖父生养了三男一女，母亲排行最小。大舅、二舅死得早，惟有三舅活到六十多岁。外祖父也死得早，我没见过他。此后，外祖母便没有再嫁，支撑着这个半农半商的小康之家。亲人相继过早辞世的悲痛，使她哭瞎了眼睛。但是这个坚强的老人，硬是摸着洗衣做饭，直到七十多岁去世。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只是她的音容笑貌依稀可记。

母亲十七岁那年嫁到曾家，婚后父亲仍回长沙法政学院继续学业，只有放假才回家。四年后，母亲生下我，月子做得十分隆重，外祖父家送了四抬礼盒，有孩子的衣服、用品和吃的东西，光是鸡蛋就送了四五百个。

我的母亲是一个缠着小脚的农村家庭妇女。她善良朴实，乐

于助人，坚强开朗，贤慧能干，同一家人相处和睦，左邻右舍的人也都很喜欢她，尊重她。

但她惟独与父亲关系很僵。父亲读了不少书，可是并不开窍，终生一事无成。不会赚钱就懂得花钱，爱面子，摆阔气，只好靠变卖田产维系。母亲不肯交出田契，两人因此经常吵架。更让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居然在长沙花钱娶了个小姨太，并把她带回家中。两人只好分居单独过，基本上不往来。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这辈子吃尽了名义夫妻的苦。

饱受目不识丁之苦的母亲，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对我这个丫头也不例外。

这与当时的风气也不无关系。那时宜章有好几个大地主送子女到大城市读书，他们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到家乡传播革命，宣传启蒙教育。如邓中夏，他的父亲是宜章县议员，叫邓典模。听母亲说，他们家讲新礼教，父子俩通信称兄道弟，平等相处。

正是在他们的宣传影响下，一些有钱人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往大城市念书。出去读书的人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像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是女子师范的第一批学员，五年后学成回到家乡办学，传播革命思想。我母亲与他们接触多年，所以思想很开通。我父亲也是读书人，他没什么思想，但也不守旧，为人厚道，支持我上学读书。我八岁到长沙读书，十二岁回家后再次出去读书，钱都是我母亲出的。

尽管母亲是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受到见多识广的外祖父以及那个家庭的影响，她思想开明，通情达理，易于接受新事物，喜欢与年轻人往来，同情支持革命。

我十二岁那年去长沙读书，路途遥远，要坐轿子还要乘船，母亲却很放心，只托轿夫路上多关照，让我孤身一人坐轿子到郴州再转长沙。

她对女儿的事很少干涉，甚至投身革命也从不反对而且还很支持。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这是一个令任何母亲都不会放心的年龄，但是深明大义的母亲明明知道这是要杀头的事，却没有流露出内心丝毫的担忧和沉重，总是默默地支持着女儿。

大革命时，宜章县委就设在我们曾家大院。县委书记和他的妻子以及隔壁小学的一批年轻教师也住在我们家。母亲待他们如同亲人，经常给他们做好吃的。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母亲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她用实际行动关心和支持革命事业。

“马日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县委被迫转移。县委将一批文件和《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交给他们认为值得信赖的曾家大嫂保管。母亲冒着杀头的危险，将这些东西藏在阁楼的夹层楼板中，等待着有朝一日党组织会派人取走。数年后我回到家乡，母亲对我提起此事。我对母亲说：

“这些文件书籍放在家中很危险，还是销毁了吧。”

“不行！这是县委放在这里的，我不能乱动，将来我还要如数还给他们。”母亲毫不含糊地说。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经过宜章，两位衣衫褴褛、饿得走不动的掉队红军战士，讨上家门。当母亲得知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后，悄悄地把他们带到厨房，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然后每人塞给两块现大洋，让他们追赶部队去。

是年，我为了避难回到宜章，不久突然接到一封从广州寄来的回信，说福建省委被破坏，叛徒带人到广州抓我，幸好我已离开广州，但他们把其他同志带走了。估计敌人会随后追踪而至，叫我尽快离开老家。母亲知悉后，迈着她那双小脚连夜跑到轿子铺请轿子，翌日一大早送我上了路。尽管她也知道，那是一条很可能不再回归之路，但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要我自己多加珍重；同时祈求佛祖保佑女儿，保佑革命早日成功。

父亲死后，我们家原有的三百多亩田产已被变卖得所剩无

儿。母亲只有依靠余下的二十多亩地租和一点房租收入，勤俭节约，苦心操劳，艰难地维持着这个败落破残的家直到新中国成立。

一九四九年宜章解放了。我在延安党校的同学宋维静，在宜章境内的南岭煤矿当军代表。南岭到宜章有四十多里路，宋代表乘吉普车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感激不已的母亲竟然做了许多好吃的，挎着篮子，迈着小脚，走了四十多里的路，回访了宋代表，并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参观了煤矿。

同年的秋天，我在中南工业部担任副部长，母亲到武汉看我们。那时是供给制，我吃小灶，母亲经过秘书长批准吃大灶。我经常把饭打回来同她一道吃。她没吃过馒头，说馒头好吃，就只吃馒头不吃菜。

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工矿考察团到北京出差，母亲要警卫员马国亮带她到机场看飞机、坐飞机。警卫员恰好认识武汉飞机场的师政委，他原来是我在东北工作的那个地区的专员。他们真的把我母亲带到飞机上参观了一番。老人家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还着实在飞机座位上坐了一阵。虽然飞机没有带她飞上蓝天，但足以让她大开眼界，心满意足了。母亲就是这样，对什么都很好奇，很有兴趣，喜欢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广东电业局工作。母亲也和我们一道住在电厂后面的工人宿舍里。那里共住有七八家人，她和工人邻居们相处得很



1961 年与母亲、亮亮在广州家中。

好，十分密切热乎。平时她经常将好吃的东西分送给左邻右舍，邻居们也常给她送来一些好吃的。

春节时，母亲叫我把家不在广东的工人、工程技术员请回家来，亲自煮饭烧菜请他们吃。

记得一位工会主席的家里养了几只火鸡，送给母亲三个火鸡蛋，母亲用自己的鸡把火鸡蛋孵成了小火鸡，老人高兴得笑逐颜开,像个天真的孩子。

我家门口的马路上种着一种有毒的叫石栗子的树，结的果实像核桃。她摘了许多果实用火煨熟吃了，结果中了毒又吐又泻，很危险。当时我不在家，回来后才听邻居说起这事。老人家就是这样，吃什么东西总是要吃个够。有一次我不在家，她和宋维静买了一个十多斤重的大西瓜，狼吞虎咽，最后吃得她撑着肚子，鼻子直往外流清水。

母亲平时自己省吃俭用，我给她买了些糖果饼干，她总是舍不得吃，要留给孙子。广东这地方很潮湿，她虽然把东西包得很严实，但时间一长就发霉变质，结果孙子吃了以后得了急性肠胃炎。

母亲身体不好，一九五九年突然得了脑血栓，三个月后拄着拐杖出院了。她不想死在广州,怕火葬,要求回湖南老家。我们只有顺从了她。

一九六三年秋，母亲因心肌梗塞悄然去世，走完了她七十二年的人生旅途。

我之所以单独开个章节写母亲，那是为了了却她老人家的一桩心愿。

四岁那年，我淹死了一只老母鸡，母亲揍我一顿之后，又把我绑在凳子上，拿出长长的布给我裹脚；祖母抡起洗衣棒追打母亲，使我的天足得以保住；第一天上

学，祖母按着我给孔圣人磕了三个响头

一九一一年四月四日（农历三月六日），在母腹中呆了十二个月的我，终于姗姗来到这个人世间。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十六岁时嫁到曾家，四年后总算有喜，全家人像盼什么稀世珍宝似地等待着曾家传人的诞生。人家都说十月怀胎，但我却不知什么缘故，似乎不大理会全家人急切的心情，在母腹中多呆了一阵，方迟迟降生。难怪母亲说我是怪胎。

父亲给我取了名字叫“昭学”。

我的出生地叫王家冲，那里景色秀丽，风光旖旎。房前有一条水渠，清澈的溪水款款流过，屋后背靠郁郁葱葱的山岗，周围是一大片的稻田和菜园。我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直到六岁才随祖父搬到宜章县城里去住。

小时候，我是个相当顽皮的女孩，胆子大，个性强，脾气倔，好奇心重，特有主意。跟小朋友们一起玩，从来是支使别人而不受他人摆布，从小就显露出贯通一生的倔强和独立不羁的性格。

尤其是好奇心特强，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有时还干点恶作剧什么的。看见祖父那么爱喝酒，我也想尝尝，大人越是说小孩不能喝酒，我就越想偷偷地尝几口。一天趁大人不注意，我溜进酒窑，陈酒又甜又香，那一次不知偷喝了多少，最后醉倒在酒坛子旁边了。事后我免不了挨了一顿揍。

看见棺材，那好奇心也作怪。趁大人们忙于入殓之事，我就偷偷地爬进棺材里，闭目挺身地躺了好一会儿，就为体验一下死人躺在其中是啥滋味。

四岁那年，我抓了家中一只抱窝的母鸡放在水渠里玩，结果把母鸡给淹死了。我怕挨母亲打，跑到后山躲了起来，后来迷了路，自己走不回来。到了晚上村里很多人点着火把到处找我。当大

家找到我时，我正躺在又厚又松软的松毛上酣睡着……

气得半死的母亲打了我一顿还不算完，又把我绑在凳子上，然后拿出一条长长的白布给我裹脚，边裹边骂：

“看你以后还野不野！”

可怜我那双小脚丫啊，四个脚趾被使劲窝向脚掌心，被布条一层层缠着，再用针线缝死。这是中国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女孩都要经受的酷刑。我疼得忍不住哼哼,还不敢大声哭。祖母听到呻吟声走了过来，看到心爱的孙女在活受罪，气得骂了母亲，并抡起洗衣棒追打她。母亲无奈，只好解开了裹脚布，这通罪好在前后仅半个时辰。

后来，在外接受解放妇女新思想的父亲也明令家人，不得再给我裹脚。就这样我的天足得以保住，并用这双天足走上了漫长而坎坷不平的革命道路。

要感谢祖母！如若不是她那一声怒呵，一根棒槌，我就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成为一个摇摇晃晃的小脚女人，那么嵌印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的将是另外一种足迹。

尽管孩提时代的我淘气调皮，但祖父、祖母却十分喜爱我的机灵、勤快和嘴甜。我常跟着祖母下菜地，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她年纪大了，有人陪她说话就高兴。祖父也爱带我去玩。有一次，他同我上山去采油茶籽，天黑了也忘了回家，是我催他，他才记起。回家后祖父在家人面前夸我说：“要不是我孙女，天黑了我还不知道回家呢!”

六岁时，我们全家人跟随祖父搬进县城，此时父亲也从长沙回到宜章。父母亲都同意送我上学，除了启蒙之外，也想通过学校和老师治治我的野气。

这是一所刚开办的女子学校，两位老师都是在我父亲的积极鼓励下，考入设在衡阳的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她们回到家乡办起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学校就设在我家隔壁。

记得第一天上学是祖母陪着去的。一进校门，就被祖母按着跪在“孔圣人神位”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学校读的是新学，国文课从“人、口、手、足”等最简单的字开始，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因此我依然有时间淘气玩耍。在校两年，我仍改不了调皮劲,没事就爬到高高的树上,吓得老师在下面直叫唤。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几个调皮鬼合伙将一个很老实的男同学骗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绑在一棵树上。后来割草的人发现了他，才给他松了绑。老师知道此事后，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个大圈，罚我们几个站圈，足足站了两节课。

尽管我在学校调皮捣蛋，但学习成绩不差，我的启蒙老师彭镜秋特别喜欢我。后来彭老师也投身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现在就住在北京木樨地。在她九十寿辰的时候，我专程登门祝寿。几十年来，我对她只有一个称呼——老师!

是啊，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往往是最令人难忘的。

七岁时，家里给我和吴家长子订婚；第二年，我到长沙读小学，住在父亲的第二个家里；姨娘偏爱她生的儿子，我操起秤杆照着姨娘的后脑勺就是一下；吴家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腐败透顶

正当我无拘无束地享受着童年乐趣的时候，家里却给我订了婚。两家是世交，未来的公公叫吴静，比我父亲长几岁，是个十分活跃的政客，念过不少书，还是宜章县议员和湖南省议员。他家上层关系复杂，同军界、政界经常往来，关系密切。

吴家是个中等家庭，大概只有几十亩田地、一幢房产。他还办实业，长沙电灯公司有他的股份。那时他住在长沙，拿省议员的俸禄。订婚时送的订婚礼，却非常讲究，共抬来几大盒子。七岁的我看到这些礼物,还真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静只有两个儿子，同我订婚的是长子，比我年长七岁。小儿子比我大两岁，患有羊角疯病，傻乎乎的一个人。吴静娶了大小两个老婆，另有一个外室。

我八岁那年初秋，吴静派他的侄子到宜章接他的小老婆去长沙住，父亲请他们顺便把我带到长沙读书。我们先坐轿子到郴州，然后再乘船到长沙。一天，吴静的侄子和吴静的小老婆吵嘴，他侄子打了那女人一耳光，把她打下了水，又急忙把她捞了上来，那女人倒在他侄子的怀里又哭又闹。当时的我已到懵懵懂懂的年龄，总感到两人关系极不正常。

到长沙后，我住在父亲的另一个家中。我头一次感到不开心，我再也得不到祖父、祖母的疼爱和母亲的庇护了。我和父亲、姨娘以及三岁的小弟弟一起过。姨娘偏爱弟弟，不能一视同仁，无论分什么吃的，给我的一份总是少的、差的。我觉得委屈、憋气，体察到了最初的不平等和感情的冷漠。

我们住的房子是租的，共三间。房子前面有个花圃，专门卖兰花。屋后不远处有个大寺庙和一个广场。

吴家的房子也是租的。这本是一个旧官僚的宅院，高大的圆顶门楼，很是气派。进入大门，便是花厅、客厅，有一个带天井的小院,其后是卧室、书房、饭厅、厨房,甚是宽敞。尽管居住的是租来的房子，但吴家却十分讲排场，摆气派。我们两家离得很近，除世交之外,又加上联姻,因此两家人经常往来,十分亲密。

我在长沙读的是衡翠小学。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职业学校，可以学刺绣手工艺，有很多二十来岁的女青年在校学习湘绣。而我那时只能上普通小学的课程。

有一天早晨，我发现我得到的早餐糯米糍粑，比小弟弟的少。我不知怎的，心中蕴藏已久的无名怒火被点着了，我操起秤杆照着姨娘的后脑勺“啪”地就是一下，打得她连呼救命。父亲闻声出来，拿起菜刀追我，吓得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未来的

婆家。

吴家没有女儿，对我特好，把我当女儿看待，收留在家中。接着送我到学费昂贵的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益湘小学读书。平日住校，放假时用黄包车接回，每个学期交费七十块现大洋。放假时，吴静还亲自挑选两个年轻漂亮的英文、国文教员，负责教我和他的两个儿子。

刚到吴家的一段时间里，我感觉一切都还不错，享受着富家千金的荣华富贵。但渐渐地我觉得那里的一些事令人困惑和费解。呼吸惯了乡间淳朴清新空气的我，感受到的只是压抑和一股腐朽的霉味。

吴家老爷口头上标榜进步追求民主，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个十足的封建老太爷。每当老爷回府时，所有的奴婢、姨太、妻子都得排队到门口恭候迎接。老爷登堂入室后，送茶的、宽衣的、更鞋的、捶腿的、打扇的、递毛巾的、拿报纸的，大家围着他一人转。我们早上起床要向老爷请早安，晚上睡觉也要道晚安。吃饭时的规矩就更多了，夏天吃饭时，婢女要站在老爷身后打扇；冬天时，菜碟子下面要用开水保温，夹菜只能夹近处的，远处的菜他的大老婆没给夹,你就不允许去夹,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也不例外。

老爷在家时，一切规规矩矩；老爷不在家时，那就翻了天似的，一切都随便得很。

吴家人表面上装得像正人君子，可暗地里却男盗女娼。与我同居一室负责关照我的大婢女，与我无话不谈，从她那里我知道了这家的一些秘密。老爷娶了姨太太，又霸占大婢女和养外室，还想在年轻漂亮的家庭教师身上打主意。而姨太太又与侄子私通，侄子也想霸占大婢女……

简直是乌烟瘴气乱了套！

但是对几个孩子，老爷却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一天，

老爷向老师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老师说我学得好,说他的大儿子笨,学不进去;小儿子傻,就更不行了。老爷盛怒之下,将大儿子绑在凳子上,用竹条打,把屁股都打烂了,趴在床上好几天都起不来。他喜欢我,从不打骂我,有时还和我说说笑笑。他经常在客人和家人面前说我是他的女儿,说将来老了要依靠我。但有一次,我因为站在大门口被他看见,罚跪二十分钟才算罢休。他的小老婆也因为站在大门口挨了打。

老爷在外也参与政治活动,可能是拥谭延闿、倒赵恒惕,但失败了。回到家中一气之下病倒了,躺了八个多月就死了。老爷死后,吊唁十分隆重,许多官僚、军阀都来吊唁,我们披麻戴孝地陪着,来一批人哭一次,没完没了。

老爷的葬礼回宜章老家举行,全家也随船迁回宜章县城住,我同他们一起回去参加葬礼,途中坐船就坐了四十多天。埋葬了老爷之后,我又同那个未婚夫一道回长沙,继续教会学校的学业。

放暑假时,我在吴家大老婆的弟弟家住了几天。此人也是个小政客,会赚钱,也很风流。他只娶了一个老婆,但他老婆很坏,据说常帮助丈夫搞女人。老爷尸骨未寒,他就在吊唁厅里与吴老爷的小姨太眉来眼去,勾勾搭搭。

老爷死后,我也就离开了那个没落的豪门绅士之家。参加革命后,受到了许多革命的教育,我逐步理解了当初的困惑。都说有钱人家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我比别人就体会得更加深刻。

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我最感兴趣的是看小说和体育运动;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从小立志当巾帼英雄的我,渴望当兵;在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报名表上姓名栏里我填上了"曾志"二字,同学问我为何改名,我说:我就是要争志气

一九二四年夏，学校放暑假，我回了趟宜章。假期过后，我又返回长沙读书。在郴州到衡阳的船上，我认识了同船的几个衡阳女师的学生。从她们那里,我初步懂得女师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所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规严格，教学有方,校园规模宏大,整洁卫生,共有八百多名学生和一百多名补习生。

船到了衡阳，我还得换乘火轮船去长沙。那几位女生劝我还没开学别急着走，到她们学校去玩几天。好奇心驱使我真的跟着她们去了。

果然校园大得出奇。一进校门，就是一个偌大的操场，教室、办公楼、宿舍均是一色的青砖瓦房。校园中还建有鱼塘、花池，校园旁边有一大片橘子林，后面是一大片松树林。

到校后，我就住在她们宿舍。此时也巧，正赶上学校半年一度的招考新生，校门口贴着布告，每个县招两名，而宜章却空缺无人报考。她们就鼓励我去报名，可是当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她们极力鼓动我说：

“你就试一试吧！”

我鼓起勇气去了。没想到居然还考上了，而且考得还不错，八人当中我考了第三名。

那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雨后春笋般勃发，大革命的浪潮正呈风起云涌之势。而只有十三岁的我，对这些政治时事还没有发生兴趣。我依然沿着童年的生活轨道我行我素，热衷的只有两件事——看小说和体育运动。

我看小说用的不光是课外时间，晚上自习课的大部分时间也在看小说，只是在查房时把课本拿出来做做样子。有时上课，把小说藏在课本底下，装着在听讲看课文，其实是在看小说，老师不到跟前一般是发现不了的。要考试了，就临时抱佛脚，每次考

试居然还不错,成绩中上。

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体育运动。那旺盛的精力，似乎只有在操场上才能得到充分宣泄。我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马儿,总爱在 篮球场上奔跑，在跳马架上翻飞，在沙坑前腾越，在跑道上冲 刺……总之，一切体育运动我都喜欢。由于我是学校的优秀球员，因此和其他四十多位体育好的同学享有单独用餐的优待，伙食较之其他同学要好些。

也许正是得益于在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锻炼，练就了我的良好体质，使得我在后来的游击斗争生涯中，能够对付各种恶劣环境，和男同志一道在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周旋。

一九二五年春，新学期刚开学，学校教务长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传达省长赵恒惕的一道命令。说不许学生参加共产党，不许听信共产党的宣传。违者轻则开除，重则判刑甚至杀头。当时听了很恐怖，搞不懂共产党到底是啥东西，当时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这些问题。反正事不关己，听完了也就过去了。我依然整天泡在操场上。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还有个共产党。

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时隔一年后，我不仅参加了这个党，而且终生与这个党永不分离！

不过当时我对国民革命还是有些印象的。那时国民党左派在学校搞了个半公开的区党部，负责人叫夏明衡（夏明翰烈士之妹），还有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等人，但她们究竟做些什么事，我并不知道，也没去过问。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当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那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正闹得轰轰烈烈，学校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相当活跃，也有人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我听得较多的是，宣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说那些封建军阀、豪绅地主表面上仁义道德、正人君子，暗地里男盗女娼、尔虞我

诈，都是坏东西。对此，我是非常拥护的。对照我在吴家大院的所见所闻,我觉得这些宣传都是事实,我能接受。

同样，我还接受了男女平等的宣传。旧社会女人在家里受压迫,像我母亲,吃饭都要单独在矮桌子上吃,有时要等男人吃完才轮到女人吃。不仅如此，妇女在社会上更是没有地位可言，受到多重压迫。所以那时提倡剪短发,我很快响应,将一头秀丽的长发给剪掉了。放假回家还因此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

是年夏天，学校放假。我们几个宜章籍的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和几个第三男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又结伴回家。从衡阳到宜章有四百多里，因为是逆水，不能乘船，我们只好步行回家。

沿途看到一些学生模样的男青年，背着行囊，三三两两地往南走。我们好奇地打听：

“你们这是到哪里去？”

“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要不要女生？”我急着问他们。

“不要女的。”

我当时真的好生失望。

我从小立志当巾帼英雄，做现代花木兰，渴望成为一名军人，经常幻想女扮男装去当兵。我们湖南不像别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而是有崇武的传统，这可能是受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影响，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当兵光荣，甚至有钱人家也喜欢送子女去参军。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女孩看，因此当兵习武的愿望也就格外强烈。

因此，看到这些热血男儿大鹏振翅向南飞去，我是何等的羡慕。我真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七尺男儿。

终于，机会来了！

一九二六年的初秋，新的学年开始不久，一天我在饭厅里吃饭，隐隐约约听到隔壁几个女同学正在叽叽咕咕议论什么考试的

事。我随便问了一声“考什么”，她们回答说是考“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当时还不清楚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干什么的,学什么的。她们告诉我是“学革命道理、学军事、学怎样发动开展农民运动”的。一听说有学军事,我就来劲了,请求她们带我去报名。她们说初试已经结束，只剩下复试了。我央求她们带我去见讲习所的负责人。

她们见我主意已定，便真的把我带去见讲习所的总队长赵伯诚。我对他说：“我早就想学习军事，我一定要进讲习所，我一定会刻苦学习，遵守纪律……”他看我情真意切，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终于作了让步，破例准予我直接参加复试。我高兴得呀，又蹦又跳。

在入学填写报名表时，我郑重地在姓名那一格里填写了“曾志”二字。同学们不解地问我：

“为什么改名了？”

“我就是要争志气！”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她们。

两天后，我如愿以偿。从此我离开了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走进了设在衡阳惠民中学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道路将在这里来个急转弯，从此走上了一条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

第二章　初涉洪流

踏进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我换上了灰军装，终于成了英姿飒爽的女兵；其他女兵违反训练纪律，被转到“政治所”；我强烈要求留下，成为讲习所里惟一的女兵

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第二个培养农民运动斗争骨干的场所。除少数农会干部外，招收的学员绝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总共一百一十二人，其中有十几名女生。

我当时才十五岁，是最小的一名学员。

讲习所设在已停课很久的教会学校惠民中学。学校离湘江不远，校园相当大，有一幢洋楼，是学校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还有一座两层的小楼，有五六个教室。

讲习所的构架完全按照军队建制，只不过叫总队、区队、小队，相当于连、排、班。所长彭平之是一名早期共产党员，曾在萍乡安源煤矿办平民夜校，和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一起发动领导过工人运动，大家都很敬重他。总队长赵伯诚，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教务主任夏明震，毕业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衡阳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总务主任兼讲习所党支部书记叫宾利用。下面的区队长则都是国民党部队派来的连排级干部，小队长多是农民协会的区干部。彭平之还有其他工作，所以不常到学校

来，具体管学校的是总队长赵伯诚和总务主任宾利用。教务主任夏明震也经常到校讲课。

当我踏进讲习所的第一天，就脱下学生装，换上灰军装，剪短头发，戴上大盖帽，扎上绑腿，束紧皮带，对着镜子仔细照。

我终于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女兵，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

讲习所所学课程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主要讲共产主义 ABC，讲帝国主义论、社会进化论，讲全国的农民运动形势，讲怎样发动农民、组织农会，领导农民运动。另外还经常召开报告会，介绍北伐军进军形势和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军事课刚开始时是学军事操，后来还有进行野外训练、实弹射击等等。

记得第一次上军事课，教官是国民党军队派来的。学的是立正、稍息、向左向右转和向后转等。那些洋学堂出来的女学生随便惯了，对上操不以为然，做动作不认真，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教官大声训斥也不管用，少数女生还是那样吊儿郎当，他气得用厚皮鞋对着站得歪歪扭扭的一些女学员又踢又骂。

这一踢非同小可，踢得女学员直抹眼泪。这些女学员有的是富家出身，平时娇气和高傲惯了，哪里受得了如此粗暴的对待。于是，她们串联好，在一周后的一次政治测验时，每人都写上同样的意见：坚决反对军阀作风，赶走××区队长，否则我们就不上他的课。几乎所有的女学员都响应了这次抗议，惟有我没参与。因为我立志要当兵，喜欢上军事课，因此觉得没必要与她们搅在一起。

所长彭平之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这还了得，刚开课就敢不服从教官，违反训练纪律。这种人不适应军事训练，也不适合搞农民运动。第二天早上点名时宣布，这次的提意见是违纪行为，并宣布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全体女学员一律转到政治运动讲习所去。有些怕苦怕累的女学员求之不得，而一些有志于农民运动的

女学员却后悔地哭了。

下操后，我找到总队长提意见：“我没有违反纪律，为什么把我也转过去？”他说:“你一个女生留下不方便。”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有困难我可以克服，厕所我可以晚上去，澡我可以在男生洗过之后再洗，反正我不走。赵队长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再次作出让步，把我单独留下。我自己住一间，不久所里派人专门为我挖了个小茅坑。

就这样，我成为讲习所里惟一的女兵，恐怕也是大革命年代最早投笔从戎的女青年之一。

当时黄埔军校不收女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不收女生。直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才在武汉招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一些大姐如彭镜秋、张瑞华、危拱之、黄杰、钱英、夏之栩、曾宪植等，都参加了武汉分校女生队，可这时我已经从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了。我也曾想过去考武汉分校女生队，但又一想很多课程都已学过也就罢了。

原来在讲习所同窗的女同学中，有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还有夏明翰、夏明震的妹妹夏明衡，她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在一起时，她们好像很忙。不久她们转到政治运动讲习所后，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剩下我一个女生后，大家就把我看得很特别。每当学员队出操时，总会吸引很多人到街边来看热闹。人们指指点点，想从队列中找出哪一个是女的。当时我早把头发剪得跟男生一样短，于是人们总是把排在最后的那个小男生当成是我。我们经常到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大操场打野外，也会引来许多女生，特意看看当初的校友、如今的女兵是怎么个当法的。

那个时代的女人大都是小脚女人，对女人的定义就是洗衣服、做饭、生孩子。看到我不仅穿军装、扛大枪，而且撒开大脚丫与男人一样出操、行军、摸爬滚打，觉得不可思议。

在衡阳，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我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思考人生问题，并决心反抗我的“包办婚姻”，母亲出面退回了聘礼；十五岁那年，我面对着党旗立下誓言：从今以后，我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讲习所里只剩下我一个女兵了，我深知自己的分量，决心为千千万万受压迫和歧视的妇女姐妹争志气！

我想，男女平等，男的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比男的做得更好，就是再艰苦、再困难、再紧张，我也要坚持下去。我克服了生理上的种种不便和不利，咬紧牙关战胜困难。虽说是农民运动讲习所，但我们的学习生活完全是军事化。军事训练相当多，也相当严格。野外训练，不管刮风下雨，无论道路上坑坑洼洼，是泥是水，让卧倒我就毫不犹豫地趴下，叫冲锋端起长枪就上，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女性。

特别是紧急集合，一般都在夜间进行。开始要求五分钟，后来要求三分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集合。谁去晚了就要挨批评、受处分（罚站、关禁闭）。为此，我每天入睡时，把衣服、帽子、绑腿、皮带放在指定的位置，并把它记熟了。不管什么时候，军号一响，我就一下爬起来，摸黑随手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然后跑步到指定地点站队集合，因此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当然晚上睡觉决不允许不解绑腿带或不脱衣服，否则查铺时被发现也是要受处分的。

我并没有因为我是女兵而要求特殊照顾，或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当时衡阳一带闹土匪，说是要来进攻衡阳，我们怕土匪晚上来袭击摸哨，思想上很警惕也很紧张，远远地看见人就喊口令举枪盘查。但男生站几班岗，我也一班不少。每次急行军，我都咬

着牙关紧跟队伍，一次也没掉过队。半年的军训，所学的所有科目，我都是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一次批评没挨过，且成绩也属中上。我从中得到很大的锻炼，也增长了不少军事常识。

不仅如此，我对政治学习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初步接触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懂得了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了解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这些丰富的道理和知识，使我顿觉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回想过去，我从来不用功读书，是那样的无知。我暗暗地自责，并贪婪地吸收着这些全新的知识和丰富的营养。我开始思考一些革命和人生的重大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婚约及未婚夫的家庭。在讲习所里，政治教官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其中就指出要打倒封建旧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而我在那个吴家生活四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到的，不正是革命要推翻的那种腐朽没落、扼杀人性的封建旧礼教吗？它曾经吞噬过不知多少青年的幸福和生命。如今，作为一个革命的新女性，难道我还要去充当它的牺牲品吗？

我决心反抗这桩包办婚姻！

我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明自己已选择了革命的道路，那桩婚事当初是父母包办的，如今还是请母亲出面去解除。深受旧式婚姻之苦的母亲理解自己的女儿，只好备了几桌酒席，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中人，退回了聘礼。对方也是世交，知道已无挽回的希望，也就同意退婚了。

摆脱了精神上的枷锁，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我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幼稚、淘气、贪玩、成天蹦蹦跳跳，脑子里却一片空白的女孩子了。我感到自己充实了、坚强了，有了质的转变。我越来越坚定地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大志。

有一天，总队长赵伯诚单独找我谈话，他郑重其事地问我：

“曾志，你愿意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愿意！”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赵队长当即就拿出一张纸，让我填写了姓名、籍贯和个人的一些情况。几天后，他又发给我一张表格，像现在的入党志愿书，两张纸对开的，我填好交上去。一个星期后，他高兴地告诉我，党支部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

十月底的一天，我被通知到农民协会办公楼上。入党仪式是秘密举行的。支部书记宾利用主持仪式，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教务主任夏明震代表党委致词，他十分严肃地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了。肉体只是人的躯壳，政治生活是人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肉体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却不能动摇改变，你们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不渝……”这些话七十多年来我仍然牢牢记在心间。

面对墙上悬挂的党旗，我和二十多位男学员庄严地举起了右手，跟着宾利用书记向党表达了自己的誓言。

接下来，每个新党员表态发言。轮到我时，我太兴奋、太激动了，以致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态度。最后，我只讲了两句话：

“从今以后，我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当时入党一般要有半年预备期的，但由于大革命时期急需干部，讲习所半年毕业后就要投入工作，所以规定讲习所的学员入党不要预备期。

此时我的年纪只有十五岁，讲习所团支部见我年纪轻，是团员的年龄，也来找我谈话，介绍我加入共青团。所以我与别人不同，我是先入党后入团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讲习所举行了毕业考试，经过整整半年严

格的政治、军事训练，我以总分第八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当我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边，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夏明震跪在我面前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的心一软，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有我一个女生，还没等毕业，就有许多单位来联系要我。衡阳驻军的一个团长专程到学校来找过我；衡阳警察大队有个协理员，他是国民党左派，也可能是共产党员，他也来学校找过我；衡阳农民协会的妇女主任龙淑，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妻子（现还健在，九十多岁了），她通过教务主任夏明震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要我去她那里工作。另外，还有妇女运动讲习所也想聘我去当教员。

因为我是党员，我服从组织的决定，首先是到农民协会做专职的妇女干事，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队的聘请，做政治助理员，算是正式的军官，每月有五十块大洋的薪水。警察大队共四百多人，我每周到那里上一两节政治课，有时全体集中上大课，有时则下到中队去上小课；有时在礼堂上讲，有时就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后来，我也到妇女运动讲习所为她们讲过几次课，那里的学员有几十个人，文化程度和年龄参差不齐。

记得那时去讲课，也不懂得什么讲课艺术，就凭着与生俱来的胆大，年纪轻记性好，我照着在讲习所里学到的东西，依葫芦画瓢。总之，一个年轻的女教官，加上崭新的知识、浅显的道理，大家都很愿意听我的课，如此而已。

当然，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我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

正是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

说来话长。尽管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为了便于工作，衡阳公开共产党身份的只有三位同志。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化名王达山。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她可能是个达官显贵家的小姐，家在长沙朱家花园，有上千亩土地，内有亭台楼阁。她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了革命思想，背叛了她的封建家庭。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后成为我丈夫的夏明震。

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舆论所迫。

那时我才十六岁，刚从讲习所毕业，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根本没考虑那事，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

我办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研究工作。夏明震是组织部部长，经常找人来谈话。夜深了，我便先睡。他们开他们的会，开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那时，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农民在乡间打土豪、分田地，吓得地主都逃到城里藏身。他们恨透了农民运动、恨透了共产党。他们网罗地痞、流氓、土匪，在衡阳郊外建立反动武装，扬言要攻打衡阳城，杀害工会、农会负责人，放共产党人的血。因此，衡阳决定戒严宵禁。

有一天夜里，夏明震召集会议，一直开得很晚。像往常一样，困了，我就先睡了。半夜里，醒来一翻身，发现有个人靠在我的床边躺着呢，原来是夏明震。我把他推醒，问他：

“他们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我的住地远，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他们有的住得近，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我没处去，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天一亮就走。”

我见他是和衣睡，连被子都没盖，且无恶意，也就没理会，翻个身又睡了。第二天一早，他没叫醒我就走了。

早上起床我也没在意这事。吃早饭时住在我隔壁间的总务主任宾利用见到我笑嘻嘻地问：

“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很愉快吧？”

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顿时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下午夏明震来找我解释，我不听，把他赶了出去。

后来，他找了妇女主任龙淑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你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夏明震原来也没什么思想准备，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他愿意同你结合，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不然你怎么办，舆论对你不利。

她还告诉我，夏明震出生书香门第，祖父是做官的，母亲是大地主家的小姐，读过不少书，懂诗文。夏家兄妹五人都投身革命（后来都为革命英勇捐躯，夏明震有个哥哥，便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震曾由母亲作主订过一门亲，女方大他好几岁，念过一些书，当时正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夏明震对她并不满意，正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个女生自由恋爱，那女的追他追得很紧。

说实话，当时我对夏明震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虽说他年轻英俊、才华横溢，但讲话老是慷慨激昂，像个演说家。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对总队长赵伯诚印象更好些。赵队长军事过硬，为人稳重、含蓄。那时他三十多岁，已经成家，妻子是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是自由恋爱，来往信件很多，双方感情很好，我对他很尊重。

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开门，夏明震就冲了进来，抓住我的双

手动情地说：

“我是真心爱你的，你就不要拒绝了，同我结婚吧！”

说着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

看着他那样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软了。

婚礼是那样的简单，没有仪式，没有酒宴，也没有鞭炮。当时正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夏明震在组织部机关住，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能到组织部去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订好一个日子，我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儿去住了。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些喜糖、花生、瓜子、糕点放在小桌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就算是结婚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它是那样的偶然，又是如此的简单。

湘南特委决定举行衡阳暴动，计划由我带人打开城门；临近暴动日时，中央派来了邓中夏，取消了暴动

当时我们还没有感受到新婚的幸福和甜蜜，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向我们挥起了屠刀。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破坏国共合作，屠杀共产党人。工会、农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被迫撤出长沙，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残酷杀害，长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长沙“马日事变”没几天，衡阳的形势也急转直下。为了防备敌人的进攻，夏明震等一批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各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工人纠察队撤出衡阳，上南岳衡山打游击；特委机关也迅速撤离，转入地下斗争，隐藏在一个离市区较远的小学里。

尽管衡阳的反动派趁机捣毁工会，抢劫大商店，但由于我们

事先有了准备，敌人捕捉屠杀共产党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这时上级指示，准备暴动，攻打长沙！湘南特委也作出决定，举行衡阳暴动，里应外合消灭衡阳城内的反动派。

当时我们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从衡阳撤出来的工人纠察队和常宁水口山的矿工纠察队，共二百多人。只有数十条枪，其余拿的是梭标大刀。作为内应的是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干部和骨干分子。当时的暴动计划是，由我带领四人在暴动的晚上，从我住的房子的屋顶爬到城墙上，再从城墙上偷偷下来，干掉看守南门的四个敌兵，然后打开城门，让城外的武装队伍进城，与城内的内应会合。先解决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警察武装，再镇压反动分子。

计划是有了，但缺少枪支弹药，特别是急需短枪。为此特委要我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当时北伐军陈嘉佑部从广东到武汉，暂时驻扎在衡阳。他属下的一名副团长叫陈东日，是共产党员而且也是宜章人，特委派我去找他。他为了同我联系，装病住进了地方医院。我装着去医院看望病人，向他汇报了暴动计划，并请他设法为我们搞些枪支弹药，他答应了。因为他手下的几个连长、指导员是我们的同志，有的是国民党左派，所以搞些枪还是有办法的。

果然，第三天他就把三枝匣子枪和上百发子弹交给了我。我带回来交给了特委书记陈佑魁。

离暴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我渴望战斗。可是此时中央派来了特派员，叫邓中夏，也是宜章人。他三十多岁，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着一顶博士帽，长得很魁梧、很精神。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从母亲那里听说了他，以及他家庭的一些情况，因此对他很尊敬，很钦佩。

邓中夏向湘南特委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取消暴动！他说，现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这个时候举行暴动十分不利，取胜的可能性不大。现在重要的是要积蓄力量，保存实力，转移到农村去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斗争。听了他的传达，我们只好将已准备好的暴动计划放弃了。

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不太被人注意，加上我比较机灵胆大，因此，特委很多跑腿的事都叫我去做。我连日在外奔走，传达特委的决定。

邓中夏在衡阳住了两天，他听说我也是宜章人，看我十分积极肯干，对我也有好感，说：

“你表现得还真不错。”

我就见过他一次，后来听说他在一九三三年英勇牺牲了。

在邓中夏走后不久的一天，有人来敲我的房间，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警察来查户口。那警察见到我一怔：

“啊！原来是助理员，没想到你住在这里。”

当时他态度和蔼，不像是来抓我的样子。但事后我想，还是提高警惕为好，因此决定转移。我们留下一个做饭的管家，我和其余住在一起的几个女同志一道，连夜转移到特委机关的秘密住地——西湖小学。

敌人突然搜查，我机智地翻墙逃脱，在停着十几副灵柩的乱坟岗躲了一夜；一向不信灵的我闭目祈祷马克思的在天之灵

西湖小学位于衡阳城西门外，比较偏僻，校长是地下党员，还有几个教员也是我们的同志。那所学校已停课，大部分的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校长和几个内勤留校。

特委机关暂时设在那里，特委书记还有几个男同志以及两个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就住在这所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我们

把武器和自制的土炸弹藏在纸篓里，上面盖上废纸，把一些文件和宣传品藏在学生宿舍床上的稻草垫下面。

一天晚上八时许，我刚从外面执行任务回来，和大伙儿正抢着做饭。传来一阵脚步声，黑暗中走进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和他的护兵，我定睛一看，原来还是个熟人。我曾是警察大队的政治助理员，给他们讲过课，所以彼此认识。我不解地问他：

“你今天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的营前些天刚到这一带驻防，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寺庙里,晚上没事过来看看。”

这时，我透过护兵手中灯笼的灯光，一眼看到第一道门外有十几条黑影，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我觉得不对劲，但装出一副浑然不知、若无其事的样子，抱歉地说：

“唉呀营长，我正在做饭手很脏，没法跟你握手，我去洗个手就来。”

我回到厨房后面，看到一个男同志急匆匆地走在我前面，只见他跳到墙角一个放小便桶的木架上，再翻身过墙不见了。我也学着他翻身过墙，然后在黑暗中拼命地往前跑，穿过一片菜园，跑到一处黑黢黢的乱山岗上。

待我回过神来，再看四周，立即被吓出一身冷汗。在我的周围就停放着十几副待葬的灵柩，在惨白的月光下，那些黑森森的家伙愈发显得狰狞可怖。远处传来几声猫头鹰凄厉的啼叫，令人毛骨悚然。而在我之前跑出来的那位男同志，此刻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可是这时我反而忘记了害怕，因为令我心急如焚的是，特委书记陈佑魁近日身患腮腺炎高烧不退，此时正睡在厅堂旁的房间里。我从陈东日副团长那里取回的三枝匣子枪就放在他那屋子里，一旦敌人搜出，那就完了！

一向不信佛也不敬神的我，此时不由得闭目祈祷：

“马克思在天有灵，千万保佑我们的特委书记，保佑我们的同志不出什么事情吧！”

那一夜，我就在那里躲着，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这时我才发现昨晚慌不择路，把一双白鞋弄得全是黑泥巴。我找到水沟，把鞋清洗干净，然后溜到学校附近，观察动静。不一会儿，看到昨晚先跑出的那位男同志走进学校，里面没什么动静，我也就跟着进去了。

一进屋，见几位女同志正在厅里好端端地坐着，特委书记安然无恙,也好端端地在床上躺着。我不由地长长地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那儿了。我问，昨晚没发生什么事吧？她们告诉我，昨晚来了十几个敌兵，把各房间都把守住，搜查完了又盘问一番，我们说是教员，放假了没有回家，就住在学校。敌人信以为真，后来见没什么结果就走了。

奇怪的是，敌人居然没有搜查特委书记的房间，门口的士兵听到一声吆喝，也就撤走了。而那时，陈佑魁早已手握双枪，打开扳机，准备和敌人拼死抵抗。这真是奇迹，我对大家说，这是马克思在天显灵！（然而奇迹不会有第二次。六年后，陈佑魁被捕，壮烈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一天，特委书记对我说：“你在国民党警察大队任过职，又是外地人，很难隐蔽下来，随时都有危险。组织上决定你到南岳衡山去搞武装斗争。”我一听很高兴，喜的是夏明震也在那里坚持斗争，我又可以和他在一起工作了。另外，我也渴望打仗，我要向杀害无数战友的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

几天后，我踏上了前往南岳的行程。

衡山聚集了一批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人，夏明震担任指挥长，手下有四百多人枪，与山下的国民党武装对峙；农民利用迷信的办法壮胆，打仗时，见子弹真能打

死人，很多人就偷偷开溜了

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的东南部，是我国五岳名山之一。衡山的最高峰叫祝融峰，海拔一千二百九十米，那里地势险峻，云雾缭绕，松竹葱郁，是开展游击斗争的理想战场。

“马日事变”后，衡阳、衡山等县的一批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率领农协骨干、农民赤卫队，于六月撤到南岳衡山，准备在那里坚持游击武装斗争。湘南特委在山上建立了武装斗争指挥部，指挥长就是夏明震，副指挥长朱石君，手下有四百多人枪。

国民党当局也纠集了山下几个县的民团武装数百人，与山上革命武装形成对峙局面。他们封锁了上山的重要路口，盘查过往行人，企图切断山上与山下的联系。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化装成一个富家小姐、学生模样，雇了一顶轿子上山。路上还算顺利，没有遇到盘查。

上山后我终于见到了夏明震，他看到我从天而降也非常高兴：

“你来得正巧，过几天我就要走了。我要到长沙向省委汇报这里的斗争情况，这里交朱石君指挥，你就同她在一起吧。我过几天就赶回来。”两天后他就走了。

那时山上的同志们士气高昂，正积极准备迎接山下敌人的进攻。但他们缺少枪支弹药，多数人拿的是梭标、大刀，鸟铳还算是好的了，步枪加起来才二十多枝，匣子枪还是我搞到的那几枝，几位领导佩带着。

农民们用一种迷信的办法来壮胆，先杀一头猪，烧香拜佛，请菩萨保佑打胜仗。然后杀一只鸡，喝鸡血酒盟誓，决心打败国民党反动民团的进攻。

一天，在树上窥望的哨兵传来敌情，敌人兵分四路攻上山来。在朱石君同志的指挥下，农民武装进行了英勇的还击，同时

虚张声势，在洋铁桶里放爆竹，迷惑敌人。我们一连打退了民团的几次进攻。

战斗十分激烈，民团仗着人多枪好频频发起进攻。我们凭着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抵抗着。

但是后来我们的人越打越少，到第二天下午清点人数时，四百多人的队伍，除死伤之外，只剩下几十个人了。原来这些来自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赤卫队员，相信迷信。原先还是很勇猛的，但后来看到子弹是能打死人的，很多人就偷偷地开溜了，有的躲起来了，只留下骨干积极分子。

怎么办？朱石君当即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敌众我寡，不能硬拼，大家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再聚合。

衡山区农协的副委员长劝我们说：

“你们两个女同志都不是本地人，在此难以立足，甚至会连累我们。你们还是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吧。”其他同志也这样劝我们。

因此朱石君决定同我一道到长沙，找省委汇报工作。

我们先坐小船，后坐火轮，大约两天后便来到长沙，与省委顺利地接上了头。朱石君向省委领导汇报了南岳武装斗争的情况。

这时组织上通知我，夏明震也在这里，你的工作和夏明震一起分配。我找到夏明震，他一见到我便说：

“你来得正是时候，组织上要我们俩到郴县加入郴州县委，从事地下工作，两天后就走。”

郴州县委实际上是中心县委，附近的郴县、宜章、桂东、桂阳、嘉禾、蓝山、临武、永兴、耒阳、资兴等县都归郴州县委领导。夏明震调任郴州县委书记，我任秘书长。

由公开斗争转入地下斗争后，我很不适应；小家庭的家务我根本不会做，最苦闷的是不能随便上街；我整

天呆在家里，经常对夏明震发火

对我来说，从事地下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我们到郴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个小家庭。一个叫陈奇的同志从亲戚家为我们租了套房子，各种用具都是现成的。过去我从没过过小家庭的生活，不会煮饭做家务。现在有了小家庭，感到做家务事是很头痛的。

首先是生火。郴州烧煤，我们要先买回煤粉，用黄土和水搅拌制成煤饼。炉灶建在地下一米多深的坑里，我没烧过这样的煤灶，因此做饭成了头等苦差事。白天生的火，晚上要用湿煤封好，我不会封火，第二天打开一看煤都烧过了，只好再生。有时一边火着了，另一边熄了，做的饭也是一边稀饭一边生米，半生不熟的。经常吃不上或吃不好饭。

我那时年轻性急，越急越不行。一向坚强的我，也为这事哭过好几回鼻子。老找别人帮忙也不好意思，怕人家笑话。一直摆弄了半个多月后，才学会生火。

第二难关就是打水洗衣服。那时用井水，井很深，长长的桶绳使劲摇晃就是打不到水。还有洗衣服，不知怎么搞的，搓衣服时这只手经常把那只手抓破，血都流在衣服上了。

最让我苦闷烦躁的是，从公开的环境转入地下，一时难以适应。过去干工作风风火火，现在纪律规定不能随便出去，说话都要小心慎重。而当时我的头发相当短，也不敢出去走动。“马日事变”后，反动派编了顺口溜，“巴巴头，万万岁，漂漂鸡婆遭枪毙”。“巴巴头”指梳个髻子，“漂漂鸡婆”是指头发剪得像母鸡尾巴一样短，短发的就要抓起来。因此，我整天呆在家里，觉得很苦闷，加上火生不着人就急，经常对着夏明震发火，好在他能理解。

到了过中秋节，看看左邻右舍买鱼买肉准备过节，我们却犯

难了。

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生活非常艰苦，没有经费，主要靠地方同志的供给。两人的生活费每天只有两三个铜板，每餐只有一个菜，不是萝卜就是白菜。但是中秋节总得应付一下，你不搞点东西吃，房东邻居就会产生怀疑，因为夏明震的公开身份是教员。

我上街买了只鸭子，拿回家就杀，给它一刀没出血，再来一刀才见血，我以为它死了。没想到它呱呱叫着满地跑，我只好把鸭子的头砍下。褪毛时，怎么弄也搞不干净，我只好连毛带皮给扒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当时我们确实不会过日子。

生活清苦还是小事，我们并不在乎这些，主要的苦闷还是工作。地下工作不能公开，只能秘密进行，我们盼望着有一天能重新与敌人面对面真刀真枪地干，那才痛快！

为了送一份秘密报告，我几次化险为夷；在从长沙返回的路上，我与后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以表兄妹相称结伴而行



与江华、彭儒在一起

大约是那年的九月初，郴州县委交给我一个特别任务，由一位叫刘清泉的年轻人陪同到衡阳，将一份秘密报告送交湘南特委。

这对于在郴州城里深居简出倍感苦闷的我来说，不啻是一份

美差。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拎来一个小藤箱，装上几件衣服和漱洗用具，并将用草纸书写的密件卷在一卷卫生草纸中。

第二天一早，我和刘清泉就上路了。从郴州到衡阳约三百多里，到耒阳才有长途交通车，我们步行两天抵达耒阳。为了节省经费，我们想了一招——半路截车。我们从耒阳一直走了二十多里路，远远看见一辆汽车过来，就站在公路中央，司机只好将车停住，伸头就骂："你们不要命啦！"我们也没吭气，赶快爬上了车。无奈司机心肠太硬，任凭我怎么说也不让便宜，这时一个商人模样的乘客主动解难："差额的两元钱我替她们出了。"

汽车到了靠近衡阳的东阳渡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坐船过湘江。那时正值军阀交战，两军隔江对峙。东阳渡渡口由广东军阀占据，有两个连把守，过往行人都要仔细盘查。轮到我时，我镇定地回答：

"我是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学校因时局动乱停课提前放假，因而回家呆着。现在学校也不开学，我只好回校去取回行李。"

当兵的见没什么破绽，叫我开箱检查。他在箱子里翻来翻去，幸好没有打开那卷卫生草纸。

这时，那士兵的眼睛突然盯着我拿伞的手，疑问道："你既然是个女学生，怎么手上有茧子？"

这真是我料想不到的问题。

"我在学校喜欢体育运动，这些茧子是举哑铃和做棒棒操磨出来的。"我急中生智，从容应答。

"你的手拿过枪！"那士兵不信，劈头又诈。

"我们女生看到枪都怕，别说是拿枪。"我故意害怕地应道。

那士兵依然不信，把我带到长官那里。那位长官正在理发，见我一身素净的女学生打扮，问了一些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情

况，我应答如流。于是他把手一挥：

“走吧，走吧！”

我急忙往码头跑，渡船已发动正要离岸。又是那位商人见我朝码头奔来，忙叫停船。待我上了船，他又替我们买了船票。唉！真是遇见了一位好心人！

我们到了衡阳，在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那条街的江岸上，找到接头地点，见到了周鲁。他原是湘南团特委书记，陈佑魁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后，他可能是代理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我首先简要介绍了郴州县委活动的情况。他听完我的汇报后，就叫我到长沙将这些情况直接向省委汇报，并告诉我接头地点和暗语。

同来的刘清泉折回衡阳，我只身一人带着密件继续前行。我混在运送国民党部队家眷的人群中上了一艘小火轮，船顺水而下，很快到了长沙。

接头地点叫“悦来客栈”，老板和伙计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安排我住下等待向省委汇报。一天晚饭后，突然来了一群警察，对旅客逐个检查，凡是怀疑的立即带走。

我当时随身只有一个小藤箱，几件衣服，不像是出远门的旅客。我想起住在隔壁的刚在饭桌上认识的年轻人，想必也是自己的同志，也许他能给我帮助。我赶忙走进他的房间，那人见状，似乎猜到了几分，连忙安慰我别慌。就说是我的亲戚来看我，其余的我来对付。一会儿警察进来了，见那人像个学生，穿着讲究，行李齐全，很有钱的样子，没再多问。当问到我时，他抢着答：

“这是我表妹，来这里看我的。”

警察见我像个清纯的女学生，问了两句就走了。我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检查关，但敌人把客栈老板及几个可疑的旅客给抓走了。

第二天一早，省委派人把我接了去。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人要

把我带到哪里去，七拐八弯最后来到了一座小楼，进屋一看才知道是陈佑魁、龙淑夫妇的家。我简要地汇报了情况，把那封密件交给了他们，并在他家住了下来。

四五天后，他交给我一封秘密的指示信，叫我带回郴州，并作了口头指示，现在不宜搞武装暴动和公开的斗争，要分散秘密行动，积蓄力量，发展组织，等待时机。

我带着省委的指示立即返回，有位叫黄琳的年轻人也要南下，我们以表兄妹相称结伴而行。原来那位青年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十余年后，我在延安碰到江华，他见了我直笑，我被他笑糊涂了。他笑着说："你不记得我啦？咱们曾是表兄妹呀。"

"你这人啊，胆子真大。"江华接着说。

经他这一说，我想起了后来在火轮船上遇到的一件事。当时有两个国民党的连级军官，找我闲聊，我竟然海阔天空地与他们聊了起来。当船停下来上岸时，他们请我上去吃饭，我也真的跟他们去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既然人家要与你接近，你就大大方方地和他们往来，你扭扭捏捏的，反而让人怀疑你。

船到了衡阳，我到原来的联络站找周鲁，没见到他。他托人捎话说"特委没什么交代了，你就先回去吧"。这样，我便离开衡阳，步行两三百里经耒阳、永兴，回到了郴州，完成了这次千里送密件的任务。

大革命失败后，我第一次回家乡；父亲向县长报告：我那不孝的女儿回来了，她有共产党嫌疑，请把她抓起来关几天教训教训；母亲急忙把我送回郴州

十一月底，郴州县委派我到宜章去视察工作，顺便回一趟家，看看父母。

宜章原来建立过县委，大革命失败后，改为特支。但嘉禾、蓝山、临武等县还是由宜章特支负责联系或者说领导。我这次是了解宜章包括那几个县的斗争情况。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我第一次回家乡，想马上能见到久别的父母亲了，心里十分高兴。

但是，当我回到家里经过父亲屋前，他对我理都不理。我心里纳闷。回到后院，母亲见我归来，真是喜出望外，拉着我的手直端详。接着手忙脚乱地给我做好吃的。

我问起父亲不理睬我的事，母亲反问我：

"你在衡阳时，他去找你，你不见他也不认他作父亲，他回来后把我大骂了一顿。"

"你养的好女儿，连父亲都不认了，她要么就别回来，她要回来我非打断她的腿不可！"他骂道。

经母亲这一说我才想起在讲习所时确有其事。那时农民运动在宜章蓬勃发展，到处都在打土豪劣绅，属于绅士之列的父亲很害怕。在逃经长沙途中，经过衡阳来看我，我不想见他，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我现在是革命者，你逃避农民运动就是反对革命，我不能见你，以后也不承认你是我父亲"。他看了信后气坏了，因此，一直还记恨着我。

第二天，有个同志来通知我说，夏明震也到宜章检查工作来了。他事先可没跟我说起这事，他就住在与我家只一墙之隔的地下党员的家里。

我把这事告诉母亲，她好高兴啊，做了好吃的点心、糍粑什么的，等着未曾谋面的女婿。

到了晚上，夏明震从那家的后墙跳到我家菜园，再从旁门直接进入母亲的房间。当时父母亲虽同住一幢房，但已分开过。父亲与姨娘、两个小弟弟住前院，母亲和我的弟妹住后院，前后院是隔开的。夏明震在屋里与母亲聊了一会儿，他说我们的同志大部分都在乡下坚持斗争，我明天要去那里找他们了解情况，可能

还要到别的县去，说完便起身告辞。第二天他果真走了。

傍晚时分，姨娘匆匆跑来告诉我，今天听你父亲对县长说："我那不孝的女儿回来了，她不听我的训导，有不轨行为，有共党嫌疑，请县长把她抓起来关几天，教训教训她！"她要我小心提防着点。父亲虽没什么出息，但在宜章还算是个读书人、小绅士，县长是他长沙法政学院的同窗好友，因此常来家中叙谈。那阵子父亲背部长了一个大痈，流脓腐烂正卧床休息，县长来看他。狠心的父亲居然告发了女儿。

母亲知道这一情况后，对我说："这个昏君既然同县长讲了，县长肯定会照办的，还是小心为好。"母亲连夜迈着她那三寸金莲，到两里以外的轿子铺去请轿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把我送回郴州。

共产党员任作宣被敌人处决未死，再次被捕后在威胁利诱下叛变，最后成为托派分子"叶青"；朱英等三个黄埔学生轻信同窗好友，被告密后送了命

夏明震离开宜章后，又到各县去巡视，走了许多地方，经临武、汝城、资兴，最后从永兴回到郴州。沿途一方面了解各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另一方面布置各地收集枪支，组织武装力量，特别是做好掌握枪支的民团的瓦解工作，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奠定基础。

他回来后高兴地告诉我，南昌暴动的队伍即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不久前到过汝城，还派人与当地地下党组织联系过。他们就在湘南一带活动。听到这一消息，我们精神振奋，更加积极地筹建革命武装。

不久，我们把郴州与宜章交界的良田镇地主民团的枪给缴了。有了枪，一批同志便上山建立了游击武装，并展开了活动。

那时在宜章与广东坪石、乐昌交界的山区也活跃着一支武装力量。他们是资兴、嘉禾等地的农会干部和赤卫队撤退到那里组织起来的，大约有一百多人，领导这支队伍的是湖南省委的任作宣。但这支队伍在那里打了两仗，维持了两三个月后便垮了。原因是指挥员不懂军事，缺乏斗争经验，战士们武器弹药不足，缺乏粮饷，人心松散，士气不高，最后只好散伙了。

任作宣回到省委机关大概任宣传部部长一职，几个月后被捕。开始他很坚强，敌人慑于他在湖南的名气，将他秘密处决。没想到他活了过来，被过路的农民背回家中养伤。一个多月后，他伤愈回省委机关工作。没过多久，省委机关被破坏，他再次被捕。这次敌人改变策略，在威胁利诱下，任作宣叛变投敌，改名叶青，最后成为托派分子。

在那支队伍中，还有一个女同志。队伍解散时，任作宣把她安排在宜章乡下一个同志家住下，可她不会说本地话，很难立足，后来任作宣介绍她到郴州来。一见面，原来是我在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叫郭怀振，我便留她在县委机关一起住，那支队伍的情况就是她告诉我的。

有一天，夏明震下乡去了，负责地下联络站工作的地下党员、米店老板娘黄传凤，带来了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参加广州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避难的黄埔军校学生。为首的叫朱英，黄埔军校三期的学生，在国民党军队任营职军官，另外两个都是连职。他们计划回到家乡后，设法筹建革命武装。

但是他们忽视了斗争的残酷性，对国民党的反共面目和当时的严峻局势认识不足，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出现。

那时，国民党范石生部从广州路过郴州，朱英想通过在政治部工作的几位黄埔同窗的关系，搞些枪支弹药，然后上山开展武装斗争。他将这一计划和盘托出，结果，当年的同窗好友将此情

况报告了上司，无情地出卖了朱英等人。

范石生部的政工部勾结地方当局，把朱英等人抓拿归案，将他们带到宜章一处河滩上秘密处决了。

后来听说，有两个人当场毙命，朱英受了重伤没死，附近的一个菜农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背回家中藏了起来。后来敌人发现朱英的尸体不见了，估计没死跑了，就又在附近搜查。查到后的第二天就把他打死了。

当时我们正筹建革命武装，急需军事干部。想不到他们由于思想上的麻痹和轻率，把自己的生命给断送了，也给革命造成了损失。真是令人扼腕痛惜！

第三章　经历失败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部队打到了宜章，组织上让我去与之取得联系，路遇国民党保安队，险些丧命；夏明震带我去见朱德，朱德的和蔼与作报告时的威严判若两人

一九二八年元月，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起义部队辗转到了宜章。他打着国民党胡少海部的旗号，在土豪劣绅的夹道欢迎下开进县城。接着又巧设“鸿门宴”，将宜章县长和一批豪绅地主一网打尽。

这样一来，宜章的工农革命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同时也在湘南一带造成了巨大的震动，鼓舞了宜章周边地区共产党人和贫苦农民的斗志。

组织上决定派我回一趟宜章，与朱德部队联系。我拿了几件衣服，提了个包袱和篮子就出发了。

当我走到良田镇时，宜章的保安大队已在那里设卡，一律不许老百姓进宜章，以免遭受赤化。站岗的团丁把我挡住了：“宜章有共匪，你不能过去！”我只好往回走。没走多远，我就往稻田处插过，企图绕过小道去宜章。没想到被团丁发现，给抓了回去。“她要逃跑，也许是共匪。”经他这么一说，很多团丁便围了上来。

真是冤家路窄！保安大队长邝境明是我过去订婚的那个未婚

夫的舅舅，保安兵中有一些是我前未婚夫老家村子里的人。他们见过我，也听说过我在衡阳与吴家退婚的事。他们认出了我，恶狠狠地说：

“这不是原来吴静家未过门的小媳妇吗？这女人是暴徒，是共党分子！”

“枪毙了她！”

“杀了她！”一些人喊着就把我往地上按，抓住我的衣服，要我跪下，我不肯跪，把身上的棉袄都撕破了。

当时敌人有明文规定，只要抓住共产党，可随时随地就地正法。“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放走一人。”他们见我不从，就把我往保安队的队部里拖，我拼命地挣扎反抗：

“你们冤枉人！我是回家路过这里的，我在外面读完书在郴县当教员，为什么说我是共党分子？你们血口喷人，没有证据呀！”

这时一个当官的闻声走了出来，他是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他一看到我惊讶地说：

“这不是昭学吗？”

原来他是我父亲的老友欧阳叔，我小时候他常上我们家玩。他说：

“正好你回来了，你父亲前几天去世了。”

“是啊，我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就赶了回来。”我灵机一动，接上话茬。其实我哪里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这几天你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宜章已被‘共匪’占领，他们把县长和有钱人家都给杀了，只有我们邝大队长幸免跑了出来。我看你今天就先住在这里，明天还是回郴州吧！”欧阳副大队长很客气地对我说。

这样我只好折回郴州了。说来真是危险，幸亏遇上了欧阳叔，是他帮助我躲过了劫难，走出鬼门关。

朱德的部队占领宜章后，又在坪石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军阀许克祥的一个团，缴枪七八百条，还有机关枪、迫击炮。他们乘胜前进，计划攻占郴州。

工农革命军沿途攻占摺岭、良田，并与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部队行进中，沿途农民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参军，或帮助部队抬担架、扛枪。大革命失败后隐蔽下来的，或避往外地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也都重新复出，重振旗鼓。

当我们听说朱德的部队已打到良田镇，并向郴州挺进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夏明震虽是领导干部，但他年龄毕竟只有二十一岁，他把帽子扔来扔去，我和郭怀振就使劲地抢他的帽子。我们喜悦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但是我们也冷静地想过，工农革命军到了郴州，能不能长期驻扎还不明确，要是部队很快开拔，国民党卷土重来，我们地下党就要遭受破坏。因此县委决定，还是秘密活动，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

为此，夏明震经常秘密出去活动，开会部署工作，我和郭怀振则躲在家里写标语，晚上偷偷地出去张贴。房东看我们的卧室很晚了还亮着灯，就过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听到脚步声就赶紧把灯吹灭了。等他们走后睡下，我们又继续写。

二月四日傍晚，夕阳渐渐西下，我们站在菜园里，远远看到苏仙岭上有一支穿着灰衣服的队伍往郴州城开来。我们估计这大概就是盼望已久的工农革命军，心里暗暗高兴。我爬到一堵矮墙上眺望，只见他们一部分往山上走，到了半山腰就往下打枪。打了一会枪，见没什么动静，就向城里开进了。

本来城里有一支国民党驻军，但工农革命军势如破竹，他们自觉不是对手，怕成瓮中之鳖，便悄悄撤到城外。在抵挡一阵后，就溜之大吉了。

当天晚上半夜两点多，我和郭怀振偷偷跑到街上贴标语，部

队的哨兵发现了过来盘问。当看过我们写的标语之后，他们非常高兴。我们见到他们，真像见到亲人，感到亲切得不得了。为了避免暴露，我们抓紧时间贴完标语，赶快溜回家里。

第二天上午，工农革命军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那里人山人海，大约有四五千人。工农革命军师长朱德在戏台上作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老总。他那时才四十多岁，尽管他络腮胡剪了，但远远看上去脸还很黑。他围着一条绿围巾，穿着一件很大的黄颜色的齐脚大衣，很威武、很精神。我当时心想这人真威严啊！

到了晚上，夏明震带我去见朱德，我在那里看到的和白天在戏台上看到的判若两人。他见到我非常和蔼可亲，说话和声细语，像慈母一般，我害怕的心情一扫而光。我们不能在那里久呆，夏明震汇报完工作，我们就告辞了。

湘南暴动轰轰烈烈，我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风云人物；头上裹着红头巾，背枝红缨枪，人称“红姑娘”；路过城门楼，一阵热血冲动，我把城楼点着了，险些下不来

工农革命军攻占宜章、郴州的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永兴、耒阳、资兴、汝城等县，在地下党组织和原农会骨干的领导下，奋起响应，在不到二十天里，形成了湘南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的新局面。湘南暴动波及整个湘南地区的十余个县，威震湘、粤、赣三省。

一是组织和恢复农会，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工农革命军攻占郴州两三天后，郴州就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才佳，各县也都普遍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各县的工会、农民协会、妇联也相继成立。

二是建立工农武装力量，保卫胜利果实。宜章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郴州的工人纠察队很快变成了赤色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邓允庭，政委夏明震（后为蔡协民）。其他各县都建立了工农自卫军。自卫军枪不多，就打造梭标和大刀。儿童团、少先队也活跃得很，盘查反动派，开展革命宣传，还帮助部队做后勤支前工作。

三是肃清反革命。“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革命。同样，当革命走向高潮时，也要毫不留情地、坚决肃清当地的反动势力，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四是打土豪分田地。除有的地方开仓清粮外，快的地方就开始分土地。

我在郴州郊区的南乡就参加过分田斗争，当时没经验，主要还是听取和尊重贫雇农的意见，同他们商量着干。主要的做法是：自耕农的土地基本不动；把地主的地按人口平均分给雇农；佃农租的土地多的拿出一部分，租得少的补一些，即抽多补少。

分得土地的农民兴高采烈，但还不放心。因为土地虽分到手，但田契还在地主手中。我们就强迫地主把田契、高利贷账本等交出来付之一炬，再开个庆祝大会。这样农民群众的斗争激情更加高昂，整个湘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非常喜人。

造成这种局势的重要因素，我认为有两个：其一是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推动了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其二是湘南地区具有良好的革命斗争传统和群众基础。这两种因素缺一不可，两者的结合才造就了湘南暴动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态势。

郴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后，我们就在郴州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共湖南省委派团省委书记席克斯，湘南特委派何舍鹅到郴州参加大会。大会将中共郴州县委改为中共郴属特委，书记还是夏明震，宣传部部长好像姓回，名字记不起来了；组织部部长空缺，原部长叶凌云，刚从湘南特委派来不久，工农

革命军快打到宜章时，他在一个停了课的小学借住，不幸被捕牺牲。我还是做秘书长的工作，好像也做些组织工作，当时党员登记表都在我手中，由我负责。大家当时都很忙，不太重视职位职务，一切照旧，只是名称改了一下。

中共郴属特委成立后，原来所领导的七八个县不变，只是把原来的支部升格为县委，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斗争需要。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不为人知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扎着红腰带，有时头上裹着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

我经常带领一批农民自卫军去抄地主豪绅的家，分掉他们的浮财，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的农民，群众拍手叫好，人心大快！

那时在我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依仗这城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

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本来就这样让它往上烧就行了，可那时没经验，热昏了头。我又跑上三楼去点火，当我从三楼下来时，楼梯已着火，险些下不来。

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德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

“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

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说什么，只是很慈祥地笑了笑走了。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也同样是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

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

不过他们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流氓，他们既不喝酒，也不赌博，只是在国民党封建制度压迫下感到压抑，渴求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知道此事后，大发脾气：

“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

吓得这些年轻学生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特派员提出把耒阳至宜章一线四百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农村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对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招致了农民的坚决反对

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动摇了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基础，给地方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大肆“围剿”湘南工农革命军，企图把新生的郴州红色政权扼杀于襁褓之中。

驻扎耒阳的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受到了来自南北两面的夹击。北面是集结于衡阳的国民党白崇禧部，南面是广东范石生部，他们与工农革命军形成对峙局面。国民党部队不仅人多，而且装备先进，对郴州苏维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极左的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

面对强敌硬拼不行，就玩点花样技巧，他们好像是从《三国演义》里学来的。他们认为敌人从宜章到衡阳要走四五天，这样就可以让进犯之敌无寸草御寒，无粒米果腹，不战而自垮。特派员充满自信地说：

“到那时就等着去捡枪吧！”

尚处幼年的共产党人，在大敌当前之时，居然想出这种异想天开的办法。他们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引起公愤，会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而我们当时也太天真幼稚了，竟也赞同他们的意见。

于是郴属特委作出决定，坚决执行“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为此，先在党内进行动员部署，然后再向群众宣传贯彻。

这一政策的执行，无疑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反对。群众不相信我们的宣传，有些积极分子是半信半疑，就是各级党员干部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也是不赞成的。而隐蔽下来以崔廷彦、崔廷弼为首的地主豪绅、反动分子便趁机煽风点火，在郴州策动反革命叛乱。他们说：“鸟还得有一个窝呢。把房子烧了无家可归，让我们去乡下吃什么？住什么？”他们在背地里鼓动组织群众反对烧房子。特别是郊区周围十几里的农民，更是坚决反对烧掉他们祖祖辈辈苦心营造的家。

干部群众的情绪和意见，以及反动分子在暗地里活动的复杂而严峻的情况，曾经多次反映上来。而包括夏明震在内的最高决策层，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干部群众的反对意见。他们说：

“我们的力量这么强大，一小撮反动分子在那里秘密活动翻不了天。”真是可悲的自信。

他们对此满不在乎，一意孤行，最后终于导致了历史的悲剧。

国民党利用农民对幼稚的共产党“焦土政策”的不满，挑动农民叛乱，很多共产党人被残酷杀害；教导队抓住了一个领头破口大骂共产党的农民，我拿起梭镖朝他的肚子扎去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群众动员大会在郴州城隍庙广场召开。原定开会时间是十点，那天我和郭怀振起得早，九点多就来到会场。只见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八九百人。同往常召开群众大会不同的是，郊区的农民们手上都拿着家伙，有锄头、扁担、镰刀，还有枪、梭镖和大刀。个个紧绷着脸，表情阴沉沉的，有的怒气冲冲。

整个会场上弥漫着一种恐怖紧张的气氛。我向他们解释，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一言我一语反驳我。

“你们烧了房子，国民党部队就吃不成饭啦？就能把他们饿死？”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住，要我们烧了房子到乡下投靠亲友，我们的亲戚都很穷，让我们投靠谁去呀？”

这时，我在南乡搞土改认识的那个支部书记也来了。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

“反动分子秘密部署，可能会利用农民的抵触情绪发动叛乱，他们扬言今天谁要是叫我们烧房子，就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今天要出大事，怎么办？”

同样，我在进入会场后也已经嗅到了一股可怕的火药味。

讲台上此时出现了一个人，大声说着：

“乡亲们！鸟都有一个窝，我们是人，上有老下有小，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不搬家还有一条活路，烧了房子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反对烧房子的站在这一边。”

他的话音刚落，参加大会的农民、居民几乎都站过去了。就

剩下我们党员干部和骨干分子站在另一边，非常孤立。

“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接着那人又大声喊。

我一听这样的口号都喊出来了，看来烧房子要出事，要发生流血事件。

形势万分危急！

我来不及多想就急忙溜出会场，向苏维埃政府机关跑去，想找苏维埃主席汇报。政府机关此时已搬到县城对面的清源山的一座寺庙里。可是等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政府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已下山到会场去了。他们和我走的不是一条道。

正着急，看到有个赤卫队员急匆匆地过河上了山，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反动派叛乱了，大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上主席台抓人，有个工农革命军的营长见状朝天开了一枪，反动分子就冲上去抢他的枪。他不让抢和他们扭成一团，结果被人拖到台上，活活打死了。夏明震等一批领导都被人从台上拖到台下，用梭标扎……不得了了，整个会场一片混乱。



陶斯亮与曾志的孙子金龙、草龙为夏明震扫墓。

正在这时，我们看到山下人声鼎沸，有好几千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过了河，从四面八方向山上冲来。

当时苏维埃政府机关有一个警卫排，有十几枝枪，我就只好组织这个排抵抗。可是这些战士都是新兵，看到满山遍野都是反叛的农民，就鸣枪吓唬他们。农民听到枪声不敢上前，但也不退。在混入队伍中的反动分子鼓动下，一会儿又冲上山来。警卫排自觉抵挡不住，扔下枪就跑，喊回这个又跑了那个，最后全跑光了。

我看到反叛的农民快冲上来了，只好往茅草小路上跑。当时很混乱，我穿的是男学生服、戴着帽子，他们一时看不清我是女的。我急中生智，假装问：

“苏维埃在什么地方？”

“就在山上！”

反叛的农民以为我也是去围攻苏维埃的。这样我只好返身往山上跑，我趁他们不注意，瞄准机会一下子钻进灌木丛躲了起来，幸好没有被发现。

没过多久，反叛的农民开始搜山。我看到不远处有人在那里找了一阵就走了，有的拿了些苏维埃政府机关的东西，从我身边不远处走过下山去了。我听到有个妇联主任跑过了河，被反叛的农民发现抓住，她大声喊：

“救命啊！救命啊！”

我着急万分，但却没办法救她，结果她在河边被杀了。

我从上午十点躲在那里，一直熬到天快黑。我听到山下有人在喊：

“山上有人吗？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如果有人，就赶快下来和我们一起走。”

看到他们身穿灰军服，知道是自己人，才放心地下山，跟着部队返回教导队的驻地。

位于郴州城外的南塔岭下，有一座书院。它规模颇大，依山而建，院前一条小溪款款流过，溪上有一座小桥，这是书院连接

外界的惟一通道。朱德工农革命军的教导队就驻扎在这座书院里。

教导队是培养军事骨干的单位，队员三十多人大部分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学生，是南昌暴动后从武汉组织起来的。队长叫刘之志，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在武汉参加工农革命军。他的妻子许秀珍，原是武汉的一名中学生，一直跟随着他从南昌暴动到湘南暴动，是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中惟一的女同志。

到了教导队驻地，我紧张了一天的神经才算松弛下来，感到有了安全感。但我老想着上午的那场群众大会，预测着城隍庙里发生的一切。我想念那些同事，特别想念夏明震。他被人拖下戏台，结果会是怎样？我默默地祈祷着，但愿他们只是受了伤，可千万不能死啊！

吃晚饭时，我端起饭碗，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掉下来了。但看到有人来了我就急忙抹去，装作没事一样。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哭鼻子。

大约是晚上八时许，哨兵进来报告，有一大群反叛的农民往这里冲来。这些亡命之徒的企图很明显，想来抢部队的枪。由于搞不清冲过来的是反叛的农民还是反动分子，因此部队眼看着他们要冲过桥了，才被迫朝天打枪。教导队的战士都是训练有素的，使的都是清一色的匣子枪。他们一梭子打过去，就把农民吓跑了，一个领头的被抓住了。

此人十分反动顽固，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放火杀人。当时我气得要命，大喊道：

“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对！宰了他！”队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时，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和胆量，也许是仇恨和愤怒吧。我拿起梭标用力朝他的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着。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

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得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这是我平生惟一一次杀人。

工农革命军派一营兵力打回郴州平息叛乱，见到共产党人尸横遍野，战士们怒火中烧，见人就打；夏明震胸前被刺了三四刀，面朝苍天；我克制住感情，没流一滴泪

由于局势混乱，敌情不明，朱德的主力部队又远在永兴、耒阳、资兴一带，孤立无援的教导队决定暂时离开郴州，与主力部队会合。

我感到郴州地区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向上级党组织湘南特委汇报。我就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

从郴州到永兴有九十多里路。当我们大约走了一二十里地，经过一个较大的村落时，只听得村里传来阵阵锣声。随后，一大群手举扁担、锄头、梭标的农民，冲出村口追赶我们。教导队朝天开了几枪，便把他们镇住了。但他们嘴里仍喊着：

“打死你们！打死你们！”

沿途经过三四个村，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我们一路打一路撤。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地，到了一个小镇上。当我们正坐下休息准备吃饭，就听到不远处的戏台下，有人喊着：

“来人啊，救命啊！”

我们跑过去一看，发现有人被五花大绑，关在戏台下的小屋子里。他说他是当地农会干部，被还乡的大地主抓了起来，准备要杀头。后来听说我们的队伍要来了，就丢下他跑了。我们赶快给他松了绑，他说：

“还有两个农会干部，刚刚给活埋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急忙跑去挖开土一看，已经没气了，只好又重新把他们埋了。吃了饭，我们又继续赶路了。

到了晚上天黑时，教导队才抵达永兴县城。我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我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

周鲁听完汇报，觉得问题严重，连夜就去找工农革命军的负责同志请求派兵。我赶了一天的路，累极了，汇报完工作，倒头就睡着了。

工农革命军当即作出决定，派出一营兵力，急行军打回郴州去，平息反革命叛乱。

第二天一早，我跟随部队返回郴州。天快黑时，队伍接近郴州。举目可见尸横遍野，有的肚子被剖开了，有的前胸被捅得像马蜂窝，有的脑袋还挂在灌木丛上……战士们悲痛至极，怒火中烧。进城后见街上的店铺都关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打，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群众。

部队了解到，一批反动地方武装和受蒙蔽的反叛群众，见部队进城便逃到郴州附近的南塔岭。部队马上攻打南塔岭，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当场击毙反动豪绅崔廷弼。

仅仅时隔两天，当我再次看到的郴州城，却是另一番惨厉的景象。城中心大街一片残墙断垣，使我甚感震惊。我们没烧过房子，但眼前却是满目焦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反叛的农民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时，一些人死里逃生，跑到五十里以外的良田镇。当地党政组织惊悉郴州反动派举行暴乱，马上召集五千多农民，连夜开进郴州，同地方反动武装及反叛的农民激战，从当晚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在混战中，反叛的农民把整条街的房子给烧了。

我还看到街上到处是血迹，尸体有几十具，横七竖八东倒西

歪……

我四下打听夏明震等的下落，有人告诉我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我和战士们急忙赶到河边，最不愿意看到的惨烈景象还是出现了。

河滩上摆着九具尸体。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我眼睛都看呆了，心直往下沉，也说不出当时是什么心情。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真是惨不忍睹！

那时天气还很冷，尸体还没有腐烂发臭，我们找来棺材，把他们逐一收敛好。我强忍着失去丈夫和战友的巨大悲痛，全身心地投入到收复郴州后的各项工作中。

两天后，夏明震等烈士被安葬在文帝庙附近。当时郴州工作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因此没有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只组织了一批人去送葬。有生以来，我就讨厌那种哭哭啼啼的送葬仪式。送葬时，我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没有为亲人送这最后的一程。

夏明震悲壮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我，但痛定之后，是加倍的坚强。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哭，我不愿让人看见我的软弱。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也不愿只为自己亲人的牺牲而哭泣。

我只知道夏明震被埋在文帝庙，却不知道文帝庙在何方。前几年我回到郴州，想去凭吊先夫的亡灵，但听说文帝庙已拆了，夏明震等人的墓被迁到一个山脚下。我上山去寻找，山上正在修公路，他的骨骸已不知所终。

我的心里至今还十分不安啊！后悔当初没有去送他那最后的一程。

重新组建了郴州县委后，陈毅任代理书记，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烧房子是错误的，对参加叛乱的农民群众既往不咎；当国民党部队大举围攻郴州时，我随朱德的部队撤向井冈山

现在回想起来，郴州特委所作出的极左的“焦土政策”，真是愚蠢至极，罪孽深重，它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它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糟踏了郴州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使胜利果实和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它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损失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挫伤了群众的感情和积极性。极左路线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广大人民群众抵制“焦土政策”，反对烧房子，甚至因此反目成仇，而这却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省。反动派恰恰利用了群众的抵触情绪和反抗心理，秘密策动、暗中唆使，挑起一场反革命叛乱，借农民群众之手向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大打出手，以致酿成了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互相残杀，殃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农会干部、赤卫队员以及不明真相的农民和无辜的群众，甚至青少年。

后来我还听说，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

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到山沟里。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一千多人屈死在那场残杀中，而真正的反动分子却藏在暗处，煽风点火，死得并不多。真是令人悲哀啊！

工农革命军打回郴州后，重新组建了中共郴州县委，由陈毅代理书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烧房子是错误的。今后不再搞“焦土政策”，也不戒备森严，让大家安居乐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宣布除那些大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一定要镇压外，不明真相受反动分子欺骗的农民，一律既往不咎。

贫苦农民本来对土地革命运动是赞成和拥护的，听说共产党不追究以往的事了，他们又重新投入土地革命斗争。照样打土豪分田地，分粮济贫烧田契。

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农会、妇联等群团组织也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宜章与摺岭交界地区活动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此时也回到郴州。农民自卫队重新拉起队伍，继续活动，郴州地区的革命形势很快得到好转。

郴州县委重组时，我不愿意留在地方工作。经组织上同意，我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

这是一支由郴州工人纠察队扩建发展起来的队伍，在与国民党部队和土匪武装的战斗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师长邓允庭，辛亥革命时，曾任过蔡锷、黄兴那支部队的参谋长。蔡锷失败后，他离开军界遁入教门，当起牧师。北伐战争时，他认识了一些共产党人，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宣传。由于他思想较进步，党组织决定发展他。

夏明震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和主持入党仪式时，我也去了。

“我相信共产主义，也愿意加入共产党；但我也相信基督

教，我不是迷信，而是相信其中的道理。共产主义讲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基督教讲平等、博爱是一致的。所以我不放弃基督教。”

可是当时部队急需军事干部，就任命他为第七师师长。不久，朱德派蔡协民来第七师任党代表。

正当郴州土地革命斗争再次风起云涌之际，广东和湖南的国民党部队已向郴州地区步步进逼，形势急转直下。

一天下午四点多，我们接到紧急通知，明天一早一律撤出郴州，向江西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

第二天一早，邓允庭师长带领主力队伍，开赴良田一带，阻击和牵制来自广东的范石生部队。我来不及去裁缝店取回定做的夹被，便匆匆忙忙地跟着党代表蔡协民和师直属队一道，离开了郴州，向井冈山进发。

第四章　井冈上下

夏明震牺牲后，我同蔡协民结为夫妻；一个气度不凡的陌生人笑着说：金屋藏娇么，好福气哟；蔡协民忙介绍说：这是毛泽东，毛润之

我跟随着郴州第七师师直机关一道转移。由于仓促行动，来不及通知苏维埃政府和群团组织的所有成员。因此当他们看到部队匆匆撤离，急忙也跟着撤出郴州。一些农会干部、赤卫队员担心受到敌人和还乡地主的报复，也跟着队伍跑，家也不要了。而他们的家属知道了这一消息，也不顾一切地跟在队伍后面跑，队伍越走越庞大，越混乱。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在这支队伍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哭哭啼啼的孩子，更多的是一大群衣衫不整、神情恐慌的妇女。队伍中，有挑担子的，有背包袱提篮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扛着梭标的，那上头挑着包袱、衣衫，甚至尿布，简直像一支逃难的队伍。

这条走走停停缓缓往前蠕动的长龙，首尾相距十几里。到了晚上，沿途露宿，生火做饭，四处火光熊熊，哭声吵闹声混成一片。

从郴州出发，经过资兴、桂东，一百多里走了四五天，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到了离酃县四十多里的水口镇一清点，尽管有些老人和妇女走不动折回去了，可跟出来的还有六七千人。再这样下去，不知何时能到达井冈山?

万一遇到敌人，只好束手待毙。

因此部队决定，在水口镇休整几天，整顿清理队伍。老人和妇孺尽量动员回去，或就在附近暂避一时，实在不能回去的干部家属随队伍前进，年轻力壮的男人留下。经过三天整编后，仍有两千多人留了下来，但队伍精干多了。

经过休整，队伍轻装上路，两天后终于来到了井冈山脚下的酃县县城。

郴州第七师直属队抵达酃县后，便住了下来，等候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

师直机关驻在一个祠堂里。一天傍晚，十分疲惫的我正依着蔡协民的肩膀，等待着开晚饭。

那时，我刚同蔡协民结为夫妻。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生，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第二十四师铁军连指导员，后随朱德到湘南。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思想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牺牲不能复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

不久经过师长邓允庭的同意，我们就结合了。

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茶点都没有。

战争年代，特殊时期，一切从简。

部队到酃县时，我刚有身孕，加上连日行军，已是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我依靠着蔡协民慵懒地半睡着。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着：

“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随声而入。

我睁眼一看这位陌生的来客，身材高挑，气度不凡。他一见床沿上相依而坐还来不及站起的我们，笑道：

“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

他边开着玩笑，边自个儿拉了条长凳坐在我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我们。

蔡协民忙拉我起身，向我介绍说：

“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啊！他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顿时倦意全消，肃然地坐在一边倾听着这两位师生和战友的谈话。

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就是他的学生。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毛泽东那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很随便、很亲热。两人侃侃而谈，似乎把我给忘了。

我端详着毛泽东，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热情风趣、平易近人，使我对他从仰慕变成了崇敬和亲切。从此对他没有了拘束，就是后来人们对他神化般地顶礼膜拜时，在我心目中，他还是那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毛泽东。

他们说了好一阵子，毛泽东起身告辞。他最后说：“我这次下山是专门来接你们这支队伍的。朱德的队伍很快就到了，我还要去那里接他们。”我们一直目送着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远处，消失在一片浓浓的暮色之中。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如今整整七十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初次见到毛泽东那一幕历历在目，主席的音容笑貌依然是那样的清晰、真切。

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陈毅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部队整编后上井冈山，毛泽东把“十六字诀”讲得绘声绘色

我们在酃县住了几天，朱德率领队伍从衡阳至耒阳间与敌作战后，经耒阳的东江、竹市、安仁的神州，到达沔渡。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比我们晚到两天，他们驻扎在砻市附近。这时我们第七师的主力部队在邓允庭师长的率领下经过沔渡，也来到了宁冈砻市。

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在砻市南边的一个大草坪上，召开了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庄严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朱毛会合”。

会师大会之后，部队开始整编。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下辖六个团。朱德原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整编为第二十八团，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整编为第三十一团，这是红四军的两个主力团。原来在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编成第三十二团，从宜章、郴州、资兴、永兴等县来的队伍，合编为三个团，郴州第七师番号取消，与宜章三师整编为第三十团，蔡协民仍在那个团担任党代表。

部队整编后，就上井冈山了。郴州第七师直属队的男女老少上千人，也随着我们上了山，在小井那儿驻了下来。

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距敌人重兵驻守的南昌、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较远，新旧军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这里山高林密，群峰连绵，地势险要，林木苍翠，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很大，且

一举一动可以影响湘赣及附近省份。

小井位于井冈山地区的中心地带，还算是个大地方了，有五六个铺子，其他几个村连铺子都没有。小井溪的对面有不少石头山，据当地农民说，过去傍晚时分总有成群的猴子在石头上蹦来跳去，部队来后，就没有那么多了。

井冈山的田地很少，有几个田洞，最大的也只有几十亩，因此当地粮食奇缺。我们上山时虽带了些粮食，但男女老少上千人，一两天后便断粮了。

当时正值初春四月，井冈山遍地是竹子，且正是长竹笋的季节，山上的竹笋已长得差不多人那么高了。为了充饥，我们只好把竹笋砍下来，剁成一块块的，放在一口大锅里煮，也没放盐。有的竹笋纤维已经很长很硬，咬也咬不动，吃得多进得少，吞下去的只是一些水和渣子，肚子还是饿的。

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部队决定下山攻打永新县城。随军来的家属小孩加上缝纫工人、病号一百来人，被留在井冈山后方留守处，我跟着后卫队下山去了。

部队就像一群饥饿的老虎下山了。

攻打永新县城，拿山村是必经之道。那村比较大，有一支国民党的小股部队驻扎在那里。红军主力部队从罗浮下山，再走一百二十里路，就到了拿山。一阵猛冲，就把这个绊脚石踢去了。

我随着后卫队到拿山时，主力部队已往永新去了。我们驻在一个地主家里，房子是两层楼的。一些战士从二楼搜出了八九坛东西，是用很大的坛子装的，上面用泥封口。他们打开一看，是金黄色的糯米陈酒，顿时满屋飘香，香气扑鼻。战士们抢着用土碗舀酒喝。

我也兴致勃勃地舀了半碗，一尝还真好喝，又甜又香，还有些粘稠。当时我走得又累又渴，不知不觉就喝了一大碗。那酒的酒性真足，不到十分钟，我就觉得头晕目眩，天地翻转，后来便

不省人事了。吓得战士们急忙用冷水往我头上浇，浇了好一阵子，才把我弄醒。我再次领略了酒的厉害。从那以后，我见酒三分怕。

第二天，我们进入已解放了的永新县城。这是我们撤出湘南后所到的第一座城市。

这时蔡协民调任第三十二团党代表，团长袁文才，我也随他到团党委办工作。但我基本上不在团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永新和宁冈交界的农村地区做群众工作。

有一次，毛委员——毛泽东到我们团里开会，给连营以上干部讲解“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他讲得绘声绘色，从实际到意义，再从意义到实际。我们到会的同志聆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后，个个深受启示，信心百倍。毛委员的这些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只是那次开会的地点记不起来了。

当时，毛委员还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我们第三十二团留下两个连和一个独立营做地方工作，与我们机关干部合在一起，三至五人编成一个小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农会、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晚上到敌人驻地偷袭敌人，这里放几枪，那里投几个土手榴弹，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搅得他们夜不能寐。

敌人也常出来骚扰。他们一来，村子里的干部、赤卫队就掩护老百姓往山上撤。但敌人一般不敢在村里久住，他们要是住下，同样不得安宁。

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发动群众、牵制敌人，在永新和宁冈交界地区建立、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区域。

井冈山上的生活非常艰苦，朱德和毛泽东亲自带头和战士一起运粮，“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红军偶尔能吃上一顿南瓜，觉得比吃肉还香，但没有人叫苦发牢骚；山上不足两个连的兵力打起了“黄洋界保卫战”

是年五月至七月，毛委员、朱军长和陈毅率领红四军，利用井冈山方圆五百余里的有利地形，转战于永新、宁冈、莲花、茶陵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击溃国民党赣军的数次进犯，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六月二十三日，在我所工作的永新、宁冈交界地区，红四军集中优势兵力，在新、老七溪岭上摆开了战场。

根据军部作战部署，第三十一团的一部分兵力埋伏在白口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主力袭击敌军前线指挥部；另一部分兵力组织永新、宁冈两县赤卫队、暴动队配合红军作战。

战斗的前夜，我住宿在第三十一团三营的营部，十几人睡在一张晒谷子用的竹垫上。六月的井冈山区，气候凉爽，到了夜间更有一丝寒意，但大家想着明天即将发生的战斗，心里却是火热的。

第二天上午，红军指战员即进入了老七溪岭隘口阵地，迎接来自宁冈方向的进犯之敌。我们赤手空拳，营长蔡惠文不让我们上前线，叫我们等候担任后勤工作，其实我的心早已飞到前线。

可是，吃完早饭还没有动静，蔡营长不耐烦了。他坐下来要勤务兵为他理发，刚在头上剃了几刀，山头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他甩开勤务兵就往山头阵地飞奔而去。

双方激战一天，山谷里硝烟弥漫、枪声震天。在战斗中，蔡惠文抽调班、排长和党员组成敢死队，向敌人猛冲，占领了敌人

的制高点。最后战斗以敌人师长杨如轩身负重伤，敌军惨败而告终。我军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俘虏了大批敌兵，缴获了许多轻重武器。红军军威大振，井冈山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当时边界群众中流传“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赣军头目杨如轩、杨池生），说的就是这次战斗的情况。因为这次战斗是在龙源口打响的，所以又叫“龙源口大捷”。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战斗。虽说战斗的细节已经遗忘了，但是那次战斗中我们红军战士机智勇敢、奋勇杀敌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还时常萦回在我的脑海中。

在这次战斗中，营长蔡惠文负了伤，他被抬下阵地前往卫生所途中，我还见过他，以后就再没见到了。他是早期红军中较有文化的青年，那时年仅二十岁，听说他后来在抗日前线牺牲了。

八月中旬，朱德军长率红四军一部回师湘南攻克郴州，复又失败退回桂东一带。毛委员率第三十一团三营往桂东方向迎接朱德的部队返回井冈山。

毛委员率部经过宁冈时，到了我们团驻地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团正在休整，战士们抓紧战斗空隙，有的在补衣服、有的在打草鞋，一派安静悠闲的气氛。更多的战士到村前的一条小河里洗澡。那时许多战士没有换洗的衣服，他们脱光衣裤，在河里洗干净、晒在石头上等基本干了，就往身上穿。

毛委员见我和蔡协民坐在一起，又风趣地开起玩笑：

“你们这一对形影不离，真是模范夫妻啊！”

突然，他发现我的肚子有些异样，知道我已怀孕（已有七个多月），便叫我尽快离开前线，回到井冈山后方留守处，并说用他的马送我上山。

第二天清晨，我骑上毛委员的马，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宁冈出发，经过茅草坪，沿着崎岖山路，艰难地翻过了黄洋界山头，到达位于大井的红四军后方留守处。

后方留守处的主任，便是我们原郴州第七师的师长邓允庭。在会师整编后，考虑到他是旧军官、基督教徒，年已五十多岁。他的夫人是一个传教师母，也年近五十，近视眼，又怀了孩子快生了，因此不适合留在部队上。当后方留守处成立时，就把他俩都安排到那里。

后方留守处共有一百来人。那里有一个缝纫厂，有八九台缝纫机，二十多个工人；有一个中药房，那时西药很少，主要靠中草药治病；有一个耕地班，主要是安置了一些跟随部队上山的干部家属，清一色的妇女、老头、老太太，他们有种田经验，就让他们负责耕种约二十亩的土地；有一个司号班，都是一些十三岁以下的孩子，由一个南昌起义时跟随朱德出来的老司号员教他们吹号；还有就是通讯班和病号、孕妇。

大井的范围不大，房子很小，一共只有一排房，一排房有五个门洞，一个门洞里两三间或三四间，所有的人都挤住在这些房子里。

山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首先是缺乏粮食，这里吃的粮食完全靠下面运上来，前方打了土豪，弄到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通讯班的战士下山背一袋粮上来，经常需要三五天的时间。后来前委领导作了一条规定，部队休整时都要给山上运粮食。毛委员和朱军长都亲自带头，和战士一起运粮食。当时运粮食没有那么多的扁担、箩筐，主要是靠背。就是把粮食装在裤腿里，两头一扎，架在脖子上。

有一次背粮食上山，我和朱军长走一路，他有说有笑，不时地给大家鼓劲。在途中休息时，他还给大家讲故事，逗得大家哈哈直乐。“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大家精神是快乐的。我们后方留守处一百来人差不多天天吃的都是辣椒干拌盐泡汤。好的时候偶尔能吃上一顿南瓜，觉得比吃肉还香。所以当时井冈山流传一首歌

谣："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这是红军战士对美味的南瓜发自内心的颂扬。

在山上，穿的、盖的比吃的更困难。秋天的井冈山经常细雨蒙蒙，浓雾重重，空气潮湿而寒冷。晚上我和几个女病号挤在一间房子里，有毛科文的妻子毛大嫂、杨子达的妻子、一个司令员的妻子。泥土地很潮，我们就用杉树皮铺在地上当床板。盖的很少，我当时还有一条夹被，算是很不错了。有些同志连夹被都没有，就用禾草遮身。为了御寒，我们白天轮流到山上打柴，晚上就在屋子中间烧一堆火，大家围着睡觉。我们穿的更是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前方打了土豪，就给我们后方留守处送来一些穿的，有男人穿的长袍马褂、有女人穿的衣袖很宽很大还镶着花边的旧式女衫，什么颜色都有。我们的同志为了御寒，也顾不得那些，有什么穿什么。有时为了劳动起来方便些，用根草绳子在腰上一扎，还挺精神的呢！

由于前方战事的发展，送回来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原来设在中井的红军后方总医院已不能容纳。军部决定在小井再盖个医院。

我到后方留守处时，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我们留守处的全体同志，包括病号、老人、小孩都参加了建设医院的劳动。在我们大井的后山上，有一片茂密的杉树林，多年的杉树挺拔坚硬，是盖房子的好材料。我们留守处的同志就负责将树砍下来，削去枝条，剥掉树皮，然后将树抬到离我们住处有三里多路的小井。

我当时虽已怀孕七个多月，也跟着大家一起抬木头。男同志力气大，他们抬头，我抬尾，因此重量主要压在他们身上。下山时，两只脚踩在新砍下的树枝上，每迈一步都很艰难。后来男同志们干脆扛着大头往下拖，到了平地再让我抬着走，一直抬到小井。大家争先恐后，干得很欢！

小井那里的工地上也同样热气腾腾，有的人在那里锯板子，

有的人爬在上面搭架子……

大家紧张而欢快地工作着，小井红军医院很快就建好了。它是一幢完全由木头搭建起来的两层楼房，上面一层傍着山，从山上直接进去，也可以通过楼梯上去；第一层是从山下进去。江西、福建一带这样的房子很多。

医院建好后我再没有去看过。据说后来住了不少伤病员。第二年三月，敌人“会剿”井冈山时，被全部烧毁了。

在后方留守处的日子里，生活是艰苦的，但却很少听到有人叫苦发牢骚。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是革命的意志和热情，激励着每个人坚持斗争，战胜困难，苦中作乐，永葆革命的青春。

八月下旬，湘赣两省的敌人，乘我们红军主力部队正在湘南外线作战的机会，以四个团的兵力东西夹击“会剿”，企图一举荡平井冈山根据地。

当时在山上的红军还不足两个连，且各连兵力分散在周围的八个哨口。为了打退数倍于我的敌军，必须动员群众，依靠勇敢和智慧。黄洋界是通往井冈山上大小五井的必经之地，左边是深山峡谷，右边是悬崖陡壁，上黄洋界必经一个弯道，每次只能走一个人。敌人如果上来，可以瞄准一个打一个。因此只要扼守黄洋界，就可以阻挡敌人对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当时军委的要求是“守住黄洋界”。

井冈山上所有的群众都被动员起来了。我们留守处也不分男女老幼，就连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我们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将竹子削成两头尖尖的竹签，在火上烤一下再放到尿里泡一泡，这样的竹签又硬又利。我们在敌人上山必经的地方插满了一层层的竹签，并在插满竹签地段的前边，挖了很多壕沟。有些壕沟是这次临时挖的，有些很早就挖好了。因为毛委员去湘南时就告诫大

家，无论如何要守住井冈山，要早作准备。

黄洋界离我们住的大井五六里路。我们后方留守处的同志除了一位女同志因即将临产没有参加外，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战斗。我们身上没有枪，虽然不是直接参加作战，但都参加了削竹签、送信、护理、送饭等间接的战斗。我们那一片由副营长谭希林负责指挥。战斗打响的时候，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八月三十日，当敌军向黄洋界哨口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就用早已准备好的朱军长在湘南打许克祥时缴获来的那两门炮和我们自制的“松树炮”狠狠地还击敌人。所谓的“松树炮”，就是将松树干挖个窟窿，里面放进黑炸药，还有破碎的铁片、碗片、玻璃等东西，然后用铁丝箍紧。用的时候，将火药从后面一点，铁片、碗片一股脑儿全发射出去，也可以打半里路那么远。再加上居高临下滚滚而下的乱石、断木，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屁滚尿流，敌人连续进攻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丢下了一个县长、一个团长和无数的尸体，狼狈地连夜逃回了老巢。

毛泽东有一首词叫《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一次黄洋界保卫战。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与我同样怀有身孕的毛大嫂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人，在她的帮助下，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二十六天后，送给了石连长夫妇，取名石来发，继承了石家香火，植根井冈山

毛大嫂，其实也就三十几岁。与我同乡，是原宜章县苏维埃主席、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毛科文的妻子。她是一个农家少妇，很能吃苦耐劳。在家时，他的丈夫是个职业革命者，经常在外活动，毛大嫂一人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全部家务。像犁田、施肥、割稻、堆稻草垛等一类很重的农活，全由她一人干了。她是当地不多见的一位劳动能手。

一九二八年四月，宜章第三师撤出湘南时，她随毛科文一起上了井冈山。因为她不认识字，又身怀有孕（她怀孕的月份比我晚一两个月），组织上就分配她在后方留守处做饭。

毛大嫂一个人要做一百来人的饭，十分辛苦。她每天要到离驻地一两里远的地方去挑水，半人多高的水桶，一百来斤，一天要挑好几趟。她有时还要自己去拾柴，捡一些芦草、松树枝回来。有时潮湿的柴禾真难烧呀！浓烟滚滚就是不窜火苗，她的两只眼睛被烟熏得通红，不断地流泪，不住地咳嗽……

真难为这位年轻的少妇，要她承担这么沉重的负荷。但她从来不叫苦，不喊累，整天总是笑呵呵的，还老想着帮助别人。她的精神感动了我，于是我也经常去帮她拾柴挑水，我每次只能挑四十斤。但我给她的帮助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而毛大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关怀和帮助则是太多了。

这一年十一月七日，我临产了。因为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我足足痛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

后方留守处没有人会接生，只好由原宜章农民协会委员长杨

子达的爱人来帮忙。她在广东学过几天护士，但她对接生也是一窍不通的。照理生完孩子人很虚弱应该让产妇休息，但她不是这样，而是按着我的肚子使劲地揉，结果肚子里的血水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我昏死了过去。

多亏了毛大嫂，找来中药房的医生。先用勺子撬开我的嘴，用缠着头发的筷子伸到嗓子里搅，用头发刺激喉咙，让我苏醒了过来。然后再用姜汤和乌鸡白凤丸一点点地喂我，使我恢复过来。但由于下面流血不止，半个小时以后，我又昏死过去了。她们又用老办法让我恢复过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到第二天才平静下来。

十一月的井冈山，北风呼啸，天气十分寒冷，毛大嫂他们为了让我尽量少受风寒，早早地为我用杉树皮搭了一个棚子，用竹子编了一面墙、一扇门和一张床，在床边搭了一张案板，又做了一张凳子。

我躺在这用竹墙和竹门围起来的小角落里，听到屋外北风飕飕呼号，心中感到一阵阵的温暖。

孩子生下来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毛大嫂一人要包揽厨房的一切活计，还要替孩子换洗尿布，磨米糊喂孩子。不久我又得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用中药“天星子”敷在乳房上，拔了脓头，高烧才退去。

有一次我在高烧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我勉强爬起来，泡点白糖水喂孩子。结果孩子喝了后哭得更凶，脸色发青。我一尝，原来白糖水泡成了盐水。那时孩子生下不到一周，喝盐水会把肠胃烧坏，好在喝得不多，后来再重泡了点糖水喂下，总算停止了哭泣。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产褥热”，持续高烧不退。后来吃了一位中医开的凉药，高烧是压了下来，但身体愈加虚弱，动则冷汗淋漓，双腿麻木沉重，不能下床行走。

幸亏邓允庭主任略通医道，开了几贴温补调理的方剂，才慢慢地好转。

孩子是生下来了，却无法抚养。当时我年仅十七岁，对喂养孩子一窍不通，缺乏经验。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带得了孩子？

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石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我，我请她把这孩子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她看这孩子可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她三年前生过一个孩子，后来死了，他们也很想有一个孩子。她说："我嫂子刚生了个孩子，我请嫂子一道喂养。"

于是，她就高高兴兴地把刚出生二十六天的孩子抱走了。

一旦母子真的分离，我又难过起来。孩子毕竟是母亲的骨肉至亲，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淌。

这个孩子被石连长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石连长去世后，来发继承了石家香火，植根井冈山。至于石来发苦难的经历，他如何能在以后的腥风血雨中生存下来？井冈山人民对他有怎样的大恩大德？他为何不来广州与我共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及他为何至今还是一个农民？……这些，需要另一本书才能写清楚了。如今他已有两个儿子，五个孙子和孙



陪大儿子石来发及孙子蔡接班登长城。

女。一九五二年，石来发二十四岁时，我们才第一次重逢。后来我也曾两上井冈山，与孩子们欢聚。最近几年，他和儿孙们常来北京看我，每次都带来许多井冈山特产。看到孩子和这些东西，我不禁又想起在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怀念那些把鲜血洒在那片土地上的战友们。

产后四十天，我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让我到后方总医院去担任总支书记。于是我告别了后方留守处，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毛大嫂。据说不久后在敌人对井冈山"会剿"的一次偷袭中，毛大嫂与后方留守处其他同志一道，与敌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英勇牺牲了。

十年前，我重返井冈山，特意回到当年后方留守处的旧址去看看，那座房子依然还在，可能被修整过。看到这些场面，我又不禁想起了毛大嫂。

她真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农家妇女！

在后方总医院当总支部书记时，我同伤病员打成一片，同生活，同娱乐；毛委员的一张条子，让我移交总医院的工作，随队伍下山；我问：为什么让我下山？毛泽东一指贺子珍等女将：是她们推举你的

后方总医院位于中井，离后方留守处只有四五里路。在产后这一个多月里，我的身体虽几经磨难，但当时毕竟年纪轻，很快就恢复了。一路上，我踏着轻快的步伐，不到半个小时，就走到了后方总医院。我见到了总医院的院长曹荣和副院长萧光球。

说是后方总医院，也只有一二十间房子，不过它比后方留守处条件好一些，伤病员都有木板床或竹子床睡，还能按时起床、

吃饭。

在中井总医院住院的大约有三十多人，多数是身患疟疾、肠胃炎、肺炎等一类的红军病员。我看到曹里怀、萧克也在那里住院治疗，因他们留在新区治疗很危险，因此，被送回后方医院。医院里药品很少，西药基本没有，主要是中草药。最好的治伤药就是碘酒和黄金粉，在挨了枪弹的伤口上撒一点黄金粉，就可以消炎止血。医院没有正规的医生，只有几个卫生员。指战员们到医院一方面是治疗，一方面是休息。

真正的重伤病员都住在离中井几十里路的山洞里。那里地势险要，到处是悬崖峭壁，路很窄，马不容易上去，抬担架上去也十分艰难。因为这样的地方便于隐蔽，不易被敌人发现。那里有重伤病员五十多人，有一个医生和几个护理人员。当我离开中井总医院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到山洞里去看过他们。后来听说这些同志在翌年三月，敌人“会剿”井冈山时被杀害了。

我到医院不久正赶上过新年。为了让伤病员高高兴兴地过年，我们在中井前面的半山坡，用木料搭了个台，举办了一个新年娱乐晚会。除伤病员外，周围的老百姓有很多人来看热闹。当时革命歌曲不多，主要是没有人编写，因此只好唱一些北伐时的歌曲，例如像“打倒列强除军阀”一类的歌，本地战士唱了当地的山歌。主要的节目是演戏，戏是自己编的，演一些揭露土豪劣绅怎么欺压穷人一类的戏。因为是过新年，不能光演忆苦的节目，因此也穿插着一些逗乐的节目。我扮演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太婆，虐待媳妇，待人凶狠，最后没有好下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在娱乐的同时也受到了教育。

军委领导对红军总医院很关心，部队打下了一个地方，弄到吃的就给送上来，有时通知我们下山去背。有一次王佐的部队打了胜仗，也派战士下山去背东西，送给总医院伤病员。过元旦的时候，下面给我们送来了几头牛和一些猪肉，伙房给做了几个

菜，让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同时也给山洞里的重伤病员和其他驻地的伤病员送去了一些。

我在后方总医院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二十多天。在这些日子里，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我们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后来有人问我："你当时是总支书记，你是怎样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的？"我回答他们一句话："我们的战士觉悟很高，不需要我特别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事实上，尽管战士们并不懂得很多革命道理，但他们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他们惟一的生路,参加红军就是参加革命，红军就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他们想的就是——"赶紧治好病，养好伤，争取早日回前线，多杀敌人！"

他们的思想就是那么朴实，他们的革命意志就是那么坚定。

我在医院时，也从来不摆出一副总支书记的架子去开导谁。我只是经常同伤病员打成一片，同生活、同娱乐，有时随便聊聊唠唠。在聊天中，议论一些问题，有时也开展辩论，说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些议论和辩论中，无形地对战士们灌输了一些革命思想，使他们明白了一些是非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思想工作的一种形式。

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原以为，红四军主力八月攻打郴州失败后，已经被消灭。但事实上，红四军从桂东撤回宁冈、永新根据地后，又重新得到恢复。为此，他们重新组织湘粤赣三省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

前委召开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迂回赣南，向吉安一带挺进，以动摇赣敌后方，迫使其从"会剿"部队撤出。同时决定，以彭德怀及袁文才、王佐部队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的敌军。

一月上旬的一天，蔡协民带领部队准备出发赣南，途经井冈山时，依依不舍地对我说："这次部队出发，要到很远的地方，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我们撤走后，敌人可能会来进攻，你要多

加保重。我们这次打出去,就是为了牵制敌人,迫使敌人后撤。”因此我有了思想准备,大部队下山,我没有任何恐惧不安的思想情绪。因为井冈山的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敌人就是打上山来，我们到处有隐蔽的地方，还可随时伺机袭击敌人。

但在大部队出发前的一天，即一月十三日下午两点钟左右，从茨坪突然送来一张条子，这张条子是毛委员亲笔写的。他要我立即动身，赶快移交工作，天黑前赶到茨坪，第二天黎明与部队一起出发。

我看了条子后，马上找到曹院长和萧副院长，将条子交给他们。因为在医院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可移交的。我回到房间，卷起夹被，找一根竹棍，一头放夹被，一头放挎包和米袋，就出发了。

到了茨坪，在一个店铺里，我见到了毛委员，我不解地问：

“为什么要我赶来随队伍出发？”

“你问她们，是她们推举你，要你一同下山的。”毛委员笑着指向坐在旁边的伍若兰、贺子珍、吴统莲等女同志说。

原来，前委为了做好下山沿途的群众工作，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宋乔生为主任。下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组。这时，刚上井冈山的万安等县的游击队中有七八位没有念过书的农村姑娘也随同一起下山。她们和军部及前委机关的伍若兰、贺子珍、吴统莲等女同志都编在妇女组里。伍若兰跟我说：

“你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所以我就选举你来当组长。”

当时的妇女组除了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工作外，就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我在工农运动委员会还担任了民运股股长和政治部部务会议成员，在毛委员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记得每当行军时，毛委员总是将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一直坚持步行。他人高腿长，迈一步够我们跑二三步，跟他一起行军我们实际上是一路小跑，就这样，我们几个小青年也愿跟着他，因为他会说很多

笑话、历史知识典故，又幽默爱开玩笑，我们总是一路跑一路笑，轻松愉快地就到了宿营地。我们爱跟着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向我们讲授革命道理、工作方法和原则，尤其是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群众工作。

第二天，我跟随大部队下了井冈山，向赣南挺进，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粤赣闽边界是左冲右突，国民党部队穷追不舍；我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一直跟着穿黄呢大衣的朱德跑；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朱德把黄呢大衣扔了，我和伍若兰跑散了；一周后，伍若兰的头被悬在赣州城头示众，从此，朱老总独爱兰花

部队经过数日的长途跋涉，途经地势险要的大小行洲、崇义，并继续前往大余。

这一带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冰天雪地，天气格外寒冷，树枝挂满冰凌，道路结冰晶亮如镜。下坡时我们只好滑行，上坡时则用马刀割冰开路。就这样连爬带滚，一天下来，人人都变成了泥猴子。

从大庾岭下来时，经过钨砂矿区，我们看到了慕名已久的钨砂。在钨砂矿上，远眺山脚下一大片房屋，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哟，到大地方了！"

大家跑步下山，到天快黑的时候，到了大余县城。

大余和南康相隔一条赣江，这一带盛产鸭子，熏制的腊板鸭，远近闻名，行销附近几省。在街道两旁，我们看到不少十二三岁的孩子，手托装满板鸭脚、板鸭翅膀的木盘子在那里吆喝叫卖。虽然价钱不贵，但我们拿不出铜板，只好"望鸭兴叹"。

那天夜里，我们在城里美美地睡了一宿。

第二天，本准备再休息一天，突然听到城外枪声紧密，我们迅即跑出城外，爬到山岗上观看。这时子弹不断“嗖嗖”从头上飞过，原来敌人已经尾追而至。疲惫之师，对敌人的偷袭毫无准备，只好仓促应战边打边退，我们军部、前委、工农委还有辎重部队，行动比较迟缓，被敌人追着屁股打。敌人控制了我们背后的制高点，向我们不停地扫射，子弹打得很密，但幸好没有一个被打伤。后来发现，我身上背的干粮袋竟斜着被打穿了两个窟窿。

我们到了山岗上，一看后面是很高的山，下面是很深的沟，追兵已离我们不远，别无选择。我们军部、前委、工农委一共一百多人，一个个从山头上向下面的山沟滚下去。幸好山坡上石头不多，草木也较少，滚下去，爬起来就跑。翻过一座山，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部队边打边撤，从早到晚，没吃没喝，急行军一整天。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指战员们一个个疲劳极了，只要一停下来，大家站着就睡着了。

这时我碰到蔡协民，他这时是第三十一团党代表。他本来身体就弱，再加上一整天没吃没喝，途中瞻前顾后，跑上跑下，指挥撤退，更是疲劳不堪。到了下半夜，他几乎就要倒下去了。我只好拖着他的双手，他的头搭在我肩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只是双脚不由自主地随着移动。就这样，我半背半拖着他走了十几里路。大概晚上两点多钟，到了一个村子，部队休息下来了。我把他拖到一个院子天井里，找了一把禾草让他躺下来。他全身像瘫了似的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时已是腊月中旬，快到过年的时候，这家农民已经做了一大缸糯米糍粑，我向老乡买了一块糍粑，在火上烤软了。把蔡协民摇醒后，让他吃了一块糍粑，这才恢复了精神。

这一夜，沿途不少战士掉队。我看到有三个战士躺在地上，

怎样叫唤也醒不过来，有的战士用枪柄敲打他们，也未见醒来。不知那几个战士后来是否赶上了队伍？

大庾岭战斗后，部队不能按原定路线行进，而是折回粤边南雄地界，经闽粤赣边界，转到兴国、吉安一带赣敌后方去了。沿途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察工作都很困难。敌人采取轮番追击的策略，一路咬住不放，穷追不舍。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只好避其锋芒，翻山越岭，踏着冰雪不化的羊肠小道走，每日急行军在九十里以上，弄得部队疲劳不堪。战士们开始发牢骚，而且将气撒到女同志身上，不是讽刺挖苦，就是歧视侮辱。我们气得不得了，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憋在肚里。

部队到达江西一个小镇子，当地古柏同志的游击队和地下党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一天晚上，毛委员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官兵活动分子大会，有百来号人，毛委员先讲了形势和对策，然后让大家讨论，这时有一位男同志站起来说：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这时下面的人七嘴八舌地喊：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我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这下子总爆发了："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这后一句话的确是说得过头了，只见毛委员一下子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我说："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见毛委员动了气，大家都不吭气了，我气呼呼的，但也不敢再吭声。

但是经过这一场辩论，女同志一个也没有留下来。

在暂时摆脱敌军重兵尾追之后，红四军继续向赣南转移。

在计划去东固根据地休整的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叫项山的地方。当地反动势力猖獗，地方反动武装从屋子里朝我们行军的队伍打冷枪，晚上在村头打枪骚扰我们。为了避免与其纠缠，我们

的部队都置之不理。

当晚，部队宿营后，传来军部下达的命令。第三十一团走前卫，三点钟出发；军部、前委直属部队四点半出发，第二十八团走后卫，天亮出发。

四点半时，我们正在一个小山岗下面的田里集合，突然从右侧响起了密集的排枪声。大家知道，这是敌人的正规部队包围上来了。朱德立即指挥一部分人抢占山岗制高点，其余的迅速撤离。

此时，天色刚蒙蒙亮，隐约可见枪声响处的山上有黑压压的人影，跟随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班，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手提机枪声，立即集中火力回击，两个机枪手当场负伤。

朱德见状，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把身上的黄呢子大衣脱下扔了，并叫机枪停止扫射。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紧跟黄呢子大衣跑。

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手提机枪声也停了。

此时天还没亮，看不清四周情况，失去了目标。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的山边跑，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附近的水田里。前面出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堆，我抓着土堆上的一根树条，很敏捷地爬了上去。回头看伍若兰也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

这时，天色已经发白，我看见山下的大路上有零星的队伍在行进，有的还挑着子弹箱、抬着迫击炮。我真想下山与他们会合，但没走几步，远处大批敌人开枪追了过来。我只好折回又往山上跑。到了一个岔路口时，我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我还一直以为她跟在后面呢。

在山头上我看见了蔡协民，我关切地问：

“看见毛委员、朱军长了吗？”

“直属队的人差不多都撤出来了，就是没有看到毛委员、朱军长和他的特务排。”为此我们大家都非常着急。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了朱军长和他的特务排，还有两名负伤的机枪手爬上山来。原来，他们在狙击敌人后走了另一条路，是绕道过来的。

朱军长首先关切地问毛委员的情况。当他得知毛委员还没突围出来时，当即传命第三十一团派一个营：

“打回去，接毛委员！”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派出去的同志回来说，一路上打听不到毛委员的消息。听当地老表说，敌人大约来了两个连，他们没有进村搜索，打了一阵排枪，追了一阵，就走了。大家估计毛委员那里不会出什么问题，很可能往别的路走了。他身边有一个特务班，可以保护。

队伍只好一边前进，一边焦急万分地盼望毛委员回来。两三天以后，毛委员终于赶上队伍。毛委员告诉我们说：

“敌人从村边追过去了，我们赶紧从后山绕过来。因为道路



一九六〇年冬，与朱德、康克清在一起。

不熟悉，翻山越岭走了好几天，才赶上队伍。”

几天来，因为打听不到毛委员的消息，我们大家都忧心忡忡，好像失去了主心骨，日夜坐卧不安。看到毛委员终于无恙归来，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整个部队一片欢腾——毛委员在红军干部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

但是，伍若兰却永远不会归队了。

一个多星期后传来了伍若兰的噩耗。后来听说，她在项山腿上受伤，被敌人抓去。敌人开始不认识她，她说她是伙夫，后来有个被俘的战士讲出了她的真实身份。当敌人知道她是朱军长的夫人后，就将她的头割下来，挂在赣州城楼示众。

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我和同志们都十分悲痛！

朱军长此后独爱兰花，据说是为了纪念若兰同志。

红军进入瑞金和宁都的交界大柏地，敌人前堵后追，两侧夹击，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红军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挽回危局；前委决定，向闽西进军，开辟新区；毛委员指着贺子珍，笑嘻嘻地对我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

二月上旬，红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占瑞金城。这是我们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以来占领的最大一座县城。

到底是大地方，瑞金城乃赣南边陲重镇，商贾云集，市井繁华，相当热闹。市民、商人见红军纪律严明十分放心，照常生活，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市面秩序井然。

第二天早上，队里发了伙食津贴，我们四五个同志相约上饭馆吃它一顿解解馋。点了四道菜，正吃得来劲。突然街上行人四处奔逃起来，商店也纷纷上门板……

该死的敌人不让人吃顿安稳饭！

我们急忙丢下碗筷拼命往驻地跑。跑到门口，队伍已经出发。我们匆忙进去取了行李跟上队伍，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没停几分钟，接着又跑起来。到了大柏地，毛委员、朱军长已先期到达那里。

大柏地周围崇山峻岭，古木参天，是瑞金和宁都交界的咽喉地带。

这时我们发现除后有追兵外，左右两侧也有敌人，前面宁都县城还有敌军把守。而且到宁都还要过一座相当长的桥，预计敌军已派重兵在那里守候。如不在此决一死战，红四军就可能被敌人包围合击而全军覆没。连日来被敌人穷追不舍跑得满肚子气的指战员们，也要求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当晚，前委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地形，趁追击的敌人疲惫不堪，包围圈尚未形成的有利时机，破釜沉舟同敌人作一决战，坚决把敌人击溃。

命令一下达，斗志高昂的指战员们迅速进入阵地，毛委员、朱军长亲临第一线指挥，我们军部、前委直属队伍也都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战斗从大年三十的下午三时一直打到年初一正午。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最后将刘士毅部完全击溃。活捉敌团长萧致平，后因战士们不认识他，被他逃脱。刘士毅部被击溃后，从广东来的敌人和从宁都来的敌人也无心再战，溜之大吉。我红军绝处逢生，军威大震，乘胜追击，队伍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宁都县城。红军在宁都休整几天，筹款数千元。

这就是在红军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是个新区，当地老百姓对红军不了解，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吓得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部队吃了老百姓的粮食、油盐、蔬菜,老百姓不在,没法直接给钱，只好将钱放在罐子里，或是用纸包起来放在拔了菜的菜地里，写明红

军的纪律和付给的钱数。有的没留钱,就打了借条,写明红军再来时,可持条付款。

红军秋毫无犯，给老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红军再次到大柏地时，很多人不仅不跑，还主动出来热情欢迎。

离开宁都后，红军挥师北上，到达东固。在江西地方红军二团和四团的帮助和掩护下，部队在那里安心休整一个多星期。这时，得悉井冈山已失守。

前委决定：红四军向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二月下旬，我们离开东固，掉头东进，经石城，向敌人兵力较为空虚的闽西进军。

从江西瑞金到福建长汀必须翻过一座叫长岭寨的大山，那里山高林密、竹草丛生，地势险要，是汀州城南的重要屏障。为了狙击红军攻占汀州城，福建省防军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派遣重兵抢占长岭寨，并亲自坐镇指挥。

毛委员召集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敌我双方态势，决定进攻长岭寨，消灭郭凤鸣，直捣汀州府。

三月十四日凌晨，红军指战员遵照军委的部署，兵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战斗从上午八时左右打响，到中午即告结束。

那天下午，我们和毛委员经长岭寨下山，途中看到几个红军战士抬着一个梯子，上面躺着一个穿呢子大衣、块头很大的人，我立即紧张起来，是朱军长负伤了？于是加快脚步走到近处想看个明白。

抬梯子的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打死了郭凤鸣！”疑团顿时消失，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和战士们一起分享着胜利的欢乐。

长岭寨之战，共消灭敌人两千多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取得了比大柏地战斗更大的胜利。

当天下午，红军满怀胜利的喜悦，押着俘虏和战利品，以及那死猪一样的郭凤鸣，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汀州城。

当地群众听说红军打死了郭凤鸣，奔走相告，纷纷拥到街上观看，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后来群众把他捆在梯子上，抬到汀州城最高的城门楼上示众三天，引得城里和乡下的老百姓络绎不绝前来观看，边看边骂。饱受大土匪、军阀郭凤鸣奴役之苦的汀州百姓，万众欢呼，感谢红军为他们除了一大祸害！

我们工农运动委员会的同志们抓住时机，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长汀，是福建西部重镇，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也是国民党专员公署所在地。红军在城中向地主豪绅筹得五万多元款饷，还补充了大量给养，并换上统一的新灰布军装。加上部队增加了枪支弹药，不少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部队补充了兵员。经过十几天的休息整编，整个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

从井冈山下来后，屡遭敌军重兵的穷追猛打，屡次陷入绝境的红四军，自此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赣南站住了脚跟。

我们还配合地方党组织，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们下井冈山以来，在赣南、闽西创建的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同时还成立了农协、工会，建立了地方武装赤卫队。

自从下井冈山后，我经常和贺子珍睡一个铺合盖一条被，协民写的信让贺子珍发现了，她看了还不算，还拿去让毛委员看，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他们俩常常像小孩子一样，先是逗乐，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有时闹着闹着就真打了起来，可一会儿气就消了，又嘻嘻哈哈，闹着玩了。有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

玩笑很不得体。不知什么原因，不久蔡协民被调来红四军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我们就在一起了。虽然没有挑明,但我估计这是毛委员的安排，毛委员看了协民的信，知道了我俩的苦恼，就将协民调来军部，让我们夫妻团圆。

三月下旬，前委在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分析闽西、赣南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抓住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阀处于分裂，自顾不暇的有利时机，红四军主力不回井冈山，就在赣南、闽西这一大范围内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与湘赣边界的红军割据区域遥相呼应。

四月初，红四军从长汀回师赣南，在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部队会合。

在瑞金，我第一次认识了彭德怀军长。他说在井冈山见过我，可我没有一点印象。他们从井冈山突围出来，一路行军打仗十分艰辛，但我见他没有丝毫疲惫的样子。见面谈话时，他总是笑容满面，十分乐观，有一股英雄好汉的气魄，我打心眼里敬佩他。

红四军、红五军会师不久，彭德怀军长根据在于都召开的前委会议精神，再次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

红军杀了经商富农的四头肥猪，毛泽东说“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刘安恭在朱军长面前挑拨，说政治部门不能干涉军队的事；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与谭震林等人离开红四军；我也被划入“毛派”

在红四军回师瑞金的行军途中，我和朱军长走在一块。那天傍晚，部队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田野不远处有四只很大的肥猪在觅食。

我听到军长身边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

“哇，这么大的肥猪，一头足有三百多斤。这一定不是穷人家养的，肯定是地主或者是富农的。”

“对！肯定是地主家养的，我们把它没收了，杀了它改善生活。”有人马上就附和着。

我们只当是开玩笑说的。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就吃上了久违的猪肉。

毛委员虽然很爱吃红烧猪肉，但他想到了战士们：“问一问部队指战员们都吃上猪肉了没有？”一了解，部队上下都吃上了猪肉。他又要我们到供应部门查一下猪肉是哪里来的。供应部门回答说，没收了地主的猪。

可是，第二天早上刚出发，就有人来告状，说他的猪被红军杀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而是富农经商买卖的猪。

毛委员听了汇报后很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猪款。

晚上，毛委员召开干部会议，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我们的商业政策，是不侵犯商人的利益。那人虽是富农，但他是经商的，猪是经商买卖的商品，我们不作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行为！

当时，军事干部中有个叫刘安恭的，此人早年留学德国，到苏联学过军事，后被上海党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任政治部主任。他与朱军长是同乡，在军阀部队时又是同事，两人关系较好。他听了毛委员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冲着朱军长。因为朱军长知道此事，却没有制止，也有一些责任。

会后，刘安恭在军长面前挑拨离间，说毛委员对你怎么能这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等等。

刘安恭不仅如此，还到部队暗中活动。在其他军事干部中游

说他的观点,有意制造矛盾。

为此，毛委员专门开会，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毛委员针对一些同志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因此应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是打仗，它还要执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任务，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组织员和宣传员。所以政治部门怎么能不对外呢？红军执行的是政治任务，如果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不去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只是打仗、游击，那么这支军队同国民党的军队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由于刘安恭的游说活动，加上当时红四军中确有一些干部存在军队应独立于政党之外的错误思想，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还不理解和接受，认为毛泽东有些武断。因此，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委员在改选前委时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

自此，毛委员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去指导地方工作。与毛委员持同一观点的谭震林、江华、蔡协民、贺子珍等人也离开红四军相继前往。

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

“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

这样，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后，我被划到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

毛泽东建议我任闽西团特委书记；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在闽西各县普遍建立，青少年踊跃投身革命；特委一声令下，就能集合上千人的队伍；激进的青少年也曾经砸庙、挖祖坟、捆绑游街，甚至乱搞男女关系

在我们到闽西之前，已有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但不很健全。我们去了之后，闽西革命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正式成立了特委，邓子恢仍任特委书记，蔡协民任组织部部长，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张鼎丞负责政权工作。在毛委员建议下，我被任命为闽西团特委书记。

由于红四军的入闽，有力地促进了闽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加上特委领导力量充实后，各项工作得到迅速加强，团的工作也发展相当快。

红军所到之处，儿童团、少先队很快建立起来。接着，龙岩、永定、上杭、汀州等县相继建立了团县委。

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广大青少年踊跃投身革命。儿童团承担了站岗、放哨的任务，年纪稍大点的就参加少年先锋队，参加斗地主、打土豪、分粮食浮财、烧地契等斗争；同时还协助大人们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时，闽西地方偏僻，封建势力猖獗，老百姓受封建影响深重，年轻人受旧礼教的压迫严重。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要人们不要相信命运之说。指出“三从四德”、封建宗法、封建迷信等等都是地主阶级、有钱人压迫统治穷人的手段。

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

对于那些巫婆、神汉、相命、算卦、跳大神的，还有虐待童养媳、婢女、丫头的，少年先锋队就组织青少年斗争他们。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少年先锋队在全区普遍建立，而且逐步向军事化发展。永定、上杭县率先成立了“少年师”，以村为小队，区为中队，县为大队的建制来建立。只要特委一声令下，就能迅速聚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

当主力红军开拔之后，少年先锋队也拿起武器，担负起保卫红色政权的任务。那时他们没有枪，只有鸟铳、梭标和大刀，但是他们很勇敢。当地方反动势力乘红军不在卷土重来时，少年先锋队就配合赤卫队进行顽强的抵抗，有时还能缴获到一些武器。

在当时的闽西，“少年师”具有相当的影响。后来谭震林把少年师编入了第四纵队，少年师番号因此取消。他们参加了正规红军，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年轻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儿童团和少年队曾经到寺庙里砸菩萨、赶走和尚，把祠堂中祖宗的神位打碎，甚至发展到连祖坟的墓碑也挖掉，对虐待童养媳的家人进行体罚，捆绑游街示众等，造成个别地方老人、父母同年轻人、儿女发生尖锐矛盾，甚至打起架来。

团特委获悉后，赶忙召开会议，宣布我们既要反对封建旧礼教，但又要尊重一些传统的东西，如祠堂的牌位、寺庙里的菩萨、坟上的墓碑，无碍革命斗争大局，用不着砸掉，否则不得人心。

针对一些童养媳解放了以后，对公婆等人进行报复的行为，我们也进行了教育，要她们尊重老人。

此外，当时的少先队是男女混编的，有些青少年认为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生活上就无拘无束，乱搞男女关系。团特委知道后，立即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很快制止了这一极端行为。

亲自指导闽西特委工作的毛泽东得了疟疾，又泻又烧，全身蜡黄；金鸡纳霜丸治好了他的病；厨师为毛泽东每天炖一只鸡、两斤牛肉；康复后的毛泽东说：拉屎就像牛拉屎，一拉一大堆

在红四军两次入闽的鼓舞和推动下，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

展迅速。

红军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很快将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毛委员在这一时期亲自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并亲笔起草了一批文件，帮助闽西苏区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

当时闽西特委机关设在龙岩与上杭交界的苏家坡，毛委员、邓子恢都住在那里,毛委员有时也到蛟洋一带指导工作,但大部分时间在苏家坡。

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毛委员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现在到了地方工作，时间较多，毛委员更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思考重要问题。

记得在苏家坡，毛委员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贫雇农、中农，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

毛委员主持这样的座谈会、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

毛委员给大伙提的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切合实际。大家见他这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也就无拘无束，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有时他们也向毛委员提出一些问题，毛委员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能讲出许多道道来且通俗易懂。

毛委员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但就是不要我记录，毛委员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

毛委员很喜欢同群众接触，同三教九流交朋友。记得刚打下长汀城时，他就邀请过佃农、裁缝工人、老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流氓头子等六种人来参加调查会，从各个侧面深入了解汀州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后来还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了解汀州的工业、手工业状况，了解社情民意。

是年八月，为了粉碎敌三省“会剿”计划，红四军前委作出分兵决定，由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到与广东交界的梅县、蕉岭一带游击，在外线打击敌人，吸引和减轻进攻苏区的敌人；毛委员率领两个纵队留在闽西，骚扰敌人，分兵发动群众。

毛委员这时不在苏家坡，而是到永定的虎岗一带，一方面指导地方工作，一方面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部队留下两个连队也在虎岗一带活动，保护毛委员。

大概是九月份下旬，红四军主力部队从梅县、蕉岭回师闽西，一举攻克上杭县城。

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几个人迅速收拾文件和行李，连夜从苏家坡翻山越岭赶路。在打下上杭县的第三天，我们抵达县城。

一两天后，毛委员也被担架抬着到了上杭。原来他在永定虎岗一带活动时不知得了什么病，全身浮肿蜡黄，肚子胀，看起来病得相当重。

在上杭，毛委员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毛委员、邓子恢和我们都住在楼上。

当时部队里没有医生，我们从上杭街上一个西药铺里请来一个医生。他看过之后说：“得的是疟疾，又泻又烧，持续不愈，时间一长，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便出现浮肿。”

他给毛委员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吃了很快就会好的。另外，他要我们给毛委员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两斤牛肉来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当时驻扎上杭县城的红四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执行党的商业政策。因此商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鸡和牛肉都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

我们专门为毛委员请了个男厨师，每天为他炖一只鸡，烧两斤牛肉，烧得烂烂的，每顿饭都喝一碗牛肉汤。二十天以后，在我们的悉心照顾下，毛委员的病痊愈，身上的浮肿也消失了。

在毛委员治病期间，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因为那时我已到地方工作，没参加这个会。会后红军主力又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只好撤出上杭，回到苏家坡。

身体已完全恢复后的毛委员，和我们一起走回苏家坡。毛委员边说边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而我们都要一溜小跑地跟在旁边。但当时我们这群年轻人还是最爱跟着毛委员行军，听他讲笑话，摆“龙门阵”，走一路笑一路。他说：

“我现在身体完全好了，吃得也多，拉屎就像牛拉屎，一拉一大堆。”惹得我们笑破了肚皮。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读英语，听起来令人发笑，但他天天读；毛泽东爱吃鱼，尤其是鱼头，我和蔡协民经常去捞鱼；周恩来向红四军发出指示信，肯定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陈毅请毛泽东回红四军；毛泽东要我照顾怀孕的贺子珍，我不同意，第一次同毛泽东吵架

在苏家坡我们和毛委员在一起。我们住的房子有两层楼，中间有一个天井。两间房子遥遥相对，毛委员和贺子珍就住在我的对面屋。

两个房间离得很近，若开着窗户的话，在屋里说话做事，对面屋的人都看得清，听得见。

我看到毛委员那时很用功，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虽然他有很重的湖南口音，读得也不很准，听起来令人发笑，但他天天读。当时，毛委员离开了前委，病刚好正在休息，因此他每天都在读书看报。

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以为是倒经。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毛委员又喜欢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两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在我们驻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和一座小桥。晚饭后，我们经常陪同毛委员夫妇去那里散步，欣赏暮色中的田园风光和落日的霞晖。

有时，我们也爬到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去玩。洞中的水里有一种鱼，能在陆地上爬，也能在水里游，叫的声音像小孩哭，当地人叫它“娃娃鱼”。我们还抓过这种鱼，吃起来味道鲜美。

小溪里也有很多的小鱼，当地群众用油脂多的树柴点了火，用铁丝编的罩子罩着，鱼见了火就聚拢过来。此时用鱼网一捞，就能捞上几条，一个晚上就可以捞上两三斤。

有时我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去捞鱼，毛委员总是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毛委员很爱吃鱼，而且特别爱吃鱼头，因此，我们大家也很高兴去干这桩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陈毅突然到上杭苏家坡找毛委员，说是接毛委员回红四军。

原来，陈毅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接替毛委员担任前委书记，会后他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周恩来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和口头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

据”的思想和建军思想，要他们请毛委员返回红四军。

当时我们都跟特委一起住在蛟洋。毛委员准备回部队，可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多月了，不便随军。毛委员临出发前，找到我交代道：“曾志，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毛委员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委员坚持道。我说：“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毛委员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我知道我理解错了，顿感赧颜，我放下声调向毛委员道：“我跟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

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委员，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与毛委员吵架！

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对毛主席发火，后来每当我想到此事心中都深感内疚。

毛委员走后，我就和贺子珍住在一起。当时正好蔡协民到厦门向省委汇报工作，我就搬过去和贺子珍睡在一起。

毛委员离开苏家坡后，到了蛟洋、新泉，最后到汀州，与正在那里的红四军会合。毛委员又重新主持前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开展各项调查研究和摸底工作，起草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为大会的召开作准备工作。

由于汀州经常受到国民党部队的骚扰，为了集中精力开好会

议,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前委决定离开汀州,到比较偏僻的古田镇。

十二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古田镇的一个祠堂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那时，我作为闽西团特委书记，应邀列席了这次会议，听了毛委员的报告。后来由于地方上有事，我只参加了两三天会就提前走了。

在红四军党的“九大”上，毛委员再次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并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党内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会后，他和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经宁化、清流、归化，回师江西。

蔡协民摔成脑震荡后，感情非常脆弱，像个小男孩;厦门一些同志认为我像《水浒传》里的“母夜叉”；组织上决定把我调离苏区去厦门白区工作

一九三〇年一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攻占龙岩城。闽西特委也随后赶往龙岩，并着手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

在红四军入闽后一年里，闽西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各级党组织、群众团体普遍建立，分田运动蓬勃开展，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喜人。

这时，闽西特委作出决定，召开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

就在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一天，来自各地的代表们都来齐了，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里。邓子恢和我们住在二楼，会场就设在学校的礼堂里。

第二天就要开大会了，大伙儿都很兴奋，交流着各地的情况，所以那天大家都睡得较迟。

那时蔡协民的身体较差，晚上常要起来解手。那天晚上，他只身起床下楼，迷迷糊糊地往前走，正好有一根栏杆断了，他便从二楼一头栽到了楼下的三合土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他爬上二楼稀里糊涂地走进另一代表住的房间，昏倒在地上……

第二天清晨，那位代表起床，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吐了一地，还有血块。大声惊呼：

"唉呀！这是谁倒在这里？"

当时蔡协民从厦门回来不久，很多人不认识他。楼里的代表们听到喊叫，都围拢了过来。有的人认出了他，便来敲我的门。

"快来看看是不是蔡同志？"

那时我也刚起床，一看蔡协民不在屋里，就急忙跑过去，一看果然是蔡协民倒在地上，我把他扶回房间躺下休息。

这样，我只好在楼下找了个房间，搬到楼下来住，并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医生说，他摔成脑震荡，还好地上有堆垃圾，尽管身上多处擦破皮肉，但没有骨折。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起码要二十来天。

这一来，蔡协民就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了。我那时是团特委书记，必须参加会议，还安排大会发言。我只好两头兼顾，一边参加大会一边照顾他。

他摔伤后，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伤感。我要是几个钟头或半天没去看他，他就非常难过，责怪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他。我知道他心里难过。他有时甚至还像个小男孩那样，难过得流泪，很希望有人去看他、陪他、安慰他，所以我就尽量挤时间多陪陪他。

说实话，他当时摔得的确很重，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头疼得很，翻身说话都感到困难，要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等代表大会开完之后，蔡协民还没全好，只是可以起床，下

地走一走。直到两个多月后,他才完全康复。

五月间，福建省委的军委书记王海萍来闽西视察工作，我和贺子珍去见他。

蔡协民去厦门汇报工作回来后，对我提起过王海萍这个名字，还说厦门省委机关的一些同志曾问过他：听说你的爱人长得不错，但很厉害，是否像《水浒传》里的“母夜叉”孙青孙二娘？他告诉那些人，没那事。当时我听了就觉得奇怪，省委那些领导到底听谁说的,怎么把我比作水浒里的女强人?!

一进门，王海萍正端着饭碗在桌前吃饭。他看到我们两人进来，听了自我介绍后，就用两个眼睛看了我半天，我不知他是否也以为我是“母夜叉”而这样奇怪地看着我。

那天我穿了件闽西土织布机织的、染成蓝颜色的粗布对襟衣。这件衣服原是贺子珍穿的，她怀孕后将我的较宽大的衣服换去穿。加上我在闽西已呆了较长时间，皮肤也比部队行军打仗时白嫩多了，并不难看吓人。

他大概觉得面前的我，同他听说的“母夜叉”判若两人，感到很惊奇。尽管我没有问他，但我从他的眼神中能看出来。

王海萍回厦门不久，我和蔡协民便接到省委的通知，到厦门省委机关工作。我知道那将是一种与部队和苏区完全不同形式的斗争和生活。尽管我更喜欢在苏区工作，但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的事，我惟有服从，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我把团特委书记的工作移交给了龙岩团县委书记张戴荣，蔡协民将特委组织部部长的工作移交给龙岩县委书记郭滴人。

六月初的一天，我和蔡协民踏上了前往厦门白区漫长而危险的旅途。

第五章　白区涉险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厦门，我扮作西药店老板的太太，负责与部分地下党员保持单线联系；省委机关就在公安局侦探长的楼下；为了避免暴露身份，遇到熟人也要装作没看见，因此遭到风言风语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错误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当时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军阀战争的爆发，已经具备了全国各地大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于是，作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中央可能认为，福建已经在闽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如果把农村武装斗争与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就更容易在福建首先取得胜利。

为了贯彻中央的路线，福建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城市白区的工作，组织厦门暴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和蔡协民奉命调到厦门省委机关工作。

当时，福建省委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闽西特委和红军提供的，取之于地主豪绅的浮财。

临行前，特委将一大笔经费交给我们转交省委。所谓的经费，就是几十两的黄金首饰。我找来一把雨伞，把竹把掏空，把

三十多个戒指拉直，一个个塞进雨伞的竹把子里。我又缝了个布袋子，将金项链装进去，缝在裤带上，缠在腰身间，大约有一斤多重。剩下的几个金镯子就戴在左右的手腕上。

七月初的一天，我和蔡协民在一位姓赖的同志护送下，从龙岩出发。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三人不走大路，由永定的赤白交界处，翻山越岭，趁着黑夜来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峰市。这是一个集镇，归广东大埔县管辖。

在赖同志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地下交通站。这是一个老字号店铺，老板一家就住在这里。店铺的后门便是一条小河，乘小船可直达大埔县城。

第二天晚上，我和蔡协民乘小船去大埔，那位赖同志完成使命返回龙岩。我们到大埔后，又换乘小轮船到潮州。

在小轮船上，我们偶遇在上杭为毛委员治病的那位医生。他显然也认出了我们，只是点头笑笑，没有同我们交谈。

我和蔡协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对此人也不甚了解。倘若医生去告密，我们保准被捕。因为轮船上就有国民党警察，且无藏身之处，跳水逃跑，我们又不会游泳。只好硬着头皮，故作镇静，任其变化。

船在江中不紧不慢地开着，我们心中却焦急万分，真希望船早点到达彼岸。好不容易看见潮州的轮廓出现在眼界，我们悬着的两颗心才渐渐落了下来。

船一靠岸，我们就急忙下船，混入熙熙攘攘的旅客人流之中。那位医生也紧随其后，但没什么动静。不一会儿，他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

此刻我们才松了口气，航程中绷紧的心弦顿时放松。那位医生真是个好人！他若告密，肯定会得到一大笔奖赏。我们细想，身处上杭苏区的这位医生，一定受过共产党、苏维埃的影响，至

少对革命是同情和支持的。

当晚，我们在潮州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到了汕头。汕头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蔚蓝色的大海，见到这么大的海滨城市，觉得很新鲜。海边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小洋楼，海港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外国轮船。湖南长沙虽大，但没有海。相比之下，觉得汕头比长沙漂亮多了。

从汕头搭海轮到厦门，在波涛起伏、一望无垠的大海中航行了两天多时间。

轮船终于靠上了厦门码头。只见码头上军警林立，关卡甚严。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踏上的是一座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城市。

我和蔡协民一上岸，就有地下党的同志在等候我们，然后被带到省委机关驻地。那是两栋样式相同且紧挨着的房子，中间有一个院子，两屋内部是相通的。省委书记罗明就住在其中的一栋，我们住在另一栋。

我是第一次见到罗明。他是广东大埔人，高高的个头，身体瘦弱，带着眼镜，说话和气平缓，虽然只有三十四五岁，但却像个长者，令人尊敬。

我们在闽西时早就听人说起过罗明，而且都是用很尊敬的口吻，他在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中威信最高。

在我们来之前，罗明单身一人住在那里，吃饭也都是在外头打游击，东吃一顿，西吃一顿。我们住下后，便请他和我们一道用餐，就像一家人。

安顿下来后，我抽空观察了一下房屋和周围的地形道路，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这栋房子看似两层，但实际上楼上与楼下是分割的，楼梯已被堵死。从屋后的山坡上有路直通二楼。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二楼到底住着什么人。因为有几个早晨，我都曾见过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经常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此人三十多岁，穿戴不凡。我猜想他肯定不是等闲之辈，有可能

是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

为防止万一，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弄清此人的底细和来头。因为我们住在楼下，也许他能听得到我们的谈话。不查则已，一查足以让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此人是厦门市公安局的侦探长。作为国民党的鹰犬，这种人正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对头。

看来此地不能久留，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嗅出什么味道之前，另找地方尽快转移。

我们很快在鼓浪屿的虎巷八号租到了一层楼房。它比较大，共有七八间，有一个门单独进出。房租也比较贵，楼下和对面的楼房由房东自用。

为了隐蔽视听，房子是由蔡协民以西药店老板的名义租下的，作为省委的机关驻地。我们称罗明为堂兄，称省委秘书处处长黄剑津为弟弟。除我和蔡协民是正式夫妻之外，组织上分别从漳州石码一带调了个叫谢小梅的女同志，从闽西调了个小学女教师郭香玉，安排给罗明和黄剑津同志作假夫妻。她们就住在机关里，谢小梅负责刻蜡版，油印材料，郭香玉负责抄抄写写。我们还在当地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立志终生不嫁的“自梳女”，帮助料理家务。

我在机关里的任务是抄写密件，与交通站联系，接送文件，与外界联络，同一些地下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其中有厦门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等。

在机关里我是个忙人，差不多每天都得外出。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西药店老板的太太，租住的又是好楼房，为了应付房东和邻居，所以每次外出都需要穿金戴银的，而且不得不换上我不喜欢的旗袍与高跟鞋。

但有时还要看联络接头的对象，如果是来自苏区农村的，我在出门后，到了偏僻之处，又要取下金戒指、手镯和项链，以免

在接头时暴露身份。

记得我离开闽西时，团省委书记陈柏生曾写信给罗明，根据我的年龄和经历，提议我到团省委去搞团的工作。但到了厦门，罗明看过信后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我想，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也可能他们认为我这个人还比较机警吧，所以安排我从事这些危险性很强的工作。

不过罗明还是多次叮嘱我，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就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则，在街上碰到再熟悉的同志，也要装作不认识，甚至连眼睛都不能抬起来，以免引起盯梢的敌人注意。

我到厦门不久，有几位在“厦门劫狱”中胜利逃到闽西苏区的同志的妻子，她们听说我从闽西过来，想向我了解自己丈夫在那边的情况。经过组织的同意，我与她们相约在中山公园见面。

公园里游人稀少，我们四人装作结伴而行的游客，找了个僻静之处聊天。一个是团省委书记陈柏生的妻子，另一个是原省委组织部部长、原团省委书记的妻子，姓名记不起来了，还有一位似乎是湖南师范的学生，后来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队的学生，叫李什么云，与大革命时的女作家谢冰莹是结拜义姐妹，她的丈夫是从上海党中央机关去的，在红军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当她们从我那里得知她们的丈夫的近况后，十分高兴也十分感激。

但事过不久，她们就在别人面前说起我的不是。原因是，有一两次我在大街上见到其中的一两位女同志，她们想与我打招呼。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将头转向另一边装作没看见，不搭理她们。由于她们不理解秘密工作的纪律，便认为“曾志这人非常傲慢，在路上碰到她，本想和她打招呼，可她把头一偏，理都不理，目中无人”。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心里也感到委屈和内疚。其实我何尝不想无拘无束地和自己的同志相聚，但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因

此后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请她们原谅了。

“立三路线”影响下的“攻打盐税卡”暴动失败；“厦门劫狱”总指挥陶铸来到了省委；初次见面，我俩都毫不掩饰地愣了片刻；陶铸傲慢地顶撞倍受人们尊重的“老大哥”罗明

我刚到厦门没几天，正赶上一次武装冒险行动——攻打厦门盐务查验关。

对省委组织的这一行动，许多同志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的盐关对盐民抽筋扒皮，恣意盘剥；对挑盐的农民也要抽税，若交的不够或交迟了，便又打又罚，群众痛恨已极。攻打盐关，不仅可为民除害，扩大党的影响，而且也可作为厦门武装暴动的一次演习。而一些同志则认为此举意义不大，弄不好不仅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而且容易暴露自己，刺激敌人加强防范和“清剿”。

然而，省委领导头脑正处在发烧之中，听不进反对的意见，执意决定打盐关。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原计划组织厦门工人、农民、学生两百多人，在厦门港举行反对军阀战争与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因时间尚早，武装纠察队还未到齐，总指挥曾炎便下令集合队伍冲入盐关捣毁了里面的设备，继之就在民生路渔行口一带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公开演讲呼口号。

由于敌特事先已侦知我们的行动，调集部队和警察，包围游行队伍，甚至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进行残酷镇压。愤怒的群众在武装纠察队的率领下，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达一个小时之久。与此同时，关押在思明监狱的二十多名监犯，闻知

街上枪声大作，也趁机暴动，打破监狱、冲出牢笼，加入肉搏战。搏斗中，总指挥曾炎为掩护群众当场牺牲，另外还有三人牺牲、三人受伤、五人被捕。

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无谓的牺牲。一九三〇年十月党中央纠正了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原先成立的厦门行动委员会也就停止了工作。

一天，我在省委书记罗明的屋里，见到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约二十三四岁，个头不高，却很精干，微黑的面庞，青腮帮子，一头不驯的浓密硬发，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他上面穿一件咖啡色广东衫，下面是西裤、皮鞋。我觉得这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更谈不上潇洒儒雅，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罗明给我们互相作了介绍。当初，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愣了片刻。

哦，原来他就是陶铸！

这个名字我在闽西时就听说过了，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总指挥。（一位华侨青年还根据此事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五十年代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从监狱中获救的一批同志，后来奔赴闽西苏区。我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陶铸是一位十分英勇又极有才干的同志，因此他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陶铸也没想到，人们传说的闽西苏区蔡协民的那个泼辣能干的“母夜叉”，竟然是白净秀气一头垂肩秀发，穿着素净得体，举止端庄的年轻女人，难怪他大吃一惊。可见，当时人们都把我想像成一个又凶又丑的女人。

看到陶铸那副愣神的样子，我心里不由暗自好笑。但紧接着下来，我对陶铸原来的那些好印象全没啦。

罗明与陶铸谈话，可陶铸坐在那里，眼睛看着窗外，一副爱听不听、爱理不理的样子。罗明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下去，可陶铸



一九三二年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曾志。

还是那么个心不在焉的劲头。罗明有些生气地说："你态度好点行不行？"陶铸也不示弱："难道要我跪着听你说话?"气得罗明好久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想，陶铸怎么能这样对待领导？罗明在省委机关很有威信，倍受尊重，又是年长我们许多的老大哥，而陶铸如此傲慢，实在是太过分了。

第一次见面，陶铸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但是当我进一步接触并了解了陶铸后，又不得不改变我对他的看法。

不久，在军委书记王海萍妻子那里我见到的是另一个陶铸。

陶铸与王海萍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陶铸去了上海，中央分配他到红四军工作。途经厦门时，军委书记王海萍见他黄埔军校出身，经历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懂军事且有作战经验，就恳切地将他截留下来，做兵运工作和搞武装斗争。先让他到厦门炮台当了三个月的兵，计划伺机兵变拖枪暴动，后来转来做劫狱工作。劫狱成功后，陶铸便留在省委军委机关工作，与王海萍夫妇同住在机关里。

有一阵，王海萍奉命去闽西巡视指导工作，偏偏不巧的是，他的妻子此时身患急性腹膜炎。因为没有钱，不等完全治好就提前出院了，在家里生活不能自理。王海萍把妻子托付给陶铸照顾，提着一颗悬着的心去了闽西。

陶铸尽心尽力去完成战友的嘱托，对王海萍的病妻给予无不至、温柔体贴的照顾。他每天跑里跑外，烧火做饭，喂药 喂水，洗洗刷刷，甚至像倒尿倒屎、洗涤污物这样的事，他也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去做，直到两个月以后王海萍回来。

当我耳闻目睹这一切后，十分感动。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富有同情心，对同志像严冬里的一把火！

警察突然包围了虎巷八号，抓走了在家的同志；“自梳女”机智地解救了王海萍；搬到鼓浪屿福州路一二七号后，我同蔡协民经常吵架；引着警察抓我的房东媳妇就住在隔壁

时至一九三一年三月，虎巷八号的“家庭成员”发生了变化，换成了另一批人，惟有原来的女佣人不变。那里成了省委宣传部和秘书处的机关。蔡协民和我已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罗明也调到闽赣省委去了，他的工作由原军委书记王海萍接替。王海萍夫妇也搬到那里居住。

不久，从闽西龙岩调来了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也住在那里。那个男孩叫郭仕宜，我们都叫他小郭，他的任务主要是担任交通员。没想到一九三四年我在福安又遇到了他，那时他改名为郭秀山，被中心市委派到闽东，担任团的领导工作。

毕竟那时的地下工作还不太成熟，不太严格，竟然在小小的机关驻地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人参加的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尽管吃住开会都在屋里，但有那么多人出入，总会引起注意的。

不久后的一天，不知何故，一批警察突然包围了虎巷八号，抓走了在家的同志，有宣传部部长李国珍、王海萍的妻子梁惠珍、闽西来的老太太，连到机关来联系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杨适也同时被捕。敌人还搜出了我们的印刷机器，然后将房子贴上封条。

多亏了那位老佣人，才使王海萍幸免于难。这位目不识丁的“自梳女”，虽然并不知道他的房主人是共产党，但是她以最朴实的感情，本能地认为这些都是好人，不同于他以前所侍候的那些阔佬。他们平等善待她、尊重她，这是任何女佣也享受不到的待遇。

于是，她看王海萍和小郭上街还未回来，便趁敌人不注意，

悄悄地溜了出来，站在街角处等着。第一个等到小郭，接着又等到王海萍，她告诉他们："不能进去了，有警察在里面检查。"从而搭救了王海萍和小郭。

被捕的那几位同志，很快就牺牲了。王海萍的妻子怀孕已六个月，残忍的敌人，不准孩子出生，将母子一起杀害了。

我和蔡协民只是由于工作调整，蔡协民调任省委军委秘书，搬了新家，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新家是在鼓浪屿福州路一二七号，这是一座结构特别的四层楼的洋房。鼓浪屿是个山坡地。这使得这房子的每一层都可以通向外面的公路，而楼内从一层到四层也有楼梯上下。这种结构的房子比较适合开展秘密工作。房东是个有钱人家，住一层楼，我们租住在第四层，有三个房间，外带一个厨房，厨房旁还有一个石洞，可以通向屋外的一个石头小房子。

不知什么原因，那阵子我常同蔡协民吵架。虽说我们两人是自由结合的，但我总觉得和他有些不协调，甚至有些格格不入，我不太喜欢他的性格，温柔有余刚毅不足。蔡协民比我大十一岁，他总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我，但又生怕我对他不好，对我管得很死。

当时，省委机关有个秘书处长叫黄剑津，没什么事时，他经常到军委驻地找我聊天。蔡协民就很有意见，看不惯。他竟当面质问黄剑津："我同曾志两人感情深厚，你不要做第三者！"弄得黄剑津非常尴尬。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莫大侮辱，他怎么能这样呢？依我的倔脾气，他越是这样，我越是对他不满意。

有一次，我们又吵架了，而且吵得很厉害。我一气之下跑到屋外的石头小房里睡觉去了。他来敲门，我不理他，他便很坚决地躺在门外冰冷的地上，大有我不开门他就誓不起来之势。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当时天气很冷，屋外的气温很低。

我不忍心让他再躺下去，没办法我只好起床开门，让他进去……总之，由于我们年龄和性格的差异，因此在一起总是磕磕碰碰，不太和谐。

我曾想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分手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犹如坐在炸药堆上，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待人处事须小心谨慎，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周全。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

一天，我准备过海去厦门，经过虎巷八号所在的那条大街时，突然被一个女人叫住了。

这女人是原来我们居住的虎巷八号房东的儿媳妇。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查封后，这家人可能已知晓我的身份，只要那女人喊一声："抓住她，她是共产党！"那我在鼓浪屿这个孤岛上就插翅难逃了。

这时，我的脑子飞速地转了一下，决定趁着她还没有恶意之前先沉着应付，再伺机逃脱。

我停住脚步，看那女人挺着大肚子，一颠一颠地跑过来，拉住我说：

"你原来租住我家的那房子被查封后，已经三个月没人租了。可房主仍写的是你们，在没有租出去之前，你还得补交这三个月的房租。"

"我搬的地方离这里较远，今天是偶然路过这里，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那我陪你去取。"房东媳妇一点也不放松。

这时，我知道自己的判断完全正确，房东一家已清楚我是共产党，不过她不是存心要出卖我。他们需要的只是钱，只要房租交清，大家相安无事。

我很认真地对她说："路挺远的，你又挺着个大肚子，我怕你累了。我看这样吧，我就在这店铺门口等着，看看有没有过往

的熟人。若有的话，我就请他给家里捎个信，让家里把房租钱送来还给你。”

那媳妇也真傻，居然没识破我这缓兵之计，还挺高兴地说：“那好！那街角处的杂货铺，就是我的娘家开的，我们就到那里去等吧！”

我们坐在店里，东张西望地找熟人。鼓浪屿的街上人来人往，游人如鲫，可是从早上九点傻等到十二点，还是没有发现一个熟人。

其实不然，过往的行人中就有几个我认识的，但我只当没看见。当时党组织活动经费相当困难，如果那时真能掏得出钱来打发她，也就没有性命之忧了。因此，我心里还是盘算着怎么尽快摆脱这个傻得可爱的女人。

说她傻得可爱，是因为她的心眼还不错。中午了，肚子开始唧咕，她很客气地邀我到不远处她娘家吃午饭。饭后，我们往回走仍回店铺等人。

真是天赐良机！远处吹吹打打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看来死的是个有钱人，那送葬的场面真够气派，众人抬着纸车纸马，浩浩荡荡在鼓浪屿狭窄的街上穿过。交通一时中断，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趁着那房东儿媳正探头伸脑看得出神之机，我一转身，撒腿往街边的一个小胡同里跑去。由于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我早已把这一带的街巷情况摸得烂熟，以备急需。

我七拐八拐，跑过几条小巷，穿过一家木材加工厂和一家医院，来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渡口，跳上了一条正要开往厦门大学的渡船。

当小渡船开出较远后，我看到刚才跑过的巷口和海边，有许多巡警在那里跑来跑去，喊人吹哨子，一片热闹。也看到那个大肚子的女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还手搭凉棚，向海里眺望。不过她

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在转眼功夫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见到这般情景，我在心里暗自偷笑。

船到厦门大学后，我便赶回市区，在秘密交通站住了下来。

天黑后，我偷偷地潜回鼓浪屿，回到机关紧急处理一些事情，准备转移。为防万一，我连夜清理文件。半夜烧东西，怕冒烟有火光，且烧纸的气味也很重，会引起房东和邻居的怀疑。怎么办？

我急中生智，用一只大洗衣盆，将文件浸泡，再用搓衣板搓成纸浆，然后一点一点地用自来水将纸浆冲进下水道。因为下水道有一段是明沟，容易被发现，我就不时下去看看明沟里有无残存着纸浆。直到一切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东方已经发白。

第二天，我站在房前晾东西，惊奇地发现，隔壁住着的就是那房东的儿子，其媳妇的娘家也就在我的住处前面不远的地方。而且他显然也认出了我。

鼓浪屿已经不能再住下去，太危险了！

蔡协民离开厦门调福州，我在光天化日之下烧毁了一批党内文件；刚到福州，警察看我与丈夫年龄相差悬殊，怀疑蔡协民拐带妇女；我生了病，隔壁的日本人为我“跳大神”驱鬼

一九三一年七月，我们接到上海党中央的指示，撤销福建省委，另设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直属中央领导。厦门由王海萍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

因为那时福建的西部和北部很大一块区域都已划入中央苏区，闽西成立闽粤赣苏区省委，闽北苏区仍归赣东北省委领导，在厦门的原福建省委主要领导白区的工作。而厦门地处福建南端，工作起来极为不便。从厦门到福州，还不如从上海到福州

近，而且还要走海路，走陆路就更远了。

分成两个中心市委后，厦门中心市委就近负责闽南地区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一二十个县、市；福州中心市委就近负责福州及闽东、闽中地区的一二十个县。

这样，我又得准备随同蔡协民离开厦门转战福州了。

在临行前，组织上交给我一个任务，清理一批寄存在厦门郊外的党内文件。

原福建省委早期设在厦门的郊区。罗明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郊外租了一幢小洋楼。那里远离闹市区，偏僻安静，风景优雅，屋外就有一片小树林。整幢小楼是空的，楼主人到国外去了。

我们到厦门时，罗明已搬出那里，和我们一起同住。但是省委还有好几大箱子的文件秘密地藏在那里。

罗明搬走后，看守房子的人又把房子租给其他人住。为了防止意外，他们让我到那里去处理那批文件。

我带了小郭作伴，当走进那幢小洋楼时，发现里面已经住进四五个青年人，好像是艺术学校的学生。这就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文件藏在里屋的贮藏间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学生住的房间和客厅，在这些人的眼皮底下要处理这几大箱的文件真不容易，万一哪一个好奇心重的年轻人，走进里间看一看我在捣鼓什么，那就糟了！

我只有沉着应付，别无他法。

我很自然地对学生们说：“我是在你们之前住在这里的旧房客，还有一些旧东西寄存在这里，需要清理一下，好把房间腾出来让你们使用。”他们也很客气地说：“你请便吧。”便不再搭理我，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把自己关在里间，迅速地整理了一下文件，把该保留的文

件集中放在两个藤箱里，需要清理的文件材料也有好几堆。

怎么办呢？在里屋烧或抱到厨房的炉灶里烧，都容易引起怀疑和暴露，贮藏间里没有下水道，看来只有到屋外去烧了。

我非常镇静地抱着那些文件、报纸和印刷品，穿过学生的卧室和客厅，来到屋外的小树林子边上，然后把它们给烧了。太多了！足足烧了一个多小时。

庆幸的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那几堆文件材料烧透，片纸不留，也没有一个学生过来看我究竟在干些什么。野外也没有看到什么游人过来。

如果我稍有疏忽，不能保持沉着镇静而是很慌张的样子，那就势必引起学生们的怀疑，只要他们过来一瞧，那些都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和党内文件，我的身份便立即暴露。万一有个别三青团的学生去报告，我必死无疑，而且将给党组织带来严重的损害。

烧完文件，我回到屋里，将贮藏间打扫干净。然后，告别了那些年轻人，拎着箱子大模大样地离开了那幢小洋楼。

是年七月，蔡协民调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我也随同他一起赴任。

没想到，刚到福州的当天，国民党警察、特务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把我们从旅馆里带走了。

在警察所里，他们连夜审讯，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多。幸好，我们事先都准备了新的公开身份的托辞，两人口供一致，未露出什么破绽。警方叫我们取保，来接应的同志已在外面等候，连夜找来保人签字画押，然后才把我们给放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到福州就遇上了麻烦。从敌人审问的情况看，他们似乎并没有把我们当共产党看，而是怀疑蔡协民拐带妇女。

我想可能是我们在住宿登记时，蔡协民为我写了一个假名字，我提出不要用这个名字，换另外一个假名字。没想到这一小

小的不慎，却引起了旅馆的注意。他们再看我们两人年龄较悬殊，觉得可疑便报告了警方。真是有惊无险！

我们住进了福州中心市委为我们租的房子，它位于仓前山。那里实际上是一个贫民区，房子从上到下都是用木板钉起来的，卫生环境条件很差。

我的工作主要是坐机关，抄写秘密文件和与交通站、接头户联络。与在厦门比，福州工作的面没有那么宽，点也没有那么多，工作不是很忙。

我们到福州正赶上那一年福州地区霍乱大流行，仓前山一带住着很多贫民，好些人感染上了霍乱。我们天天都能听到死人家的哭声，看到有人抬着简易的棺材去埋。

当时我也是很紧张的，因为那时福州中心市委的经费很拮据，租不起好点的房子，也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万一感染上那可怕的霍乱，那就只好等死了。

有一天深夜，我的肚子突然一阵绞痛，疼得我忍不住在床上打滚呻吟。那阵子蔡协民到农村视察工作去了，只有我孤身一人，无法上医院或请医生买药，我想忍一阵子也许会好起来。由于夜深人静，木板隔壁，我的呻吟声惊动了住在隔壁的一对日本夫妇。他们闻声便过来到楼上卧室看望我。见我疼痛难忍，劝我说不要紧，他们有办法对付。

我是第一次领教“跳大神”。只见那日本男人手执一把刀，口念咒语，又蹦又跳；还用碗装上水和米，往我的身上洒；然后挥刀在门槛上砍劈，最后烧掉了一个用纸扎的小人。

虚弱的我躺在床上，也不好拒绝这位热心的日本人的帮助，只好任由他在我屋里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我肚子再疼也只好强忍着，他们见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便客气地告辞了。

后来还是“十滴水”起作用，疼痛慢慢缓解了。那对日本夫妇可能还认为是他们把鬼驱跑了呢！

不久，党中央派来了个巡视员叫姚仲云，到福州地区检查指导工作。他就住在我们前面的小楼上，刚来时他看到我们还挺客气的。但当他几天不见再次出现时，他的神色就很不好看，对我也不那么和气了，好像对我们特别是对蔡协民很不满意似的。

后来我见他几天不出门，一人躲在楼上写东西，写了又揉，揉了又写。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给中央写报告，大大告了蔡协民一状。

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带着“左”倾盲动的思想框框来套福州的工作，因此，对福州中心市委的工作很有意见。他认为福州中心市委的工作还不够大胆积极，执行中央指示精神不力。指责蔡协民对工作应付了事，较少开展示威游行、集会等活动。因此给蔡协民扣上了一顶右倾的大帽子！

中央巡视员一走，我们就搬出了仓前山。一是担心邻居那对来历不明的日本人。他们到过我们家里“跳大神”，对我们已有所了解，日后还会来套近乎；二是担心那个地区霍乱流行，势必殃及我们。

新家位于市中心区，是一幢较新的两层的房子。房东与我们各住东西，中央共用一个天井。这里比较宽敞清洁，共有五间住房。

为此，我们从闽西调来了一个男孩，住机关。他叫张智，是张鼎丞的亲弟弟。这是一个机智聪明的孩子，在家乡闽西永兴时，受其兄长的影响，他年仅十岁就参加了地下工作，当交通员。后来调到省委机关，继续当交通员。

张智到福州后，对外充当我的弟弟，对内他的主要任务是刻蜡版、油印机关报。稿件由蔡协民、我，还有其他同志编写提供。

在我们调到福州之前，邓子恢已从闽西调到福州，担任农村巡视员。他到闽东地区巡视指导工作，组织了抗捐、抗粮、抗税

斗争。是年八月，他从闽东巡视回来后，也和我们住在一起。

在福州可比不上在厦门了。我到厦门时，从闽西苏区带去了许多金首饰，党的活动经费还比较充足。另外在厦门，我们的联系对象也比较多，实在没钱时，还可以找他们帮助。有的同志甚至把家里的金银首饰偷出来交给组织，用作活动经费。

可是，福州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党员同志大都比较穷。我们每个月除了房租之外，伙食费是每人每月六元。其中有一半要花在交通费上，真正用在伙食上面的只有三元钱。

好在那时福州的物价比较便宜，但从事城市地下工作的同志，多扮成有一定身份的人。上街买菜，菜篮子里如果没装上点东西，街坊邻居是会怀疑的。因此，伙食还是要维持两荤两素的标准，不过那两荤是装点门面的。每次怎么摆出来再怎么收回去，直摆到快不新鲜时才吃。那时我正怀孕，也无法增加营养。

如果要添置点服装，也要从伙食费、交通费里抠，多吃稀饭多走路，以节省费用。张智从闽西来的时候，我还要给他添置几件衣服。他有脚气病，穿球鞋就出汗溃烂，只好省钱为他买双皮鞋。

尽管生活清贫，但大家从不埋怨叫苦。比起在农村行军打仗，爬山涉水，餐风宿露，这点苦便算不上什么。

我生了第二个儿子，母亲寄了四十块现大洋，要我把孩子送回去，我把二十块钱交给组织；蔡协民被免职当了“巡视员”；中心市委急需经费，花了人家一百块大洋，组织作出决定，把我的小铁牛送给一个中医，我给小铁牛喂了最后一次奶

这一年的十一月，我在福州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

福州中心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妻子非常热心，她来照顾我坐月

子，并且是按福州当地的习俗来照顾我。

孩子生下后，她就煎了几个鸡蛋，并用榛油炸老姜，又放了一斤多的糯米酒和很多的红糖，熬了两大碗，逼我喝下一大碗。我平时不喝酒，产后身体十分虚弱，喝下去后感觉昏昏沉沉，好像醉得厉害。但是过一阵子后，感觉特好。

福州还有一个习俗，产妇坐月子不能吃母鸡，要吃公鸡。这和我的家乡完全相反，湖南人说公鸡热性大，也不能吃姜，说吃了这些东西后人会发狂。而福州每顿都用很多姜、红糖、榛油、红酒，主食是鸡、鸡蛋和线面。

常言道，入乡随俗。福州有福州的水土，也就有了相应的饮食习俗。我就照这么吃，确实感觉良好。几天后，肚子就不胀了，子宫收缩得很好。一周后，我就下床干活了，买菜、做饭、洗尿布。她们劝我多卧床休养一阵，但我不忍心让她们伺候我，因为我自我感觉良好。

在生孩子之前，我曾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我没办法带孩子，路途遥远，又无法送回家，只好送给别人了。母亲很快复了信，并寄了四十块现大洋，叫我千万别把孩子送人，并要我把孩子送回家，由她来带。

照理这些钱回一趟湖南是够了，但当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我从母亲寄来的四十块大洋中，取出一半交给了组织，自己留下一半。

孩子满月后，逢人便笑，十分听话，人见人爱。大人手头忙时，他出奇的乖，一人静静地躺在摇篮里，不哭也不闹，还会定时拉屎，从不把屎尿弄到床上。我们见他长得壮实，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铁牛。

那段日子，我边工作边带孩子。紧张工作之余，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但好景不长，翌年初，我们接到中央免去蔡协民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厦门市委“巡视员”的通知。

显然这是那个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告“御状”的结果。

一九三二年一月，我随蔡协民一同回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我原打算稍做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儿子送回老家。

一到厦门在旅馆里住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就来看我们了。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打算，请他们批准我的假期。王海萍则百般劝说，又是孩子太小，经不起旅途折腾啦；又是路程遥远，车船转换麻烦啦；又是担心大人小孩晕车晕船，弄不好会病倒在路上啦；又是来回要两个多月，耽误工作啦……

但这些都动摇不了我的决心，我仍坚持要送，而且路费勉强够用。蔡协民也同意我的意见。

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叶延环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他结婚四年未有生育，很想领养个孩子。党组织已预收了一百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

这哪是送？这是卖！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我无可奈何地对王海萍说：“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是对三十多岁的蔡协民来说，还真舍不得。事后他埋怨我这么快就答应了，已没有商量挽回的余地。

其实，我也是舍不得将小铁牛送人的。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送掉亲生骨肉宛如从娘心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小铁牛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如今要送人了，今生今世难说再见到，我的心情也是难以言喻的。

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次。我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发呆地看着他，使劲地记住他的模样。然后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我抱着铁牛坐着，蔡协民立于一旁。照完相后，我给小铁牛喂完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给同志抱走了。

送走孩子后，蔡协民便奉命到惠安、泉州等地巡视工作去了。

小铁牛刚到厦门时还是好好的。到了那个医生家后，虽说一家人视若掌上明珠，但不巧的是，当时正是天花、麻疹流行季节，家里来了许多求医的麻疹、天花病孩，不到半个月小铁牛就染上了麻疹、接着又染上了天花。两个多月就断奶的孩子，又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并染上急症，尽管医生家人使出浑身解数，最终还是挽救不了铁牛幼小的生命。

起初大家都尽力瞒着我，但是我还是知道了这一噩耗。我努力地压抑住心中的无限痛楚，一声不吭，仍然默默地忙碌着。只是到了夜深时，才任泪水纵横。

小铁牛与我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确实是很有感情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我病在床上，实际上是毛大嫂等人帮助我带的，二十六天后就送给别人，小铁牛这孩子跟我时间长，你说我怎不心痛呢?!

提笔写到这里，小铁牛的音容笑貌又仿佛浮现在我眼前。

王海萍和我们同住机关，见我那几日神情恍惚，沉默寡言，知道瞒不住了。就将小铁牛染病夭折的详情如实相告，并恳切地安慰了我一番。

我望着眼前这位市委书记，眼睛湿润了。想到他不是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妻子和尚在腹中的孩子吗？如今孑然一身，他何尝不悲痛？但他却没有沉溺在个人的悲痛之中，而是更加拼命地工作。这样的领导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日军侵占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厦门市民要求张贴当日快报，政府当局却拘捕驱散看报的市民，从而引发了“三五”惨案；党组织竭力组织后援，但在国民党高压下流产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侵占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而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十九路军撤离前线。厦门市民闻讯十分气愤，要求报馆及时张贴当日快报，供市民阅读。在日本领事馆的压力下，厦门市公安局指使警察在后滩驱散拘捕围观战报的市民，于是激起市民公愤。

三月五日，约五六千市民拥至公安局门前，质问局长。公安局警卫见状便关上大铁门。游行队伍就停在公安局门口呼喊口号。公安局长下令手下用高压水龙头喷射驱赶群众。

一位勇敢的名叫林守书的汽车司机，攀上铁门，想从里面将门打开，好让队伍冲进去。这时军警竟然开枪，只见那小伙子从铁门上栽下来。群众更加愤怒，“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声喊得更加响亮。如此相持二十分钟后，公安局见群众迟迟不肯散去，便再次命令军警瞄准群众开枪。当场打伤六人（其中一人伤重死于医院），群众被迫四散逃开。

“三五”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省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发动各界爱国人士和市民举行更大规模的斗争。

那天夜里，我们在中山公园集合了约千余人的队伍，打出大幅标语，高喊口号，散发传单，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路过江声报社时，愤怒的群众砸烂了报社的招牌，接着捣毁了思明县党部和思明报馆。当晚游行活动长达三个小时。

是夜，总商会负责人星夜跑到司令部，要公安局局长自动离

职以和缓群众愤怒的情绪。厦门抗日救国会临时召集代表会只提出撤办公安局局长，抚恤死伤，恢复壁报，不禁止爱国运动组织“三五”惨案委员会等妥协条件。

八日，市委决定，以“三五”惨案为导火线，发动全市各界罢市、罢工、罢课。并决定召集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后援问题。

十七日，厦门各界代表召开大会，成立厦门民众“三五”惨案后援会，会上决定二十一日在中山公园举行追悼大会，通过斗争纲领。会后举行抬棺示威游行，掀起厦门反帝反国民党的高潮。

这一决定的作出，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厦门当局的恐慌。他们加紧了对后援活动的破坏工作，通过社会民主党派领导的学校代表，在筹备会上提出推翻追悼会的意见，同时对死者家属进行利诱威胁。

我们也采取了对策，坚持十七日代表大会的决议，追悼会不改期，加紧对中间分子、死者家属的工作，在报上登载追悼会的时间地点并发表宣言等；同时加强党团领导，做好学校、团体的工作。

二十日，后援会第二次代表会在一所中学的教室里召开，各界代表七八十人出席了会议。代表们群情激愤，争论激烈，纷纷要求：召开纪念死者的追悼会，会后进行抬棺示威游行；惩办凶手、偿还血债，抚恤死者亲属；声援上海“一·二八”抗战，发起募捐支持抗日将士活动等等。

一些被收买和利用的学校与团体的代表则提出不要在公园开追悼会，改到党部去开，追悼会延期举行等意见。

由于此次筹备会是公开召开的，因此这天也来了四五十个警察，虎视眈眈地站在会场后面和校园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主持会议的一位中学教导主任，见来了那么多的警察，便转

变态度，不主张搞示威游行了。说会影响交通，妨碍学生上课，职员上班；更容易招致警察的干预，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一些学校的代表害怕事态扩大，提出退席放弃斗争。

然而，省委派去组织筹备会的一位有公开身份的同志，则坚持要在二十一日如期举行全厦门的抬棺示威游行。

会场里的警察害怕抬棺示威游行，会使公安局的威风扫地，遭受公众的强烈谴责。因此，他们威胁说：

“聚众示威游行是违法行为，警方将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干涉，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此时，会场上两种意见还是争执不下，大家情绪激昂，气氛十分紧张，会议已开了两个多小时，再僵持下去，肯定会出事，警察必定动手抓人。

在这关键时刻，我只好见机行事了。本来省委决定我在幕后指挥，交代我，若第一方案不行就执行第二方案。这时，我给地下党的其他同志使了眼色，示意他们不要再坚持下去了。最后会议决定追悼会延期至二十三日召开。

追悼会决定改期后，国民党厦门当局便有时间从容地从各方面来破坏“三五”惨案后援运动，最后达到迫使追悼会流产的目的。他们召集参加后援会的几个学校校长加以威吓，并派出侦探监视一些学校的代表，进一步分化瓦解后援阵线。

当局付给死者陈再家属三千元，强迫其在报上登启事，说是此案已经了结；同时强迫另一死者林守书家属搬家，使我们无法找到他。他们还收买总商会、抗日救国会等团体，登报声明，不参与后援会，公安局召集新闻记者谈话，说“三五”惨案已经结束。敌警备区司令部还张贴布告，禁止集会，加紧戒严。

鉴于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为了避免我们以少数力量与统治阶级直接冲突而受到很大打击和损失，因此只好决定取消大规模的抬棺集会游行，改为分别举行小型的追悼会和飞行集会，派出

宣传队至各区演讲，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三五”惨案的罪恶。

二十三日上午，厦门戒备森严，街头军警密布，一些学校召开了追悼会，有的学校学生准备举行示威游行，刚出校门便被警察挡了回去。

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高压和阴谋破坏下，“三五”惨案后援运动被迫流产。

蔡协民借酒浇愁，向陶铸发牢骚，回忆起井冈山时毛泽东的批评，痛哭流涕，并骂我对他三心二意，把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为了尽快地从失去爱子和斗争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暂时离开厦门机关，到外县农村去巡视工作。

我和叶延环同行，走陆路先后到同安、惠安、莆田等县，在有党组织工作的地方逗留几天，了解一下情况。

四月中旬，我回到了厦门。当我回到机关驻地武当分巷（草仔埯），二十一日没见到蔡协民，他已受市委的派遣先行到漳州去开展工作，以迎接红军进漳；倒是见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他也是在福州听说红军打下了漳州，回厦门一趟。

陶铸对我谈起前几天他与蔡协民聚会的情况。蔡协民到惠安县巡视工作近一个多月，胜利领导了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斗争。当他满怀喜悦回到厦门中心市委机关与我团聚时，见我不在机关已下乡走了，等了几天也没有我的音讯，他又接到通知到漳州。两人总见不着面，孩子又送人了，他觉得自己形影相吊，因此深感失望和难过。

平日不喝酒的蔡协民在苦恼中，也和陶铸喝起了闷酒，借酒消愁。

当年在红四军那场党领导军队的争论中，毛委员曾批评蔡协

民是中间派，蔡协民嘴上没说，但心里却不服气。另外蔡协民当时在政治部工作，抄写布告时，漏写了一个字，将共产党写成共产。毛委员很生气，严厉批评他做事不认真，抄完也不校对一遍就贴出去。掉了个“党”字，这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原则性错误，国民党反动派不就是骂我们“共产”吗?！毛委员气得甚至不愿见他，“我不高兴看的人，我情愿看我的脚趾头！”

喝酒时蔡协民说起这些事，痛哭流涕，说毛委员不了解他，对他不留情面。说话中，又扯到了我，骂我对他三心二意啦，不是真心爱他啦……

说到气头上，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市委机关准备迁到漳州，我去打前站；国民党设卡阻止行人进入漳州；我坐着一条人见人躲的大粪船到了漳州；当我出现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时，意外地发现蔡协民；毛泽东给我们让出了他那间卧室

是月下旬，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为了开辟闽南新苏区，厦门中心市委决定将市委机关迁到漳州。

作为厦门市委秘书长，理应由我打前站，到漳州与红四军取得联系。从厦门到漳州必须先走水路，渡海到鼓浪屿对面的嵩屿岛；然后走陆路，从嵩屿到白水营，经石码最后到漳州。

当我从嵩屿到白水营时，我们设在一个小学的接头站同志告诉我，此路不通。许多土匪盘踞在白水营，拦路抢劫，抓人杀人；国民党部队也在那里设了关卡，阻止行人进入漳州。

无奈，我只好返回厦门。但是我又不愿意就这样回机关，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在厦门码头上徘徊着，寻找着办法和机会。

自红军攻占漳州后，厦门守敌十分紧张，他们不仅封锁了陆

路，而且封锁了水路，江面上停泊了好几艘军舰，所有船只，无论是客轮还是货船一律不准去石码，就连往日码头上随处可见高声揽客的小筏子也不见了。

正在一筹莫展时，我发现了一只石码来的装粪船。我知道机会来了。当时厦门的粪便都是石码农民用船来清运回乡的，看来只能将就着坐粪船走了。我走上前去问："大叔，船还回去吗？"船老大说马上就走。我真是喜出望外，请求他捎我一程，他见我穿着朴素，蓝布衣服，黑裙子，布鞋，一副学生打扮，便满口答应。

这船除了满满一舱粪便之外，能坐人的地方也就是船头和船尾了。船老大在船尾掌舵，一个大概是他的女人在前面划桨。我就坐在船头上，身后的粪水随着船直晃荡，在阳光下蒸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但对我来说，只要能到漳州，再脏再臭也是无所谓的。

船经过关卡时，岸上的士兵一看是装粪船，也就懒得搭理，我那天的那身打扮同样也没引起敌人的怀疑。就这样，我顺利地到达了石码。

说来也巧，当天上午十点之前，石码还是敌人占领的，十点钟红军的队伍才开进石码。下午我到石码时，看到我们的队伍还在陆续开进，我一路打听终于在大港乾找到司令部所在地，那是一座基督教礼拜堂。

站岗的士兵把我拦下盘查，我告诉他们，我是厦门来的，要见你们的首长。正在这时二楼上探出了一个脑袋，问哪里来的，找谁。我一抬头，便认出了他。他原是红四军里的一个师长，叫王良。我喊他，可他莫名其妙，一时没认出眼前学生模样的我来。待我报了姓名后，他惊讶地说：

"啊呀！曾志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我在红军部队时，总是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一身男式打扮。

如今留长了头发，穿起了裙子，难怪他认不出来。

王良高兴地叫我快进屋上楼坐。这时我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红四军的军长了。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同屋的参谋长聂鹤亭。我说了此行的来意后，王良军长派人把我送到政治部。

在政治部驻地，我第一次见到了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他派了一部刚缴获的大卡车专程送我到漳州。

石码距漳州四十多里地，一个小时后，我就到了设在漳州城西芝山南麓的省立龙溪中学“干之楼”的东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林彪司令员和聂荣臻政委。他们很热情地请我吃晚饭，有好几样菜。饭后，林彪司令员告诉我，毛泽东此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亲自指挥由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东征福建，攻克漳州，此时也住在漳州。我一听十分高兴，要他们立即派人带我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住在龙溪中学隔壁的教会学校寻源中学的校长楼里。这是一栋两层楼外墙漆成红色的建筑。（寻源中学现在成了市委机关驻地，人们把当年毛泽东住过的这幢房子称为“芝山红楼”，在那里开辟了一个红军进漳纪念馆，并在红楼前竖立了一块纪念碑。）

当我突然出现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时，意外地发现蔡协民也在那里。毛泽东见到我同样觉得意外，他笑着说：

“曾志，你来得正巧，蔡协民正好在我这里。”

我说明了来意，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现在还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

随即，毛主席让出了他那间比较大的卧室给我和蔡协民，自己搬到旁边一间较小的房间住。我们就一直住那里，直到红军撤出漳州。

毛泽东在龙溪中学图书馆整整呆了两天，挑了好几担的书；战士们没收陈嘉庚一个店铺的财产，我意外地发现有许多万金油；毛泽东同意我回中央苏区工作；蔡协民要我同他一道去开辟新苏区小山城

在红军攻占漳州之前，厦门中心市委已派邓子恢、蔡协民等到那里，指导漳州县委开展工作，以策应红军攻打漳州，并做好迎接红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红军打下漳州后，王海萍率厦门中心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开展工作。我曾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我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想回部队工作，毛泽东同意了。但他说，这要征求一下市委书记王海萍的意见。后来我找了王海萍，他也表示同意。这样，我在漳州便较少参加当地的群众工作。

我曾陪同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物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除留下少数自己阅读外，他用这批书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红军的文化生活。

有一次，我到街上办事，见一批战士围着一家大店铺，正在没收店里的东西。一打听，原来这是南洋华侨巨商陈嘉庚先生开的一家鞋店。部队向鞋店筹款，他们没有把钱交出来，战士们就到店里没收财产。

那店里摆着各种橡胶制品，战士们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

我在仓库里意外地发现了很多万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胶鞋等。这些东西，战士们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没有人去动它们。我告诉他们，这些万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对部队来说可是热门货啊。万金油等药治那些头疼脑热，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经我这一说，他们就动手将这些东西统统运走了。

我也比照我的脚拿了几双女胶鞋，以及肥皂、万金油之类的。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住地，拿出一部分送给毛泽东，请他转交给贺子珍。

鉴于红军攻打漳州，旨在消灭国民党张贞部，调动广东之敌，筹款筹粮等任务已基本完成，便决定红军回师中央苏区。当厦门中心市委知道红军就要离开的消息后，便研究讨论了红军退漳后的形势和创造闽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集中精力发展壮大小山城根据地。

小山城根据地位于南靖、平和、漳浦等三县交界山区，方圆不到一百里。那里山高路险，远离县城，交通闭塞。这个地方四周群峰环抱，盛产粮食，有五六个自然村，一百多户，六百多人口。陶铸在担任漳属特委书记时，带人用一枝小手枪，绑了一个地主的孩子，获赎金三千多元。除一部分上交省委作经费外，用余下的钱买了三十多枝驳壳枪，组建了一支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后来发展为一百多人枪，并在那里建立了小根据地。红军进漳时，我们要求红军给两个连，充实加强这支队伍，但红军没同意，只给了百来个轻伤员，并拨给两百多枝枪。漳州县委发动农民参军，使队伍扩大到六百多人，有五个大队。

五月下旬红军退出漳州前夕，在漳浦县城郊区正式成立了闽南红三团，蔡协民兼任总指挥；团长冯翼飞，海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政委由闽南革命委员会主席、当地的群众领袖王占春兼任。全团共八百多人，编为五个连队，连排干部大部分是由中央

红军派来的轻伤员担任。红三团成立后，即深入靖和浦一带农村，以小山城为中心开展游击斗争。

为了领导创建闽南新苏区，厦门市委决定新成立漳州中心县委，辖漳州城内、南北乡、石码、海澄和靖和浦地区，由蔡协民任书记，同时取消漳州县委。

由于毛泽东和王海萍已同意我回中央苏区工作，因此我没准备随蔡协民一同去漳南工作。当组织上决定蔡协民留在漳州任中心县委书记后，蔡协民口头上虽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却很苦闷、很难过。

会后，蔡协民找到王海萍书记，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前往小山城，否则会影响他的工作。这就让王海萍犯难了。因为他已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我回中央苏区工作，罗明到漳州后知道此事也表示同意。现在蔡协民提出这个要求，就不好办了。

王海萍不好直接找我谈话，他知道我一定不会同意，但他又不得不考虑蔡协民的要求和情绪。他便找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出面。

毛泽东亲自找我谈话，他恳切地说："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说句心里话，我当时还真不乐意去。因为我那时已下了决心，趁着调动工作到中央苏区去，与蔡协民分手各奔东西。我对毛泽东也说过这事，但是，既然毛泽东出面这样说了，我又能再说些什么呢？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服从组织决定这是起码的要求。即使与个人的利益和意愿相左，也还是要执行组织决定的。

两三天之后，我们即将启程往小山城，毛泽东特地设宴为我

们饯行。我知道当时毛泽东在漳州，生活十分清苦。他住在芝山红楼，单独起伙，秘书、医生、伙夫、警卫加上我们十来个人，天天就是豆芽加白菜，基本上没有荤菜。屋后的水缸里泡着两条一尺多长的海茄子，不知怎么吃，一直泡在那里没动。记得我到漳州后，林彪司令员、我的同乡第十二师师长刘炎分别请我吃过饭，都是有鱼有肉的。尽管漳州是个城市，毛泽东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善。

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却破例叫警卫员去买了一只大火鸡，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满怀感情地为我们饯行。

尽管牛油并不好吃，可毛泽东的一片真诚心意使我十分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强敌压境，我们却主动出击，企图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以致伤亡惨重；敌人认为红军群龙无首，围剿大功告成，便撤出闽南；不到一个月，苏维埃政权又恢复起来

五月中旬，我和新组建的漳州中心县委一班人以及红三团，到漳浦小山城根据地开展工作。当时县委有五个常委，蔡协民、冯翼飞、王占春、我，还有一个当地的农民干部，我任组织部部长。

月底，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撤出漳州返回江西瑞金。红军退出漳州后，厦门中心市委也将机关迁回厦门。

我们在小山城一带，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烧田契借约，发动农民参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游击斗争，苏区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在红军攻占漳州时损兵折将的张贞部，并不甘心失

败，他们在漳州外围重新调集了大量部队，虎视眈眈，伺机反扑。

中央红军离开漳州不到半个月，张贞便率残部并纠集翁母猪、陈祥云的民团，杀气腾腾向尚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山城根据地和刚成立不久的红三团发动了全面的“围剿”，企图把我们这个刚刚诞生二十多天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强敌压境，我们当时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返回厦门不久的中心市委此时刚被破坏，漳州中心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刚改编成立的红三团，绝大部分是刚参军的农民赤卫队员，打枪都不大会，有的听到枪声还害怕，战斗力很差。

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本该按照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开展游击斗争。但是，我们却盲目地执行罗明到漳州来所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保卫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主动出击，打退敌人的进攻。

虽说，斗争前期也取得过像牙庄等战斗的胜利，消灭张贞部两百多人，缴枪四十多枝，还攻下了漳浦县城。但从总体上讲，我们执行的是一个错误的方针，特别是因前期的胜利也滋长了自满轻敌的情绪，头脑越加难以清醒。

六月五日，敌人动用了一个师约三千人的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包围红三团驻地寨子村。敌人从四面八方拥了上来，并且抢占了制高点断了我们的后路。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惨重，团政委王占春率队在抢夺制高点的激战中身负重伤被抬下了阵地，几天后牺牲在一个山洞里。

当晚，队伍退至小山城。面对三面受敌，十里以外都是敌人的严峻局势，蔡协民作出了立即撤出小山城，向平和三坪迂回，跳出敌人包围圈的决定。

这是保存革命武装力量，以适应恶劣斗争形势而作出的正确

选择。但后来这也成了厦门中心市委强加给我们的“逃跑主义”的罪状之一。

红三团的动向很快被发现，敌人尾追而来，前后堵截。此时又遇天下大雨，山洪暴发，前路受阻。蔡协民等人决定主动出击，避免被动挨打。派人侦察，结果发现龙溪圩只有少数民团驻扎，原以为取胜有望。谁料侦察有误，驻扎龙溪圩的是张贞部的一个加强营。结果可想而知，红三团再次受到损失，由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组成的尖刀连，伤亡惨重。战斗失败，红三团被迫退回小山城。

县委召开会议，商量对策。经过讨论，权衡利弊，最后一致决定退守车本。

这时如果及时转移还不晚，而我们却采取了分兵把口，坚守阵地的错误战术，利用车本山上陡峭的地形，与敌人打起了阵地战。

六月二十三日，张贞部三个团加上邻县反动民团共一万多人，攻上车本。激战中，指挥防守北线的冯翼飞团长率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于阵地上。

敌人突破北线后，直插中路。在中路总指挥的蔡协民被迫指挥部队分散突围。至此，以小山城为中心的根据地沦于敌手。

在当地籍战士的指引下，我们十分狼狈地往深山里撤退。

此时，我已有身孕，求生的欲望驱使我随着队伍在荆棘和石头丛中没命地跑。最后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翻山越岭，躲进了深山老林。

在山上，我们远远望见几里外，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部队来回走动在搜山，而我们躲在山上不敢走动，担心暴露目标。

两天两夜下来，大伙儿没吃没喝，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决定等天黑后下山看看，弄点吃的东西回来。

当时很多人都走不动了，我好在口袋中还有一撮生米充饥，加上怀孕后，本来也没什么食欲。等体力稍好些，我便自告奋勇化装成农妇下山。

好不容易盼到夕阳西下，我在当地一个熟悉道路地形的农会干部的陪同下出发了。翻过两座小山之后，发现了在一条山溪边有一株野杨梅树，鲜红的杨梅果挂满了枝头。又饿又渴的我们，扑上前去大吃一通，体力有所恢复。

在一个山坳里，我们看到不远处的牛棚前拴着一只黑水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牛棚边晒着几件破衣服。经过仔细观察，在确认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后，我们向牛棚走去。

牛棚里空无一人。我们见到一个破盆子里还留着一点凉稀饭，此时的我们已顾不上许多了，三下五除二，便把稀饭给吃了。

等了很久，总算等回了主人。这些老根据地的群众真是好样的。敌人来了后，他们便带着家里的粮食和猪牛鸡鸭躲进深山，不把它们留给敌人。当他听我们把情况一说，就马上下山找来了地方上的负责同志。他们杀了一口猪，把肉和米合在一起煮了几大桶的饭，并连夜翻山越岭，把饭送到红军的隐蔽地。

这顿饭对于饿了两天的红军战士来说，实在是太美了、太香了！

第二天，队伍继续留在山头，讨论分析这次失败的教训和原因。

谈到这次惨重的损失，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显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力量和形势，把游击区当成苏区看待。红色政权虽已成立，但还不巩固；很多地方还未建立党组织和分配土地，群众基础还较薄弱；红军刚组建，没经过训练和实践锻炼，便还击强敌的进攻，甚至采取进攻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与敌硬碰，死守阵地，怎

么会不失败呢?

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央的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的指示精神的“左”倾错误。只是认为，我们创立的闽南新苏区不能与中央苏区相比，中央苏区位于几省交界的地区，区域范围大，有强大的红军，政权建立和巩固多年。因此，不能按中央苏区的办法对付敌人，大家都同意这种分析。

最后，我们决定暂时分散游击，重新聚集力量，逐步恢复失地。将剩下的百来人分成好几个分队，分头寻找走散的战士，深入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建立工作联系。

国民党部队见红三团团长、政委已被打死，红军死伤过半，群龙无首，以为“围剿”大功告成，便撤出闽南。除县城和重镇留些兵力外，其他地方都没有驻军。

这样便给闽南苏区的恢复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经过分散秘密游击，严惩了地主反动分子；发动群众，恢复了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村与村都建立了工作联系，发现敌情及时通报；红军队伍从一百多人迅速恢复发展到三百多人。

正当各项工作顺利进展的时候，我却病倒了。主要是患了疟疾（打摆子），加上怀孕的反应。一会儿冷得上下牙直打颤，一会儿又烧得迷迷糊糊，甚至流大量的鼻血。

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同志们将我从村子里撤到一个山洞里养病。狭小的山洞里阴冷潮湿，还有一股地下水流打洞里经过。他们为我找来一些干树枝，均匀地垫在没水的地方，上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干草。

我在山洞里躺了好几天，蔡协民派人好不容易弄来了一些治疟疾的药。病情有所好转后，我又回到村子里养病。

一天，我又打起了“摆子”，几床破棉被压在身上还冷得直发抖。这时，暗哨气喘吁吁地跑回村里，报告说敌人来了。村里的群众闻讯，便各自往后山撤退。

无奈的我，也只好硬撑起身子拖着病体往山上跑，但没跑多远便跌倒了。幸好一个年纪较大的战士见我倒下，急忙跑过来，背起我迅速往山上奔跑。

此时天色已晚，在半山腰上，他把我放下来想休息一下。没想到，我的脚刚着地，便失去了知觉。幸好那个老战士懂得些医术，用大拇指使劲掐我的人中，把嘴唇都掐破了；同时抠脚两边的筋，抠不动就用嘴咬。接着，又用嘴对着我的嘴做人工呼吸，最后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醒来的我，冷得再次全身发抖，像筛糠一样，牙齿一点也不听使唤。一位好心的大嫂见敌人的枪声已经停了，便大胆地冒险下山。摸黑回到家里，抱来了一床棉被，提来一壶开水。她将被子紧紧地裹住我的身子，又喂我喝下一些热水，我的身体才慢慢地暖和起来。

我猜想这大概是一股过路的敌人，只是骚扰了一下村子，便离开了此地。但想来还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不是那位红军老战士的舍身相救，我也许就被进村的敌人给抓走了；如果他不懂得抠掐穴位，那么我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再一次在生与死的“中转站”里停留片刻后，又转身走了出来。

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我们请求调动工作，蔡协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临别前我和蔡协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到此结束；我和陶铸组成了假夫妻

十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厦门中心市委让我们速回厦门的通知，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

接替蔡协民工作的是一位叫杨道平的同志。红三团团长的职务，由副团长尹利东（后改名尹林平）接替，尹利东原是中央红军的一个营长，红军进漳时受了轻伤，伤愈后便留在红三团担任副团长。后来他一直坚持在闽南那一带从事武装斗争。

回到位于碧山路一六一号的厦门中心市委机关，我发现几乎全是生疏的面孔。原来的那批领导都先后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市委书记兼军事部部长王海萍在红军从漳州撤军后回到厦门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牺牲了；组织部部长董云阁和刚到厦门担任宣传部部长后接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许依华，也相继被捕牺牲了，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接替王海萍职务的，是在德国工作生活十几年，刚被共产国际派回上海再被中央派到厦门的许包野，他是许依华的胞兄。

我们刚回厦门中心市委机关，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其实在此之前，从七月至十月即在我病重期间，厦门中心市委已经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并派人到漳州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在闽南党内展开了一场“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

主持批判会的新任书记许包野刚到厦门不久，情况不了解也谈不出什么意见。然而，团市委书记万达材却像一挺重机关枪，对我们连续开火了。

万达材的发言并不是从应该接受什么教训、错在哪里、原因何在进行分析批评，而是净给我们戴大帽子。他指责我们对敌人进攻的政治分析，首先是脱离阶级立场，忽视其进攻的危险性，高枕无忧地放松了对敌人进攻的防御工作，完全是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其次是“保守主义”，敌人进攻后，又不根据具体情况抵御敌人，而且跟着群众意见跑，群众不让走，要求打，你们就留下守在那里。第三是“逃跑主义”，打不赢敌人，你们就不顾一切地逃跑，撇下群众一跑了之，以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此外，对于社会民主党及反动派采取迂腐的“慈悲主义”，

忽视肃反工作。

对于这种不顾实际情况而扣的这些大帽子，我和蔡协民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闽南新苏区的失败和挫折，我们深感痛心，在会上也做了自我批评，对于我们自己所犯的不容宽恕的错误进行了反省，给什么处分我们都没意见。但重要的是要找出原因，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工作。

对于不切实际的批斗，蔡协民和我深感愤慨，我据理力争，我提出申辩，我们的错误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主要在于我们脱离客观实际，盲目执行了中央针对中央苏区提出的那套策略。我把当时在车本山头开会总结失败教训的认识和分析复述了一遍。最后重申我们的观点，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打，否则现在得到恢复发展的闽南根据地还会失去。蔡协民还执笔以我们两人名义向市委上交了一份《对市委检阅决议的意见书》。

对于我们的申辩，他们倍感恼火。认为我们不能虚心接受组织的批评和同志们的帮助，企图以“左”的错误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批判会开了两个半天，我至今仍觉得这个会让我受益匪浅。并不是他们的“正确”批评使我受到教育，而是通过这个批判会，我进一步理清了思路，更清醒地认识了闽南根据地失败的教训。这对于不久后我在创建和巩固闽东苏区的斗争中，避免重犯同样的、更多的错误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最后市委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给蔡协民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固执己见的我也作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分配工作。

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我和蔡协民已不好在厦门呆下去了。不是我们看不起厦门新市委的同志，而是他们大都是些新来

的，不了解情况，听不进我们的意见。他们把我们看做是犯错误的同志，更不会信任和重用，因此我们请求调动工作。

蔡协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处分也在所不辞。

然而，我却不愿去上海，我想中央更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人家也会把我们当犯错误的同志看待，这样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下面的同志对我还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错误，别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

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自此，我和蔡协民各奔西东。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十一月，我随厦门大学数学系学生、原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陈少尧一同来到福州，向福州中心市委报到。

福州中心市委从厦门中心市委写来的介绍信中，知道了我在厦门的情况，包括处分决定。因此到福州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将我在厦门，特别是在漳南的工作情况以及我的见解、认识，向书记陶铸和组织部部长陈之枢作了详细汇报。他们认为我的看法和观点是客观的、正确的，因此他们对我并没有另眼看待。

经过这次挫折之后，我不但没有灰心和消沉，而且变得更加坚强。我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改变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看法。

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我的近期良好表现，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考虑到我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我官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

我刚到福州时，同陶铸、谢飞等同志住在机关里。谢飞曾经

是刘少奇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当局驱逐回国。她后来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工作，因此不久后她便调回中央苏区了。

谢飞走后，我们就另外租了栋房子，我和陶铸、陈之枢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中央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划清界限，肃清影响；陶铸以市委名义报告中央，证明蔡协民清白无辜；被中央甩了的蔡协民流落在上海街头，身无分文却买了块衣料让我做旗袍；一九三四年，被叛徒出卖的蔡协民坚贞不屈，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是年秋天，上海中央局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蔡协民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我深感惊奇。我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好几年，对他的革命历史还是了解的。

从外表上看，蔡协民清清瘦瘦，斯斯文文，经常穿着一件长衫，俨然一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模样。作为一名领导者，他稳健缜密，认真负责，具有组织才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意志坚定，信仰不移，对党的忠诚和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丈夫，他缠绵深情，把妻子看得很重……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位早年入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游击战场，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区，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陶铸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陶铸对蔡协民还是比较熟悉的。为

此福州中心市委开了个会，也没叫我检举揭发，划清界限。福州中心市委认为，中央也许对蔡协民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决定以市委名义给中央写份报告，证明蔡协民清白无辜，但无济于事。前几年我到古田开会，路过漳州时，漳州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还说起他们在征集史料时，发现了当年的那份报告。今天这份报告还珍藏在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它是福州中心市委当年抵制中央错误指示，反对厦门中心市委在闽南发动所谓反对“蔡协民路线”斗争的有力佐证。

一九三三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

由于中央刚发出过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地下党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是不能与他接头联系的。但是对他十分了解的陶铸还是去见了蔡协民，并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我提出要去见他一面，市委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关系，同意了。但陶铸一再交代：

“你去见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店里，我见到了蔡协民。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

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值钱的东西也典当光了。老板天天来催，不敢呆在屋里，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过，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

最后，蔡协民终于意识到，他是被中央给甩了。

但什么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一九二三年入团，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了？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噩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

无奈，蔡协民依然天天到马路上徘徊，看看能否遇见熟悉的同志。终于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曾在家乡一道共事的老同学。那人是经商路过上海的，他听说蔡协民到上海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后，给了蔡协民十块大洋。接着，蔡协民又碰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专跑上海这条线的交通员陈冷才，并同他一道买了船票回福州。

说完这段苦难的经历后，蔡协民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我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

我双手接过布料，一向坚强的我，此时不禁鼻子一酸，潸然泪下。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觉得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他，就是挨处分也认了。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对党忠贞不二的老同志再保所谓的"密"了。

蔡协民对中央的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十分清醒，现在一切解释和埋怨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厦门、福州的党组织都不会与他接头，或者接纳他。惟有自己从头做起，开辟工作，以实际行动和成绩，甚至鲜血和生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劝他还是回到厦门去，"在哪里出了问题，就回到哪里去"。一是可以去海军或炮台去当兵，伺机兵变拖枪上山打游击，建立武装，创建根据地；二是找一些过去熟悉的工人，介绍进厂去当工人，发动工人运动。

于是，蔡协民真的回到了厦门。后来他来信告诉我，他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工、打石头、背枕木、抬木料，靠卖苦力养活自己。晚上就和一个老工人作伴，住在一个破工棚里。他边劳动边与工人接触，开展工运斗争。

一个文弱的书生，如果没有一种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念，是决不会忍受这种痛苦和煎熬的。

这期间，蔡协民找过厦门中心市委，他们见他表现不错，就在一九三三年七月调他到安溪县任县委秘书。当时那一带活跃着一支游击队，这原是一支土匪武装，拖枪改造后成为革命武装，后来发展成为一支红军游击队。由于缺乏军事干部，所以把蔡协民派去带队打游击。那时方毅也在那一带打游击，这一情况我是一九三八年后听方毅说的。

直到年底，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协民的遭遇后，严厉批评了原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并决定调蔡协民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不幸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正在厦门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从闽西回来的叛徒苏文波发现告了密，蔡协民落入敌手。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

是年五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三岁。他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了所谓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的由来。在闽南红三团里，有位指导员叫游生民，他也是从井冈山下到闽西的，红军进漳时负轻伤被留下充实到红三团。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时，厦门中心市委通知漳州中心县委，此人是“社会民主党”。于是游生民被绑了起来准备内部处理。但是蔡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曾志次子曾春华夫妇在井冈山蔡协民塑像前。

协民分析再三，认为他不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杀他，还把他给放了。厦门中心市委根据蔡协民也来自闽西，又放了姓游的，加上蔡协民领导漳州斗争期间所犯的错误。因此完全凭着主观臆测，认定蔡协民是游生民的同伙，是“社会民主党”。

厦门中心市委未经任何调查，就向中央写了报告，轻率地将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忠诚的共产党员，推出了党的大门之外，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我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但由于我向蔡协民透露了“中央通知”，且如实地向组织汇报，陶铸给了我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我临近分娩时，不得不搬出了市委机关；陶铸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我生下的却是蔡协民的骨肉；我的第三个孩子送给了一个盐商

见过蔡协民之后，回到机关，我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我与蔡协民的谈话情况。陶铸对此非常生气，当即召开市委会议，进行批评。

会上大家认为，我这是明知故犯，违犯了市委领导的告诫，泄露了党的机密。因此决定对我进行党纪处分：留党察看三个月，这可是一个很重的处分啊！

对此，我毫无意见，也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我是泄露了机密，但我没有做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我把事实告诉他本人，是为了对党的事业负责，为了对一个忠实于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负责。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

尽管陶铸给了我一个严厉的处分，但这时，我对陶铸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说实话，我过去对感情这类问题，看得不是太重，体会也不深。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对我处处关心、体贴，见到我总有一种很亲切的神态。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挂念着他。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就会想他；如果他出门迟迟未归，我便坐立不安，担心他出事。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

因此，我们这对假夫妻假戏真做，自然结合了。

但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我又不得不离开市委机关，到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去协助工作。并且搬出市委机关，住进了互济会机关。

住地对面房子的一楼，是一个制作牛皮的作坊，沤、染牛皮的气味儿，臭气熏天。一天到晚，熏得我头痛恶心。但别无去处，我只好硬撑着住下去。

正在这时，我的第三个孩子即将来到人世。快要生产了，我

的口袋中只有几毛钱，弄得我一筹莫展。还是急公好义、能体恤人的陶铸，用他惟一值钱的毛毡当了三块大洋。花了两块大洋，请来了附近街坊的一个接生婆。

那女人到家里后，二话没说，拿把剪刀在我的裤裆处，“咔嚓、咔嚓”就剪出一个大窟窿。接着用桌上的花露水擦了擦手就算消毒了。然后就很粗鲁地把手伸进我的子宫里去抠，探一探婴儿是否头朝下，结果把我的子宫口都抠破了，痛得我汗如雨下。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但我的子宫却被感染了。只叹当时太困难了，无法住院生产，也请不起助产士，因为请助产士至少得花七块大洋。

与生第二个孩子不同的是，这次生育无人照顾，在我身边的只有陶铸。他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为我做饭、洗尿布甚至洗血裤子。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管生下来的并不是他的骨肉。

这次生育也没有按照当地的习俗“坐月子”，只是买了些鸡蛋、奶粉和几只母鸡。结果吃了几天，我的脸、肚子都肿了，子宫不但收缩不好，还有了炎症。好在身边有陶铸照顾，我总算撑了下来。

由于当时自己的处境并不好，加上身体状态极差，这第三个孩子也像前两个孩子一样，在生下来的第十三天，就不得不送了人。当时我总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现在看来这种思想确实太偏激了。

孩子的养母，是一个从湖北到福州落户的盐商。那家男人去世后，寡妇一人，家里贫穷，想要个男孩当儿子养老。她的侄子是个警官，叫张铁，是地下党员。通过他的介绍，孩子就送给了他的婶母。为此，那寡妇请了个自己孩子都快两岁的奶妈，同时喂养着两个孩子。

送走孩子，本该再休养一阵，但是正在留党察看期间的我，对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性好强的我，拖着病弱的身体，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陶铸被王明撤职，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我和陶铸租了间旅馆，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度了十天“蜜月”；陶铸到上海后，我们每周通信；信件中断后，中央突然通知：陶铸被捕叛变

一九三三年的三月，上海中央局来了个通知，叫陶铸立即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书记一职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接任。

正在闽东农村巡视工作，指导发动武装斗争的陶铸，接到通知后立即回到福州。对此次调动，陶铸虽感到意外，但并不知道其中原委，直到一个月后他在上海被捕入狱，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原来，中央派来福州巡视工作的巡视员朱礼治，曾征求陶铸对王明的看法，生性秉直的陶铸毫不隐瞒地表露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吃洋面包的，我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并不太懂！”这位巡视员回上海后，向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如实地转达了陶铸的看法。这可惹恼了这位总书记，这次调动，实际上是被王明巧立名目撤了职。

陶铸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王明意图的，但他知道将要和我分手了。

在此之前，我们这对假夫妻还真没有像样地厮守在一块。我到福州后已怀孕，接着生孩子，坐月子，这期间又受处分搬出了机关，单独住在互济会。陶铸也经常下乡巡视，我们难得呆在一起。而现在孩子刚送了人，身体刚复原，却又要分手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聚，我们彼此心中都有无限的依恋。

陶铸临行前，在一个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我们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恩爱相依，共同度过了十天幸福的“蜜月”。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旅馆门口依依分手，互道珍重，难分难舍。

刚开始时，我每周都能收到陶铸从上海寄来的两封信，信虽简短但充满热烈的感情。来了四五封信后，突然就断了消息。我每天翘首等待，等啊，盼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个星期后还是杳无音讯。

我预感到他可能出事了，但很快就安慰自己，他不会出事的！或许是被中央派到哪里去了，来不及写信；或许是到比较遥远的地方去了，信一下子接不到。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我的心里就更着急了，整日坐立不安，茶饭不香。我尝到了牵肠挂肚的滋味。

二十多天后，陈之枢到互济会机关来找我，告诉我中央来通知，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福州市委各机关赶快疏散！

这真是晴天霹雳！炸得我一阵晕眩。

这怎么可能呢？谁人不知道陶铸是铮铮铁骨的硬汉，他可能被捕，但绝不会叛变！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对这叛变消息的来源，我却满腹狐疑。我只从陶铸的来信中知道，他到上海后，在四马路附近租下一个小亭子间住。几天后，中央局组织部派人来和他谈了一次话，临走时只是嘱咐：“不要多出去，等待工作安排。”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只好每天呆在亭子间里读书看报，只有在晚上偶尔去马路边买张小报看看，等候中央通知，心里十分苦闷着急。

这些情况表明，中央还没给他安排工作，他与中央机关也没什么直接联系，只有与中央局交通员李友生的单线联系。

再说，要是陶铸真的在上海叛变了，那么这二十多天来，福州中心市委机关和同志们何以安然无恙？这不合乎逻辑！

我去找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张铁，将听来的消息和我的分析告诉他，他也同意我的判断。

"这里有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陶铸真的叛变了，现在已经二十多天了，福州市委各机关也没采取应变措施，怎么一点也没遭到破坏？我在仓前山的住处，以前陶铸常来常往，我怎么还会如此平安无事？"他转而安慰我："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陶铸都几乎是只身杀出重围，死里逃生，从未灰心颓丧过。你放心，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后来我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被晾在那个亭子间里苦挨时光，中央将他拒之门外。

与陶铸同行同住的，还有一位中央局派到福建国民党驻军刘和鼎部做兵运工作的王善堂。此次他到上海接受新任务，被派往江西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交通联络员。此人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被捕后叛变。后来他又趁机逃回,重新混入党内。

五月十八日早晨，王善堂离开亭子间前往十六铺轮船码头，准备启程去江西。不料在码头上被特务认出被捕，旋即供出陶铸。近午时分，陶铸在亭子间里被捕，押往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

说陶铸叛变纯属谣言，其编造者就是忌贤妒能、一心想排挤走陶铸的陈之枢。他给中央打了小报告，说陶铸搞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没有集体领导。后来恰恰是他自己叛变了革命，使福州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当然这是后话。

事实上，陶铸被捕入狱后，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格，严守了党的组织机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后被转移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三个月后，被移交国民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终生监禁。他在狱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担任书记，团结狱中的同志，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九月，陶铸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告诉我，他被中央召去上海，正是朱礼治的汇报和陈之枢的小报告所致。这是陶铸在狱中听难友萧桂昌告诉他的。萧桂昌问陶铸，你同朱礼治讲了什么？弄得王明很生气,以后可不要随随便便说话。

萧桂昌当时也是中央巡视员，到过福州两次。他是诗人，工人出身，后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在陶铸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捕入狱。他见到陶铸风趣地说：

“你这个家伙，怎么也进来了?”

原来中央已决定调陶铸到江苏省委工作，主编《精华报》。这是一份江苏省委的内部机关报，叫陶铸去编报，显然是对他的不信任。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通知，陶铸已经被捕了。

由于陶铸的被捕“叛变”，我的工作处境就更难了。我已不可能再留在福州继续工作了。陈之枢找我谈话，通知我到闽东地区工作。至于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鉴于我在互济会中的表现，市委决定撤销这一处分。到闽东后，参加福安中心县委的工作。

陈之枢还说，市委机关计划转移，搬到新的地点。他要我在去闽东之前，将陶铸的母亲送回湖南祁阳老家。

当时，陶铸的母亲董唐姑正在福州，为了掩护儿子的地下工作，她也住在市委机关里。每天迈着她的那双小脚，操持着家务，支持儿子的革命斗争。

董唐姑是一个性格刚毅的女人，一个坚强不屈的母亲。当年她的丈夫陶铁铮参加武昌起义，拥孙反袁，后为豪绅陷害。她指着丈夫的血衣，对两个儿子说：

“此仇不报，你们就枉为陶氏子孙！”

陶铸参加革命后，敌人抓走他的母亲，把枪口对准她，要她交出大共产党陶铸，她都面无畏色。

陶铸的母亲听说我要送她回湖南老家，决意不肯，坚持自己

能行。但她一个小脚女人，大字不识，年近五十，从福州到祁阳山重水复、千里迢迢，中途要换车船，找旅社。让她一个人走我还真不放心。

当我为陶铸的母亲买好船票送她上船时，见她好像满不在乎，而我却为自己不能尽孝道而难过地哭了。

也算陶铸的母亲有福气。她在旅途上结识了一位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的年轻湖南女子，两人结伴而行。那女人说自己无家可归，母亲便劝她一同回祁阳老家，她果然愿意前往。两人回祁阳后，那女人便同一位早已脱离共产党的姓徐的先生结了婚。直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抗战，她看到报纸上刊登有关八路军和彭德怀司令的消息后，才说出实话。

原来，她是彭德怀在国民党军队当团长时，一个部队驻地房东的女儿，两人结过婚。平江暴动后，她没跟着队伍走，敌人抄了她的家，她无家可归便四处流浪。她的家人替她登了启事，同彭德怀脱离夫妻关系。

当她得知彭德怀的消息后，便离开了姓徐的丈夫和女儿，只身跑到延安。彭德怀对她说：

“你已经登报与我脱离了关系，表态不跟共产党走，这是政治气节问题。因此我现在不可能再同你生活在一起了。”

但彭德怀还是很客气地对她说：“你就留在延安学习吧！”果然，那女的就留在延安学习，并且同其他同志结了婚，生了孩子，后来一直从事财经工作。

送走陶铸的母亲之后，陈之枢又同我谈了一次话，介绍了福安中心县委的情况，嘱咐我到那里后需要处理的一些关系和问题。

是年六月初，我离开了福州，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第六章　驰骋闽东

福安中心县委南北两个区的领导人互不服气，他们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但两个人之间同样是水火不容；我对施霖说：共产党内不允许有小派别存在

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我在交通员的陪同下，从福州乘小火轮，沿着漫长的海岸线往东北方向行驶。沿途可见众多的港湾和岛屿，以及连绵起伏的山脉。山上林木苍翠、郁郁葱葱，山脚下、海岸边则是成片的稻田、蔗林……

对我来说，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我知道这里已经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游击斗争。

在福州中心市委工作期间，作为秘书长，我从闽东各地送来的材料、巡视员送交的报告和口头介绍中，我已经对这块土地以及发生在这块土地的斗争有所了解。

闽东地区，包括原来的闽东北五县，即福安、宁德、霞浦、福鼎、寿宁和原属闽中的连江、罗源，以及靠近闽北的古田、屏南。它东临大海，西靠闽北，南和福州毗邻，北与浙江接壤。海岸线长达一千五百多公里，境内有太姥山、白云山、鹫峰山绵亘其间，沿海地域有三都澳港、赛岐港、罗源湾和西洋岛、梅花岛等岛屿。湍急的赛江，由北向南，直贯境中，经三都湾注人东海。闽东是开展游击斗争的理想战场。

邓子恢曾作为市委巡视员，多次到闽东的福安、连江等地发动农民运动，掀起抗麦债斗争和“平粜”赊粮斗争的浪潮。

陶铸在担任中心市委书记期间，曾先后到连江、福安领导创建了闽中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和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点燃了闽东工农游击斗争的烈火。

在我到闽东之前，福州中心市委又先后委派任铁锋、叶飞、练文澜、江平等人到那一带工作，广大贫苦农民被充分发动起来，同地主豪绅展开了抗税、抗捐、抗债、抗粮、抗租的“五抗”斗争。

临行前，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向我介绍过福安党组织的一些情况。福安中心县委南北两个区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们各据南北两区，互不服气，互不买账。南区的叫施霖、詹建忠（人称“南詹”），北区的叫詹如柏（人称“北詹”）。他们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反动派势不两立。但是他们党性不纯，搞派别，都想争夺领导权，两人之间同样是水火不容。

当时中心县委设在北区，詹如柏为书记，但施霖却不服他的领导，不承认中心县委。施霖和“南詹”不顾党的组织原则，自己另外成立了一个县委，要求接受福州中心市委的直接领导。

陈之枢要我先到南区去，做些调查，了解南区施霖和“南詹”的工作情况，查清他们另立县委的原因和他们双方矛盾的性质及焦点何在，党员群众对此有什么反应和意见，然后再到北区，参加中心县委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好双方矛盾的调解工作。

小火轮抵达三都澳后，我们改乘小溪船，沿着三都澳的海岸行驶。当进入白马门后，江面上水流逐渐平缓，水质由清绿逐渐变浑灰，河道逐渐变窄变浅。

天黑后，在一个叫甘棠的地方，我们上了岸。

在甘棠码头上岸后，交通员把我带到一个农民的家里，与一

位十六岁的小姑娘同睡一铺。小姑娘天真活泼，认识几个字，对我十分热情。

我对交通员提出要见施霖。这姑娘听我说找施霖，对我更加亲切。她不无激动地告诉我，施先生在我们甘棠，没有人不说他好。他为我们贫苦农民做好事，替穷人打官司、算命、择日、写信，而且分文不取。村里人不和睦，他总是耐心劝解。他对人和气，真是个好人啊！

施霖曾经在南区当过校长，教过书。他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团结詹建忠、陈洪妹、阮英平等一批人发动领导了南区的“五抗”斗争。甘棠一带的许多贫雇农甚至个别富农都信任他，尊敬他，称他为“先生”。他到哪里群众都为他保密，暗中警戒。

他真是“狡兔三窟”，我去见他，也经过了三个地方，等于通过三道防线才见面的。

施霖中等身材，身体较瘦弱，身穿深色便装布鞋，清洁得体。一种较慈祥和气的面容和神态，很似教书先生。他很客气地迎接我到里屋坐下。我发现这只是谈话场所，并不是他住的地方。

寒暄几句后，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奉福州中心市委的使命特来找你的。你们请求市委承认你们组织的县委这一问题，市委已讨论过了。一个县只能设一个县委，党的组织不是帮会，绝不允许自由组合。一切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都要经过上级党的同意。你们另立县委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市委指示你们赶快取消。如果坚持不取消，就会变成反对党组织的性质了。”

他大概被我这一番原则性极强的话给镇住了，一时无言以对。

“你们为什么要另立一个县委呢？”我缓了口气，问道。

“我们对福州中心市委的领导毫无意见。市委对福安党的工作布置，如发动群众进行‘五抗’斗争，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等我

们都积极贯彻执行。我们另立县委，只是不愿意接受詹如柏的领导。他这人独断专行，遇事不同大家商量，很霸道。他对同志使阴谋，耍手腕，搞打击报复。他把手伸到南区拉拢南区的同志，在我们这里搞分裂活动，专门排挤我个人。”施霖说得激动起来，脸都涨红了。

施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请中心市委相信我，我施霖绝不会反对党，我同国民党、豪绅地主势不两立！敌人是要杀我的，我只有跟共产党走，除此之外是无路可走的，请你相信我！”

我见他对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纪律还不了解，便和气地批评开导他：

“共产党员对同志有意见，可以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批评和帮助，或者书面向县委报告，或者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这些都是党的组织原则允许的。但决不允许党内有小派别、小团体组织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铁的纪律。你虽然入党时间不算短，但是对党章、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纪律，还不大了解，你可要好好地学习和掌握。”

“那是，那是，你刚才讲的，我过去不太懂，要是知道，我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施霖认真诚恳地回答说，“我向中心市委保证，我们立即取消另立的县委，接受经上级党批准的福安中心县委的领导，把对个人和对党组织截然分开。对福安中心县委，我们今后不再称它为北区县委了。”

我见施霖态度端正，认识有所转变，便中止了谈话，并建议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施霖表示同意。

南区干部会议在另一个同志家楼上的贮粮间召开，参加的还有陈洪妹、詹建忠、王四弟、阮英平等人。大家听了我的发言后，对取消县委没有异议，都承认另立县委是错误的，并一致认

为工作不能因此停顿。我提出，县委取消后，仍以原来就有的南区区委的名义领导南区工作，原来县委的同志要积极参加南区区委的工作，但不是县委身份。到会同志都表示同意。

接着，会议集中精力研究分析了南区形势和今后工作。我了解到，南区的“五抗”斗争年年都发动，但除了抗鸦片捐斗争取得较大的胜利外，其余的斗争发动规模小，都没有实现减轻农民负担的愿望，有时还会引起地主豪绅的镇压。南区的国民党驻军不多，地主豪绅主要利用民团“大刀会”来镇压农民的反抗。

看来，农民不能充分发动起来，“五抗”斗争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威胁主要来自地主反动武装民团大刀会。因此，怎样武装自己，反击地主豪绅的进攻，已成为南区乃至闽东斗争的重要环节。

吃神符、念咒语的“大刀会”成了地主豪绅镇压农民运动的爪牙；我提出利用农民的迷信心理，“旧瓶装新酒”把农民武装组织起来；为了与“大刀会”区别，起名“红带会”

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我对“大刀会”有了一定的了解。

当时的闽东社会，军阀混战，土豪劣绅当权，社会腐败，以致各地土匪、海盗蜂起。地主豪绅为了免遭土匪海盗劫掠，纷纷组建民团“大刀会”，企图自保。他们以“防匪护村”为名，宣传“大刀会”刀枪不入的神功，诱骗农民参加民团“大刀会”，并把“民团捐”摊派到农民头上，而领导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大刀会”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会道门组织，以“坛”为单位，因会徒以大刀、梭标为主要武器，故统称为“大刀会”。由于他们信奉的祖师和教派不同，有白莲教、黄巾教

等，因而出现名目繁多的会名。如在南区甘棠一带就有“一心会”、“白带会”、“白鹤会”、“奶娘会”、“九仙会”等等。各坛有自己敬奉的神灵和咒语，在作战前要祭神坛，吃神符，念咒语，以为这样就可以抵御敌人的刀枪。

“大刀会”的建立，曾使匪患得到控制。但随着党领导的“五抗”斗争的高涨，大刀会却在地主豪绅的指挥下，把矛头指向农民革命，充当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凶恶爪牙，暴露出他们的反动性，成为闽东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

但是，我们调查了各种教派的“大刀会”组织后发现，“大刀会”其组织形式是封建的，而学刀法拳法是为了进攻与自卫；打仗前将朱砂、辰砂用黄酒或水送服，是为了镇静、麻醉神经，不畏危险，有利于冲锋陷阵；在作战前不许和女人同房，这除了避秽外，还有助于保持充沛的体力；作战时要侧身前进，眼睛直视前方，不准东张西望，不准弯腰拾地上的东西等，都是为了作战时聚精会神，奋勇争先，这又不单纯是封建迷信。

那么，我们何不利用“大刀会”的形式，利用广大农民群众存在的迷信心理，把他们秘密武装起来呢?

我和区委的同志交换意见时，他们早就有了这种想法，认为这是一种极好的办法。但因为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组织形式，怕上级党组织批评，不敢提出。我表示，这种形式等于利用“旧酒瓶装新酒”，酒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 只要对“五抗”斗争有利，对武装农民有利，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干。封建迷信的东西，经过改头换面，用来对抗地主豪绅国民党反动派，就决不是封建迷信的内容了。

为了与地主反动武装“大刀会”有所区别，我们将这一农民武装组织名称定名为“红带会”，因为红色表示革命；红带也比较简单，不要法衣法帽，只要一条四五寸宽、四五尺长的鲜红粗布，做一条红带子，像军官的佩带一样，斜披在身上。武装也同样是

大刀、梭镖。但它与“大刀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不受地主豪绅的控制，而是一支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近似于闽西苏区的赤卫队。

我随着区委的同志在南区走村串寨，把组织建立“红带会”的决定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作布置，大家听了个个兴高采烈，一致赞同。

于是我们从各村抽调了一批农民斗争骨干，自带粮食上山秘密集中培训，请来“大刀会”法师设坛授法和练习拳脚。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进行试刀，即用大刀往憋足了劲的胸脯上砍，试刀成功后即告学法出师。他们回到各地后也设坛授法。

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不出两三个月，南区甘棠一带有两百多个村都建立了“红带会”，广大贫苦农民被充分发动和武装起来。

我在南区同施霖、詹建忠、陈洪妹等人工作一段时间后，帮助施霖等人端正了思想认识，纠正了另立山头各自为政的错误做法。半个多月后，我便前往北区，向中心县委报到。

人称“北詹”的詹如柏与地主豪绅不共戴天，与各路土匪称兄道弟，对党的方针政策也坚决执行；而对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却采用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叶飞始终认为自己被行刺与“北詹”有关

此时的福安北区，已成为中心县委的一块游击根据地。一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陶铸到福安巡视工作，亲自创建了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点燃了闽东地区的游击武装斗争的烈火。九月中旬，福安县委发动“兰田暴动”，缴了地主的十八枝枪。接着又攻打了溪尾、棠溪两处地主民团。随后，队伍撤到在福安北部山区靠近霞浦、寿宁的三角地带纵横几十华里的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由于有了游击队的撑腰，北区农民纷纷起来投入“五抗”斗争。大地主豪绅被迫逃亡县城，一般地主不敢收租要债，税棍粮胥也害怕下乡。因此，地主豪绅请来国民党教导团到北区“清剿”游击队。

我到北区好几天了也没遇上詹如柏(听说他带着游击队到其他地方去了)，倒是遇上了县城国民党驻军两个连的进攻。

当时我正在和几位农民群众谈话，待村口放哨的群众跑来报告时，敌人已经快进村了，我们慌忙跑向后山。由于将近八个月的城市机关生活，很少走路，突然跑步爬山，加上山陡路窄，心情紧张，不出百余米，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心想这次可完了，山坡上没什么树，子弹在耳边“嗖嗖”地响着。眼看敌人就追赶上来了……

突然，从我后面跑上来一个身强力壮的同志，二话没说，抓住我的手就往山上拖，我的双腿不由自主地被他拖着跑了两百多米。

当爬到一个拐弯处，周围长满了灌木林，敌人已看不清我们了，他才松开手。过了一会儿，我才喘过气来。

我真悔恨自己，一个红军老战士，长年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为什么在城市里呆了半年多，爬山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呢？可见不经常锻炼，就会变得娇嫩软弱。今后我将在闽东山区斗争生活，爬山走路这一关还得先过。后来，我有意跑步上山，一股气跑三四里不休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魄，同男同志一道行军打仗不掉队，跋山涉水气不喘腿不软。

第二天，在北区的一个村子里，我总算见到了福安中心县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原任书记马立峰年初在北区不幸被捕后，由詹如柏代理书记。

詹如柏是北区后洋村人，家中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其叔父无后，他被过继给叔叔当儿子。叔父是村里的富裕之家，他念

过六年私塾后，回家种过地，学了些武艺，后又到县城里念过书。他三十多岁，中等个子，身体壮实，一身农民打扮，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他勇敢机智，敢说敢干，处事果断，表情相当严肃，但言谈并不粗鲁，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

听说詹如柏参加革命前，与福安、寿宁、霞浦、宁德等县的一些土匪都有联络往来。一些土匪头子认为他仗义豪侠，还同他结拜把兄弟。那时党的政策，也是要求我们深入到一些与国民党对抗的土匪中争取和改造他们，因此詹如柏与他们仍有往来。

詹如柏与国民党豪绅地主不共戴天，对党的方针路线坚决执行，信仰坚定，革命坚决。但由于他没有接触马列主义，没有受过党的培训，长期在农村工作，念的是旧学堂，生活在富裕环境，与各路土匪称兄道弟，因此，思想上惟我独尊，同志之间不能真诚坦白，对待同志经常抱有猜疑防范的心理。

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处理某些人与事上，完全违背组织原则。合他意的便想方设法抬举起来，反对过他或他认为不满意的，则采取阴谋手段，置人于死地。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成反革命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

我曾听叶飞说过，他在福安狮子头客栈险些被县便衣队枪杀。后来抓获一名枪杀叶飞的凶手，詹如柏还没等凶手站住，一句话也没问，就慌里慌张地大声喝令快拖出去枪毙了。当时叶飞也在座，就见凶手回过头来大骂：

"詹如柏，你好狠心啊！我的事情你什么不知道？"

"快拖出去毙了！不许他骂人。"

"詹如柏，你太没良心啦！"凶手拖出去很远，还在叫着。

叶飞对此深表疑惑，詹如柏见到凶手为什么态度如此失常？詹如柏无疑认识凶手，但为何一句话也不审问，一句话也不让凶

手说，便急急忙忙地命令拉出去枪毙了呢？他始终存疑，詹如柏与他在狮子头被行刺有关系。

当时我还不了解詹如柏的为人，我劝叶飞不要瞎猜疑，也许他和凶手有什么个人恩怨吧。

当然，这是詹如柏的一些个别行为。不过一般情况，他对人还是热情诚恳的。我刚到北区时，是同詹如柏夫妇一道吃住。他的妻子林淑梅，那时很年轻，二十来岁，比我们小一点，是个农村姑娘。念过两年小学，为人老实厚道。

见到詹如柏后，我将在南区与施霖、南詹、陈洪妹等人接触后所谈的一切内容都告诉了他，包括施霖等人的思想认识和态度，以及他们已承认错误、自动取消南区县委，现在是以南区区委名义开展工作。詹如柏听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样就好”，便再也没说什么话了。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第一支队长兼政委江平是个知识分子，队伍集合用手指点数，更不会指挥作战，队伍打仗全凭个人勇敢；我第一次见到叶飞，他中等身材，眉清目秀；“北詹”与范浚有矛盾，范浚不会打仗，只会做秘密工作

同一天，我还见到了第一支队的队长兼政委江平和他的游击队员们。他刚率队从寿宁边界风尘仆仆回到驻地。

江平是福州中心市委一九三二年秋派到闽东的。他原来长期在福州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曾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他的未婚妻是任弼时的妹妹，叫任培轩，是我在长沙自治小学的同学，又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

江平个子高大，较胖，可能是平脚，所以爬山走路十分吃

力。但他待人和气，为人善良，在游击队里不像是队长，更像是慈祥的父亲，同战士们打成一片。他不是闽东人，普通话说得很好，但不懂闽东方言。队员们喜欢他，都叫他老江，没人叫他队长或政委。

他原来是个知识分子，不懂军事更不懂游击战术。连队伍集合站队，他都是用手指去点数，不叫队员们报数。我跟第一支队活动过一段时间，游击队有两次与敌人遭遇，才发现他不会指挥作战，完全放任队员们自己打，全凭个人勇猛。队员们都是本地人，地形路线十分熟悉，打起仗来相当勇敢。

我在休息和饭后与队员们闲谈时，同他们说起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以及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化整为零、迂回打圈、麻雀战等。还谈到每个红军战士应该身兼三职，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每到一个地方，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组织群众斗争，是每个战士的责任。队员们听了感到很新鲜，很高兴。有些队员对我说，如果过去我们都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办，有些战斗、有些暴动，损失就会小得多。



闽东苏区创立六十周年时，与老战友叶飞在一起。

没过几天，叶飞也从宁德霍童回到福安。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中等清瘦的个子，眉清目秀，一身农民打

扮，但举止行为仍然是学生形象。

在福州中心市委时，我曾听说过他原是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部长，后于一九三二年秋派来闽东工作。一九三三年初，福安中心县委又派他到宁德巡视工作，在那里他领导了著名的“霍童暴动”。

大约七月初，福安中心县委在离赛岐镇五六里的赛岔孤楼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房主郑仁和，是个读书人，与马立峰等差不多同期入党，公开职业是在赛岐的渔行里做事。他的家三座房子并排而建，彼此相连，掩映在一片松竹之间，因此比较隐蔽僻静，是福安党的重要交通站。

那天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五六人，即詹如柏、叶飞、江平、庄毓麟、我，可能还有陈洪妹。会议开了一整夜，天快亮时才结束。

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对付福安国民党驻军、民团对北区游击根据地的不断进攻；如何领导开展寿宁、福鼎、霞浦、宁德及福安的“五抗”斗争，发展各县区的游击武装，开辟各自的游击根据地。

会议对利用“红带会”的组织形式开展斗争，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认为，利用“红带会”的组织形式来迅速地武装革命的农民，是发动农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很好形式，也可以满足革命群众武装自卫的要求。因此决定在闽东各县凡有工作的地方都要有计划地发展“红带会”组织，并以此团结和组织广大贫雇农参加各种革命斗争。

会上还对寿宁县几位领导同志的工作做了分析。记得“北詹”说过，寿宁的叶秀蕃、范浚、范铁民这三位同志都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叶秀蕃、范浚是知识分子，会做秘密工作，但不会带兵打仗，而范铁民是游击队长，会打仗。他参加革命是坚决的，可以放心。只是他不会做群众工作，要有人去帮助他。

“北詹”还说，叶秀蕃、范浚与范铁民矛盾很深，认为他是土匪头子，不可靠；而范铁民又不买他两人的账，不接受叶秀蕃和范浚的领导，相互不信任、不服气。

因此“北詹”主张，寿宁县的工作由范铁民负责为好，他手上有支游击队，便于开展工作。叶秀蕃长期在福鼎方面活动，与范铁民矛盾不大；范浚与范铁民有较大矛盾，要设法把范浚调出来工作。

由于我们刚到闽东，对情况不了解，不知道范铁民与詹如柏曾是拜把兄弟，也没想到詹如柏会在其中耍手腕。因此，对詹如柏的主张，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有听他的了。

后来在年底时，我听说范浚夫妇在离赛岐不远的廉首村被人暗杀了，她妻子已有孕在身，也未能幸免。

好多人还蒙在鼓里，因为传说范浚夫妇到中央苏区去了，有些同志还十分羡慕呢！

南埕盐霸盘剥盐民，我指导盐工协会开展有计划的斗争，六百多人到宁德请愿；闽东第一个红色政权——福安革委会成立，国民党发动频繁“围剿”

赛岔孤楼会议后，福安中心县委派我到宁德南埕盐区巡视工作。

七月的一天，我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乘小船从福安顶头出发，出白马门，向三都澳驶去。

三都澳是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的海上基地。闽东地区许多反动地主豪绅，在土地革命斗争浪潮的冲击下，纷纷逃亡躲进三都澳。因此，那片海域戒备森严，盘查严格。

为了在通过沿海敌占区时避免暴露，我换上了当地妇女常穿的紧袄宽腿裤，将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我还在裤腰上别一

枝手枪,大腿上绑一枝手枪,以防万一。

时至下半夜，我们的小船划到三都澳附近，远远望见几束探照灯在海面上摇过，几艘汽艇在远处海上游弋巡逻。

船老大夫妇是我们船民工会的同志，胆大心细。见敌人查得严，便把桨放下，改用木瓢轻轻地掏着海水前进，使敌人听不到一点声音。夫妇两人弯着腰，辛辛苦苦地划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偷偷渡过了三都澳那段水面。

小船沿着海岸线航行了一整天，天渐黑时终于靠上了南埕的码头。交通员上岸找人接头去了，这时码头上走来了当地民团的两个巡逻团丁。见是外地的小船在此停泊，就过来盘查，并说要把我们带上岸。

船老大一看不妙，就急忙下船应付。我心里很着急，怕上岸走远路，大腿上的枪会掉下来。我乘着天黑，盘问的人尚未注意到坐在船舱里的我，赶紧从裤腿里把绑在大腿上的手枪拔出，插在裤腰上，静观动向。

正在这时，码头上又走来一个团丁，这个正是负责与我们接头的同志。他见有生人坐在舱里，估计是上级来的同志，便对另两个团丁说:

“这个是我的外甥女，来做客的，不用查了。”

真是好险！如果一盘问，我准露馅，因为我还不会说当地方言。

南埕是一个约有一千多户的大村落。其中有四百多户农民从事制盐。盐霸用重金买通官府，到南埕办盐场，垄断盐的生产和销售。他以每担一元二角的低价向盐工收购食盐，再以七八元的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

广大盐民终年在烈日下、海水中拼命地劳作，其结果仍然是家贫如洗。盐民们强烈要求抗捐税，自由买卖食盐。

我到那里听取了当地盐工协会活动的汇报。针对他们缺乏计

划部署，没有组织性等问题，给予了指导和帮助，要求他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

三四天后我离开南埕返回福安。后来听说，南埕盐工协会在我走后不久，发动盐工及其家属六百多人到宁德县城请愿，举行示威游行，最终迫使县长作出让步，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月底，我们几位都回到北区，在泰逢村召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宣布正式成立福安革命委员会，由詹如柏担任主席。这是闽东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北区一带领导开展了打土豪借款和分粮斗争。随后北区的各区、乡、村先后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政权还建立了“红带会”，以保护斗争的成果。

福安北区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很快引起国民党闽东当局的恐慌，他们派出海军陆战队一个营，到北区“围剿”第一支队。

我们得到城里地下党派人送来的情报，立即作了商量。根据情报说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的游击队要是与他们硬拼是万万行不得的。我们要采取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声东击西，迂回袭击，把敌人赶回城里去。

第二天，敌人果然浩浩荡荡开抵北区。而且此次“围剿”不像过去的扫荡，很快就撤走了，而是步步为营、驻扎下来搜山烧山，企图歼灭游击队。

为此，我们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在农民骨干的配合下，采取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对付敌人。

白天，游击队和党政机关的同志都撤到深山隐蔽起来。到了晚上，在驻有敌军的村子，三五个勇敢的游击队员和青年农民绕过敌人的哨兵，摸到敌人的驻地前，插上很多香火，再放它几枪；同时将鞭炮投进洋铁桶里爆响，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四处有排枪声和人影，吓得东钻西窜，闹得敌人整夜不敢入睡。更有大胆的游击队员竟潜入敌人的住地和厨房，把剩下的饭菜和能

吃能用的东西都搬上山来。

当敌人向北区进发后，我和詹如柏以及他的妻子，再带上三个战士，化装成走娘家亲戚的，乘小溪船傍晚时分到达离城关两里多的村子里潜伏下来。到了半夜，在城郊和城里地下党的配合下，我们在城东外瞄准敌人城门岗哨又是射击、又是放鞭炮。我们几个人就这样在城东放一阵，赶快又跑到城西放一阵，还跑到离城三里多路的民团驻地放了一阵，使城里的守敌手忙脚乱，心神不宁，也使民团迷惑不清。城里的地下党同志同时贴出大批标语，扬言游击队要袭击县城……

果然，国民党闽东当局害怕县城空虚，担心遭到游击队的进攻，赶忙通知“围剿”北区的那个营立即撤回县城。就这样，我们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阴谋。

但没隔几天，国民党闽东当局再次暗中纠集海军陆战队、县警备队，在地主民团“大刀会”的配合下，大举进犯北区，企图一举“剿灭”第一支队，铲除革命委员会。

由于我们事先不曾获得敌人进攻的情报，因此当敌人到了根据地时，我们才发现敌人此次的进攻气势汹汹，且人多势众。

第一支队掩护群众迅速向深山撤退，好在群众早有了坚壁清野的准备，重要东西都已隐藏在深山里。敌人一到，他们挑起锅碗行李，携儿带女就往山上躲避。

当我们爬上山头，才发现附近“大刀会”也配合敌军分几路向山头搜索。为了掩护群众，保存自己，我们临时决定，第一支队化整为零，随农民到森林里隐藏。因为游击队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地形地势相当熟悉，到处可以躲藏，不怕敌人搜山。

敌人这次进攻来势凶猛，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不但搜山，而且放火烧山。幸好山区的林间水气重，好几处山火点燃后，又自动熄灭了。

当我们安排好队员和群众疏散之后，敌人已距离我和詹如柏夫妇相当近了。敌人步步紧逼搜索，我们节节隐退。好在我们在暗处，没有被敌人发现。在危急情况下，詹如柏表现出过人的勇敢和机智，他悄悄地对我们说：

“我看到对面村子里的六七十个“大刀会”徒往那边的山头搜查去了，我们就到对面村后的竹林子里去躲一躲，到敌人的心窝里更安全。”

我们觉得有道理，便从一条长满茅草的山路插过去，穿过一片榛子林，再钻入村后的竹林里。詹如柏要我们在原地等候，他去去就来。不一会儿，詹如柏回来了。不到半小时，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提着一个竹篮和罐子给我们送饭来了。詹如柏好像管那人叫舅舅。

此时已将近下午三点，饿了大半天的我们，围上前去一阵狼吞虎咽。吃完饭已是三点多了，为了不至于被回村的“大刀会”碰上，我们又离开了竹林子。

这一带村子已成了敌占区，走大路相当危险。我们就尽挑羊肠小道走，在棘荆丛中钻来钻去，走累了就找个僻静处休息一下。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当我们坐起身来准备继续步行时，突然发现山下不远处，有一股参加搜山的“大刀会”徒一无所获，败兴回村。幸好我们这边长满了一人多高的灌木，敌人没有发现，但隐约可以听见那些人的骂骂咧咧的声音。真是好险啊！

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根据地。第二天，见到叶飞等人。经了解，“大刀会”搜了一阵山，什么也没捞着，泄气地走了。但城里来的敌人还未走，估计还会组织搜山。福安中心县委几个领导商量后决定，县委干部和游击队员再集中到县城南面有工作基础的村庄里隐蔽起来，开展群众工作。

同时还决定，派我回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将敌人频繁进攻北区根据地、施霖等承认错误自行取消另立的县委等情况，

以及闽东党的今后工作意见报告市委。并请求派一个军事干部和设法搞些枪支弹药回来。因为支队长兼政委的江平身患重病，短期好不了。另外，一个人身兼两职总不是长久之计。

我陪何老太太探望他在狱中的儿子，他们的骨肉相依之情，勾起我对生下十三天就送给人的小儿子的怀念；半岁的儿子瘦得皮包骨，穿着肮脏不堪，我的泪水几近夺眶而出

三四天后，我回到了福州，住在何老太太的家里。我是经张铁介绍才认识何老太太的，并以她家的地址作为我与湖南老家联系的通讯处。

何老太太是一位党内同志的母亲，五十多岁。独生儿子何奋，原是一位教员，一九三二年参加抗日救国大游行时被捕。何老太太独自住在南门兜附近的一条叫柴禾铺的陋巷里，只有一间破旧的小屋。她家原本贫寒，儿子入狱后，更是断了生活来源，全靠地下党每月救济三五元勉强度日。老人家平日里三餐吃稀饭，配的是豆腐乳或白豆腐沾酱油。但每星期去监狱探视儿子，总要带一钵子的炖肉或烧鱼。这种至深至诚的母爱，令我感动之至。

在等待市委召见的空隙，我曾随何老太太去探了一次监。只见年轻的何奋，拖着一副又大又重的脚镣微笑着向我们慢慢走来，脚镣摩擦地面发出铿铿锵锵的响声。他虽苍白瘦削，但神情自若，一身英勇气概。艰苦漫长的狱中生活，并没有摧垮他的精神防线。何老太太对着探视窗口说："你'表妹'看你来了！"何奋望着我会意地笑了笑，仿佛对我说，我是不会屈服的，请党组织放心！

何老太太与儿子的这种骨肉相依之情，激起了我对儿子的思

念。我一定要设法见见我那生下十三天就送人的小儿子。听何老太太说，我儿子的奶妈就住在附近，她经常抱着孩子打这门前经过。我们就守在门口，一连等了三天，终于见到那奶妈抱着一个孩子走过来。何老太太连忙热情相邀，请她们进来坐坐。

不见孩子倒罢，见了孩子，我的心都快碎了。儿子已经半岁，看上去不过三个月大小。瘦得皮包骨头，两只手像小鸡爪，一脸细皱纹,活像一只干瘦丑陋的小猴子。身上的衣着更是寒酸破烂,肮脏不堪,头上的小帽子还是出生十三天送走时戴的那顶。

孩子怎么搞成这样？一问才知道，奶妈自己还有个两岁的吃奶的孩子，奶水不够，只好给别人家的喂稀饭和馒头了。那天我正好买了两个馒头，我掰下一块，用开水泡泡喂他吃，孩子居然吃得津津有味。吃了还要吃，显然是饿极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为了不让奶妈看出我的身份，只好强忍着把泪水咽下。

面对亲生骨肉却不能相认，眼见可怜的儿子如此的不幸，我心如刀绞，深感内疚。在过去的短短五年里，我已经失去了两位革命伴侣，而我深爱的陶铸至今还在狱中生死不明；可怜的三个儿子，为了革命事业，或是卖人或是送人，没有感受过多少母爱……

我望着渐渐远去的那顶小帽子，在心里默默地说着：原谅我吧，孩子！待到胜利的那一天，妈妈一定会来找你的！

全国刚解放，我就拜托当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帮助寻找这个三儿子。经过多方查找，一九五〇年终于找到。方毅派人把他送到我所工作的汉口。我望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个头还不及十岁小孩高，而且是个跛子，身上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穿的美国救济破布衫。

儿子流着眼泪向我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童年。他四岁那年因营养不良患了淋巴腺结核，全身淋巴溃烂，长年脓血淋漓，又臭又

脏，惹得养母讨厌，受尽歧视。因养母是基督教徒，在他十四五岁时，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除一个肾脏，清除了髋骨上的烂肉。命是保住了，但腿却跛了。

这孩子长这么大没穿过一天鞋，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更不用说念过一天书了。他很小就开始承担养家糊口的重负，做过磨牛角梳子的小工，走街串巷叫卖过香烟花生。每赚得一分钱，都分文不少的交给养母。



一九九一年四月四日，曾春华、陶斯亮为曾志贺八十岁生日。

孩子叫春华，回到我身边后才开始上学，由于勤奋刻苦，他用很短的时间就从小学一年级跃升到工农速成中学。后来，又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一直在东北一家军工厂从事黄色炸药研制工作，后调到广东乐昌，成为一名工程师。怜爱他的外婆，替他在农村找了个既能吃苦又非常能干的媳妇。他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春华虽然身体残废，但很要强。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努力地工作，过着俭朴的生活，从来没向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提出要对以往失去的作任何的补偿。

江平惨死在敌人的大刀之下，成为血洒闽东的第一

个外省籍烈士；我们在五十多个村子建立了党团组织，对反动分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到福州三四天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到我的住处，听取了我关于闽东工作情况和要求的详细汇报。他听后对我说："你在这里住几天，市委研究以后再找你。"

几天后，陈之枢再次来到何老太太家，把市委研究后的意见告诉了我。他说："如果施霖真诚承认错误，同意取消另立的县委，那他还可以参加福安中心县委，代表中心县委就近指导南区区委的工作。但南区区委不能拒绝中心县委任何委员来南区检查指导工作。今后决不允许各搞一派、各霸一方，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原则教育干部和党员，增强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

市委还决定派任铁锋去闽东担任游击队长，并要我们首先发动组织好南区的秋收斗争。

我和任铁锋一起回闽东，本来还有练文澜同行，临行前他不知何故不去了。我们将市委代买的四枝长枪，用旧被单包捆着，外面再包上两床草席，搬上小火轮船，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们在离得远远的但又能看得见的地方，以免被检查人员发现受牵连。

我原先就认识任铁锋，只是不很熟。他在我们福州中心市委机关住过几天，我只知道他在从事兵运工作。

航行中，任铁锋谈起了他的革命经历。他原来叫任达，福建永泰人，做过反帝大同盟工作，同福州一批学生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较熟悉。后来，党组织派他到福州马尾国民党海军训练营，学习水兵半年，从中开展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春，市委又派他到闽东工作，在福安穆阳地区组织暴动未能成功，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他，用竹签插到两个大拇指里，把他的指甲盖都扎掉了。但他始终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由于没有证据，被关了一年后

出狱。记得陈之枢在谈到他时，说他很勇敢，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表现坚定。

任铁锋出狱后，被派到连江工作担任游击队政委，这次市委把他从连江方面调过来。

小火轮到了三都澳后，我们又换乘小溪船，平安无事地到了南区。我派人将三枝长枪送往北区，转交詹如柏。我和任铁锋先留在南区工作一段时间，部署秋收斗争。

我找到施霖、陈洪妹等，传达了市委的指示，他们很高兴，尤其陈洪妹更是高兴。他原先担心给施霖处分，市委不给处分，他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这时，他们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江平壮烈牺牲了。就在我走后不久，敌人对北区组织的第二次"围剿"中，江平身患疟疾，无法随队转移，留在咸阳百丈坑一个贫雇农的家里养病。当敌人"搜剿"那一带时，群众把他藏在一个石洞里，每天给他送饭送药。不料被对面山搜山的敌人发现，"大刀会"包围了石洞，江平最后惨死在"大刀会"的乱刀之下。残暴的敌人砍下他的头，挂在城门上示众。

我在去福州汇报工作之前，还特地去看望了正在病中的江平。他那时打摆子发高烧，病势很重。没想到从福州回来，他已经被敌人杀害了。我听到这一消息，感到震惊，并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而痛心。

江平是第一个牺牲在闽东的外省籍烈士，他把满腔热血洒在了福安这块异乡的土地上。

这次回南区，我发现南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经过过去两个多月的宣传发动，以甘棠为中心，附近大小五十多个村子差不多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和秘密农会，尤其是"红带会"发展迅速，十分普及。

在这些村里，地主富农分子及其狗腿子的一举一动，党团组

织了如指掌。敌人的探警,包括做买卖的任何生人一进村,就有人报告,而我们的活动等于半公开。

这时，甘棠洋上数千亩的水稻已由绿转黄，秋收在即。南区区委通过各村党组织和秘密农会，联络各家各户，齐心抗租。

九月，水稻开镰，各村一律采取拖租的办法，有些地主派民团强催硬逼，甚至吊打农民。我们巧妙地秘密处决了几个为非作歹的坏蛋，震慑了地主及其狗腿子。

由于南区群众团结一心，抗租声势浩大，使得地主不敢随意下乡，催租逼粮，轻举妄动。少数恶霸地主逃到镇子里，请来海军陆战队到村里抓人。驻扎甘棠的海军陆战队，差不多天天出动，在附近村子转来转去，威吓群众。国民党当局也派出探警特务，四处侦察施霖等南区领导人，企图打虎先打头。

有一天晚上，我们原计划在距甘棠五六华里的漳港村过夜。晚上十点多时，赛岐的一位同志突然找到我们，见面就说：

“你们果然在这里，听说赛岐的敌人已得知你们在这个村子，计划今晚要来搜捕。你们赶快离开吧！”

我们只好转移到两里以外的加招村。刚躺下不久，一想不对头，这村是敌人到漳港的必经之路，万一敌人路过，拐进村子搜查那不糟了。这样我们只好起身躲在屋后山坡上的一片甘蔗林里，不久果然将近一个排的敌人打村边经过到漳港去了。大约下半夜三点多钟，敌人又经过村子回赛岐去了。待敌人走远后，我们才从甘蔗地里回到村子，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就这样，我和任铁锋、施霖等人“狡兔三窟”，使敌人掌握不到我们的行踪。

虽说是“发配”闽东，我仍下决心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无论党信任与否；语言不通，我一字一句地学；

吃饭困难，我与农民一起吃番薯丝；练就了一副钢肠铁胃，曾一口气吃了二十六个荷包蛋

我之所以调福安工作，是因为我向蔡协民说了真话而受到党纪处分。又由于谣传陶铸叛变，为了市委的安全将我调离福州。去福安之前虽说撤销了对我的处分，但心情还是沉重的，总觉得是被“发配”到闽东的。

历来好强的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党组织信任与否，我都要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屈都别想让我低头屈服。

我在福安农村工作，困难相当大，语言不通是最大的困难。在福安的党员和干部中，只有我是外省人，叶飞、苏阿德、任铁锋、庄毓麟等同志都是福建本省的。

农村工作都是在广大农民家里转来转去，可不比在城市住党的机关。语言不通怎么做农村工作？为此我发誓一定要闯过语言这一关。

刚开始时，我只好像哑巴那样用手势代替语言。例如对方用手拍拍凳子要我坐，我用眼睛看他的嘴形和发音，我照他的说一遍。对方点点头，笑了，我就记住凳子怎么叫了。饭做好了对方叫我吃饭，我照他的话说一遍，他摇摇头，说明我说错了。有时我拿着筷子和碗向对方举一举，对方会意我在问他，对方答复，我照着说……

就这样几个月下来，生活中的一般语言，我基本上能听懂，一字一句我也能讲一点。语言能相通，感情就更融洽。福安会讲普通话的同志不多，只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可是，我们不能天天在一起，我不能依赖他们当翻译。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与不懂普通话的同志在一起工作。

当时是处于秘密状态之下，白色恐怖严重，地主豪绅、国民党探警、民团“大刀会”到处都是。我这个外地人，稍有不慎，就可

能被发现。而且在农村,村子小,房子杂,人来人往,秘密隐藏很不容易。加之我又是个女子，经常还要同战士们一道行军打仗，多有不便。有时虽然化装成农村少妇，梳巴巴头，穿少妇衣裤,但进出村子也很不容易,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正是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福安坚持斗争。

在吃的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在农村工作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当地同志供吃供住，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当时山区农民的主食是番薯丝，即用番薯在推子上推成丝，晒干后储藏起来。一年到头就吃这个，生活较好的加点大米，贫苦的人家连番薯丝还吃不饱。

我在闽东很少吃到大米，好像也没吃过白面。番薯丝饭吃多了就胀腹、烧胃、吐酸水。农民们没油煮菜不要紧，如果没有咸鱼配饭，就全身发软，腿脚无力，走路没劲。所谓咸鱼，就是用盐水浸泡的手指大小的烂海鱼，又咸又臭，一毛钱可以买六七斤，吃上大半个月。刚开始还真不习惯，但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

后来有一次，红军占领了距东区七八十里的高山上的一座城堡，那里是柘洋（现柘荣县）特区所在地。叶飞、詹如柏通知我去开会。

从东区去柘洋，走的全是羊肠小道，还要翻山越岭。我和交通员为了赶路，连走带跑。好在那时走山路已成习惯，登山如履平地，毫不气喘，因此，天黑时总算赶到。

叶飞等人已经吃过晚饭，见我们还没有吃饭，便通知下面弄点吃的来。尽管我饥餐渴饮，但我还是让交通员先吃了剩下的饭菜。一会儿一位同志端上来一大碗荷包蛋，没有饭，我一边吃一边与叶飞、詹如柏等闲谈。因为打了胜仗，大家情绪很高，说说笑笑，不知不觉，把一大碗鸡蛋全吃光了。

我问那位同志煎了多少个蛋，他笑着说：

“你真能吃，一共煎了二十六个鸡蛋。”

我一听吓呆了，心想如果因此消化不良得了病，那就太丢人了。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想，或许是这半年来吃番薯丝的功劳，练就了一副钢肠铁胃，要不然早就撑破了肚皮！

一百七十多名“红带会”会员在“法师”的带领下，祭坛念咒，开始了威震闽东的“甘棠暴动”；除大刀、梭镖外，只有一枝手枪，却缴获了二十六枝步枪和成箱的子弹、手榴弹

十月的南区，敌我斗争局势异常尖锐，近乎白热化。

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四处追税抢粮，打人抓人，地主民团“大刀会”也参与逼租讨债，气焰嚣张。整个南区群情激愤，党、团员积极分子个个摩拳擦掌，群众也纷纷要求党组织采取行动，严惩海军陆战队。有些“红带会”会员主动起来，反抗前来抢粮抓人的民团“大刀会”。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气愤地批评我们不顾群众要求，一味拖延，眼巴巴地看群众受损失。

我们和区委的同志对南区敌我形势作了分析和对比。海军陆战队在福安只有两个营的驻军，海岸线漫长，驻军分散，甘棠重镇仅驻扎一个排。民团“大刀会”的力量也不及“红带会”，而甘棠镇共有居民四百多户，甘棠四道门都已建立“红带会”和秘密农会，附近二十多里的村庄大都建立了“红带会”。整个南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是敌弱我强。

大家认为是揭竿而起举行武装暴动的时候了。为此区委决定，在甘棠里应外合，消灭敌海军陆战队驻军那个排。

对于公开举行武装暴动，施霖有些害怕。他虽然没有阻碍暴

动，但叫他出来参与，他却不出来，我们就不理他，实际上是撇开他。而原南区的那一批干部则勇敢地站出来，参加了此后的暴动。

这时，施霖与詹建忠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跑到霞浦一带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十月二十二日深夜，七十多名“红带会”会员在“法师”带领下，祭神坛，念咒语，喝朱砂辰砂酒。祭事结束后，在暴动总指挥任铁锋的带领下，向甘棠镇进发。在抵达甘棠护城河边沿后，突击队兵分几路，在甘棠镇内“红带会”会员的带领下，经小巷绕过敌人哨兵，包围了海军陆战队的驻地刘氏宗祠，并悄悄干掉了敌人设在门口的岗哨。

讯号一响，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刘祠。一个排的敌人都住在楼上，当队员们冲到敌人跟前时，他们还在梦乡之中，枪支都挂在墙上。没等敌人爬起来，队员们就摸黑把枪抢下了。敌人吓得有的钻在床底下，有的躲在桌子底下。由于事先我们就决定，暴动未公开，只要枪支弹药，不抓俘虏，带着俘虏无处关押，因此队员们夺了枪就往楼下跑。

突击队员中最先冲上楼去夺枪的是党员成全，夺枪后他在楼下监视敌人，掩护战友们撤退。不料敌人从楼上扔下一个手榴弹，炸死了成全。他是党组织派到“红带会”去的，后来成了“法师”。他年轻、勇敢，积极主张举行甘棠暴动，并在暴动中带头冲锋陷阵，不幸壮烈牺牲。

这次战斗我方除了成全牺牲外，其余未有伤亡，敌方排长跳窗户跑了。我们未拿敌人其他用品，也未捉杀其他敌兵。参加暴动的突击队员拿的全是大刀、梭镖，只有任铁锋有一枝手枪，而这次战斗共缴获二十六枝步枪和装有子弹的子弹带，还有成箱的子弹、手榴弹。这在当时是收获最大且枪支最好的一次战斗，队员们欣喜若狂，凯旋而归。

突击队趁着浓浓的夜幕，撤出了甘棠镇，转移到离甘棠几十里的高山上，宣布成立游击队，队长任铁锋，政委陈洪妹。后来这支队伍很快被正式编为“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五支队”，队长是任铁锋，政委是叶飞。

甘棠之战，重创海军陆战队后，给南区的地主豪绅以很大的震慑。一般的地主豪绅见势再不敢向群众逼租要债了，但还是有一些势力较大的反动地主则组织民团“大刀会”，与游击队和“红带会”对抗。

游击队在“红带会”的配合下，专挑最反动、群众最痛恨的民团“大刀会”打。在队员们的英勇奋战下，不到二十天就歼灭了南区一带的十三个反动民团“大刀会”，开创了南区革命的新局面。

叶飞被刺，子弹从右脸进，左脸出，却没打烂舌头与牙齿，养伤时有鱼有肉有医治；庄毓麟病重，住在一个雇农家，吃的是稀饭白菜汤，且无医无药；“北詹”亲自安排叶飞养伤，对老庄却从不过问；叶飞让我送一些肉给老庄

甘棠暴动结束，突击队员上山后，我便抽空去找詹如柏，传达市委的指示，汇报南区的工作。

此时，詹如柏带着游击队避开敌人“围剿”北区的锋芒，在福安城南附近农村活动。见面后，我作了简要汇报，詹如柏相当高兴，似乎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他说，现在各地也都在学“红带会”，开展秋收抗租斗争，广大农民情绪高昂，信心十足。他还说，过些时候我们一起去找老任，把两支队伍合并起来。队伍交给老任统一指挥，我要着重抓一下中心县委的全面工作。他要我去寿宁巡视一下工作，帮助范铁民他们把游击根据地发展并巩固起来。另外，顺便去看望一下叶飞。

这时，我才知道叶飞负了伤，正在福寿交界的一个深山村里养伤。到了村子，又听说庄毓麟肺病严重，也在村里休养。

我先去看望了叶飞。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到赛岐附近的一个村对面的地下交通站——狮子头客栈接头。快中午时分，他正在楼上吃饭，突然上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他还以为是接头的同志。他刚侧身，那人已猛冲上来，抓住他的胸前围巾抬手就是一枪。他把头一偏，子弹从右脸颊进左脸颊出来，既没打掉牙齿也没打烂舌头，人却倒下了。

那便衣搜走了叶飞身上的笔记本、钢笔、手枪等物品，掉头就走。叶飞本能地抬起头来，站在楼梯上的另一个便衣见了大喊："他还没死！"开枪那一个又回过身来朝他开了几枪，其中一发子弹打中左胸肩胛，其余的都没击中。

此时楼下有人喊："快走，快走，游击队快来了！"两个便衣慌忙跑下楼梯，回去报功领赏去了。

叶飞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他再也不敢动弹。此时楼上楼下一片寂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料想敌人已经离去，挣扎着爬到楼梯口，再连爬带滚到楼下。只见楼里空无一人，老板和伙计都不见了。

当他爬到屋后不远的一块洼地时，便再也爬不动了，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狮子头村党支部的同志找到他把他抬回村里藏了起来。请来土医生紧急处理伤口，用狗肝敷在伤口上止血。然后借来行头和轿子，让他装扮成新娘，巧妙地瞒过了敌人的盘查，送到北区的一个山村里休养。

叶飞见我来看他，非常高兴。还请我吃了一碗鸭肉，说也让我增加点营养。

随后，我去看望了庄毓麟。一见到他吓了我一大跳，只见他有气无力地弯着腰，坐在一张凳子上。我喊他，他惊奇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很显然，他对我的到来感到意外，低声说："你来

了。”我看他脸色蜡黄，双眼死灰，没有一点神采。一身衣服脏得发臭，床上也臭烘烘的，床头地上洒了一堆草木灰，灰堆上吐满了浓痰。

“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吃药了没有？”我吃惊地问他。

“吃什么药？就是买来了药，也没法煎。”他有气无力地告诉我，“我住的这家是单身汉，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头。他家贫如洗，靠出外帮工度日。清早起来，煮半锅红薯加点大米的稀饭，再煮些清水白菜，连一点油星都没有。他吃完早饭出去帮工，天黑了才回来。剩下的就留在锅里给我吃。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如此，哪里还谈得上吃药。”

看到这般情景，听到这一席话，我不禁一阵心酸，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庄毓麟原是福州毓英女子中学的教员，很有才华，在学校里深受师生们的尊重。他是一个比较早入党的同志，一九三二年春因参与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一·二八”抗日运动而暴露了身份。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福州中心市委派他到闽东工作，化名章玉担任福安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他在我之前什么时间到福安的，我不太清楚。大约七月左右我在北区见过他。那时他身体虽清瘦，但精神很好，谈笑风生，和气可亲，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你知道叶飞也在这村子养伤吗？”我问他。

“听说过，我没有力气走过去看他。他那边有人关心，热热闹闹，我也不愿意去那边凑热闹。”

“没有人来看你吗？”

“很少来人。”他显得十分伤感。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叶飞如此关照？他既有人照顾，又有中西药品，虽然深山里买鱼买肉难，但他那里鸡鸭天天不断。而为什么对庄毓麟却如此亏待？我真是疑惑不解！

我回到叶飞住处，把老庄的恶劣境况告诉他，他也十分惊讶！叶飞说：

“这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也在这村里养病，但我还没出过大门，以为生活上我们的待遇是一样的。”

后来我了解到，叶飞的医疗和生活照顾是“北詹”亲自安排的，而庄毓麟的医疗、生活他却没有过问。

我同叶飞商量，老庄再这样呆下去，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还是想办法送他去治病吧。叶飞十分同意我的意见。

我在叶飞那里找了一些肉，买了一些鸡蛋和一只母鸡，请附近一家农民的媳妇帮助他做饭菜、煎药。为了避免传染，老庄还是住在老雇工那里。

恰好这时游击队在城南附近打了反动“大刀会”，缴获了一批战利品。我替老庄挑了几件细软长衫和礼帽鞋子等，交给老庄。问他去哪里医治为好，他说：

“我在福州不能立足，厦门又太远。从这到温州再到上海比较方便，我就去上海吧。那里医院多，医疗条件好，弄不好我这病还有希望。”

我将此事写信告诉詹如柏，他同意我的意见。我们筹集了五十多块大洋，选好了护送的交通员，一切安排妥当，我便启程去了寿宁。

后来，庄毓麟到上海治疗的情况如何，我们惦记着，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由土匪而投身革命的范铁民与一个年逾四十的富农寡妇姘居；为遮人耳目，寡妇将十四岁的女儿嫁给他；范铁民与地主豪绅和平共处

离开叶飞、老庄休养的村子后，我便直奔寿宁东区。

只走了一天的山路，便到了目的地。那里地形不错，大多数村子都是背靠山林，前面是较大片的稻田。那一带原来就是范铁民当土匪时的势力范围,后来他参加革命了,这里便成了小游击根据地。

村子里的革命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不像在福安南区仍处在秘密状况。那里的贫雇农与地主豪绅斗争不明显，群众斗争热情虽高，但秋收已过，发动贫雇农抗租已无必要。而且地主豪绅已不敢收捐要债，对贫雇农也暂时不敢公开行恶了。范铁民与地主富农实际上是搞和平共处，基本上还是土匪大王割据的形势。

寿宁的县委书记是叶秀蕃，他主要在寿宁城区和西区活动。他与施霖较相似，是旧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小学校长，善于做秘密工作，不善于打游击。詹如柏交代我到寿宁去帮助一下范铁民，因此我没有去找叶秀蕃。

范铁民，高高的个子，书生模样，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是个土匪小头目。他相当老练，不像一般青年那样幼稚；表面态度相当和气，比较豪爽热情，不像施霖那样沉静谨慎。

交谈中，范铁民比较坦诚地同我说到他的隐私。他的私生活相当腐化。年仅二十四五岁，竟然与一位四十多岁的富农寡妇姘居。为了避人耳目，寡妇把自己十四岁的女儿嫁给了他。他们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寡妇表面上是他的岳母，实际上是他的情妇。

根据我对寿宁东区形势的观察和了解，我有针对性地与范铁民交换了工作意见。我说到，共产党闹革命在农村首先要依靠贫雇中农，通过组织秘密农会、自卫队，发动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开展分粮、抗捐等。游击队要随时警惕敌人的“围剿”，为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反击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大刀会”的进攻，要广泛组织“红带会”，这是一种武装农民的形式，要积极领导和促进。

据我所知，寿宁东、西区的党组织和农会是比较有基础的。

一九二九年以后，一批早期党员就在这一带建立秘密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范浚在西区的贫下中农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叶秀蕃、詹如柏也常来检查巡视工作。而范铁民则不会做党的群众工作，经常不在游击队里生活。除了敌人进攻，平日里都生活在寡妇家中。他的那支游击队已不再是原来的土匪队伍，而是后来参加革命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组成的队伍。

这里我附带提一句，范式人回忆说："曾志同志到东区，发展范铁民入党，成立寿宁革命委员会。"（见《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第一期）我反复回忆，总想不起来我曾介绍范铁民入党的事情。我去寿宁时，范铁民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支队长了，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是共党"匪首"，而他本人也是以寿宁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自居。怎么还要我去介绍他入党呢？此事至今我还想不通。

我在寿宁只呆了七八天时间，范铁民陪着我，在东区的几个村走了一下，召开过东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贫雇农骨干分子会议，也和范铁民等领导谈过几次话。当时我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但是直到我离开，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

从寿宁东区回到福安北区，已是十一月。在北区的第一支队与在南区的第五支队已联合行动，发展到两百多人。这支队伍的活动范围，已不再是福安南北区了，而是纵横驰骋于宁德、霞浦、寿宁、福鼎等各县，威震闽东。

我顺路回到叶飞那里看望一下。听说庄毓麟已去了上海治病。此时，叶飞的枪伤已基本痊愈，只是身上长了几个鸡蛋大小的疖子，行走不方便。

我在北区呆了两三天，城里的敌人又来"清剿"。我们身边没有武装队伍，只好同农会自卫队一起撤到山上。敌人大约有一个正规连。进到村里，翻箱倒柜，大搜一通，可是一无所获。一气之下，朝着附近的山上胡乱地射击了一阵，便败兴地扬长而去

了。

那里的村庄早就坚壁清野，连牛都赶到深山坳里放养，山民们家徒四壁，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敌人进村，除了烧房子，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

北区地势险峻、山高林密，对面不见人，所以敌人来多了，老百姓也不害怕了。

那时，我和叶飞在山头上窥望，观察敌人的动向。敌人的子弹向我们所处的方向飞来，有时像哨子那样“呜呜”响，有时又听到“噗噗”的声音。叶飞那时接触战斗场面还不多，辨别不出子弹的方向和高低。他听到子弹“呜呜”从头上飞过，仍把脖子缩一下，而子弹“噗噗”地落在他脚附近，反而没有什么反应。可是经过多年的战争锻炼，他成了解放军上将。

可见是战争造就了伟大的人才。

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主张抗日反蒋，发动“闽变”；福安中心县委抓住机会创建闽东苏区，成立“闽东独立二团”，叶飞任政委，任铁锋任团长；我去西洋岛谈判收编海匪柯成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初，福安县城和赛岐镇的地下党送来情报，驻守福安的海军陆战队已调往三都澳，赛岐只余下一个连留守。

紧接着，传来准确消息，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发动事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反蒋。

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闽变”和国民党守敌的南撤所造成的防务空虚，对我们发动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红色区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福安中心县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闽变”发生，敌人大部撤退的有利时机，积极迅速创建闽东新苏区，把福安、寿宁、福鼎、霞浦、宁德五县连成一片。在福安与各毗邻县交界地区，建立县委和苏维埃政府。集中各县游击队成立红军，集中各地“红带会”成立红带总队，保卫红色政权和苏维埃区域。建立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

创建闽东新苏区的斗争烈火，首先在福安燃烧，很快就蔓延到闽东全区各地。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福安中心县委在闽东重镇赛岐举行暴动，游击队“红带会”三四千人，不费一枪一弹，威武地开进赛岐。开仓济贫三天，将几千担的粮食和食盐分给南区一带的贫苦农民，深受群众的拥护。

接着，中心县委将各县游击队集中于霞浦的西圣山，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二团”，团长任铁锋，政委叶飞。下设三个连，共三百多人。

独立团成立后，在各地“红带会”的配合下，围攻霞浦县城。但由于独立团刚刚成立，勇敢有余，战斗无术，“红带会”使用的都是冷兵器，霞浦守敌凭借又高又厚的城墙，死命抵抗，因此红军未能攻入城内。但红军浩浩荡荡攻城的声势，威震闽东，鼓舞了闽东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也使地主豪绅困守城镇，相当一段时间坐卧不安，不敢胡作非为。

福安中心县委还在柏柱洋狮峰寺成立了“闽东红带总队”，统一调动全区各地的“红带会”。那时“红带会”已在全区得到普及，有数万之众，那真是“螺号震天响，红带处处飘”。“红带会”成为闽东工农武装的坚强一翼，在保卫和巩固苏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此时，以福安为中心的福寿、安德、福霞、安福、霞鼎等各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紧接着各区、

乡、村各级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闽东各地星罗棋布。

福安中心县委适时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由马立峰负责，统一领导闽东苏区的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闽东全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呈现一派如火如荼的局面。

我认为，闽东新苏区的创建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不仅在城镇而且在农村建立了党的组织，特别在农村，党先后派邓子恢、蔡协民、陶铸等到闽东指导工作，发动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五抗”斗争和游击武装斗争。尽管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但群众的反抗情绪仍然十分高昂。而且福安有一支小游击队，在北区建立了一小片游击根据地。

其二，利用“法兵”——“红带会”这一封建的民间武装组织形式，实现了广大贫苦农民武装自卫的要求，增强了斗争的实力和勇气，真正走了群众路线。不仅在有党团组织和秘密农会的乡村普遍建立了“红带会”，而且以“红带会”的组织形式，去没有党团组织和农会组织的乡村开展工作，因此使得“红带会”在闽东各县普遍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闽东各县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在发展、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有着卓越的贡献。

其三，紧紧抓住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敌人南撤防务空虚的大好时机，迅速地把几支游击队集中起来，建立闽东红军，并且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不顾疲劳，连续作战，迅速歼灭各地的反革命武装。同时，配合“红带会”歼灭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

正是以上三个特点，使闽东北五县在短暂的一两个月内，便建立了以福安为中心的纵横五百里，基本上连成一片的红色苏维埃区域。

在距霞浦县城五六十海里的海面上，有一个西洋岛，岛上盘踞着一股海匪。首领柯成贵，原是福州一所中学的学生，后来柯姓家族与另一派豪绅发生纠纷引发械斗，死伤了人命。对方欲打击报复，国民党政府也通缉他，他不得已逃到西洋岛上当了海匪。

西洋岛是浙江温州去福建福州及闽东各县去上海之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处。柯成贵收罗一伙人专门在海上袭击过往船只，抢劫财物，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有一百多人。

国民党当局曾几次派兵"清剿"，都因各种原因不能得逞。后来他听说，共产党在闽东发动革命，与国民党对着干，苏维埃政权的为民政策主张及工农游击队作战英勇精神，他非常敬佩。

柯成贵通过他的同窗、福安中心县委工作人员陈亮，与我们取得联系，并表达了希望同工农游击队合作，接受收编，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意愿。

福安中心县委考虑到，柯成贵出身学生，不是惯匪；他的队伍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和渔民；他们主要是劫富济贫，与国民党军队势不两立，这样的队伍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愿意接受收编的主要目的是国民党军队进攻时，他们可退到我们的陆地苏区，依靠我们求得生存。而我们与柯成贵的队伍搞统一战线，也不是没有好处。我们可以利用该岛作为对国民党斗争的海上前哨，利用该岛四通八达的有利条件,作为加强渔民工作的海上基地,还可作为购买医疗用品、枪支弹药等战略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中转站。

为此中心县委决定，由陈亮陪同我，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的名义到西洋岛，与柯成贵谈判并收编。

陈亮是个小个子，但他意志坚定且很有胆量，西洋岛这个地方，一般的人还不敢去。他虽不信佛，但生来吃素不吃荤。在途中我曾用猪油凉拌紫菜让他试过，他一入口便敏感地吐掉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同志，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被错杀了。

那是一九三四年初的一天，我们乘坐一只渔船前往西洋岛。小船在大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时分，远处一个孤岛隐隐约约在海面上出现，陈亮指着前方对我说：

“那就是西洋岛。”

船终于靠上了海滩，岸上已经有几十个人守候在那里，为首的是一位三十来岁英俊威武的男子。陈亮告诉我，他就是闽东沿海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柯成贵司令。只见他首先大步迎上来，热情地与我和陈亮握手，我没想到他的举止如此得体，言谈也不俗。此时军号哒哒，鞭炮齐鸣，约有三十名队员举枪列队，夹道迎接我们进入驻地。

晚上，柯成贵设四桌酒宴，隆重款待我们。酒宴结束后，请我们去祠堂看大戏。有意思的是，戏台上居然打出了“曾县委加冠”字样的牌子，接着又打出了“陈县委加冠”字样的牌子。按旧风俗，打谁的加冠，谁就得给赏钱。我们事先没准备，弄得措手不及，只好临时找了张红纸，各给了两块现大洋的红包。

第二天，我们与柯成贵及他的参谋长、副司令举行了会谈。柯成贵自称司令，他手下的副职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

柯成贵说：“我们干这一行是迫不得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国民党政府军队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因此我们与他们水火不容。这一点请曾县委相信！”

他们的宗旨是劫富济贫，不是一切过往船只都打劫，而是专挑那些渔霸、大商人和国民党的运输船。得到的东西，大部分作军饷，一部分救济本镇和附近渔村的穷人，有时还送一些给船上的苦役船工。这支队伍的经济来源，除主要靠打劫海上船只财物外，还靠抽取镇上大烟馆、酒馆、赌馆收入和商业税收。

他相当真诚地说：“我们知道共产党为中国的工农谋幸福，求解放，没收地主豪绅土地，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十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决心跟你们共产

党走，这也是我们的惟一出路。”

我对他的表态和行动表示赞赏，并提出几点希望：一是希望他们把西洋岛的革命斗争发动起来，教育官兵不要侵犯贫苦渔民利益，支持他们开展反霸斗争。二是希望整顿队伍，进行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游击战术学习和文化学习，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必要时，我们可派同志来西洋岛，帮助你们开展工作。三是希望队伍在购买医药物品、枪支弹药方面为苏维埃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如果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可深入我苏维埃区域，如果他们给养上有困难，苏维埃政权将鼎力相助。至于部队番号和职务，待福安中心县委研究后再授予和任命。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柯成贵满口同意。下午他们还热情地带我出去视察了西洋岛街道和附近渔村。

西洋岛有一条石板小街，几十家商店。周围都是渔村，附近还有两三个小岛，也都是渔村。几个大小岛屿合起来不足三十华里，人口一千多人。

我们还乘船登上了两三海里外的另一小岛。站在岛上极目眺望，一片汪洋，波浪汹涌，使我这个旱鸭子望而生畏。但正是在这一片海域上，柯成贵等人神出鬼没，纵横驰骋，使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我回来后不久，福安中心县委便决定将柯成贵部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柯成贵任营长。

后来我听说，柯成贵是个好样的。他没有食言，带领这支队伍在截击敌人海上交通、筹集财政款项、购买武器和药物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重兵“围剿”闽东连罗苏区时，一批红军西南团的指战员和地方党的干部撤退到西洋岛。

为了保护大批党的骨干，柯成贵率队与进犯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英勇牺牲，结束了他从海匪到红军指挥员的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由我主持的闽东土改，吸取了中央苏区土改的经验教训，采取“抽多补少”与“抽肥补瘦”同时进行，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同等对待，使农民对土改的热情很高

三四天后，我带着柯成贵送的半袋西洋岛特产——紫菜，乘原船回到了福安。

途中听说赛岐镇已被我军占领，便乘船直奔赛岐镇。此时游击队、赤卫队已在镇上驻扎五六日之久。当夜，我便住在赛岐。

第二天上午七时许，只听到一阵紧密的枪声传来，接着传来消息说，国民党部队已经占领了附近的山头。毫无思想准备的我，随着撤退的队伍，慌乱中撤出了赛岐。到了很远的地方才想起，从西洋岛带回的那半袋紫菜和新买回来的油印机都丢了。

据说敌人是沿着溪边山路，从县城连夜急行军五六十华里，偷袭赛岐的。也由于几个月来，我们屡战屡胜，形势大好，因此对敌人的反攻产生了麻痹大意。幸好我们没有伤亡，只是撤退时够狼狈的了。

山头被敌人占领后，我们便沿着山边的水田埂向南跑。田埂仅六七寸宽，我一不小心，脚底一滑，便摔倒在下丘的田里。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但全身已沾满泥浆。这是我行军打仗中第一次这么难堪，因此记忆尤深。

撤出赛岐后，我和福安中心县委的几个领导同志都回到了柏柱洋，在甲厝召开了中心县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土改、建政、扩大武装等工作。“闽变”发生后，十九路军释放政治犯，马立峰、范式人等被释放回闽东。马立峰加入了中心县委，因此，中心县委根据斗争需要作了新的分工。马立峰分工抓政权工作，主要筹备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等事宜；叶飞任红军独立团政委，主要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和地方武装斗争等；任铁锋任红军独

立团团长；詹如柏仍代理中心县委书记，主要抓地方组织建设和群众运动。以前詹如柏着重抓武装斗争,大家认为他是书记,应着重管全面，部队由叶、任两位同志负责为好。我的主要任务是抓分田运动和建立以福安北区为中心的福安、寿宁、霞浦、福鼎四县接连在一起的山区后方根据地。

在中心县委会议上，马立峰提出，我们几个同志来个比赛，看谁先做出成绩，大家都表示赞同。但没有正式的比赛规则，只是半开玩笑说的。不过我可是认真地响应了。

会后，我开始了在上南区柏柱洋一带举行分田的试点工作。要搞土改，首先是要拟订政策和实施方案。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时我参加过分田，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我在闽西搞过土改，而中心县委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因此只好由我来草拟《分田纲要》。好在那时年轻、记忆力好，闽西土改的土地法大纲，基本上能回忆得起来。

其次是培训土改干部，我们在柏柱洋地区，从福寿、福霞交界地区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农村中抽调了一批骨干，集中培训，学习《分田纲要》的基本内容，学习怎样划分阶级，从自己村里选择真人真事进行划分、讨论和确定；然后是学习怎样丈量土地和分配土地，怎样处理债务和田契等等。

培训的时间不长，一般只需要个把星期。培训结束后，我们便在柏柱洋地区开展了分田试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分田试验取得成功。

为了推广柏柱洋分田经验，中心县委在柏柱洋召开了庆祝分田胜利大会，各县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来学习和取经。

当夜，柏柱洋地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持灯游行，数千名翻身解放并获得土地的农民手持火把、灯笼、红旗，敲锣打鼓，走村串寨，犹如一条长长的火龙在夜幕中游动……

各县区代表经过实地观摩学习回到当地后，立即逐级召开

区、乡、村苏维埃主席和土地委员会议，部署分田工作，举办培训班。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也抽调一批参加柏柱洋分田试点的上南区干部，分赴各地指导分田工作。

从三四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土改分田运动，以柏柱洋为中心梅花形波浪式地向外推进，迅速在闽东苏区全面铺开。

闽东苏区的土改分田运动，吸收并借鉴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避免了一些错误，少走了不少弯路。如闽西开始是抽多补少，结果肥瘦不均；闽东苏区则是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同时进行，尽可能少做变动，照顾农民的耕作习惯。

闽东苏区的土改分田不是靠工作队由上而下进行，而是由各村的苏维埃组织贫雇农群众进行。因此土改进度较快，划阶级、分田地都比较准确，假土改、夹生饭很少出现，贫苦农民很快都得到了土改分田的胜利果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根据闽东是畲族聚居区、畲民长期遭受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实际，在制定《分田纲要》时，强调畲汉民族同等对待，按人口分配土地。吃苦耐劳的畲族妇女与男劳力同等对待，也分得了应有的份额。此举深受广大畲族同胞的拥护，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巨大热情。

我虽说着重主持土改分田工作，但却没有费多大的精力。由于各级苏区政府重视这项工作，广大农民对土改分田热情很高，再加上有《分田纲要》和柏柱洋分田试点经验，因此这项工作很快就全面铺开。闽东各县凡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村庄，都开展了土改分田工作。

就像当年的闽西苏区，此时的闽东苏区同样呈现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陶铸来信，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平息了他已叛变的谣传；我从没收的财物中领出二十元钱，进县城冒险寄

给陶铸；收到钱的陶铸买了鱼肝油，使病情得到好转

三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通过福州何老太太转来的信，估计是张铁托人带到福安的。因为张铁常去看望那位何老太太，何家是我与外界联系的通讯处。

信中写道：我已被判刑，刑期你可以想像得到，没有出去的可能了。请求善待母亲，替我尽份孝道。并说在狱中病重，若回信请寄南京军人监狱一二七一号。

在陶铸被捕拘留期间，曾托被释放的难友，悄悄带出一张巴掌大的破纸片，上面写道：

“病重住院，恐无生还希望。”

此后，便再也没有他丝毫音讯。尽管我也不相信陶铸被捕叛变的传说，但事实上我已受到牵连，这使我时时感到压抑苦闷。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遥望星空，常常勾起我对陶铸的无限思念。我不相信那些谣言，我盼望着有关陶铸的确切消息。没想到一年后，我总算收到了他的来信。

很显然，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值得庆幸的是，他毕竟活了下来。我将信交给叶飞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判处无期，就说明陶铸没有叛变。我问叶飞，陶铸病重，可否寄一点钱给他，他表示同意。我记得，在闽东工作两年来，除了这次经叶飞批准，从没收的财物中领出二十元钱寄给陶铸外，我自己没有私自动用过一个铜板。

这时，我正好要去一趟寿宁，还要到福安县城与地下党接头。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

这可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悬赏的赏金是三千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想到以往与陶铸的恩爱，想到陶铸此时正在铁窗下煎熬，我就下决心去冒这个险了！

我由交通员带着混进了县城，接头的地点是“蔡元记”百货店，老板郭文焕就是我要接头的人，他是县城地下党的负责同志。我站在柜台外面装作选购书籍，我一边翻书，一边与郭文焕谈话。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离开了书店。

我请交通员告诉我邮局地址，叫他先到城门外等候，我自己一个人走进邮局。我不动声色地填了汇款单，交上二十元钱。邮局的职员接过我填写的汇单后，惊奇地看着我。

我从容不迫地转身走出邮局，拐了几个弯与等候在城门外的交通员会合后，疾步向社口方向奔去。第二天就抵达寿宁。

后来，听城里的地下党说，那天我刚走不久，城里突然戒严，城门四闭。警察特务四处盘查，说一个女共产党进城了。

数年后，陶铸获释出狱后告诉我，从福安寄出的钱和信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正患肺病，咯血不止，我寄去的钱真是雪中送炭。他买了几瓶鱼肝油，使病情得到好转。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把监牢当学堂，勤读了几年书。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将他营救出狱。所以那次冒险还是值得的！

到了寿宁，整个形势与第一次去时大不一样，尤其是寿宁东区与福安北区已连成一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很快改为苏维埃政府。斗争已经公开化，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游击队、“红带会”四处开展活动。此时范铁民的腰伤一直未好，游击队的工作就由赖金彪负责。

赖金彪是个外来干部，闽西人，原来在罗炳辉、谭震林的红十二军军部当传令兵，毕业于中央红军“彭杨军校”第二期，后被送往苏联学习。抵上海后因交通中断，折回福州。一九三三年五月，福州中心市委派他到闽东，詹如柏转派他到寿宁帮助范铁民工作。他先后担任闽东红十六连连长、独立团团长、独立师副师长。听说在一九三五年春的突围战斗中，为掩护部队转移殿后阻击敌人，最后英勇牺牲。

我在寿宁东区各地跑了一趟，向范铁民了解了寿宁的斗争情况。特别是我在各地听到不少贫雇农骨干称赞范浚，要求调他回寿宁工作。就连范铁民也说，他与范浚没什么大的矛盾。当时寿宁所有的同志都不知道范浚已被杀害，还以为是去了中央苏区。

回到福安后，我将去寿宁了解到有关范浚的情况告诉了叶飞。我们都认为，“北詹”之所以杀掉范浚，完全是为扶持自己的势力而不惜杀人的土匪意识作怪，认为范浚与范铁民水火不相容，完全是他的猜疑。

这种人真是可怕！

“大刀会”侵入苏区烧杀抢掠，中心县委决定打击他们的气焰；“白鹤会”控制着周围几十坛“大刀会”；红军两攻西家宅，消灭“五虎”兄弟

闽东苏区的迅速形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和地主豪绅的恐慌。在根据地边缘的地主豪绅也大量建立民团“大刀会”，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侵入根据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由于国民党部队南撤，当时对苏区构成威胁最大的还是反动民团“大刀会”。

为此中心县委决定，红军、游击队以及“红带会”集中力量，互相配合，有计划地歼灭地主反动民团“大刀会”，打下他们的反革命器张气焰。

在福安东区与霞浦西北山区之间，有个西家宅村。该村“大刀会”的名称叫“白鹤会”，其头目是三兄弟，加上两个堂兄弟，人称“五虎”。他们全是二十来岁的壮汉，异常凶猛残忍，终年习武，横行乡里。经常袭击我苏区，胡作非为，群众十分痛恨。他们还控制着周围几十坛“大刀会”，誓与共产党为敌。

据了解，西家宅“白鹤会”使用的是带有铁钩的梭镖，它扎进人体可将肠子和肌肉都钩出来。针对这一点，我们制作了一种

土武器对付它。我们砍了许多竹子，比梭镖长三分之一，竹子的枝杈保留七八寸，在火中烘热后放入尿中浸泡以增强硬度。打仗时，一根竹杈和一把梭镖或一支长枪配对。待敌人冲过来时，先用竹杈把敌人刺过来的梭镖叉住，接着我方梭镖立即扎向敌人，或用枪把敌人打倒。

但是，我们只研究了打法，而忽略和轻视了敌人的实力，没有作深入的调查，只派出六七十人攻打西家宅。

我们下午五点出发，到达西家宅并包围“大刀会”驻地时已快五点。开始攻击时，敌人紧闭大门龟缩在祠堂里按兵不动。我跟着部分队伍守在祠堂后门，正在观看一个队员爬墙上了屋顶，准备向屋里扔土手榴弹。

突然发现，另一股“大刀会”急速向祠堂杀来，我们慌忙往后撤退。这时祠堂后门大开，屋内的“白鹤会”会徒大声喊叫着直向我们冲杀过来。

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我了，梭镖离我不到两米，我心想这下可完了，非死在这里不可。正在这时，一个人从我身后窜过来，拖着我拼命往前跑，我一看原来是赖金彪。追赶的刀匪大喊：“抓住他们！”赖金彪赶快扔去一枚土手榴弹，刀匪见到甩过去的手榴弹都赶快趴在地上。可偏偏这是一枚哑弹，刀匪见没有爆炸，又疯狂地追了上来。

这时，我们已赢得了时间，跑到山脚下。我们布置在山腰的接应队伍，开枪向刀匪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余的才渐渐退了回去。

回到山上，总结这次战斗，大家都认为这次受挫主要是轻敌。尽管没有伤亡，但影响不佳，“白鹤会”的气焰更加嚣张。简直是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大家窝着一肚子火，决心非歼灭这“五虎”不可！

第二次，我们调来了红十六连，加上东区“红带会”，共计

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向西家宅杀去。这次，我们改变了战术，先是让少数“红带会”队员去挑战诱敌出巢，假装失败。当将“大刀会”会徒诱至开阔地后，主力队伍再围而歼之。这次我呆在半山腰观战。

“白鹤会”根本没把“红带会”放在眼里，我军先头队伍冲向村子，他们就迎了出来。个个张牙舞爪，大喊大叫，在第二线的红军立即扑上前去，首先是竹杈迎战，叉住梭镖，接着是梭镖队杀向刀匪，一下子就刺倒了好几个。刀匪退却，红军战士瞄准刀匪放枪，又打倒了一批。

“五虎”兄弟急红了眼，挥舞大刀率队再次冲杀过来。赖金标下令集中火力，射杀冲在前面的“白鹤会”头目。结果，猖獗多时的“五虎”兄弟，一个个都被红军战士当场击毙。其余的刀匪见“五虎”已死，便如鸟兽散，全部落荒而逃。

歼灭了远近闻名的西家宅“大刀会”后，邻近各坛“大刀会”早已对红军闻风丧胆。有的“大刀会”坛自动解散，有的贫苦农民退出“大刀会”，只有顽固不化的少数“大刀会”继续与红军为敌，但最终同样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由于消灭了一大批根据地外沿骚扰苏区甚至深入苏区内兴风作浪的地主反动民团“大刀会”，闽东苏区的形势趋于稳定，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陶铸恢复自由遥遥无期，二十三岁的我随时准备牺牲，早将“三从四德”抛到九霄云外；特委召开重要会议，批评我“与任铁锋、叶飞关系密切”，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叶飞从此不与我个别交谈；会议决定让我去敌人“围剿”的重点地区福霞兼任县委书记

一九三四年四月初，由于宁德县委书记叶国珍在福州被捕叛

变，福建临时省委代理书记陈之枢等被捕叛变，临时省委和福州等地的党组织也随之遭到严重破坏。

闽东党组织和连江罗源的党组织同上级都失去了联系，与上海党中央也联系不上。为此我们福安中心县委和连罗县委在柏柱洋召开了联席会议。

双方都认为，与上级失去联系后，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合作与协调。因此决定将福安中心县委和连罗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

经过协商和选举，书记为苏达，因为他是工人出身，原是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是派往连罗的特派员。当时党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党委书记一定要由工人或贫雇农担任。组织部部长决定由我担任（后由阮英平接任），宣传部部长由叶飞兼任。

大家一致认为，闽东已初步形成五县基本连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今后要加强建立闽东与连罗的海上联系网，与闽东各县连成一气。要加强沿海渔村的组织工作，多建立几支海上游击队，建立海上游击区和海上游击根据地。今后要做到敌人从海上过来，我们向山区活动；敌人进攻山区，我们能在海上游击。通过连江游击队设法与福清、莆田一带游击队取得联系；同时通过山区一方面向政和、南平发展，一方面向浙江的平阳一带发展，与平阳游击队取得联系，互相配合。

特委机关就设在柏柱洋斗面村的一座大地主的房子里。

临时特委成立后，福安中心县委便自行消亡，特委先后下辖福寿、福霞、安德、安福、福鼎、霞鼎、宁德、寿宁、连罗九个县委和福安城关特支。

紧接着，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柱洋胜利召开，来自全区各地的四百多名各界代表满怀喜悦和豪迈欢聚一堂。会上正式宣布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副主席叶秀蕃，秘书长张少廉。

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当时已经成立的福霞、福寿、安德、安福、连江和不久后成立的罗源、周墩、霞鼎等九个县苏维埃和四十多个区苏维埃。

闽东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闽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胜利结晶，是无数像江平、成全，也包括范浚，以及许多不知名的英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闽东苏维埃政府机关也同样设在柏柱洋斗面村的另一个逃亡大地主的一座房子里。

斗面村村子虽小，但由于地处柏柱洋的中心，因此成为闽东革命的指挥中枢。闽东红军独立二团在那里设立了后方团部，共青团闽东特委和闽东妇女工作团机关也设在斗面村。

自从到了福安，我好像一只拧紧发条的钟，东奔西跑，时刻不停地工作着。没有休息，睡眠很少，生活也很清贫。这种紧张而疲劳的斗争生活，一年下来，我终于病倒了。在闽南漳州地区工作时的疟疾病又复发了，也很可能是在寿宁工作那段时间感染上的。

疟疾发作起来，真是难受。开始是发冷，夏天盖棉被还会冷得你牙齿相撞、全身颤抖，一会儿发起高烧来，可达四十度左右，烧得你晕乎乎的，隔天发作一次。当时除了金鸡纳霜丸，没有其他特效药。而这种药是进口的，在农村很难买到。

闽东特委成立约两个月时，我的疟疾病很重，高烧不止。有时突然一股热气从脚板心冒出，接着全身发抖，牙关紧咬，把嘴唇都咬破了。双眼突鼓，整个身体抽搐一团，但意识尚存，只是说不成话了。

同志们见状，都很恐慌，一时又找不到医生。正在束手无策时，房东镇静地找来麻油，用麻油把艾叶和姜头炸热。然后用炸热的麻油在我身上使劲揉擦，捂上棉被，两个小时左右抽搐才算

缓解。

当时，特委正在召开重要会议，我因病，没法出席。是后来任铁锋个别告诉我会议的情况。

会上，大家批评任铁锋在军事指挥上缺乏全盘计划，单凭个人勇敢，带队独自行动；不遵守组织纪律，不尊重叶飞、詹如柏、马立峰等特委领导同志，只听曾志一人的。詹如柏批评说：“我们的话，任铁锋根本不理，要经过曾志去说才行，这种关系很不正常。”

马立峰说：“曾志同时与任铁锋、叶飞关系密切，在干部群众中造成坏影响。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你们都是特委的负责同志，都要检讨。曾志应负主要责任，不但要批评，还应该处分……”

马立峰虽然讲了这些话，但我知道在背后起实际推动作用的是詹如柏。

批判会后，对会议的内容，特委没有一位领导同志正式找我谈话，是任铁锋事后个别告诉我的，叶飞则从此不再与我个别交谈了。

这次会议并没有给我任何处分，而是决定调我去兼任福霞县委书记。当时福霞地区是敌人进攻“围剿”的重点地区，那里的形势相当严峻。那时我正重病在身，这个任命其实意味着处分，甚至可以说是严厉的惩罚。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

任铁锋与我一起从福州到福安南区，我们同施霖等人一道领导南区秋收抗租斗争，发动甘棠暴动，配合得很好。后来又在一起打过几次仗，我们意见都较一致。在工作实践中，他信任我、尊重我，所以我们的工作关系是好的。但我对他个人并无好感，

因为他有些粗暴。别的同志有时气得同他吵架，而我着重个别谈话,给予批评,不伤他的面子。

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但对他也有顾虑，他个性倔强，尤其是对女同志有一种大男子气。

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这也是正常的事。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二十三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

我心想，管它呢！批评就批评吧，今后再不理睬这种事了，一心努力做好工作。

我担任县委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敌人每次“围剿”都没有收获；任铁锋被人抬来治病；阮英平送来了“处分决定”：曾志在恋爱问题上极不严肃，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团结，是企图把党权、军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阴谋手段，于是我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

疟疾刚愈，我就到福安霞浦交界的山区，担任福霞县委书记。

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对付敌人的进攻。在深山密林里，家家搭山寮草棚，把粮食、衣服、日用品都搬到山中，牲畜也在深山里饲养。敌人来了，挑个行李全家跑上深山；敌人一走，再返回村里。敌人多次进攻“围剿”都捞不到什么好处。

不久，任铁锋的脚得了一种叫什么脚鹤风的病，膝关节肿得

很大，完全不能行走，而且像疟疾那样发冷发热。他离开部队，被用担架抬着到福霞根据地来医治。我打心底里不愿他来，但他病得那么重，到福霞地区的红军后方医疗所来治疗，我当然不能拒绝，而且还要尽力帮助他治好病。

开始用了很多药，连吃带熏，又洗又敷，都没什么效果。后来一个懂草药的当地老医生，拿来几片两尺多长像大蒜叶那样叫胡蒜的绿色叶子，放在火上烤成半熟，趁热缠在任铁锋的膝盖上。一天换两次，只敷了几天，膝关节红肿便消失了，疼痛也好多了。不到一个月基本上就好了，真是奇迹！

九月的一天，特委委员阮英平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喜出望外。他原来是南区的干部，一九三三年南区秋收暴动攻打海军陆战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彼此十分熟悉。他是南区农民干部中最优秀的，因此特委成立时，被选为特委委员。但是没有想到，他给我带来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送来一份对我的处分决定。

所谓决定，不过是写在一张无人签名、更无盖章的旧纸上。决定的内容已记不完全，大意是：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她这样做，是企图使党权、军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阴谋手段，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特委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四个月处分，调寿宁县做群众工作。

这真是太荒诞了！

我问阮英平究竟是怎么回事。阮英平说，是代理书记召开会议决定的，决定内容大半是他的意见。会上马立峰首先发言，对你提出批评，我们不了解情况，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同意什么。决定是代理书记亲自写的，要我专程来福霞，向你宣布。

“这个处分决定其他负责同志看过吗？”我追问阮英平。

“不知道，‘北詹’说对你的处分一个月前就决定了。因为国民党部队‘围剿’福霞山区，‘北詹’等人说，待你在福霞领导粉碎了敌人‘围剿’后，再宣布，所以才拖到现在。”

我感到又气又滑稽。没想到，代理书记过去对待施霖、对待范浚的那一套阴谋把戏，现在又落到我的头上了。

既然撤销了我的职务，给我留党察看处分，又要我去领导群众打退敌人的“围剿”，这是什么组织原则？

我同时与两个同志要好，怎么能扯到是我耍阴谋手段，为了操纵党权军权呢？叶飞、任铁锋在军队任职，我能操纵他们吗？他们会让我操纵吗？他自己是代理特委书记，党权在他自己手里，说我操纵党权不是很可笑吗？而正是因为他操纵党权，才为所欲为，不顾事实给我党纪处分。

代理书记为什么要借题对我进行打击呢？我分析是，“闽变”以后，闽东苏区的形势迅猛发展，我们几个同志都各奔东西，独立工作，集体开会较少，互相沟通不够。我与叶飞、任铁锋较常碰面，我们三人商量事情较多。而我们与代理书记单独碰面多，集体交谈少。他可能认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权都是我们三人掌握，他有种失落感。

对代理书记以往的一些阴险行为，我们是有所耳闻和戒备的。叶飞第一次到福安，代理书记看不起他，排挤他，包括令人生疑的“狮子头客栈事件”。我和叶飞的确议论过，认为代理书记不宜多管军队，认为他惯用亲信、打击别人的思想行为十分危险。代理书记也可能感到我们对他不信任而耿耿于怀。

于是，代理书记便借我的恋爱问题，对我施加打击报复，目标当然不止我一人，而是“一石三鸟”。而且偏偏是派我去敌人重点“围剿”的寿宁红白交界的地区工作，其用意已是昭然若揭了。

当时的寿宁是什么形势呢？自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庆元

被打败后，国民党当局几乎把尾追先遣队的大部兵力，都掉过头来进攻闽东苏区。寿宁与浙江交界,首当其冲。大部分苏区都被敌人占领，敌人烧杀劫抢，大肆“清剿”。苏维埃政权基本上转入地下，地方武装早就集中加入了闽东独立师，党团员、“红带会”和农会骨干都进入深山密林。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调我这个正在病中的外省人去工作，岂不是借刀杀人。

去就去吧！共产党员不怕死，虽然这种冤屈的死不值得，但我决不去乞求。

我把福霞县委的工作移交给阮英平，独自一人拖着还未痊愈的沉重病体，返回柏柱洋特委所在地。从福霞山区到柏柱洋行程二十几里，有十几里的下坡路。身体虚弱加上精神上难以承受的打击，我一路走，一路跌，跌倒了爬起来再走。从吃完早饭出发，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到达柏柱洋。

在斗面村特委机关，我见到了代理书记。他坐在凳子上像个泥菩萨，一动不动，板着一副面孔，只说了一句：

“你回来了。”

“我正在生病，要休息几天才能去。而且这里到寿宁几百里路，上上下下都是羊肠小道，我病成这样自己走去有困难，能不能请人抬我一段?”

“抬着你走影响不好。你先休息两天，我派一个人送你，给你几块钱，病发作时，就地住两天再走。”“北詹”说完之后就走掉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人影。

我整个身子好似掉进冰窟窿里，他往常的面孔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

“发配”寿宁，同志们抬着我在山里转来转去，我给特委写了一封信；叶飞提出：曾志重病在身，把她调回来养病吧；叶飞与我单独谈话，我放声地大哭了一场

四天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虚弱身体，在交通员的陪同下前往寿宁。

正如我所预料的，途中我休克了两次。久病成半医的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曾告诉送我的交通员，万一我不醒人事时，应该怎么办。所以两次休克都抢救过来了。

送我的交通员和当地干部见状，无论如何要抬着送我。但是到了福安、寿宁、赤白交界地区，大白天就是好人也过不去，别说抬着走。因为敌人出没无常，随时可能碰上敌人，而且村庄里也找不着人，只能翻山越岭到深山里去寻找。

此时，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竭尽全力，随着交通员在深山里爬走。幸好，我去过两次寿宁，接触那里的党政同志和农会骨干比较多，他们中不少人都认得我。

几天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当地党政负责同志。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尤其看我抱病上山找他们，更是感动，对我非常体贴照顾。受到代理书记冷遇的我，此时更加感到基层同志们的热情与温暖。

而我除了在精神上能给他们以鼓励外，更多的是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那一带也不安全，敌人经常来搜山，他们知道我们隐藏在山头的人没有多少武器，因此一个班的武装也敢上山搜索。为了防避敌人，同志们不是背着我，便是抬着我，在深山里转来转去，我什么也干不了。

半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无法与叶秀蕃取得联系，我在东区，叶秀蕃在西区，东、西两区早已断了联系。叶秀蕃善于做秘密工作，据说他隐藏到浙南方面去了。

于是，我给特委写了一份报告，将寿宁的斗争形势、我的病情以及干部群众对我的关心照顾情况向特委作了汇报。我写这份报告并没有想回特委的意思，我知道自己是被发配来的，幻想回去？那才是做梦！

据说，叶飞看到了这封信。他在特委会上提出，寿宁形势如此恶劣，曾志重病在身，在那里也做不了什么工作，反而增加那里的负担，把她调回来治病吧。于是，特委派交通员去寿宁把我接回特委。这次我去寿宁呆了不到一个月，算是第三次去寿宁。（我看了叶飞的回忆文章，说是他决定派我去寿宁担任县委书记的，他记错了。其实是“北詹”把我发配到寿宁去做群众工作的，因为我已留党察看，是不能担任党内职务的。倒是他在特委会上提出要我离开寿宁回特委的。）

回到特委机关，我见到了叶飞。他单独同我谈了一次话，以领导人的身份，批评我对任铁锋的迁就。他说，大家对任铁锋都有意见，而你在一些会上从未严正其辞地批评过他。使有些同志感到，在任铁锋的心目中，只有你没有同志们，没有组织纪律。在这个问题上，应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然后，他真诚地安慰我说：“现在不要多想了，仍然回福霞地区去，那里比较安全，医疗条件也好些，你就安心治病不要工作了。”

听到这番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放声大哭了一场。自从受到批评和处分以来，我是第一次痛哭，我要让满腹的泪水把我的委屈、痛苦和愤怒冲洗一尽！

然而泪水只能洗去一时的痛苦，而那荒诞的处分决定，在我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却一直像梦魇一般纠缠着我，给我在政治上带来莫大的灾难。我不能在回忆中抹去这段痛苦冤屈的往事，也同样不能在向党组织交代革命经历时将这次处分隐瞒不报。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重要事件。

直到二十年后，在一九五四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再次见到叶飞。我们回忆起当年在闽东苏区共同斗争的那段难忘的往事。叶飞说，那次特委对你的处分是完全错误的，

什么企图以此掌握党权军权是代理书记莫须有的捏造。“他这人就是好玩手腕、耍阴谋。不过他最后为革命壮烈牺牲了，作为幸存者，我们就不必再与他计较了。”他接着说：“至于那个错误的处分决定是应该撤销的！”

叶飞当即找来了邮电部党组书记、曾经也是闽东特委委员的范式人，向他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叶飞郑重其事地说：“闽东苏区健在的负责人就只有我们两人了，我们代表当时的闽东特委，正式宣布，对你的错误处分给予撤销，以后登记表上就不用写这个处分了。”

我总算从噩梦中醒来，这困扰我多年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澄清解决。对于代理书记的所作所为，我是有意见的！不过他虽有很多的缺点，但仍不失为一位坚定的革命战士。他最后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的精神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仍然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

我随叶飞在福霞养病，任铁锋率领海上挺进队打游击；挺进队拦截了一艘轮船，没收了一些药品，任铁锋送我一小盒西洋参；我一次就炖了半盒吃下去，不想旧病未除添新病；畲家嫂子蓝金妹救我一命

回到柏柱洋特委机关一星期后，叶飞对我说：“我明天有事去福霞岗面，你同我一道去那里养病吧。”

当时福霞地区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红军后方医院也设在那里，对于疗养来说，那里是首选的地方。第二天我去了福霞。

我那时疟疾是好了，但不知是否吃多了一种叫马钱子的药，总觉得昏头昏脑，脸上潮红，走路不稳，不知不觉就摔倒了。不过体力上好多了。

我住在红军医务所所在地的那个山村的群众家里，其实没有什么药吃,只是休息。

这一时期，任铁锋率领他那支三十多人的挺进队，在福霞沿海一带游击，袭击国民党和地主豪绅的货船，很有收获。这些队员水性好，会踩水，枪法也很准。他们在来往轮船的航道上，布上渔网。当货船进入航道，桨舵很快被渔网缠住，轮船便开动不了。挺进队的快船迅速包围上去，解除船长和护航人员的武装。随即打开船舱，尽情地把有用的东西搬到自己的小船上，然后扬帆而去。

他们把没收的东西运回来，送给政府、部队及医务所等单位，留下一部分交给渔民干部，分给贫苦的渔民。在一个短时期里，红军部队的经费及物资来源，不少是出自任铁锋的海上挺进队。

有一次，海上挺进队在海上拦截了一只轮船，没收了一批物资，其中有一些医药用品。任铁锋派人将这些药品运到医务所，同时送我一小盒西洋参。

我只知道西洋参提神补气生津，觉得对身体康复很适合，因此一次就炖了半盒吃下去。没想到药性上来，心跳很快，脑袋像针扎一样刺痛，彻夜难眠。

我自己尝试着用梨子压成泥，再用两个鸡蛋与梨泥混合起来敷在头上。到了下半夜，我的脑子忽然一阵特别清醒，接着一股凉气从身上散发出来，神志不清，顿时晕了过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又恢复了过来。心跳体温总算恢复正常，但白天黑夜还是无法入眠。

又过了几天，一个披头散发、满脸污垢、衣裳破烂的大高个男人，突然闯进我的房间来乞讨，使我受了点惊吓。好多天脑子里常产生幻觉，理智有些控制不住神经。心想这下可完了，我可能变成疯子，患精神病了。

此时，国民党的大部队已进入闽东苏区，对闽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当时我们躲在山沟沟里，只能凭着敌人越来越频繁的进攻和残酷的烧杀抢劫，判断形势日趋恶化。后来才知道，国民党当局对闽东苏区的崛起异常恐慌，动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大肆进攻闽东，企图一举荡平闽东革命根据地，消灭闽东红军游击队。

为了避免过大损失，保存有生力量，叶飞率领红军独立师，撤出福安中心苏区，转移到闽东五县以外的地区迂回游击，采取更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

主力红军走后，敌人采取以连进攻、以班搜索烧杀的办法，在福霞一带进行“清剿”。不少党团员、农会骨干和“红带会”会员被残酷捕杀，有的整个村子被烧光，群众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红军后方医院被迫转移，伤病员分散隐蔽。我在地方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深山沟里的一些村寨里藏来躲去。

有一天，我躲在溪尾与盐田之间的一个畲族村子里养病。敌人突然到了村边。村里的群众背的背、挑的挑，快速地往后山上跑。这里的畲族群众为了对付敌人的袭击，平时都已做好准备，早已实行了坚壁清野，一有敌情，随时可以转移。

我的房东听到枪声，跑回屋里挑起担子就往外跑，畲家女主人抱起孩子，同时叫我快走。我那时正躺在她家堂屋的床上，也挣扎着爬起来，跟在那位嫂子后面跑。但刚出门外几十步，两脚就不听使唤踉踉跄跄，终于跌倒了。

那位嫂子回头见我跌倒爬不起来，就将手中抱着的两岁的孩子放在路边的草堆旁，跑回来扶我。她见我脸色惨白晕了过去，便不顾孩子的啼哭，背着我快步往后山的林子里跑去。刚背到一个较安全的地方，便听到村子里响起了阵阵枪声，她焦急得哭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敌人走了，村里恢复了平静。那位畲家嫂子飞快地跑下山回到村子，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老人家那里找回了孩子。

原来那老人家走不动，见有个孩子在路旁哭，便抱进了屋。敌人进来搜查，见一老一少，也没有盘问就走了。

这位好心的畲家嫂子，也许没有多少革命意识，她只知道我是为她们穷苦人做事的好人。她正是出自这种纯朴的阶级感情，使她连自己的孩子都不顾而先来救我。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这位善良的畲家嫂子，就转移到别的村子里去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这位年轻的畲家嫂子，她那无比高尚的举动，一直使我感叹不已、终生不忘。

我一直想找到这位畲家嫂子，亲自向她表示谢意。在延安时，我曾向范式人打听过，他说那村子可能叫杜坑。但遗憾的是，我还不知道救我一命的畲家嫂子的姓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事，我的心中都感到歉疚不安。

一九九四年，我回到福安参加闽东苏区创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闽东畲族革命纪念馆的橱窗里，我终于知道了那个畲村叫小坑，那位畲家嫂子的名字叫蓝金妹。可惜的是，她已经先我离开了人世，我再也无法亲自向她表达谢意。这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打了两支吗啡，我从此卧床不起，一个叫林大目的农民给了我无私的照顾；任铁锋见我病重，让人抬着我随他们出发；一个烂眼阿婆的两剂草药使我大病初愈

在福霞山区养病期间，不知怎么搞得，全身都是毛病，这病刚好，那病又来了。孤家寡人，有时病得生活不能自理，吃住行都得依靠当地群众。住在哪家，吃就在哪家，行动主要靠村干部

和积极分子，带着我从这个村转到另一个村，从这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病重时,他们还用竹椅子抬着我,没有他们可以说我是寸步难移。

后来，我的病日益加重，这主要是我自己造成的。有一次我看到医务所里有种吗啡针，说明书上写着，该药主要用途是安眠止痛。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入眠，这岂不正好对症下药。

我要求后方医院的一位卫生员给我来一支。这位年轻人原是福安或是霞浦县城一家西药店的清洁员。他参加革命后，在后方医院当卫生员，学会了肌肉注射。他把针放在煮饭用的铁锅里煮沸，消了一下毒，给我打了一支吗啡，我觉得脑子更昏。

第二天，再打一支，我便天旋地转，不断呕吐。从此卧床不起，全身瘫软，眼睛发直，说话无力，连一句话都说不连贯了。听不得一点声音，连听到老鼠声、鸟叫声，心都要狂跳不止。稍一瞌睡，就做噩梦，我觉得自己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

这时，组织上派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农民同志专门照顾我。这位同志非常尽职尽责，对我照顾很好，单独为我煮稀饭，替我下山去抓药。敌人来了，他就背着我跑到附近山林里躲藏起来。每到转移地点时，总是他背着我走……

真不该把他的名字也忘了。新中国成立后，我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他叫林大目。他是有恩于我的。在我病得最重的时候，是他给了我无私的照顾，使我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人们把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为鱼和水的关系，这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共产党人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好像鱼儿离开了水，连一刻也不能存活。

我深刻地体会到，我这一生，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无私救助和保护，恐怕一百次也死过了！

大概是吗啡药力慢慢地消失了，我的病情才逐渐好转，能下地在屋里走动，但还是没有力气，连一个小小的阶梯也上不去。

不久，任铁锋带着他的挺进队来到福霞山区，好不容易找到了我。见我病重，劝我随他们一起去霞浦盐田北面的那一带去。那里是沿海地区，又是赤白交界地区，敌人“围剿”的重点已不在那一带。

我觉得转移到较远的地方去也好，我已经给当地干部群众增添了很多麻烦，不好再拖累他们了。我同意与任铁锋他们一起离开。

当天晚上，他们找了一张有靠背的竹椅，用两根竹杆扎成一顶轿子。第二天清早，由两个群众抬着我，随任铁锋他们出发了。

林大目不愿离开家乡，送了我很长一段路才默默离去。

我们走了六七十里路，停在一个村旁休息。其中的一位轿夫说，前面不远的那家，有一位老阿婆懂草药会看病。我说那就去看看吧。

他们把我抬到老阿婆门前。只见那老阿婆约七十岁左右，身体干瘦，赤着脚，烂眼皮，一脸的皱纹，满手背的青筋，但身子骨硬朗，举止灵巧。她招呼我坐下，没有先问我的病情，她用手拨开我的眼皮观察了一番，又要我伸出舌头看了看，然后用手指压在我的指甲上，把指甲逐个看了一遍。然后说我的病是气血两虚，要活血顺气。

她蹲在地上，在草药堆里找了些干树根、干树叶、干花草之类的药材，用柴刀砍碎。再找来几片竹笋壳子，把树根草药包扎好，共包了两剂药。

她详细地交代我，住下后，买一只三斤以上的大红公鸡，先把草药熬成三斤多的药汁。然后用药汁熬红公鸡，不放盐，熬成两大碗汤，睡觉前趁热喝下一碗，鸡肉不要吃。喝完后就盖上棉被躺下，下半夜前胸会发胀。心口发闷时不要害怕，不要起床，也不要揭被子，最好能出出汗。第二天早晨再煮热喝一碗，胸口

可能会冒出很多血红点子，不要紧，这是药力作用。第二副药也是照这方法做好服下。吃了这两剂药，你说话的气力就会提上一些，血也会化通一些。然后再吃一些补药，病就会好的。

果真第一剂药吃下去，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胸前确实出了许多红点点，说话时底气也足了一些。可惜第二剂草药放在轿子下，笋壳叶子擦破了一些，草药掉了一部分，不敢再熬了吃。怕药物不全，吃了反而加重病情，因此只吃了一剂。

此后，我的病有很大好转。大概吃了药的第二天半夜，有一股相当凉的液体，从尿道流了出来，腹部胀气好像收缩了很多。接着说话底气足了，话也连贯了，眼睛转动也比较自如了，走路也不很沉重了。

一剂毫不起眼的草药，一堆叫不上名字的树根、树枝、树叶的神奇组合，竟出乎意外地收到如此好的效果，真神了！

任铁锋的随从队员赌博输了挺进队的经费，被批评了一顿；另一个随从队员担心远走他乡；两人都要与任铁锋分手，任铁锋火冒三丈

我被安顿在一个沿海小村的一户农民家中，这一带没有国民党驻军，因此当地的保甲长也不敢猖狂，害怕我们把他们秘密地处死。

我听房东说，施霖、“南詹”、张少廉等都在附近隐蔽，我托他帮助我把施霖找来。施霖很快派人把我接到离这个村大约五六里的山沟，安排在一栋存放番薯丝的空仓库里。

当晚，施霖来见我。劫后余生，他乡遇故知，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他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我们还交谈了甘棠分手后的情况。

叶飞、范式人回忆说，由于施霖怕死不敢公开出来参加工

作，任铁锋要枪毙他，我召开会议开除他的党籍。这不是事实。

一九三三年秋甘棠暴动之后，施霖不敢公开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任铁锋对他是有意见的，但并没过多地去理会他，也没有去强迫他。后来施霖和“南詹”两人都离开了南区，到什么地方我没有查问。因那时形势发展很快，工作千头万绪，施霖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太深的印象。

特委开会批判施霖、“南詹”，并开除他们的党籍时，我正在福霞工作，也听说过这事。如果真是我召开会议开除他的话，我还敢轻易地去找施霖，施霖还会热情地见我吗？

施霖告诉我，这两天他们几个正在商量去开辟一个新的地区。他说这里也不安全，敌人来来往往很容易被察觉，他要我同他们一起去那个地方。那儿离这里大约有七八十里，坐帆船去一个夜晚就到了。那是一个较大的岛屿，好像叫什么“威”的，面积好几十里，有十几个村庄，施霖、“南詹”和张少廉有亲戚住在那儿一带。我们到那里去发动渔民，开辟新区。

我经过思考后，表示同意。因为身体不好，福霞和其他地方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目前是回不去了。在山沟里躲来躲去，倒不如到新的地区去做秘密工作，等形势有所好转时，再考虑打回来。

我们刚商量妥当，任铁锋把我们的计划给打乱了。那天，从长乐梅花镇来了一个人，说是找任铁锋。这是一位经常为我们采购枪支弹药、医药物品的交通员，叫阿弟仔，想讨点货款回去。

任铁锋见了那人后，立即改变了主意。他对那人说：

“我最近身上没钱，过一段再还给你。你来得正好，我们挺进队正要去连江罗源一带的海上打游击，你能否把老曾送到你梅花镇去治病？而且要保证她的安全。”

“没问题，绝对保证安全。”那人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说，梅花镇海上交通方便，四通八达，镇子里中西医生都

有，药品也多。他有个干娘六十岁了，原先是唱戏的，老了不唱了，自己住，房子是单门独户的。他哥嫂那里也可以住，住处不成问题，保证保密。

任铁锋到山上找到我，不由分说把我拉到海边村子里，劝我随那人去梅花镇治病。而我却真不愿意，因为我已同施霖商量好了，要去那个岛开辟新区。再说梅花镇是有名的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我们闽东红军修械所就曾在梅花镇雇请过几个修枪的工人，我对到那种地方很有顾虑。

但那交通员左一个担保，右一个没问题，使我十分犹豫。最后任铁锋说：

"我送你去，顺便去连江找黄孝敏、魏耿等联系一下。挺进队就暂时隐藏在这一带，由队长舍弟负责，过几天我自己或派人来接队伍出海。"

说完就马上找舍弟交代工作。尔后任铁锋只带两名随从队员，毫无商量地把我扶到船上。

我总不能就这样不辞而别。幸好张少廉也在村子里，他说正要去那个岛联系一下，正好同船一道出海。我想这样也好，到了梅花镇抓紧治疗，如一时回不了闽东，就从梅花镇直接去那个岛找施霖。与张少廉一道走，还可以告诉我今后联络的地点和姓名。

那时沿海一带都是敌人，国民党海军的检查船白天总在海岸线上游弋巡逻，我们只好晚上行船。船在海上航行了一夜，天快亮时正好到了船老大的家，一个叫赤沙的渔村。他们说一夜未眠要上岸去睡个觉，我们也只好偷偷地上了岸，秘密地住了下来。

这时已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再过两三天便是农历大年了。好客的船老大盛情留我们过了年再走。这一带是我们海上游击区域，渔民船工们经常配合游击队在海上活动，他们同情支持革命。在这里过年我们是比较放心的。

另外考虑到，从这里到梅花镇还得夜行几个晚上，而且要通过戒备森严的三都澳海军基地，十分危险。让船工们在危险的旅途中过年太说不过去了，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过了年再启程。

任铁锋的随从队员叫成南，十五六岁，挺进队的五六十元经费由他保管着。年前任铁锋曾叮嘱他不要去同地方上的群众赌博。可他不听，结果输了好几块。任铁锋把他找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接管了经费。成南回到房间哭着要回去。另一随从队员叫作弟，十七八岁，对前途感到渺茫，担心远走异乡后该怎么办。张少廉也劝说他们回去为好。

第二天清早，任铁锋得知那两个随从队员要与他分手的消息，马上去寻找，他们躲着不见。一个多小时后，两个随从队员住的那家房东跑来告诉任铁锋，你们赶快上船去吧，要防止他俩变心。这里走陆路到三都镇只有十几里，他们万一跑去三都镇投敌，把三都港口封锁起来，你们就插翅难飞了。

我们只好上了船，刚要离开海岸，有几个渔民跑过来要任铁锋把枪留下才能开船。为什么渔民要枪呢？我分析，可能是张少廉怕我们一走了之，因此鼓动渔民要我们把枪留下。

幸好任铁锋的短枪放在梅花镇交通员手中提着的篮子里，任铁锋用手把衣服翻起来，说你们仔细看一看，我身上哪有枪？不要相信那两个小家伙的话，枪都在他们那里。渔民们哑口无言了。

船工急忙把船撑离了海岸，掉转船头，离开福霞向大海驶去。

任铁锋火冒三丈，站在船头骂道：

“他妈的！等我回来时再和这两个小子算账！”

而此时的我，望着渐渐模糊远我而去的闽东海岸线，望着海天茫茫一望无际的大海，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

离别闽东，到了长乐县的梅花镇，得知连罗根据地的苏维埃都已垮掉，党组织不知去向；没有了政治生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惶恐大哭；我们开始了天南地北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

泪别闽东，我与任铁锋取水路赴长乐县梅花镇。

木船不大，在茫茫的大海上犹如一片时沉时浮的秋叶。

船行一天多，来到一个像是叫陈村的渔村，这是我们海上的秘密立足点和交通站，离连江苏区很近，所以游击队常来常往。任铁锋想在这里打听连江的消息，并打算就此去那儿会见游击队负责人。

我们上了岸，通过关系找来渔民打听情况。渔民说：最近国民党的大部队围攻连江罗源苏区，前几天看到连江游击队乘了几条渔船经过附近海面，但不知所去何方。

这是一条坏消息。因为这支游击队向来机动灵活，敌人从陆地来，他们就下到海里，敌人从海上来，他们又跑进山区，真是海阔天空，任由驰骋。但越是这种时候便越不容易找到他们，这可怎么办呢？任铁锋说：只好先去梅花镇了。

当夜，我们就在一个渔民的家里住下了。

正是黄花鱼发海的渔汛时节，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活的黄花鱼，还尽情吃了一顿。

黄花鱼学名大黄鱼，每到春天，大黄鱼都要洄游回闽东，在一个叫官井洋的海域交配产卵，繁衍后代。但海鱼有个特点：捕上来不一会儿便会死，所以市场上根本看不到活鱼。陈村就在官井洋渔场附近，打回来的大黄鱼有些还活蹦乱跳，算是让我开了眼。

房东大妈见我是远客，又病歪歪的，就特地挑了一条大约两斤重的活鱼，清蒸了，说让我补补身体。我从小爱吃鱼，大妈做

的鱼味道又好，也就没客气，三下五除二把一条鱼都吃了。不料没过多久就呕了起来,估计是吃鱼太多,伤食了。她没料到我的体质会这么差，所以，一面宽慰我，一面为我弄药。她用茶叶、乌梅加食盐放在锅里炒到发黄变焦再兑水煮开，我喝了一碗，呕吐立止，第二天早上又喝一碗，就通体舒坦了，真是一副灵丹妙药。

船又行一天，来到一个现在已记不起名字的海岛上，我们要在这里换一条大些的船，而且还须上岸住一夜。带路的“交通”叮嘱我们把贵重物品，例如钢笔、手表、枪支之类交给他保管，说这地方三教九流全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问：“交给你就安全吗？”“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是在‘帮’的，没人敢惹我！”

我们只有照办。

其实，这里是一个鱼类集散转运地，闽浙渔民把在附近渔场捕获的鱼虾卖给鱼行或鱼贩子，由他们运来岛上（也有渔民打了鱼直接运来卖的），再从这里转贩到上海、杭州、宁波、福州等大城市。

我们看到岛上码头连着码头，大大小小约有几十个，每一个码头前都靠泊着不少帆船。挑夫们从小船上把一担担鱼虾挑上码头，过秤后又分门别类倒进可装三百来斤货的大竹筐里，再“嗨唷嗨唷”抬上大船，运往各地。码头和木船上的老板、小贩、渔民和挑夫们，还有掌秤的、算账的、看热闹的都扯开嗓子嚷着吼着吆喝着，加上喊人的、骂街的、吵架的，真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因为鱼虾易坏，须随到随运，所以昼夜都这么热闹。到夜里，明晃晃的大汽灯，彻夜不灭，码头上一片嘈杂混浊的辉煌。

岛上有一条用大石板铺成的长街，近两里长，也许是年代过于久远，也许是每天走的人太多，石板已被踏得油光发亮了。长街两边大都是客店，人进人出川流不息，店外则排满了赌博摊子，一摊挨着一摊。都有一张四方桌，四五条长凳，上吊一盏汽

灯，渔民、小贩和挑夫们卖了鱼或挣了钱就立即被人拉到这里赌博。沿街至少有五六十张这样的赌桌，各式各样的赌具都有，每张桌前都人头攒动，看来生意十分兴隆。

我们绕过赌博摊走进一家客店，吓得我差点倒退出来：只见一个大房间里六七张木板床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抽鸦片的人，满屋乌烟瘴气，个个不堪入目。我把手上的篮子放在一张空床上，等我小解回来却发现篮子里少了一条裤子。我把这事告诉了带路的“交通”，他立即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就探囊取物一般把裤子找回来了。

这里的确什么样的人都有：娼妓、嫖客、卖唱的、算命的、酗酒的、骗钱的、舞刀弄枪的、捏腰捶背的、扒手、强盗、土匪……渔民、小贩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钱都浑浑噩噩地在这里被骗光榨尽了。这一个个摊子、一家家铺子，就是一只只张牙舞爪、食人膏血、吐布瘟疫的毒蜘蛛呀！

我感到有些毛骨悚然——这真是一个恐怖的小岛。

“交通”把我带到客栈附近海边的一个渔民家住宿。男人们打鱼去了，屋里只有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和他们年轻瘦弱的母亲。一家人衣衫单薄而且褴褛，虽然春寒料峭，却都没有鞋穿，光着脚板跑进跑出，一双脚冻得紫红紫红。这家人的房子和别的渔民一样，只有低矮的一小间，东倒西歪着，是用破船烂板搭起来的，到处是窟窿，海风一吹，呜呜叫。屋里除了锅灶和一张破床之外，别无长物，真正家徒四壁，夜里连盏油灯也没有——他们点不起。从渔户区到街市只一步之遥，一边黑暗而凄清，一边却是亮如白昼的醉生梦死，一个小岛上俨然有两个世界。

第二天一早，我们换乘了一条大些的渔船到了长乐县的梅花镇。

这是一个地处陆地岬角有几千户人家的大集镇，交通便捷，商贾云集，但街市却很狭小，行人摩肩接踵，十分拥挤。“林子

大了，什么鸟都有”，这里同样也是个是非之地。

“交通”先带我们去见了他的胞兄，那人四十来岁，老婆孩子六七口人单门独户住着，算得殷实人家。他好像也是“帮”里的人，和三教九流都有些来往，对我们的来历略有所知，好在对我们还算热情。之后“交通”又带我们去见了他的干娘。干娘六十岁光景，白白净净，年轻时一定很美，一双小脚堪称三寸金莲，穿双绣花小尖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地，让人担心。干娘过去是唱戏的，据说还会武打，现在老了便不唱了。她没儿没女，孤身一人住着楼上楼下三间屋，我去她家住，看样子她倒挺高兴。

晚上，“交通”的哥哥来说了一些情况，让我们大吃一惊。这些情况与任铁锋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最危险的还在于梅花镇上那十几个曾到闽东红军修械所修理过枪支的工人师傅。闽东修械所被敌人捣毁时，那里的工人师傅有的被抓走，有的跑了回来。“这几个跑回来的人要是在镇上碰见你们，不向你们要工钱，也会向你们要人，甚至可能会去向敌人告密，邀功请赏。”“交通”的哥哥说。

“前几天你们那里的军需科张科长刚来过这儿。想用烟土换些军需和药品回去，在镇上被那些工人碰见后遇到了麻烦。他们拉住了张科长纠缠不休，要钱要人，后来也不知把这个军需科长弄到哪儿去了！”

“交通”的哥哥再三告诫道：“你们在此地不能久留，要是被那些工人发现，连我全家也要跟着掉脑袋。”

至于连江罗源的情况，“交通”的哥哥介绍的与我们在陈村听到的一样：国民党大部队“围剿”连罗根据地，那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都垮了，部队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乘渔船下了海，谁也不知去向。

连江这条路显然断了。

我一下子像掉进了冰窟窿，不知如何是好。想留，留不得；要走，又往哪儿走呢？

福州党的临时省委机关早被破坏，省委书记陈之枢被捕叛变后各级组织遭受了极大损失，福州也去不得了。

回闽东呢？

我们离开福霞山区时，已得知国民党三个师正在那儿疯狂“围剿”，情况十分险恶，红军独立师已撤出福安苏区转战他乡，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也被敌人占领，党政干部都转移隐蔽了，找他们犹如大海捞针。

然而，离开梅花镇去别处，那又怎么能找到党组织呢？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没有了政治生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想至此，我很惶恐，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无论如何要返回闽东。不管敌人有多少，不管形势多险恶，我也要回闽东去！

我请求“交通”为我找船，送我回去，但“交通”不肯，我自己直接去找船，但没有一个船工敢送我。任铁锋还担心那躲藏起来不肯与我们同来梅花镇的两个游击队员会在三都澳投敌告密，如若那样，我们则连必经之地三都澳都过不去。但我仍坚持要走，你们若不愿送我就自己走回去，就是死也要死在闽东！

任铁锋和“交通”以及“交通”的哥哥轮番批评我。任铁锋说：你要冷静下来，现在是任性的时候吗？这种情况下回闽东无异于自投罗网、自寻绝路！何况你的病还没好，身体这么虚弱，连路也走不动，又怎么爬山越岭，寻找组织呢？“交通”和他的哥哥说：你独自一人能回闽东吗？我们不会让你去的！

那么我怎么办呢？

任铁锋说：在福州我有一个中学时的老师，他人好，忠厚得很，我们先去他那儿避几天。然后再去永泰县找我堂姐夫，他与当地的土匪有联系，通过他我们可以搞点枪，然后就在永泰打游

击，开展工作，寻找党组织。

听了这些批评我开始冷静些了——也是实在没有法子，如果身体好，当乞丐要饭我也要走回闽东去！现在只能听从任铁锋的安排，随他行动了。

到了福州郊外，任铁锋去一家米店打听他永泰堂姐夫的消息，我则在路旁等候。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去永泰的事落空了。与土匪头子有些联系的堂姐夫一个月前被国民党当做土匪头抓走枪毙了。

这样就只好冒险进城，找那位中学老师了。

那位老师四十多岁，很慈祥和蔼。家里只有三口人，妻子患严重的肺结核，骨瘦如柴，早已卧床不起，他和六岁的女儿也有肺病，家里只好请了一个保姆，生活过得很清苦。任铁锋任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团长的事虽然早已见诸报端，但老师并不知道，因为他在学校读书时，名字不叫任铁锋，叫任达。

我们对老师说，福州不便久留，想到广东去。老师告诉任铁锋，中学的另一位老师现在广东汕头基督教会做牧师，你们可以去找他。说着就写了一封介绍信。

因为从闽东出来时我们都是农民打扮，这身打扮无论在福州或汕头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就在福州偷偷住了一星期，等赶制出了几件衣服后才动身。

——就这样，我们十分无奈地离开了闽东，离开了福建，开始了天南地北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

“离开闽东”一事，被作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党内受到多次审查，被折腾了几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有“本来就是清楚的”七个字

我从一九三三年六月到福安中心县委，至一九三五年三月离

开福霞中心县委，在闽东工作战斗共计一年十个月。

然而，这一段短短的历史却成了以后我多次受审查的焦点。这一切起源于一次“检举”——一九三八年，范式人从福建八路军办事处给中共中央长江局发了份电报，称：曾志、任达是从闽东逃跑出去的。

第一次审查就在一九三八年，组织上把我在汤池训练班的支部书记职务给撤了（好在没有开除党籍），还牵连了陶铸。因为陶铸有一个笔名叫任陶，于是有人便硬说任铁锋就是陶铸。

我和任铁锋是一九三五年春离开闽东的，而陶铸那时被判了无期徒刑正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里，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才获得自由。那时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我党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指名要陶铸等出来工作，国民党迫于无奈才不得不释放了他们。说与我一起离开闽东的任铁锋就是当时还被关在南京监狱中的陶铸，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与叶飞、范式人在北京再次重逢。我请范式人回答那个在我心里憋了十六年的问题：

“你为什么一九三八年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说我和任铁锋是从闽东逃跑出来的呢？

范式人说：“十九路军‘闽变’后释放政治犯，我才从福州监狱出来回到闽东，在红军独立团任十六连指导员，特委上面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你们怎么离开闽东我也不太清楚，一九三五年后不见你们的踪影，就猜想：可能是从闽东逃跑走的，一九三八年听说你在湖北工作，所以向长江局发了那份电报。”

我说：“好家伙，你这一猜想差点没开除我的党籍！”

第二次审查是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时期。经过一年四个月的监禁审查，还是把闽东这一段历史挂了起来。党

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论还写着："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由于这个结论，华中代表团选举七大候补代表时，投票赞成我的刚刚超过三分之二，差一点落选。

几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是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工作的。由于是战争环境，加上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我不便要求组织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详细调查。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只有在最初的一九三八年，我曾给当时在新四军任职的叶飞写过一封信，希望他能为我这段历史作一个证明。但由于军队行止不定，后来叶飞说他没有收到我的那封信。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我再次致信已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希望他能证明我离开闽东的前因后果。叶飞给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王德(我当时在中共广州市委工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曾志在闽东确实有病，而且是重病，她是为治病才离开闽东的。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庆元失败后，追击他们的国民党三个师的兵力又回身大举"围剿"闽东苏区，特委领导马立峰、詹如柏等先后牺牲，红军游击队被打散，更多的同志在反"围剿"战斗中战死。叶飞在信中还写道：曾志离开闽东后在广东、上海积极寻找组织；而闽东有些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明知游击队就在家门口，也不出来找党，直到全国解放后过上太平日子了才想到党，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曾志的表现比他们好得多！

后来，我把离开闽东的经过以及我的全部历史，向中共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每一段经历都写了证明人，请求党组织进行审查。省、市委组织部为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与审查，一九五六年中共广东省委作出正式结论，指出："曾志同志一九三五年春离开闽东与党失去联系，主要是因病到白区治疗，同时又正值敌人大举向闽东苏区进攻，交通断绝的战争环境所致，并非

动摇逃跑。曾志同志离开闽东后并未消极，病好后仍继续寻找党组织，进行革命工作……一九三六年经北方局正式批准恢复了党的关系……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对此结论，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

第三次受审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离开闽东这段历史，又被原中央专案组“一办”陶铸专案组列为“有关案犯”，进行了长时间的所谓“审查”。

打倒“四人帮”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日中央组织部复查意见认为：调查材料证明，中共广东省委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中央专案组“一办”将曾志列为陶铸专案的“有关案犯”进行所谓审查是完全错误的。曾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须再作结论。

我手捧着党的文件，反复念着“本来就是清楚的”这七个字，不禁百感交织、潸然泪下……

第七章　千里寻党

到了汕头，牧师暗劝我们“浪子回头”；二十天后，我们到了广州，仍然找不到党的关系；早就知道“左联”是党的外围组织，于是作出决定，任铁锋去上海找党，我先回宜章老家等消息

我们是乘海轮从福州去汕头的。那位当过任铁锋老师的牧师先生见了我们，同时又看了福州老师的信，很热情，留我们在他家住下了。

对我们的突然到来，牧师自然是有所疑虑的，只是不便询问罢了。但他每星期做礼拜讲《圣经》时，都会邀请我们一起去听。有一次他讲了《圣经》里的某一节，大意是规劝浪子回头的，语焉甚详，似乎是在有意暗示和劝诫我们什么。

牧师的夫人是个好心人，抽空陪我去看了一次私人门诊。我的病主要是心力衰弱，腹部胀气，全身水肿。看门诊的是个女医生，她给我吃了些蓝颜色的药粉，结果造成大便不通，五六天才能排一次，而且困难得很。这个私人诊所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估计她虽然也学过一点医，但并不精通，所以我原来的病没有好转，反又新添了麻烦。

到汕头后任铁锋便写了封信给广州海关的洪履权，洪履权回信说他的父亲和弟弟就在汕头，有事可找他们帮忙。

任铁锋和洪履权兄弟是四五年前一起在福州读书时认识的。

洪履权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后来又参加了共青团。任铁锋因负责与他联系，经常去他家，所以比较熟悉。

洪履权的父亲在外地海关工作了三十年，是个老关员。海关的薪金是累进的，按年加薪，工作一年每月至少可增加两块银元，满二十五年的老了还有退休金。所以洪履权的家里比较富裕。

洪履权在福州读书时，与姐姐、妹妹、弟弟和寡居的婶母生活在一起，洪履权的家人包括他的婶母都热心于爱国抗日运动，思想比较进步。任铁锋与他们全家都很熟悉，一度曾把印传单的油印机都搬进了洪家。后来洪履权的父亲从广东几次来信要他去广州读海关学校，洪履权也因参加了抗日反帝和反日货的游行示威，有些害怕暴露，所以便去了广州， 任铁锋这才把油印机从洪家搬出。不久任铁锋自己也调动了工作，所以与他再没有联系。

听说洪履权的弟弟洪履和在汕头，又是熟悉的校友，任铁锋便按图索骥找到了他。

他家在汕头是大户，有一栋洋楼，还带一块草坪，属有产阶级，但洪履和却是真正的进步青年。虽然他才十七八岁，但同任铁锋却很合得来，两人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他完全知道我们在闽东的情况。洪履和一九三七年底或一九三八年初到武汉参加了八路军。由于他也是广州海关学校毕业的，英语不错，文字能力比其兄还强，因此被派往八路军前方办报纸，后来又到新疆工作，与毛泽民等一起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在新疆监狱里他认识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出狱后两人便结了婚。新中国成立后洪履和担任我国驻苏特派记者，回国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后因患心脏病，不久就病逝了。

在汕头和洪履和的交往像沙漠中吹来了一丝清风，令人感到凉爽而轻松。

后来洪履权又来信，要我们去广州，我们便辞别洪履和与牧师一家，离开了汕头。屈指算来在汕头共呆了二十天。

到了广州我们便住在洪履权家。这是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楼，他租住二层，隔壁是洪履权姑父家。那一年洪履权约二十五岁，海关学校毕业才工作一年多，月薪就有一百四十块银元，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会跳舞，是个很正派的青年。

洪履权在广州也没有党的关系，但他与来自福州的革命青年李端、陈道有来往。

李端、陈道过去与任铁锋也有过工作关系。一九三二年，为声援上海“一·二八”抗日运动，福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组织者之一的郑维新被捕， 在公堂上大骂贪官污吏，大骂国民党不抗日，被公安局局长当场开枪打死。此事激起了福州学生和广大市民的公愤，李端、陈道等人便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造成了很大影响。事后国民党大搜捕，他们在福州难以立足，经当时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同意而暂避广州。他们也是共产党员，但在广州同样没有找到党的关系。

大家都是革命同志，所以在一起时便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谈话中，大家特别关心的总是已开始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的行踪。我们查阅着各种报纸，凡登有中央红军和各根据地消息的，我们都如获至宝，悉数收集起来，认真研究，从字里行间捕捉党和红军的消息。尽管国民党的报纸上对红军尽是谩骂，充斥着“消灭”、“打垮”一类的大话，但大家都坚信共产主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坚信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消灭不了的，我们都以这样的信念鼓励着自己，也鼓励着别人。

我常用朱德的革命英雄主义来激励大家，这也是过去从蔡协民那儿听来的。例如：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被敌人打散了，朱老总集合起一批失散的队伍，充满豪情地对大家说：“兵家作战，胜败常事，只要有坚定的决心，今天失败了，明天一定会胜

利。”朱老总还说：“如果我们只剩下二十人，我带你们下乡发动贫雇农上山打游击；如果能集合起两百人，我就能领着你们打遍天下！”

朱老总一身是胆、横扫千军的豪迈气概，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然而，最令人魂牵梦绕的还是怎样找到党。李端、陈道来广州两年多了，始终打听不到党的消息。他们说：看来在这里很难找到党，最好去上海，那里的抗日爱国运动很活跃，容易找到组织。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于是大家都开始做着相应的准备。

经李端、陈道介绍，我和任铁锋结识了在广州大学读本科和读研究生的几位福建老乡。他们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都同情或追求革命，知道我们来自闽东苏区，便特别热情，表示很敬佩我们，也十分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劝我抓紧去看病。一位叫陈国治的研究生有个朋友在德国人办的中山医学院当医生，他便带我先去作抽血检查。不料只抽了四十五 CC 血，我就虚脱晕倒了，幸好陈先生和他的朋友都在场，便直接将我送进一个单人病房住了院。我很不安，因为这个医院主要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收费很高，单病房一项每天就要收两块银元。中山大学的朋友和李端、陈道、洪履权等经常来看望我，劝我不要为钱担心，他们一定会帮助我的。

我在医院住了约二十天，每天除了吃药打针还作了多种理疗，到出院时我的腹部肿胀消退了，走路和谈话也精神多了。住院共花了八十多块银元，都是中山大学这些朋友付的，真是感激莫名。可不知怎么搞的，他们的名字除了陈国治一人外其余都想不起来了，实在对不起人家。

出院后着急的还是找党。如何去上海，到上海后如何找关系又成了我们天天的话题。

洪履权有个同乡在广州中山大学当旁听生，叫郑震庭。郑震

庭说，他有个原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朋友何友恭现在上海，似有“左联”的关系。我们早知道“左联”是党的外围组织，如果找到“左联”，就可能找到党，虽没有十分把握，但是每一线希望对我们都是极其珍贵的。我们赶紧作出了安排，决定：由任铁锋与郑震庭一起去上海找何友恭，进而寻找党的关系，我先回宜章老家等消息。

我七八岁就离开了家乡，读书期间也只是在寒暑假回去几次。虽然参加革命后宜章流传过一些我的事情，但毕竟大革命时期和湘南暴动我都不在那儿，估计住一阵问题不大。再说我堂哥曾当过宜章县的大队副，虽已退职，但上上下下总还有些面子，而且他和我家是上下屋，看来安全是有保障的。记得刚来广州时曾写信问候母亲，并询问可否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母亲回信说已与堂哥商量过了，他保证我回家住一段不会出什么事。于是我便依计划回了宜章。

行前，我辗转寄了封信给南京监狱的陶铸，信的落款地址是李端的家。

回到母亲身边，一切平安。不久，任铁锋来信，告诉了我他们在上海的地址。

我回家约一个月后又接到广州洪履和的来信，他已由汕头到广州准备报考海关学校。信中说，前不久来了几个便衣到李端家抓我，李端和他母亲说：我家没有曾志这人，而且根本不知曾志是谁，但便衣还是硬把李端抓走了。洪履和要我赶快离开家，直接去上海。

但母亲不让我走，说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无论如何要过了节再走。从来信看李端被抓已经半个月了，敌人并没有更多的证据，拿他也没有办法，估计李端不会供出我的。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在家等过中秋节，但我如坐针毡，时刻都准备着便衣来抓我时如何逃脱。

中秋节刚过我就离家到了广东坪石——去上海只能从广州换海轮。虽然洪履和信上警告过我要直接去上海，但我想：广州这么大，我又只是路过，想必不会出事。我到广州找了个洪履权值班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下了，从我房间的窗口可以清楚看到码头上的情景。果然见他在码头上走来走去，我高兴极了，这就证明洪家没有出事。

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洪家，刚要上楼，恰好碰到洪履权下楼去上班。我叫他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哎呀，你胆子太大了，这种时候还来广州！"我说："来你家取行李，马上就走。"于是他领我返回楼上，此时他家里人都还没有起床。我细声问他便衣来抓我的细节，他也细声告诉我："便衣是从福州来，是一个姓周的带来的，他说认识你。他们是先到南京监狱然后才来广州抓人的。李端被抓后是我交代履和写信告诉你的。"因为他急着要上班，所以匆匆说了几句就下楼走了，我也赶忙拿起行李回了旅馆。姓周的是谁呢？我在脑海里反复回忆着我所认识的周姓男人，最后估计这人就是叛徒周剑心。但我又百思不解：为什么他们要去南京监狱？是不是陶铸真的叛变了？但是，叛变了为什么仍关在监狱，而且还判了重刑呢？叛变了为什么他自己不来抓我，而要叫福州的叛徒来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交织着我的恨和爱，也交织着我的疑虑和希望。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特务正是从我给陶铸的信上找到李端家的通讯地址的。

尽管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怀疑陶铸的气节，但我仍决定从此再不给陶铸写信了。

我们找到了地下党员陈家康，送上了一份失去党的关系的报告，却没有回音；两年间，不知搬了多少次

家，换了多少次名；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使我们能维持咸菜就稀粥的生活

我于一九三五年秋天抵上海，与先期来此的任铁锋、郑震庭会合后继续四处寻找组织。

此前，郑震庭的朋友何友恭曾介绍他们认识了另一位朋友陈家康。陈家康告诉他们：他本人与“社联”有些联系，但又不是“社联”成员，你们要找党组织接关系，可以写一份报告，说明与党失去联系的经过，他负责转上去。任铁锋告诉我：报告已经送去一个多月了，可不知为什么音讯全无。

我分析，这里是国民党的巢穴，我党处于“地下”，自然须十分谨慎，再说闽东苏区被破坏了，组织又如何调查我们的自述并判断其真伪呢！看来“社联”这一头是走不通了。

后来才知道：陈家康就是一个地下党员，抗战时他曾任周恩来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工作。

但陈家康还是介绍我们认识了在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社做事的闽东人郑眠石（又名陈楚云）。郑眠石是老同志、老党员，曾蹲过国民党的监狱，陶铸在福州工作时也认识他。新中国成立后，郑眠石在北京的中央某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前病故。我们很信任郑先生，把闽东的情况和我们寻找党组织的迫切愿望都告诉了他，但他说上海目前没法找到党的关系，他也没找到。

这可怎么办？我们商量了很久，大家都认为：不能消极等待，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更不能灰心丧气。要多方寻找，要投身到各种群众性的救亡活动中去。大家坚信：有群众的地方，特别是有工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共产党！

于是我与任铁锋就准备进工厂做工。但是，想在上海做工也不易，虽然广告上天天有招工消息，但报名的多，录用的往往不到十分之一，还要找关系、托人情、送厚礼。有次我去一个纺织

厂招工处报名，听我不是江浙口音，人家二话没说：不要！任铁峰的遭遇也跟我差不多，去了几个地方尽碰钉子。

这时任铁峰认识了一个在某邮局做事叫杨成祺的福州同乡，杨成祺的外公庄某是退休的海军上将，他自己则是上海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之一。由杨成祺介绍，我们参加了“武自会”，分配任铁锋做学生工作，分配我做女工和爱国女青年的工作。“武自会”也是我党外围组织，是宋庆龄领导的。杨成祺（化名老庄）要求我们从此开始专做“武自会”的工作，与“社联”、“左联”的关系人须减少来往，还要我们立即搬家，与陈家康脱钩，同时还必须找一个正式的职业。

这样做，都是从事秘密工作的需要。由此开始，在上海的两年间，我不知搬过多少次家，而每一次搬家都要更换一个姓名，到底我曾用过哪些名字，现在几乎忘了，只记得其中一个：王淑生。

其实后来我的职业还是“社联”陈家康的朋友郑眠石帮助解决的，他介绍我去成志小学做了教员。该校两位教务主任都是福州人，他们也都欢迎我去，于是我在上海便有了第一份工作。

学校让我教一年级国语，每月薪金十五块银元，两位教务主任还介绍我给校长两个六七岁的孩子每天补一小时功课，每月另给六块银元。有了这二十一块银元，我们的房租和吃饭问题基本有着落了，但在大上海要靠它解决三个人的日常开销又实在紧得很，每月房租和水电八元，桌椅板凳租金一元，三人伙食至少九元，所以样样都要省俭，住处只能选亭子间、灶壁间，出门只能走路（每天走二三十里是常事），衣服被褥一件也不敢添置。上海的夏天很热，我们没钱买草席，正好邻居往晒台上扔了一张破草席，我把它捡回来洗了洗就用上了，还觉得挺舒服。

后来杨成祺给任铁锋也找了份工作，是在上海福新烟厂搬烟丝，每月十块银元。但那活太累，成天弯腰躬背重复一两个动

作，烟尘又大，熏得肺部和气管直冒火，干不到一个月，他就吐了血，只好不干了。

我在成志小学也只教了一个学期，新学期就没有再收到续聘书了，好在郑眠石又为我在惠平中学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虽然月薪少些，但总算没有断炊，当然日子是更艰难了，只能顿顿就着咸菜喝稀粥，一天到晚饥肠辘辘。好在“武自会”指定由任铁锋联系的大中学校教职工中有一些是福建同乡，十分困难时他们也能接济一点。

可是，来上海这么久了，还是没有找到党组织。

在“女教师读书会”上，我认识了赵玲，她和丈夫萧明也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萧明把我的情况函告北方局，特科派来了“王大哥”，决定恢复我和任铁锋的党组织关系；从一九三五年二月离开闽东，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找到党历时一年零八个月

那时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日益高涨，社会上出现的爱国进步书刊也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我们经常接触的杂志有《世界知识》、《永生》、《生活》、《大众哲学》等等。特别可喜的是各种读书会也应运而生，成为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抨击时弊、交流思想、互诉衷肠的活动场所，很受各界爱国进步人士欢迎。

我经常到书店、书摊上去翻阅各种书报杂志，经常一看半天，特别好的书刊我也买一些，以便细细研读。我之所以广泛涉猎进步书刊，目的是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党的活动线索，找到更多的进步团体。

当时抗日救国会下面有一个女教师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又组织了女教师读书会、世界语读书班、歌咏组、女工夜校等，这些

我都一一参加了。其他进步组织，例如，陶行知先生领导的“小先生制”组织，我也参加了。

女教师读书会借用一个小学的课堂每周聚会一次，参加者为小学教员和曾经教过小学的女性，都是一个介绍一个进来的，所以都是比较可靠的进步青年。学习的方法是互相介绍这一周所看书报杂志上的好文章，并敞开心扉陈述自己的心得看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由于不拘一格，因此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争相发言，有时互相启发，有时争论激烈，每个人都很认真，也很兴奋，感到颇有收获。

有一次我将自己看过的政治类、时事类书刊上有关国内外形势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作了一次洋洋洒洒的发言，大家都说我讲得很好。之后就有一位叫赵玲的女教师开始主动接近我了，她经常到惠平中学图书馆来找我聊天。开始只谈读书方面的问题，久而久之发现彼此观点基本一致，于是话题慢慢深入。我们一起抨击“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痛骂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进而又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问题畅谈了看法。我隐隐感到：四十岁的赵玲跟我谈这些并非兴之所至，她一定不是等闲之人。

不久，她邀请我上她家里玩。她没有儿女，两口子住在两层公寓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宽敞而又明亮，比起我们的住处简直天上地下。她丈夫叫萧明，矮胖身材，很精明，也很热情。交谈一阵之后，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我看你不是一般的女职员，你阐述问题立场观点正确，分析也细致深刻，很有说服力，你大概是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吧？”他看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自我介绍说：“我们也是与组织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

原来，萧明是大革命前的老党员，湖南新田县人，曾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八年任北平市委书记，还负责河北省委部分工作，因为与柯庆施、张慕陶共同领导的抗日同盟会的抗日活动失

败，他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组织上让他自谋出路，重新接受考验。萧明说，尽管如此，但他与北方局还有个别联系。

他谈得很恳切，我感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是可以信赖的。于是我便把失去组织关系和找党的经过如实告诉了他。

后来，接触多了，我又陆续讲了诸如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暴动、工农红军以及井冈山反“围剿”、闽西闽南和闽东斗争的经历。萧明鼓励我：让我们都努力工作吧！等工作有了成绩，我可以通过个别联系的渠道，向北方局报告你们的情况。相信我们都是可以接上组织关系的。

有一天萧明告诉我，他已把我们的情况函告北方局党组织了。不久，萧明又告诉我们：北方局党组织来了复信，要他负责与我们联系，并进一步搞好现有工作。大约六月底，萧明赴北平，说是组织让他去的，大约二十多天即可返回。可他离沪后直到八月底才有信给赵玲，叫她前往北平，他决定不回上海了；同时要赵玲告诉我放心，他会写信给我们的。

赵玲走了，我不免有些失望：寻找党组织的希望难道又要落空了吗？

认识赵玲夫妇对我而言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他们视我为知己，待我亲如姐妹。

萧明是“笔杆子”，经常能写些文章赚点稿费，所以生活比较宽裕，吃住也较好，这样两人都日见发胖了。赵玲发胖后原来的衣服不能穿了就给我一些，单的棉的都有，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她也经常邀我上她家吃饭。记得那年端午节，赵玲请我去吃饺子，约好十二点准到，可是我紧赶慢赶将近一点才到，赵玲生气了：“你怎么搞的，不守时间！”她掀开锅：“你看你看，饺子都煮糊了！”我往锅里一看，果然饺子都糊成一锅粥了。我一个劲道歉，感到真的很对不住他们。他们做一顿饺子不容易：剁肉、和面、擀饺子皮，再一个一个包起来，很麻烦很费时间。

他们是一片盛情，而我却扫了他们的兴。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是吃饺子怕麻烦，而我们则是吃不起饺子。连烧饼和干饭也吃不起，哪里还有钱吃饺子。我在上海两年，没上过一次饭馆茶楼，没看过一场电影戏剧，没买过一次水果零食。但是，只要能找到党，一切就虽苦犹甜了。

在彼此都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同志之间的感情的确比兄弟姐妹更亲。

望眼欲穿地等了一个月，萧明终于来信了，信上说北平“王大哥”要到上海看望我们，要我们“热情款待”。

这分明是告诉我们：党组织派人来联系了！真是喜从天降啊，我们都像孩子似地欢呼雀跃起来，激动得不得了。

九月底或十月初“王大哥”果然来了，见了面彼此都非常高兴。他是个山东大汉，三十岁左右，厚道而又和气。“王大哥”说，他属于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上海特科，属于党的军事性组织，不是上海党组织，是北方局指示特科来与我们联系的。他还告诉我们萧明已在北方局工作了。我和任铁锋把各自的简历、离开闽东的经过和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寻找组织的情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他听过之后要我们各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交特科党组织审查。十月中旬，“王大哥”又来见我们，并正式传达：特科党组织研究审查了我们的报告，决定批准恢复我和任铁锋的党组织关系。

我从一九三五年二月离开闽东，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找到党，其间失去组织关系共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八个月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党组织，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党组织，从广州到上海，从酷暑到严冬，我们尝尽了失群孤雁的辛酸苦辣，彷徨烦恼。现在好了，我又投进了党的温暖怀抱，重新拥有了政治生命，从此我感到人生更有价值，生活也更加美好了！

恢复了组织关系后，组织上决定我继续参加“武自会”的工作，同时，广泛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八一三”淞沪战役我动员了三名护士参加火线救护

恢复党组织关系后，我又在上海工作了一年，这样我在上海总共呆了两年。

第一年主要是找党，通过各种关系找党，参加各种活动找党。如前所说，经杨成祺介绍我与任铁锋都参加了“武自会”。任铁锋首先在大中学校的教职工中建立了联系，后来又与海关、邮政部门的一些职员和几个工厂的“武自会”建立了联系。虽然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但“武自会”的工作方法完全是秘密工作那一套，多为单线联系，张三的关系李四不知道，李四的关系张三不知道，“关系”之间也互不来往。所以任铁锋在上海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关系我并不知道，而且从不打听，这是秘密工作的纪律。

因为我的工作对象是女工和女青年，所以便经常往工厂区跑。苏州河畔日资开办的鸿兴纱厂的宿舍区我去过多次，记得有个我负责联系的女工和她丈夫都是“武自会”成员，她邻居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在明星香水厂做工，也是“武自会”成员。但他们的姓名几乎全忘了。

现在还记得名字的只有钱秀贞和徐启明了。她俩是住在一起的同乡加同学，又是好朋友，都是中学毕业后来上海找出路的。钱秀贞在杨树浦某纱厂做工，徐启明（又名徐婉榕）则是小学教员。纱厂女工很辛苦，早上四点就要起床，五点开工，一直要干到下午六点才放工，迟到要扣很多钱；中午不停机，自带饭盒，一边吃一边看机器，每天要拼死拼活干足十三个小时。放工回来钱秀贞早已精疲力竭，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为了省事，她总

是做一顿饭吃上两三天，在老虎灶上打些开水，冲碗泡饭就点酸菜就对付了。尽管这样，这些苦苦挣扎的女工参加“武自会”的抗日救亡活动还是十分踊跃，十分热情。不是为了抗日救亡工作，不是向往光明追求真理，这些家庭条件并不坏的女学生能吃得了这种苦，受得起这份罪吗？

我除了做女工工作、参加女教师读书会，还广泛参加了上海市的各种爱国抗日的群众活动。

一九三六年“三八”节的游行示威，至今记忆犹新，我参与了这次游行示威的全过程，是这次活动的见证人。

恢复党组织关系后，我工作的劲头更大了，组织上决定我继续参加“武自会”工作，于是，我参加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发起的“小先生制”活动。这项活动是组织一些好学上进、热心教育的中学生，在课余时间为里弄失学青少年上课。我联系的是其中一个小组，几个中学生都只有十六七岁，家庭条件也都不错。我们借了附近小学一间教室，吸收了七八个十一岁至十四岁的失学少年，每天放学后在这里由小先生为他们上文化课，同时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我热心于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通过与这些“小先生”、“小学生”交朋友，多取得一些社会关系，以便更好地掩护秘密工作和开展党的工作。

我还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该会原有的宗旨当然是宣传基督教的，但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姓邓）大约与史良等爱国人士熟悉，便用女青年会的名义办起了女工夜校，采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而学文化倒在其次，甚至只是一个幌子。我在女工夜校也讲过课，记得我与陈维涛就是在夜校认识的。

此外，我还参加了世界语学习班、歌咏队等。广泛参加这些进步活动，既团结了群众、宣传了革命，又活跃了生活、陶冶了情操，还增长了自己的才干。

罗淑章办的女子职业学校我也常去，我与罗淑章并没有直接的来往，但这个学校的李淑英（她是刘宁一的夫人）我曾多次与其联系，她当时是上海烟厂的工人。我建立的工作关系还有上海仁济医院的几个女护士，每有群众游行或“飞行集会”，她们都带着急救包走在队伍里，担当救护工作。“八一三”淞沪之战中，上海党组织与国民党联手组织了武装别动队，狙击日军，我动员了三名女护士参加别动队，在火线做救护工作。

鲁迅先生出殡，实际上又是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出殡队伍里，宋庆龄和史良、沈钧儒等七君子走在前面，我们紧跟其后，人流浩浩荡荡，场面十分壮观。

一九三七年一月前后，上海特科接替“王大哥”与我们联系的陈同志来说：为了统一上海党组织，今后各方面在上海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一律归于上海市委领导。陈同志通知我们：我们的组织关系也已经转到上海市委了，与他同来的浙江籍的林同志就是今后上海市委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

林同志来后，我们又一次把自己的履历向组织作了简要汇报，为的是他能尽早对我们有所了解。之后，除了林同志与我们联系外，林同志的夫人也常来。从此后我与任铁锋便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工作，党组织的联系人也一直是林同志，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我离开上海为止。

由于在上海被特务盯梢，工作越来越困难，组织上决定我离开上海去延安；任铁锋在淞沪战役中组织的别动队被打垮，带着三名女护士赶到武汉向党报告情况，被开除党籍，自谋出路

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当局结束十年内战。翌年“七七”事变中日两国军队激战于

卢沟桥，从此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八月，国共双方达成了将延安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 等协议。由此，国共两党开始重新合作，由我党倡导的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但是，国民党方面一边说合作，一边又千方百计限制或破坏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活动，甚至依然把共产党当做敌人。所以我们在上海仍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我参加的公开活动日益增多，逐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所以常被盯梢。

国民党有一张密密匝匝的暗探网，覆盖了整个大上海，几乎每一条街道上都有便衣探子，数量多到这边暗探打个暗号那边暗探就能听到、看到，弄得老百姓人人自危，也给党的地下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特务盯梢往往不是一人盯到底，因为那样容易被发现，他们采用的是一站交一站的接力方式，粘着对象不放，一直跟到你的住处。可是特务再狡猾，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还是能一眼识破，及时采取措施甩掉“尾巴”。当然也可能你自以为把尾巴甩了，其实另一条“尾巴”又跟上了你，所以稍有不慎，就会铸成大错。

有一次我参加读书讨论会出来，就发觉被特务盯上了，转了几条马路，在几个商店里进进出出，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特务的面孔换了好几个，但总有一条“尾巴”若即若离地咬在后面，甩不脱。最后，我只好走到法租界霞飞路里弄里的一个有钱人家门口。这家主人是一个花露水厂的经理，他儿子是中学生，要求进步，是“小先生制”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家我去过，认识他的家人和佣人。女佣人为我开了门，就在她转身关门之际，我已快步穿过门厅打开后门拐进了另一条里弄，佣人还以为我上了二楼呢。就这样，我机智地摆脱了特务的跟踪。

又一次是晚上，我从一个同志家出来，在一条比较黑的马路

上突然发现被暗探跟上了。转了几条马路，还是不能摆脱，他时而在后，时而在前，时而又与我擦肩而过，我既不能掉以轻心，又不能张惶失措，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一边快速地开动脑筋想主意。到了法租界，看到有一个安南巡逻兵在路口站着，我灵机一动，赶快走到巡逻兵跟前，指着尾随来的暗探说："先生，他不是好人，他调戏我！"我又回身双手叉腰指着暗探骂："你良心哪里去了？上海炮火连天，东洋人天天轰炸，老百姓连条活路都没有了，你还想欺侮人，你还有点人味吗？"那暗探不防我有这一手，可能也因为我骂得在理，他一时竟无言以对，慌忙中掏出"派司"递给安南巡捕，谁知那二鬼子偏要充大，看过证件还声色俱厉地训斥他："以后放规矩点！听到没有？"特务连声喏喏，抓起"派司"跳上电车便跑了。

由于被盯梢多了，我在上海的工作越来越困难，组织上便决定让我撤离上海，到延安去。

延安，是我心中的圣地，延安有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许多我熟悉的老领导、老朋友，能去延安，真是太幸福了！我拿到了党组织的介绍信，计划经由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前往延安。

而任铁锋已先我一步离开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时，上海的黄色工会与我党合作，组织起了一支武装别动队，大家各有一两千人，他们的人任大队长，任铁锋是我党派任的副大队长。任铁锋搞过军队，他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福州马尾练营的学员，曾组织过武装暴动，带过兵，打仗很勇敢。但是临时组建的这支别动队的成员却几乎无一具有军事常识，政治素质也很差，所以与日本军队在水网地带一交手就被打垮了，一垮队伍就散了，最后只剩了二十多人。任铁锋带着三名仁济医院的女护士（其中一人成为他的妻子），赶到武汉向党组织报告了这一失败。听到队伍打没了，领导同志很生气，就叫他回了上海，之后上级又开除了他的党籍，让他自谋出路。

新四军成立之后，任铁锋曾要求到新四军工作，但他的要求未被理睬。由于在上海生活无着，他只好回了福建，与一同乡（原也是共产党员）合伙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

由于他的合伙人曾叛变，并做了特务，任铁锋虽未加入特务组织，但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反五反”中，任铁锋受牵连被打成反革命，抓起来关了好几年。放出来之后，他就在福建省的一个机关里当了名一般干部。

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重新审查了他的历史，为他平反、落实了政策，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定为行政十四级，由于年事已高，便没有再安排相应职务。

任铁锋晚年十分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尤其关心闽东的党史工作，闽东几次举行党史征研活动，他都应邀参加了。

任铁锋一九八七年病逝于上海，享年七十八岁。

在南京，我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向人打听陶铸在狱中的情况，得知他是军人监狱里各项斗争的领导人，骨头最硬，我喜形于色

我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离开上海的。

那时上海到南京的铁路沿线是日机袭击的重点，几乎天天遭轰炸扫射，但许多急于离开火线的军民，还是把车厢挤得水泄不通。火车尚未出上海站，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旅客们纷纷背上行李往外跑。我手提一个被包、一个箱子怎么也跑不动，幸好同车厢一个国民党的轻伤士兵主动帮了我一把。

火车才开了一站地，就再次遇上了敌机，大家又跑下车等了几个小时，其间又遇上多次空袭。后来通知说火车不走了，我们只好改乘长途汽车。不料公路上日军飞机也来袭击，有的乘客吓

得直接从行驶着的汽车的窗口往外跳，好几人因此受了伤。好不容易开到苏州，汽车也不走了，我只好进城找旅馆住下。

苏州原是座清幽的小城，早有所闻“小桥、流水、人家”，玲珑剔透，园林建筑又冠绝江南。可我进得城来，只见整个苏州城的房屋都刷成了黑色，街上十室九闭、行人寥落，全城闷沉沉、阴森森，一片肃杀，好像进了阴曹地府一般。面前见到的景象和过去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让人真切地感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就这么走走停停，整整两天两夜我才从上海来到南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便送我到了招待所——这是党的招待所呀！心里这么想着，便感到浑身都热乎乎的。

招待所设在南京郊区的一座平房里，窗外是一片绿油油的田园风光。所长之一是夏子翔，所里住的大多是党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夏大姐和她母亲也刚从监狱出来。

我忐忑不安地向刚从南京军人监狱出来的曾宝打听陶铸。曾宝说：“陶铸前几天还在这里呀，现在调武汉湖北省工委去了。”

“那么，陶铸在狱中表现怎么样？”我急切地问道。

“他很坚定，是军人监狱里各项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我与陶铸是狱中的朋友，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外面传说他叛变了，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胡说八道，是敌人造谣！凡是军人监狱的政治犯都知道陶铸的骨头是最硬的，和敌人作斗争也是最坚决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喜出望外，多年的一个思想包袱终于放下了。曾宝见我有些喜形于色，忽然问我：“你是不是曾志？”我忙答：“是、是、是！”曾宝说：“啊呀，你怎么不早说？！在监狱里陶铸经常跟我提到你，他一出来就给你母亲那儿去了信，没有收到吗？”我便告诉他，已经多年未跟家里通信

了，家里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

事有凑巧，我们本来是要经郑州去延安的，因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护送我们的“交通”要送一份重要文件交武汉的董必武，所以决定领我们一起绕道武汉再去延安。此事于我自然是正中下怀了。

我们是随交通员搭江轮去武汉的，同行的还有后来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金祥。

第八章　武汉重逢

一到武汉，我立即写了张便条，告诉陶铸我已到此；陶铸风风火火地赶来，一边喘着气，一边嘟嘟嘟说个不停；四年的铁窗生活弄得他两颊深陷，二十八岁的青年跟四十岁差不多；我告诉他，我要去延安，陶铸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吧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汉口的一座小楼里，在这里我见到了党中央派驻武汉的代表董必武。董老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这次却是第一次见面。

其实他才五十多岁，以现在的标准说，算中年，尊其为“老”是因为在革命队伍中，他终究比其他同志年龄大些，可能还因为他有两撇八字须，待人接物又颇具长者之风的缘故吧！

董老和蔼可亲，让出了他的后房给我住。见到他，我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董老把离别多年的老伴也接来了，老伴也五十多岁，身体很不好。她是旧社会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心地善良，待人很和气。但她原来一直生活在旧式家庭里，并没有随董老出来投身于革命。

在办事处我还见到了李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我与李涛是“大同乡”，又是井冈山的战友，所以见了面彼此都很高兴。记得这位老兄爱吃猪肘子，只要条件允许，每天晚上都要炖一个两斤重的大肘子，一顿消灭光，

然后才安然入睡。这显然很不科学，因此三年以后我到延安再见他时，他已成了一个两百斤左右的大胖子，又害着青光眼，几乎完全失明，很可怜的样子，我只有暗暗为他惋惜，当然，这是后话了。

一到武汉办事处，我立即写了一张便条，告诉陶铸我已到此，请李涛派人送武昌。大约晚上八点，陶铸风风火火地来了，一边喘着气一边嘟嘟嘟说个不停，根本不容我插一句：

"上午看到你的信，喜出望外，恨不得马上过江来，可是下午有会，我真有点坐不住，直到六点才赶到码头，又遇大风，轮渡不肯开，我急得要命，后来轮渡终于冒险开了，谢天谢地，差点过不来了！"忽然，他打住了话头，双眸充满了柔情，音调也好似降低了八度："我还饿着肚子呢，我们找个馆子吃饭去吧！"

我微笑着默默地听他倾诉，心里又甜又酸，百感交集。他瘦得要命，四年的铁窗生涯弄得他脸色苍白两颊深陷，越发显得眉重眼大，一件对襟盘扣夹袄，套在一身骨头架子上，晃里晃当。这哪里像个二十八岁的青年，说四十岁差不多。然而听他说话看他眼神，却依然还是那个热情奔放、犀利敏锐、火一样的陶铸。

我们走上街头，他不停地侧过脸来上上下下打量我，像是不认识，像是看不够，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嗔他："你发神经啦！"他笑了："真的是你吗？不是做梦吧？"高兴得简直像个孩子。他说："我出狱的当天就给你写信了。是寄到你母亲那儿转的，二十多天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可把我急坏了。谁料想此刻你已在身边了，真像做梦。"又想起什么，哈哈笑道："我们正开会，忽然收到你的条子，我就有些坐不住了。钱瑛大姐开我的玩笑，说：曾志来了，看把陶铸高兴的，全身的寒毛都飞起来啦！"

在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边吃边小声说了别后的遭遇经历。他

告诉我，他现任中共湖北省工委（省临委及省委的前身）委员，分管宣传、青运和文化。目前正组织群众，筹备保卫大武汉的游行，并在发动献金运动，联系上层人士，忙得不亦乐乎。我对他说，我是路过武汉的，过两天就要随“交通”去延安。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吧！”我很矛盾，从感情上说我是愿意留下的，毕竟我们已分别四年半了，但延安是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于是我不置可否地说：“上海党组织是介绍我去延安的。”他恳切地对我说：“还是留下吧，我跟郭述申同志（省工委书记）说去！”

我们谈到夜半时分。陶铸说：“现在过不了江了，就在你这里住下吧！”第二天一早他又回了武昌。

第三天早晨我刚起床，郭述申来了，说：“你是曾志同志吧？昨天陶铸同志跟我说了，我们都欢迎你留在湖北工作。把你的介绍信给我吧，由我们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你就放心好了。”见他这么热情，我只好把介绍信交给了他，其实我心里还是十分矛盾。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做地下工作，要时时具备两副面孔，很憋气，我早就厌烦了；而延安是我们的天地，公开生活，自由呼吸，心情一定十分舒畅，在那样的条件下工作学习该有多幸福啊！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扫陶铸的兴，再说，我也不是个怕死的人——谁都知道在国统区工作，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我就没再坚持要走。

经组织决定，我终于留在武汉了，省工委安排我担任省妇委书记。

为陶铸出狱，李克农出了大力，但两人之间却没见过面；陶铸去长江局找周恩来，被一个人拦住，两个人打作一团；周恩来厉声大叫“你们干什么?”住了手的两人还不服气，一个说“是他不报姓名”，一个说“是

他先动手打人”；陶铸不与有变节行为的哥哥往来

陶铸和我在汉口租了一间楼上的房子，厨房却在楼下，是与别人共用的。家具很简单，都是租来的，不过一张棕床、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而已，价钱也不贵，每月一块银元，再添置些锅碗瓢盆，家就安起来了。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各干各的工作，却也天天其乐融融，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与陶铸在湖北。

有一天半夜两点了，陶铸还没有回来。去什么地方了呢？会不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呢？想想不太可能，因为国共两党刚刚合作，团结的呼声很高，那么总是忙工作吧！大约两点半了，才有人在楼下敲门，我赶紧下楼开门，陶铸一声不吭，气冲冲地上了楼。我走上前正要问他，却发现他额头上鼓起核桃大的一个包。“是被特务打了吗？”我急忙问他。他“哼”了一声，气呼呼地说：“我跟长江局的李克农打架了！”我吓了一跳：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我与陶铸都知道，李克农在营救陶铸等人出狱过程中是出了大力的。

国共两党合作后，虽然两党达成了释放政治犯的默契，但国民党方面却仍关押着许多我党重要干部，如若我们拿不出真凭实

据，他们是一律不会承认，更不会放人的。在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李克农同国民党特务进行了一场智慧和勇气的较量，多方位、多渠道地巧妙收集我党被押干部的名单和关押地点。陶铸等人的材料就是从一个秘密渠道送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接到情报，李克农即让人弄来几套国民党的将校军服，他自己穿了少将那套，让另外几位同志当了少校，几个人大模大样来到国民党的司法部门和监狱，向他们要人。至此国民党当局已没有理由再推脱，所以不费周折就把陶铸他们营救出来了。

对李克农的大智大勇，陶铸十分敬佩，出狱后曾去办事处，想会会李克农，以表示谢意，但却恰逢李克农外出而没有见着。这样两人便一直不认识。

这天陶铸去长江局找周恩来，他向来性子急，所以是“登登登”跑上楼的，这时突然从楼梯口闪出一人，大声喝道：“什么人，站住！”陶铸见他挺凶，哪里受得了，便回说：“你这官僚主义，嚷什么！”一面继续跑上楼。说话间，上面那人已经给了陶铸一拳，陶铸哪怕这个，也顺手给了他一巴掌，把那人的眼镜打落在地并且摔碎了，于是两人打作一团，从楼梯上打到楼下的客厅，仍不歇手。周恩来闻声赶忙出来，厉声大叫：“你们干什么！”那人气呼呼地说：“不知什么人，硬要上楼！”周恩来一看：“他是陶铸！”又对陶铸说：“他是李克农！”两人这才住手。住了手还不服气，一个说：“是他不报姓名！”一个说：“是他先动手打人！”

两个血气方刚的高级干部这一幕好戏在五十五年后被《陶铸传》的作者谑称为“三岔口”。

以后，陶铸和李克农只要一见面，说起此事都会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在武汉的住房很小，不过十平方米左右。伙食也很简单：早餐买着吃，中午与晚上自己做，不过一菜一饭，吃饱就

算。但我们非常快乐，生活得很幸福。就陶铸而言，他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了近五年，居然得到了自由，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而我漂泊无定，辗转千里，也历经了艰险磨难。现在终于团聚了，这比什么锦衣玉食都好，我们怎能不快乐、不幸福呢！现在回忆那小房子里短短几个月的生活，仍感到是那样温馨，那样甜蜜。陶铸对我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尽管我们的钱很少，但即使只有一个桔子，他也只吃一半，要留半个给我。他常在我耳边轻轻说："你真是我的好人儿。对党你是努力工作的好同志，对我你是温良贤惠的好妻子，我真有福气噢！"

在武汉的那段日子里，我和陶铸还抽空去寻访了他的同乡又是儿时好友的徐任吾，并由此弄清楚了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徐任吾是旧知识分子，曾参加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时又自动脱党，但没有自首，后来便在一个果园里管果树，住在汉阳的鹦鹉洲。这也是陶铸一九三三年调上海另行分配工作离开福州时，留给我的永久转信地址。

我们去鹦鹉洲找他，他已不在果园做事，而在汉口为一个也是同乡的国民党官僚看管一座很大的空房子。找到徐任吾，谈话中，我问起一九三五年我通过鹦鹉洲果园地址托他给南京监狱陶铸转信的事。徐任吾叹了口气："唉，这还要从陶耐存（陶铸的胞兄）说起！"

原来，一九三四年陶耐存在福建被国民党逮捕后就变节了，后因其书、文俱佳而被国民党福州警备团长看中留做了团长的书记官，陶耐存当书记官后又写信把徐任吾叫去做了司书。徐任吾到福州后，我寄往鹦鹉洲果园托他代转的信也被转寄到了福州，徐任吾接信后便及时转到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陶铸的手上。但事后他却把此事告诉了陶耐存，陶耐存又顺口告诉了叛徒周剑心。不料周剑心一听此事便立即带上特务赶到南京监狱，搜到了这封信，又按信上的地址到广州李端处抓我，结果把李端抓走了。

终于真相大白了！陶铸说："原来如此！我就奇怪，怎么单单把曾志的来信搜走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李端那头出了问题，之后便再不敢给李端写信，同时也没有再收到曾志的信。"

此后不久，陶耐存也来到了武汉，住在徐任吾处，传话来说想见见我们。陶耐存在国民党里做官儿，而且是自首变节之人，按理我们不应理睬他；但是，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像蒋介石这样血债累累的反动头子都要团结，对陶耐存似乎也要讲点政策，再说他虽有变节行为，但没有出卖同志，而且又是专程来看我们的，所以还是决定去见他一面。

见面地点在徐任吾那里，徐任吾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说些家常，便散了。我们离开徐任吾住处时，陶耐存见陶铸衣服单薄，就把自己穿的一件毛料衣服脱下给了陶铸。回来后陶铸把那衣服顺手挂在了墙壁的钉子上，许久没再动它。有一天，他拿这件衣服去晒，掏掏口袋却发现了一张纸条，打开一看是特务组织蓝衣社的便笺，陶铸很气愤，对我说："耐存这家伙还参加了蓝衣社，真是可恨！今后不要再理他！"从这以后直到全国解放，我们再没有跟他有过来往。

陶铸主持汤池训练班，我被任命为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兼教员；陶铸把"农村贷款工作"叫"敲门砖"，王明却说违背了"统一战线"；蒋介石惊恐地说："汤池训练班是红军大学"

北平、天津失守后，在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下，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平津等地流亡学生成批成批来到武汉，其中大多是进步青年，还有不少学生党员，一时，武汉成了国统区里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大本营。

当时国民党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是董必武辛亥革命时的朋友，又是与董老一起考取秀才的同窗，由于日军入侵，国难当头，因此他很关心抗日救亡的爱国活动。在一天夜里，他秘密前去拜望董老，请教今后如何合作抗战。

石瑛说：建设厅下面有一个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由他兼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训练农村合作人员，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几批农村合作指导员都只知做官，不会做事，农民得不到实惠，许多贷款还被“指导员”中饱私囊了。石瑛希望再办几期训练班，请共产党参与领导，由共产党来训练。对此积极的意向，董老当即表示了支持。

石瑛得到支持后，便找建设厅棉业改良所所长杨显东具体商议开办训练班的事宜。棉业专家杨显东提议，训练班可请李范一先生作名誉主持。

李范一也是董老辛亥革命时的朋友，在美国学的是实业，回国后提倡“实业救国”，当时是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的委员，正在应城县的汤池搞农村改进实验区，实际就是办了个农场，除种地、养猪外还开办了碾米厂、榨油厂、织布厂和供销合作社等。李先生为人清正廉洁，颇有抱负，此前还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安徽省建设厅厅长、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等职务，由他出面当然再合适不过。

杨显东还提议，训练班地址选在应城的汤池最好。对此，石瑛都一一同意，并同杨显东与农业银行农村贷款部主任孙耀华一同去应城征求李范一的意见。李先生早就听说人们对农村合作指导员颇有微辞，因此听了杨显东谈的新设想自然满口答应。

杨显东回到武汉先后向石瑛与董老报告了此事，董老通知中共湖北省临委派人介入此项工作。湖北省临委即派陶铸和刘顺元两同志以共产党员半公开的身份去汤池实际主持训练班工作。刘

顺元去半个月长江局便把他调走了，因此，训练班的领导担子就落在了陶铸一人肩上。



一九三八年与陶铸在湖北汤池训练班。

经过党内布置，招生工作几天就结束了。第一期学员约六七十人，多是平津来的进步的大学毕业生和肄业生。

训练班每期为一个多月。主要课程有：抗战形势分析、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政策等。陶铸亲自教授军用地图的测绘和游击战术课，在训练班上也讲怎样做农村调查、怎样发动群众，当然还有些农业贷款知识等。训练班主要采取先提出问题，然后进行座谈展开讨论，最后授课的形式，由于突破了教员讲、学员听的刻板模式，因此气氛相当活跃，师生都觉得心情舒畅。

我是随第二批招收的学员一起从武汉到汤池的，被任命为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并兼任教员。

我和陶铸住在李范一先生住宅旁有温泉浴室的小房子里，学员们则住在两里外的李家庙。

训练班的生活是很紧张很艰苦的，学员们一律睡地铺，蹲在地上吃饭，坐在地上学习，每天天刚亮，就要升旗跑步出早操，伙食以咸菜干饭为主，极少有鱼肉，这倒很像后来经历的延安生活。尽管这样，学员们却个个情绪高昂，天天歌声嘹亮。

除了课堂讨论，不时还有紧急集合和夜行军，也搞过小型军事演习。我们还带学员去附近的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大家在训练班里学政治、学军事、接触社会、磨练意志，每个人都明白训练班的宗旨是为这场正义战争培养合格的干部，是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基础作准备，而农村贷款指导工作，只是发动群众的先导，拿陶铸的话讲叫“敲门砖”。学员中大多是流亡学生，他们饱经了家破人亡背井离乡的苦楚，抗日的觉悟很高，所以都拥护训练班这一宗旨。

可是当陶铸将这一宗旨报告临时省委和长江局时，王明却批评说，我们这样做违背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王明又说：什么“敲门砖”！训练班就是培养农村贷款指导员，不要搞成游击战争训练班！

王明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共产国际书记处派回国后，一直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自居，到处指手画脚，推行他“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的错误路线，干扰中央“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

陶铸虽挨了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回汤池后仍按既定的办学宗旨培训学员。除了让学员进行游击战争训练外，他还为湖北一旦沦陷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实际准备工作：他亲自到鄂中大洪山区察看地形，绘制了十多张军用地图；又派出骨干学员深入山区要地，做发动组织群众和布置游击战争后方根据地的工作。他还从训练班极其有限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加上李范一先生资助汤池合作社的资金共三千六百元，委托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香港购回了二十四枝德国造的驳壳枪。除此之外，他又派人打入国民党的联保武装，开展统战工作，力求影响甚至控制这支队伍为我所用，他还十分注重在上层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中开展工作，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我的工作主要是了解和考察学员的政治思想表现和发展党员，以便结业时能有一批人走出汤池到各地去建立并发展党的组织。支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负责地方的党组织建设，因此我经常将因种种原因而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地方同志请来谈话，审查其历史，研究并决定可否为其恢复党籍。我还直接去应城的陈家河、天门的皂市、汉川和京山等地，恢复和建立党的支部，发展党员，发动组织群众，为进行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作准备。陶铸与我当时都年轻，脑子也快，又都有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的实际经验，所以在训练班里我们很快就分别写出了教材。陶铸写的是《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我写的是《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都有一万余字。师生们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经过扬弃和提炼升华后也吸收进了文章。这两本小册子很快由武汉某书店出版并公开发行，有一次我去武汉，在金城书店的书架上还看到过。可惜由于战争的原因，我们竟没有保存下这两本书，实为憾事。

汤池训练班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大特务康泽、徐恩曾和一些国民党政要或派人或亲自前往“参观”、“视察”（实为监视），甚至蒋介石也惊恐地说：汤池训练班是一所“红军大学”。十分耐人寻味的是，被派往监视训练班的人不少后来都投向了共产党。其中，负有监视任务的应城督学张谦光在汤池旁听了两星期课之后，思想认识上便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到应城即以督学的名义，一面积极鼓励当地青年去汤池训练班学习，一面亲自带领进步教师下乡宣传抗日。应城沦陷后，他坚定地投身于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很快入了党，以后又先后担负过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的重任。正因汤池训练班具有如此之大的感召力，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一九三八年五月，汤池训练班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勒令停办。

应城汤池训练班，只办了三期，但三期训练班却培养出了三百多名抗战骨干，他们后来分散在鄂中各县以及鄂西北一些县担任农村合作贷款指导员。凡派有指导员的地方都建立起了农村合作贷款指导小组。汤池训练班的学员，后来遍布到湖北三十二个县。党利用这个公开阵地，借官方名义，大力开展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筹组武装力量、准备抗战的活动，从而取得了农村工作的主动权，为之后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作了充分准备。正如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所说的，汤池训练班成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之一，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这个训练班后来在武昌续办了一期，不过那时陶铸与我都已离开了。

长江干训班还未开学，却让我卷起铺盖回汤池，连支部书记的职务也被撤销了；陶铸鼓励我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革命锐气；武汉失守，国民党军溃退，陶铸赴大洪山打游击

还是在汤池训练班的后期，省临委组织部调我到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我很高兴，因为多年做地下工作没有学习的机会，早就盼望坐下来好好学点理论了。我兴高采烈地移交了工作离开汤池来到汉口，一进训练班就碰到了章蕴，可谓喜出望外。

章蕴是我在长沙读书时的同学，不过当时我在初四年级，她在高二年级。那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贵族学校”。因大家都在学校住宿，学校便给寄宿生立了规矩：高年级学生必须管教低年级学生，章蕴就是学校指定来管教我的。我与她除了不在一起上课，其他都在一起：睡觉是床连

床，吃饭坐一张桌，自习在同一教室，于是事无巨细，包括起床、穿衣、睡觉，大学生都要管小学生。但她对我很好，从不责备，时时像亲姐姐那样关照我，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自我参加革命后与她再未联系，想不到我们都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了！

然而，平地起风波，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训练班尚未开学，却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卷起铺盖返回汤池，但组织上并未说明不让学习的原因。

回到汤池训练班，发觉我已被免去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成了没有任务的闲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思想上很苦闷。尽管如此，我仍自己找工作做，因为我作为教员的身份并没有被取消。于是我照样参加学员的学习讨论，找学员和地方同志谈话，也到校外去做社会调查。

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的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一生的信条。我这一辈子多次身处逆境，但这个信条却从未改变或动摇过。

后来才听说是福建办事处的范某某打了电报给长江局，说我同任达（即任铁锋）是从闽东苏区逃跑出来的。

这件事当时把陶铸也牵连进去了，有人硬说任达就是陶铸，因为陶铸笔名叫任陶。但即使在这种时候，陶铸也仍然鼓励我振作精神自觉搞好工作。他说，我们之所以参加革命是因为我们追求真理，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们自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党的哪个领导或哪个组织，无论信任或不信任，都不能动摇我们自觉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愿随时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员，什么时候也不能对革命事业丧失信心，什么时候也不能丧失革命锐气，什么时候都要坚持为党工作。

陶铸的鼓励给了我莫大安慰。我暗暗叮嘱自己：尽管职务有高有低，但思想上我不能落后于他！我知道，“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情古已有之。但再重的舌头也压不死我为党献身的决

心!

然而，厄运之火不久也烧到了陶铸的头上。

由于汤池训练班的宗旨与王明“统一战线至上”的右倾主张背道而驰，陶铸又不听“招呼”，所以第三期训练班还没有结束王明就下令将陶铸调离了。一九三八年六月湖北省委改选时又将一直任省工委和临时省委委员、一度还担任省临委副书记的陶铸排挤在外，说是要他去宜昌，在鄂西中心县委另行分配工作。可是等陶铸离开汤池到达宜昌时却又什么工作也不分配，只让他就地待命。

这是陶铸第二次被王明免职。同样都说另行分配工作，同样是什么工作也不分配!

把个人成见引入党内严肃的路线斗争，这也是王明的一大“发明”，王明的狭隘与偏执由此可见一斑。

陶铸被调离汤池时，战局已经很明朗：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武汉失守是不可避免的了。

训练班为陶铸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师生们在发言中对逼走陶铸都很义愤，陶铸则坚定地对大家说：

“我现在是暂时离开大家，一旦武汉沦陷，我会立刻回来的！到那时，我们一起去敌后打游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陶铸压倒一切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训练班师生的心。

我这时在汤池训练班已无工作，只保留了党籍，不过是陶铸家属，这样我也只好随陶铸走了。

我们在宜昌住了一个月，陶铸的任命仍没有来，后来听说让他去重庆，陶铸火了：

“去重庆干什么！我的岗位在前线！”

十月二十六日武汉失守了，日军先是占领了武汉三镇，随即又占领了武汉外围的一些城镇，而国民党军队却像潮水般地四处

溃退。

正是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陶铸决定：迎着国民党的溃军走！上鄂中，上大洪山去！

——这就是陶铸，一个为了真理和正义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人！

我决定不随他走。我要随荆门来的郑速燕到鄂西的荆门，去开辟自己全新的工作！于是我们向鄂西中心县委作了汇报。

中心县委同意后，我们三人就出发了。那是一个大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秋露很重，身上冷飕飕地的。我们一起上了宜昌开往襄樊、荆门的长途客车。车子开到十里铺时，陶铸就下车了，他要从这儿徒步去鄂中大洪山区。

陶铸口袋里插着把牙刷，提了一个竹篮子，三步一回头地渐渐走远了。唉，此去鄂中几百里，关山迢遥，土匪如毛，你独自一人，可要善自珍重啊！

没有儿女情长的送别，我在颠簸的汽车上默默目送着踽踽独行的陶铸渐去渐远，目送他融没在一片金色的秋阳中……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义无反顾地各奔东西，走向了不同的战场。

《陶铸传》写道："在抗日战争时期，鄂中能很快开创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树起新四军的大旗，是陶铸同志坚定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的结果。"李先念曾说，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靠八条枪起家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成了以后发展、坚持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王明打击陶铸，但鄂中的广大党员、游击队员、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却十分信任拥戴陶铸，即便是六十年后的今天，鄂中人民也仍在怀念陶铸。